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分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討論青年求學的問題

詠霓

裁兵問題的研究

吳景超

太原見聞記

陶希聖

一個重要問題的討論

誰來訓政？

何魯成

附答

叔永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侯記書
天津	成府書局（代定） 燕大燕昌號
上海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新華書局 亞東圖書公司
南京	新中華書局 正中華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花牌
鎮江	鎮江書局（代定）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熱	現代書局
漢口	開明書局 萬善書 金城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
廣州	神州書局 現代書局
汕頭	華南書局 圖書消費社
汕頭	大東書局 新民國書店
汕頭	新時代書局 百利公司
汕頭	海門會文書局 南書局
汕頭	師專書局 永昌公司
汕頭	東方書局（代定）中山書
汕頭	店 遠東書局 春記報社
汕頭	吉昇昌書局 春記報社
汕頭	荷翠書報代辦部
汕頭	文者書局 圖書館
汕頭	安徽省立圖書館
汕頭	安海書局 中華書局
汕頭	甘肅書局 統一派報所
汕頭	華新書局 統一派報所
汕頭	西太派報社
汕頭	甘肅書局 統一派報所
汕頭	現代書局
汕頭	文寶書局
汕頭	新川書局
汕頭	朋友書局
汕頭	東方書局
汕頭	新友書局
汕頭	萬有圖書公司
汕頭	開明書局
汕頭	衡州派報社

獨立評論

第十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外國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五六

討論青年求學的問題

詠霓

近來又收到好幾封青年朋友的來信，說要指導這樣，指導那樣。其實我那裏敢指導，有許多事，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樣是好。但是他們來信的意思大都是很懇切的，叫我不好不覆。還有一位廣東朋友，來信封面上只寫「詠霓先生」，連姓都不知道，可見他們真是對於問題本身的熱心，真是希望得到一些誠懇的答解。

許多問題，歸納起來，其實不過是求學與做人二件大事。從古以來，老輩所教，後生所學，千言萬語，原也不過是這二件事。在外國也完全是一樣。但關於做人的問題，太重太複雜了，現在還不敢亂說。這一次要想將關於青年求學的問題先來談談。那裏敢說指導，祇是一種討論的貢獻罷了。

第一是中學生的求學問題。中學畢業之後，沒有能力進大學的人，往往陷于悲觀，要問如何能夠升學。其實大可不必灰心。一個人在社會上做一個木匠，和做一個大學教授，稱呼或有不同，價值並不兩樣。無論那種職業，你只要盡心去幹，都是有趣味有意義的。近時有許多人往往

慨歎中學功課之不切實用，除了升學之外。因此中學畢業生如果不能升入大學時也自以為數年學問完全白費。這種觀念是錯悞的。中學既不是職業學校，當然並不是為養成特別技能。畢業之後如果不入大學，自然還要找一個職業盡心的去學。一個中學畢業生去做一個商店的售貨員，工廠的監工人，這都不算是什麼委屈，這是很好的服務機會。在初做的時候要和未受中學教育的人一樣的盡心去學，但是學下去做下去，受過教育的人究竟應該比未受教育的人高出許多。例如中學校所學的珠算也許及不到商店夥計的爛熟，但你如果進了商店還肯學習，那你有丁數學根柢，難道不能在短時間內追上他們，勝過他們？受過中學教育的人對於通信的文字，簿記的運用，總應該比未受教育的強。對於一切業務，只要用心去學，中學的常識總有許多幫助。這使都是成功的基礎。中等教育本來不是養成專門的技術，而是養成求學做事的基礎。一個人有了這個基礎，再從一種職業上去學去做，這樣從實際得到的經驗，決不下於從大學得到的技能。很有幾位中學畢業不能升

學的人問我如何讀繼求學，我只有勸他們用常識基礎，在他們職業上努力去學去做，不要三心兩意，空想不可必得莫名其妙的「高深學問」。

第二是進大學的問題。一個人能夠進大學的確是一種幸運，因為許多知識——即使是許多心靈上的享受——都從此可以得到。有一位學生進了大學，反而發生疑問說：叫家裏化了許多錢進大學，你看到底是否值得呢？我可以無疑地答復說是完全值得的，只要你能好好的利用這個機會。我很夢想世界上社會組織能夠進步到這樣程度，使得人人能受大學教育。大學畢了業儘管還去種田，還去經商，但是人人能夠受過完全教育，豈不是把整個的人類提高？但這不過是一個烏託邦的理想，現在且談實際的問題。

青年進大學的問題可分為二個，一是擇校，二是選學。擇校是很要緊的。近來中國大學雖然整頓得略有成效，——說他們毫無進步是絕對冤枉的——但還不能完全都好。某校某院學風的好壞，社會上大概有相當公論的。某校某系教師的好壞，只要問幾個專門朋友，也不難得到大概的標準。現在還免不了有虛裝門面的校院和勉強充數的教授，却也不少設備充足和熱心教導的。好壞之間相差甚遠，入學的人必須仔細打聽一下。如果考不取好的學校，寧使多

等一年再考。不可勉強進入太壞的學校。如果屢次考不上好的學校，那也只好承認自己的學力不足或是運氣不好，寧使忍一下氣，另求出路，即如上節所說的中學生能做的職業，也不可勉強去進太壞的大學。因為做一個名不符實的大學畢業生，實不如做一個實事求是的普通工作者。

選學與擇業有連帶關係。這都有二種標準。一是個人的嗜好，二是做事的利便。前者在少數特出的人才應該格外注重，後者則多數人應該多加注意。特出的人才是不為環境所拘的。他們只管就自己性之所近儘力去幹，不問社會上要不要。其結果他們往往能夠得到超異的成績，出人頭地，打破紀錄，使他所學所做的更進一步。凡是能夠出人頭地的工作，無論何學何業，都是好的，都是民族的光榮人類的成績。不但是化學，物理，我們需要這樣特出的人才，便是吟詩作賦寫小說，也應該聽從天才發展，值得受社會供養。不過為多數普通人說，我想該注意到各人的實際環境。選學的時候便要想想就業的途徑，擇業的時候便應想想做事的步驟。一個家資巨萬在家已經飽讀線裝書的青年，強要再學農學，畢業之後，決不會實際去從事農業的。如此學而不用，還不如學自己有興味的社會科學能合實用。又如一個開大工廠的子弟，應該多有機會知道

某種機械之缺乏專門；一個理科教授的朋友，應該容易探聽某種問題之少人研究。缺少的便是需要的，也便是學成了容易致用容易見效的。如果要考慮需要的話，我想那樣看法像是最好標準。至於這個高唱普羅文學，那個大叫國防工業，如果並無內容，也只成爲一時時髦而已。

第三說到求學的方法，我有一個很簡單的貢獻，便是要一邊學一邊做。大多數學生只喜歡聽講，學理愈深愈好，學說愈新愈歡迎，弄得教授們傾箱倒匣的講，第四年的功課第三年已講過，過了第四年便感覺研究院裏無話可講（這當然都指好的學生和教授而言，壞的不論）。從中學到大學只是東手聽講，功課聽完，本事一點沒有學會，就是叫他們自己做起來還是一點不會。我曾看見測量學生已學過天文測算，而拿了一個指南針不知如何用法，地質學生已講過屋子屋宇種種地球原始，而拿了花崗岩呼生特司東（砂石）。這種學識當然無用。所以我教書的時候總是勸學生們不但是用耳用目的學，而還要動手動腳的做。這不但對大學生說，中學生也是如此。現在中學生不但別的即對於國文和數學也大欠練習的功夫。最近我代朋友看了二十本大學考卷，其中到有十八本文法不通或是白字甚多。所以近來專門畢業的青年往往專門工作已有相當成就，而

每有著述便覺大難，且多不好。這都是中學時代缺少練習之故。所以我以爲無論何種功課要叫學生做（做文章也是做）的功夫至少與教授講的功夫相等。能領導學生做的教授便是好教授，肯跟著教授做的便是好學生。反之只會講與只知聽講的都不會有好結果。許多學生有一種根本錯誤，害盡終身，更是他們以爲學一種科學只要學會方法。例如學測量的只明白書本上的經緯儀的用法，從不去辨識地上的形勢，更少能認識天上的星辰。其果結是測量學生甚多，實真的地圖猶如鳳毛麟角。又例如在外國學自然科學的只知略明原則大意，論到實際事物便以爲中外異致不甚注意，回到中國，各國東西既未精習，中國東西也不知道。他們以爲只要知道方法便算學會，將來儘管可以慢慢的做，實則一存此心必至終身不做，或一生不好好的做，那他們所認爲已會的方法也就白學了。試看現在有多少專家，說起來似乎頭頭是道，做起來大半顛倒荒唐，豈非盡是求學時代只學方法不肯實做的結果。所以凡事必須做得出做得好才算學會，只知方法是不足的。

在研究工作上，方法當然是最重要的，但也須有真實的對象與實際的問題，然後研究方有結果。例如十八九世紀中國學者也很受西洋科學的影響，用很近乎科學的方法

，來研究中國學術，一時稱爲樸學，在中國術學上放一異彩。不過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只是一些古人造作的文字，討論的問題只是一些挖東補西故紙堆上的東西。所以他們研究方法雖不錯而其結果大半是磨叨兜圈，極少進步，少能貢獻于人和知識及力量的前進。在同一時代，歐洲學者研究的論理方法實也不過如此，但他們却注重實事與實物，所以研究範圍愈拼愈廣，形象增身愈逐愈深，遂演成近代的科學成功！結果便大不同了。現在我們求學也是一樣，不但要會用科學方法，而且更要注意種種實際問題。從這眼光看起來，用科學方法做小說辨証，做碑版考訂，做紙片上的考古；雖然很有意義，究不免玩物喪志。在少數人儘可獨學自好，我們也十分欽佩，但並不希望多數學者都向那一方面走。

尤其是學自然科學及無用科學的，十分必要從實事實物去用心，萬不可勞精敝神于紙上文字。所以我常對我的地質朋友說我們做地質工作的如果一年沒上山便不配稱地質學者，應將大部份工夫用在實地和實物觀察，連做報告文字都不應該過於要佔我們時間。講到此點，我有一個意見可以借此談談。現在有許多入對於青年的文字功夫太不講究，發生感慨。我以為從前老教育，叫人讀書做文，只是教人能够言之有序，現在新教育，叫人求學，却是教人

能够言之有物。『有物』比有序好得多。在這個過渡時代，實質尚未充實，形式略爲退步，這也不足怪的。不過無論科學家工程師却總要思想清楚，能够分別是與非，知與不知，這種資格從著述文字上很容易看得出，而現在許多青年著作之中，實還相去太遠（俟另有機會再具體的說），這也是求學時代缺乏訓練之故。我們對於實學實物，第一要觀察，第二還要思想，慎思明辨，自然成爲文章了。

從這個觀點上我更想對不能在大城市服務的青年貢獻一些意見。有許多青年學生因爲大學裏有很像樣子的圖書館，畢業論文總是總圖書館裏找材料，因此他們以爲一切工作只有現成研究所等設備完備的機關纔能做。既不能人在大城市的究究機關服務，因此使灰心以爲學了無用，不肯用心。我曾聽見許多青年都說離開大城市從前所學一概無用了。這話是不盡然的。我們要做繁証博引的考証文章當然非有充分圖書設備不可。但做實事實物的觀察却有時離開大城市深入內地更容易多做出現在工作來。例如學自然科學的大學生，不但在大城市當助教，當研究員時，應該繼續研究，便是往內地去做中學教師也大可以做實地觀察。學問要到處可以應用，做事也隨時可以學問，一般大學生都應該有此信條。

在完結這段文字以前，我還想提出一個問題。在這個中國人一切自信心都動搖的時候，我們還有一種自信心，便是我們中國人學問上的能力真是不差。這不但是歐美大學裏考幾個超等博士可以證明，而且近幾年來在初發達的好幾種自然科學研究工作上，都可以看得出中國人思想的銳敏，得到結論的快速，決不在他國學者之下。也已有人在贊歎著我們東鄰同類學者在這一點上至少有些不如。這種結論當然未免太快。但在這個中國科學尚未成熟時代，中國人研究能力的確已經有所表顯了。不過我還有一些過慮，就我個人經驗所及，我覺得中國人學問能力也有些疑問。從前我最懷疑的是中國學生爲什麼稍爲勤學便要吐血生病，是否因爲能力太容易用力過度的原故。其實學生在校不過是工作開始，真正工作正在後來。如果開始入門便已如此踴躍，無怪畢業之後只好做閒官充名士了。近來似乎不大聽說因用功而生病的學生，用功的風氣不如從前呢，還是求學的方法改良進步了呢？還有一點，我覺得中國學者對於學問上專門精進頗爲快速，而往往缺乏觸類旁通的能力，缺少對於他種工作他種事業的適當瞭解與評量。這句話在多數人恐尙不能體會，現亦無暇細說，但我覺得是實在的。這種毛病的流弊是各種知識不能充分利用，

而在專門工作上也不易達到精深而又廣博的程度。他的原因似在乎學生求學時代只注意於一二門他所認爲主要的功課，而對於其他功課過於看輕，甚至一點不管。我們對於自己的專門固然必須十分用心，實學實做，而對於鄰近相關的功課也必須通達大意，不可只當作一種取得畢業學分的工具。如果大家都專了一小門東西而對於基礎知識和關係學科都一概不知，那我便不能不懷疑到我們腦子太小一裝就滿了。

末了，我要勸多數青年都省出一些功夫對中國的現勢得到一點切實的認識。中國整個的文化，整個的民族生命現在都已到了危急存亡間不容髮的時候，我們內政外交萬不可再有錯誤。從過去十餘年的歷史可以證明軍閥政客的行動上的罪惡固然萬喙難辭，其實危害國家的內政外交上的思想態度，大部份還是一般所謂知識階級的責任。現在許多青年對於中國內政的需要與外患的原因是否曾經切實研究明白認識，似乎很可疑問。青年們都是或都將是社會中堅份子，即使沒有興味從事政治工作，但對於國家大事明白認識與公平論斷的義務與權利，都是不能推脫的。如何能得到這種知識呢，最要緊的是看看中國近代史，尤其是近代外交史，例如大公報出版的『六十年中國與日本』

，青年學生都應該翻讀一下。更應該認識一些中國民窮財盡的背境及社會組織，庶幾年長做事不至茫然無措。再有工夫，不妨看看日本維新的歷史，俄國建設的計畫，可以知道人家是如何刻苦如何認真，所以能够轉危爲安，救亡圖強。青年學生於正式功課以外，涉獵消遣的閱讀是很重

裁兵問題的·研究

吳景超

在中國的各種社會問題中，最嚴重而又最難解決的一個，便是兵太多的問題。我們說他最嚴重，因爲中國現在最需要建設，最需要近代化，但是這一切，受了養兵太多的阻礙，幾乎不能進行。我們試舉目一觀，中國的財政，現在可以說是陷入最大的危機，全年的收入，無論如何是不够開支的，政府在山窮水盡之時，只好靠借公債度日。這種狀況，無論管理財政的人是如何的能幹，決不能支持長久的。造成這種局面的最大原因，便是軍費的支出太多，而軍費的支出太多，乃是因爲養兵太多的緣故。又爲談農村復興的人，對於時局最痛心疾首的，便是苛捐雜稅太多，這些苛捐雜稅，使農民在收穫豐裕的年歲，也因爲剝削太多，還是要過飢寒交迫，兒女啼號的日子。這些苛捐雜稅，是農民的致命傷，但是我們如問這些苛捐雜稅

要的。不但可以補充知識，還可以從此養成人格。對於無聊的小說或膚淺的宣傳品(好的又當別論)須謹防他們的引誘。

青年們！不要灰心，不必歎氣！將來世界的好壞還在我們自造，大家努力預備罷。

爲何會生，一定會發現他與養兵太多也有密切的關係。譬如兩年前有人調查甘肅的苛捐雜稅，得四十四種名目：(一)畝款，(二)地丁，(三)罰款，(四)接濟費，(五)清鄉費，(六)麻鞋捐，(七)皮襖捐，(八)軍服捐，(九)麥款捐，(十)流通券，(十一)軍驛價，(十二)雜費捐，(十三)襪子捐，(十四)開拔費，(十五)勞軍費，(十六)商家借款，(十七)改裝費，(十八)糧價，(十九)軍費，(二十)房租，(二十一)鍋捐，(二十二)換防費，(二十三)修械費，(二十四)補防費，(二十五)豬捐，(二十六)架腿，(二十七)公債，(二十八)特別借款，(二十九)臨時費，(三十)富戶捐，(三十一)交通捐，(三十二)柴草捐，(三十三)米麩，(三四)被褥費，(三五)徵兵費，(三六)總司令大借款，(三七)緊急借款，(三八)購械費，(三九)馬料稅，(四十)水磨捐，(四一)修路費，(四二)檢驗費，(四三)貨物

附加稅，（四四）預徵。我們只把這些名目看一下，就可知道其中有一大部份是爲養兵用的，其餘的部份，間接也與軍費有關。假如兵的數目沒有減少，空談取消苛捐雜稅，是無用的。又如中國各地的教育，爲什麼不能發展，各地的教師，爲什麼時常欠薪，中國各地的建設，爲什麼時常停滯，已經進行的建設，爲什麼不能繼續；一切一切，我們都可以「缺乏經費」來作我們最重要的答案。但是我們如再問經費到那兒去了，又一定可以發現因爲目前中國養兵太多，一切應當用在建設，用在富強中國的經費，都給這些兵士消耗完了。

我們用不着對於這一點作更長的討論。因爲凡是留心中國社會問題的人，誰不感到中國養兵太多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呢？不過這個問題雖然嚴重，却也不是一時所能解決的。有些人以爲中國養兵既然太多，唯一的解決方法，便是立即進行裁兵。這種說法雖然痛快，但實際上一定是行不通的。因爲現在養兵的人，我們可以把他們分爲三種。第一是中央政府，第二是各地軍閥，第三是共產黨。中央政府，在幾年前也曾舉行過裁兵會議，會議的結果，不但是兵沒有裁，及而鬧了幾次內戰，添了許多新的軍隊。自從那次會議失敗之後，在中央秉政的人，就沒有人提裁出兵的政策來過，最近中央財政已到最困難的關頭，但

擁有軍權的人，却說軍費不能減少，因爲軍隊已經裁到不能再裁的地步了。我們如替中央政府打算，看見他們一方面要打共產黨，一方面要維持中央的地位，不爲野心份子所推翻，就可知道要他們裁兵，是一句很不中聽的話。至如說到各地軍閥，他們有一部份是對中央不滿的，一部份是名受中央節制而實際却是大權在握的。這一班人，野心小一點的，至少想保持自己的地位，野心大一點的，還想擴充他們的地盤。所以如勸他們擴充軍隊，他們也許還肯考慮；如勸他們裁兵，那真是與虎謀皮了。共產黨另成一個系統，他們是想與國民黨逐鹿中原的，爲達到他們的目的起見，非擴充他們的武力不可，所以他們也是不肯裁兵的。

裁兵在目前難于實行，已如上述，那麼我們此時提出裁兵問題來討論，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我們以爲目前談裁兵，雖然是有點不識時務，但是中國如要現代化，如想走上富強之路，將來總有一天，要談到裁兵問題的。這一天在什麼時候來到，我們固然不敢預言，但我們如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中國的時局，就可知道這種紛擾的局面，割據的局面，決不會永久維持下去的。總有一天，天下大勢，會如寫三國演義的人所說的，「分久必合」了。等到分久必合

那天來到，自然要談裁兵問題的。不過裁兵問題是極複雜的，辦理如不得當，對於社會可以生出很大的禍害。現在主張裁兵的人雖然很多，但能提出一個完善的裁兵方案來的，可以說是無有。與其將來臨時抱佛脚，不為先做一點研究的工作，以為將來實行裁兵時的參考，這便是我們現在提出這個重大問題來討論的意思。

在過去數年內，正式軍隊自動裁兵的事，雖然罕見，但在內戰中失敗的軍隊，被動裁編的，却是時有的了。這些軍隊，有時在槍械被繳後，便遭解散，有時還得到幾塊錢路費，做回鄉的費用。這些被解散的軍士，其出路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但一直至今似乎還沒有人注意這個問題。我們從報章雜誌中看到的零星記載，知道這些兵士，在被解散之沒，決不是個個回家種田，安分守己的。其中有一部份，一定是當土匪去了。土匪的數目如達到數百數千，官兵進剿感到困難的時候，政府每每採取收編的辦法，於是這些土匪又變為正式軍隊了。結果以前的裁兵等于白裁，不但軍隊的數目沒有減少，反而在軍隊變為土匪，土匪變為軍隊的過程中，破壞了若干農村損失若干人民的生命財產！這樣的裁兵，不如不裁。但是在我們對於裁兵問題沒有研究之前，請問一切主張裁兵的人，

除了給資遣散的辦法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我們以為在政府還沒有實行裁兵之前，大家對於裁兵應如何裁法一問題，須作一種切實的研究。研究的方法，我們現在所想得到的，至少也有兩種。第一種是歷史的研究。在中國歷史上，內亂不知道發生若干次。內亂發生之後，總有一種割據的局面發生，各擁強兵，以爭天下。經過若干年的鬪爭，統一總會完成的。在統一的時候，總有裁兵問題發生的。因為以前統一中國的人，總是用武力的，所以他自己一定有一巨大的軍隊。征服別人的時候，又收集了別人的隊伍，所以到統一完成的時候，統一者的軍隊，其數目是很可觀的。歷代統一中國的人，如漢高祖，漢光武，以及唐高祖·明太祖等，都遇到裁兵的問題，而且都把這問題解決過的。他們所用的方法，很可以作近代人的參考。譬如漢高祖五年，天下已經統一，曾有一道詔令，提到安置兵士的。他說：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于吏者，亟與。」（前漢書卷一下）

他這種裁兵的方法，據我們看來，就比給資遣散的方法，要高明得多，因為當兵的人，把當兵看作一種職業，他是靠當兵來解決他的衣食問題的。現在如把他裁撤，

等于打破了他的飯碗，使他變成一個無業的人。普通無業的人，不一定是無家的，他們還有親族照顧，不致一時便有凍餒之憂。但當兵的人，因為軍隊的遷移無定，有時駐防的地方，也許離開兵士的家鄉有數千里。所以一解散，不但是失業了，也是無家可歸。這種遣散的兵士，自然有許多要挺而走險了，漢高祖看到這一點，所以在遣散之後，還給兵士田宅，讓他們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這種辦法，在今日不一定能够仿效，但他的原則却是可採用的。此外別人裁兵的方法，散見于各史籍中，也是值得去搜集起來，加以研究的。

第二種研究辦法，便是對於現在軍隊中的兵士，加以大規模的清查。中國的兵士，號稱二百萬以至三百萬，但是他們各種情形，至今還是一個大謎。歷年來關於兵士的調查，雖然也有幾種，但多屬于片面的，或局部的，不足供裁兵的參考。我們很願意看見一個大規模的清查，告訴我們中國兵士的籍貫，年齡，婚姻狀況，家庭狀況，未入伍前的職業，工作的能力，教育的程度等等。同時我們願意有人以個案的方法，搜集一些兵士的傳記，看他們是在那種環境之下長成的，在生活中有些什麼樣的經驗，為何走上當兵之路，第一次去當兵，是在那種情形之下

決定的。這些統計的及個案的材料，可以使我們對於中國的兵士，有一個比較清楚的認識，將來裁兵的時候，為這些兵士謀出路，也可以有些事實做根據。因為我們要知道，裁兵雖然是一個社會問題，但直接受到影響的，還是被裁的兵士。裁兵而不為兵士另找出路，結果不會美滿的。但為兵士謀出路，先得了解他們，所以調查他們的狀況乃是裁兵的先決問題。這種工作，不是一下就可完成的，所以參謀本部，或國防委員會，或其他的機關，能早日舉行這種調查的工作，乃是我們所希望的。順便我們還可以說一句，便是這種調查的成績，不但對於研究裁兵問題的人有用，就是對於研究別種社會問題的人，也有相當的貢獻。譬如上面所說兵士籍貫的材料，我們如根據他製造一張圖表，一定可以發現某省某縣，兵士的出數非常之多，另外也許可以發現某省某縣，幾乎沒有當兵的人。我想出兵甚多與出兵很少的縣，其環境一定有大不相同的地方。我們如去做一種比較的研究，看看造成這種相異狀態的原素何在，定還可以發現許多事實，為研究貧窮，犯罪，農村破產等問題的人，所想知道的。所以關於兵士狀況的調查，不但從解決實際問題的方面看去，是極重要的，便是從研究學理的方面看去，也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

太原見聞記

陶希聖

一 中道論

我在太原從五月底住到八月底。三個月裏，一則常常下雨，道路阻塞，不宜遠行；二則我在太原是個陌生人，陌生人在原始半原始的社會裏是一種奇異或危險物，不宜多有遠行；我屢次遠行的企圖都打消了。我並不是說山西社會還有原始半原始的心理。山西在近二十多年政治沒有大變遷，沉靜的政治組織對一個陌生人是張着奇異的眼睛的。

說山西的政治環境沉靜，是對的，也是錯的。這裏的政象，外面靜謐，裏面却正在變遷。民國十九年以後，山西既一度參加太行山東的政潮，再難閉關不問外事。山西的當局即不問外事，外事却要入關相尋了。即以太原這都會來說，什麼黨派都有支部。各黨各派的活動把太原知識分子的眼睛和腦海給鬧活潑了。他們也和上海等處的小報記者一樣，以爲每人必須有黨，無黨便不會生存。

年紀不很大的中學生見了我，便會問各黨派的現狀。並且稍爲活潑的中學生，便是一腦子的口號。有一次，我到一個中學去講了一回。隨後幾位很努力研究政治社會尤

其是文學的十五六七的學生來談話。他們提出的問題有：

1. 中國革命應當由那一個階級領導？
2. 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

格式主義宣傳的力量可真不小。學生們有了這些口號在心裏，便沒心思去學別的。據校長說，他們老是拋棄化學課本去學文學去。

學生們心裏的格式，不用說並不止一套。上面所說的一套是馬克思主義的。因爲馬克斯主義的格式流行，於是山西當局一邊的人們便另提一個格式。正針對馬克斯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他們提出唯中論和唯中史觀。有一個新刊的日報叫做中報，就是唯中史觀論者的機關報。

唯中論的大旨是先說辯証法，然後於兩極之間執取中道。以唯中論來論歷史，是不可想像的。我曾從中報看到一段唯中的文化史看法。大意是印度文化是後退的，西洋文化是前進的，中國文化是中道的。我看了以後，想到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我本想查一查這本書，可惜早已爛在北京大學的存儲室裏去了。

唯中論者的活動是太原很有力的活動。他們有一個學聯會，還有許多提倡國貨的團體。他們對於山西以外時局的觀察每每比普通的官員教員們優長特到些。通常的人以為他們是閻百川的御用團體，其實他們的活動並不是一秉閻先生的意旨的。

閻先生是中道論者。他是儒生的中道論，不是所謂辯証法的中道論。閻對事物的看法，是看看再說。他是不輕易走極端的。他不輕易得罪一個人，不輕易殺人。所以各黨各派便大肆活動。鬧到九分九釐，也不過押送回鄉。並且近來頗有人在他手下做反對運動。他即令知道也不去即時給他們下不來。

然而山西的經濟的困難，把這位中道論者迫得做了心物二元論者了。

二 十年計劃

統制經濟的口號在太原很惹人注意。有一經濟統制處，每日在報紙上披露他們所提的口號。五月到八月間經濟統制處所提口號以提倡土貨為中心。

土貨提倡運動有一個團體來推行。這團體叫做「造產救國社。」其成立是由發起人每人舉出十五人來，如是展轉介紹，社員多到一千餘。社員普及全省，宣傳土貨的生

產和消費。

何以說是「土貨」？因為他們所提倡只是山西貨。他們所抵制的是各種洋貨。

造產救國社最近設立一處消費合作社，推銷國貨，尤其是山西貨。土布，繭綢，羊毛織物，駝絨織物，頗有適用而廉價的。

提倡土貨只是十年建設計劃的一部分，但是基本的部分。省政十年建設計劃案劈頭說道：「謂省政全般設施是政治可，謂全部政治之着眼即在經濟亦可」。又說十年計劃的目的在：

「使十年後全省人民每人每年平均至少增加二十元生產價額。」

又說：

「本計畫案以實行生產政治為目的。所謂生產政治者，即用政治之力量，開發生產，扶助生產，保護生產」。

十年計畫以發達生產為主是有來由的。山西是一個多山的高原。森林久採伐將盡；農田本不大肥饒。山坡都開成熟田了。屋頂上做打穀場。耕田的量也是很少的了。這裏有天賦的煤鐵的大量的富源。但是重工業被外國商品所阻，不能發達。山西過去是很富的。富的來源是山西人在

外省外國的商業和金融業。「老西」以儉樸而長於計較著名，但是洋才民初，票號爲華波廣州的銀行都擠垮了。俄國革命及外蒙獨立把那兒的老西打回來。九一八的大砲把東省的山西產業破壞了。老西雖然儉樸，生和的矛盾減少，仍然日陷貧窮。民十九年的紙幣破直，又把晉中晉北的金融損害才小。山西省發行的紙票至今不大流行。綏遠的兵隊還得仰給山西。陽泉及晉城的客軍也是重大的負擔。算盤打不過來。於是當局已覺到經濟的重要性。唯中論就偏重了「物」了。

十年計畫的實行，自然需要實行的機關。他們仍然用行政的機關担负這個任務。我會說過，「官僚組織是榨壓民衆的鐵錘。打下去不費吹灰之力，要牠改造社會尤其是減輕民衆的負擔，換句話說，要牠往上打，那是很困難的。」山西的縣長長要想貪污，已不容易。不過，要他們做經濟建設也不大容易的。十年計畫實行以前，就差這往上打的一着。

卽如保晉公司的煤礦業，股東已多年沒開過會；股票已多年沒分過紅。董事和經理頗有些發過財去了。而官府要人頗有每月受一二三千元的乾薪的。保晉公司被鐵錘給打扁了，再誰敢去大量投資。這一例已足使人知道鐵錘

往上打是困難而必要的。

閻先生也看出這一點。有一位西北學生告訴我，說他以爲做一件事，與其用官，不如用商人。所以山西實業公司和消費合作社業組織，都由商人主持。商人的長處是計較，知處是組織力和專門知識的運用。如果不會這兩手，不怕算盤打上十四橋，事業仍然不易發達的，山西的大學牛因之很抱怨閻氏不用專家。

不過，專門也有些不大好用。兩眼看慣了美國的鋼鐵匠人的專家，回到國內很窮的地裏來，設計都難于適用。他眉頭一皺，浩歎道：「你們中國這樣糟！」他腦子裏馬上浮出「我們美國」的紐約市——統統子到三家村去指揮佃戶媽媽排酒席。那是一曲喜劇。專家是要經過社會經濟學的制裁和訓練才好用的。不過，商人並不足以去限制專家。商人的眼光往往太重近利。並且，假如山西票號商人有組織力，不也會被有限公司的銀行擠倒。

太原有些人暗地裏批評十年計畫。我遇見一位老先生，他說：「十年計畫，不過有錢的大官多做幾樣生意，把小生意都給併吞去罷了。」

尙書裏的理想聖人告訴他的大臣道：「汝無面從，退有後言。」然而這種「後言」從沒有達到當局耳朵裏的機會

。因爲，面從的人究究多些。

無論如何，山西的當局總是在那兒想辦法。

辦法的最大窒礙是省內外的稅捐太重了。牛角如果貼印花，牲口如果吃鴉片，生產是很難發達的。生產如不發達，小生意固然倒，大生意也是要倒的。稅捐不能按經濟的需要來改革，十年計畫很難成功。

三 縣村計畫

五月底六月初正是縣村計畫準備修訂的時期。政府招了一千多人聽講以後，加以考試，錄取一百多人，分派到

各縣解釋縣村建設計畫的種種，促成各縣計畫案的修訂。

這一批人憑着一管筆一張紙一篇文，便取得促訂縣村計畫的資格。他們來投考的本意只是與技科員找書記相同。他們的任務却太專門了。結果是紙上文章多，手下工夫少。

雖然聯絡員分派得不少，有計劃的經濟調查卻似乎並沒有大規模着手。沒材料的十年計畫是怎樣的訂呢？

(未完)

討論

誰來訓政？

何魯成

獨立評論，我是每期看的，至於我愛看它的原因，是因爲它有許多一般人所不敢評論的評論；記得適之先生冒

不韙的中日直接交涉的主張，我也是在它上面看到的。最近我在第六十八號上，看到任叔永先生的一篇，技術合作應從何處作起的文章。我看了這後，覺得梗在心頭的話，非說出不痛快，因此我做這篇拋磚引玉的文章，希望國人

羣起討論，因爲任先生的主張，是國人當今不能忽略的一個大問題。

任先生勸國人，不必疑慮和國聯技術合作這一回事，這是我同意的。本來和國聯技術合作，不是國聯共管，國聯現時還不想共管中國，也可說國聯力量，還沒達到共管中國地步。國人不要受了日本的威脅恫嚇，便杞人憂天起

來。中國要想從事建設，異邦人才的引用，那是必需的，而和國聯技術合作，乃是最捷當，而却沒有危險的一條路。

至於任先生以爲國聯的技術合作，最好是從管理技術上做起，那就是我所要討論的，也許亦是一般國民所不能同意的。

不錯，目下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兩件事的興辦或改良，而是整個行政機關的現代化問題。不過，是否由少數洋大人來監督，給以管理一切的大權，就可以有一個現代化的政府呢？政府裏面的腐化根子，是否必須請洋大人來設法剷除，洋大人是否具有剷除這些腐化根子的能力呢？問題看來是兩個，實質是目下中國應否請洋大人來訓政的一個問題。「阿斗」確是太不成材，先生的教導也無力，事實原該大家承認的，補救的方法，原該大家去想的。不過任先生提議，大家去請教幾個高明先生，一同受一點訓練，是很需要考慮的一個辦法。歷史上，沒有一國政治混亂到極點，大家束手無法的時候，可以請異邦高明先生來監督，給以管理一切的大權，便會得把一個國家，從混亂中拔出來的。固然，歷史的先例，原是創造的。不過這樣不長進貪圖省力的辦法，歷史還沒有碰到這樣不長進貪圖

省力的民族。况且所謂「訓政」，是否可以和學校教育相提並論？目下從學校中出來的人，社會上還責備他們，和社會真實的情況隔膜呢！那麼請幾個異邦的高明先生訓練出來的學生，一定和國情民俗吻合麼？愛特生的電燈泡，福特的汽車，在中國人用起來，和美國人是一樣的享受。不過，美國的總統制，搬到中國來，一定暢行無阻嗎？異邦的高明先生，所有的行政經驗，都是異邦的，還未中國化，等他們在中國做了事，積疊起經驗，至少得幾年。在這幾年中，我們該吃到多少嘗試的痛苦？

我認爲，目下中國最腐化的地方，不是中央政府，是地府政府，尤其是中央照顧不到的偏僻縣治。蔣先生，做過國府主席，財產也很丰厚，難道他還有奢望嗎？我猜也許他具有在我手中把這個國家弄好的願望。汪先生，是抱了跳入火坑的決心，才上台的。宋部長，國外歸來，抱負極大，籌劃周詳。他們這三個人，是南京政府的靈魂，他們何嘗不想勵精圖治領導人民來做真正建設的事業，但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那兒呢？平心而論，近年來，中央機關腐化的現象，剷除得不少，剷除的也不算慢，然而地方政府腐化的現象，日增月益。親友中，有謀縣長的，大抵喜擇偏僻的縣份，民智閉塞，與外界隔絕，傷心害理，

括撈起來，着實可觀。土劣專橫，自好之士，裹足不前，耐苦自去的，儘都是空肚鴨子。這些地方，不是中央見不到，實在沒有決心和毅力去剷除。縣長的換來換去，儘是一斤之貉，在小民看來，是以暴易暴。況却有許多地方，中央威信，沒有深入，縣長不和當地土劣勾結，性命也難保，那裏還談到興革。中國官吏的夤緣手腕，着實可驚，要叫少數洋大人來監督他們，恐怕洋大人要給他們蒙在鼓裏，還不知道呢？而却以中國官吏舞弊的經驗的豐富，決不是外國幾個書呆子，可以監督得到的。目下中國要想澄清吏治，剷除腐化根子，第一條必須走的路，便是去年大公合報社論的「剿匪要義」中的一句話。也是胡適先生在「所謂剿匪問題」一文中，特別提出的，便是「於全國中懲治一萬貪污官吏」。那些人，是貪污的文武官，政府想來也是明白的。此後只要拋開情面和利害，痛快地懲治一下，吏治便可澄清，各級政府，離現代化行政機關的路程，也就縮短不少了。這件事，缺少的是最高當局的決心和毅力，不是高明先生的特別辦法。

任先生講現代的特點，有二個，第一便是重效率。而中國的普通現象，便是人浮於事與任用私人，這兩層都是與現代的效率觀念根本不相容的。爲什麼人浮於事呢？因

爲粥少僧多，社會事業不發達，大家擠到政界的一條狹路上去。爲什麼任用私人呢？因爲中國尚未脫離宗法社會的觀念，引用親友，是社會上共認的一種美德。以後不在工商業方面，謀安插人，但是裁員，不但使人走頭無路，爲生活而自殺，恐怕還要釀成大亂子出來。以後不在社會教育上，剷除任用私人的風氣，僅靠少數洋大人的嚴厲執行，效力恐怕極微吧！

現代化的第二個特點是要有組織。不錯，中國的行政組織是重床疊屋的，不是由事務設立機關的，大半因人，才設立機關的。但這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譬如馮先生從察哈爾解兵權後，中央許給以名義，於是就有林學督辦，水利督辦等名目出現。中國是根據各集團的勢力。必須安插的位置等條件，設立機關；分配職權，雖說是混亂的，沒有效率可講的，但是未嘗不是暫維現況的一個辦法。不然，組織雖好可不易或立，成立之後，也要給各方勢力所切倒的。這些複雜的人事，不是從異邦請來的高明先生，所能了解的。不顧一切的改革只有愈使局面混亂。中國只可一點一滴改革，從不合理的組織，進到較合理的，再進到最合理的。君達先生在本刊第二十五期裏，所提出行政機關必要的改革，是可寶貴的。但這是國人從痛苦中認識出來的

，比洋大人走馬看花所下的批評，真切得多。

上面是說，中國行政改革問題，有許多地方，是無須洋大人代勞的，也無法代勞的。同時我們切勿忘記了喧賓奪主的故事，國聯現時雖不想共管中國，但派遣來的專家，仍是有國籍的，心上難免不記着祖國的利益，一旦握權，幹點損害中國的事情，也事意中事。一國政權比稅務的主權，來得重要得多。一國的政權放棄之後，恐怕就沒有能力能像稅務的主權一樣可以漸漸收回。照任先生的說法，譬如上海的繁榮，是租界制度造成的，全國就該多關租界。等它繁榮了，中國有力量，使可漸漸收回的，豈不是笑話？既失的稅權，尚且要收回，何況動關民族存亡的一

附 答

我在第六十八期的獨立評論裏面發表了一篇文章，主張我們與國聯專家的技術合作，應從管理技術上作起。在發表這篇文章以前，我曾經仔細考慮過。因為我逆料這樣的一個主張，一定可以引起許多疑慮和驚懼。因此，在我上次的文章裏面，曾經再三申明，國聯非即國際，合作不是共管，用合作方式雇用客卿，只等於明清兩朝的任用利瑪竇，湯若望掌管欽天監，尚不能比於前清的用赫德管稅

國主權，豈可輕易放棄呢？

我們不必害怕，天明以前，必有一段黑暗的時期，英美吏治的清明，也不過一二百年的事。歷史上，美國的分贓制度，是有名的。後來經過吏治澄清運動，才逐漸達到現代化的目標。不過有點值得注意，便是它沒有引用客卿，是出於國人自動的改革。所以，中國也不必請洋大人來訓政，只要國民黨立即開放政權，讓「阿斗」多點學習的機會。小學生的成績，大學生不必笑，安知來者不如今呢？「阿斗」也該早點祛除依賴的心理，不要老是靠着諸葛亮。如果諸葛亮昏庸老朽，就該自己起來，從嘗試中求經驗，從經驗中找求進步，從進步中建樹起理想。

九，二六，南京

叔 永

務司（因為稅務司有條約的關係）。總結的一句是：這種辦法，是與主權無關的。不意我這一層意思，讀者還未能十分明白；或者雖明白了，仍覺得有詳加討論的必要，於是引出了何魯成先生這一篇「誰來訓政？」的文章。我們很高興何先生能看出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大問題」，「希望國人羣起討論」。我是這個問題的發起人，自然在開始討論之前，有先說幾句話的權利。

我所要申明的，第一，是在上次的文章，并不曾主

張「請洋大人來訓政」。訓政是國民黨的建國方略，是一個政治的制度。除非一個人真正中風病狂，我想總不至於把國民黨所不能讓國民的大政，希望幾個紫鬚碧眼的人來取而代之罷！我們的主張，只是要當局的人們，就是在行政管理方面，也承認我們能力和經驗的不够，虛心委懷對於外國的專門家，多多請一點教；要我們在這願安承教當兒，自己也得到一點訓練。這和國民黨的訓政，顯然大有分別。具體說來，我們只要自己得到訓練之後，這一班的洋大人們，仍不難以政府的一紙命令立時解僱。這樣去留完全在我。我不明白在甚麼地方可以發生主權的問題。

第二，我們更不會主張「洋大人替我們多關租界，使它繁榮了，中國有力量，便可以漸漸收回」。這若果是我們的主張，誠然是大「笑話」。可是在我們的心頭筆底，都找不出這樣一個意思。這個意思既不是我們的，自然也用不着深辯。

以上把我們不會主張的兩層交代過了，現在再把我們所要主張的講一下。

第一，我們認為一個新事業的成功，不但技術上要有新的智識，便是管理上也要有新的方法，要不然，便非弄得一場糊塗，那事業的本身也終歸於場台不止。舉一個最

顯著的例來說罷。漢陽鐵廠是我們開辦最早，規模最大的工業。牠的失敗歷史，在本刊第五期「建設與計畫」一文中已經大概說過了。可是那裏所說的還只限於技術的一方面。若把管理的一方面來考究一下，也可以知道牠非失敗不可。記得民國九年楊杏佛君被聘至漢陽鐵廠會計處替他們整理會計，他去工作了一年有餘，終於一籌莫展。據他說，這廠沒有新式簿記，沒有成本會計，沒有全廠的物產登記，要清理也無從清理起。這大約就是從那些候補道總辦的成績罷。這樣的管理法，焉有不失敗的道理。招商局的失敗由於管理的不得法，是觀於最近國民政府派員清查的報告而愈明瞭的。至於國營的各條鐵路，不是勉強支持，債務無法清償，便是腐敗到路基朽壞，常常鬧出覆車傷人的亂子。可見這些都完全不是技術的問題，而是管理的問題。要是這些已成的事業，都因管理的不得法，而漸漸的走上腐敗，侵蝕，毀滅的道路，那末，我們對於未來的同樣的事業，又焉得不替他們寒心呢？

我上次文章，曾經假定新辦的事業由新設的機關去管理，這些新設的機關，因為有外國專家幫着計劃，管理，牠的效率自然要比舊機關高些。因此想到政府的一切機關未嘗不可用同樣的方法來使牠現代化。何先生似乎狠費

成我的現代化的主張，可是不贊成我借助客卿的方法。我們要曉得所謂現代化，不專靠計劃，組織，而主持這些計劃組織的頭腦尤爲要緊。我們中國人不配說現代化，就是因爲我們中國人的頭腦根本是非現代的。舉一個最近的例。我們說政府機關裏面人浮於事，任用私人，跟着就有人說這是因爲喇少僧多，因爲宗法社會的觀念，好像這是有相當理由的。我們說政府機關有許多是重床疊架，跟着就有人說中國是根據各集團的勢力，必須安插位置的條件，設立機關，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這樣處處讓步，時時講條件，現狀是維持到了，可是去現代化的目的也就越走越遠，這不是和所有的主張南轅北轍嗎？

何先生對於現今中央的政治，似乎很抱樂觀。他說，「平心而論，近年來中央機關腐化的現象，剷除得不少，剷除得也不算慢」。我不曉得他所謂剷除的腐化現象是甚麼？若所指的是官場氣習，辦公時間等等，我也可以相當的承認。不過這些小節，與國家大計并無多大關係。我在上次的文章裏，曾經說明效率的意義，是以較少的用費，較短的時間，得到較大的效果。所以要是組織不得法，人才不中用，雖一天做二十四個鐘頭的工，也是不相下的。幾天前天津大公報有一篇社論題爲「裁無可裁」？說：

「吾人鑑於中央地方政費之冗濫，行政效率之低劣，竊以爲以現政府之有力而自由，處茲司農仰屋之會，應有大刀闊斧之緊縮辦法，不應有裁無可裁之說。方今農村破產，瀕漫全國，政繁民困，達於極點，急應悉罷不急之務，盡祛可裁之官，予人心以震奮之感。卽爲五院之中，縱令裁去立法監察考試三院，夫於國計民生何害？司法行政部既隸行政院，則取消現在之司法部，抑又有何不可？各部之內，併鐵道於交通，合海部於軍政，更於建設大計何妨？此外疊房架屋之機關，似是而非之建設，痛加整刷，何一而非節政費，省手續之善法？

這些話，大可爲我們所說效率問題的注腳，而現今政府當局的人事還有許多未盡，不能以爲牠的腐化程度不深，（這當然還是問題）使泰然自以爲滿足，更明白了。

何先生提出地方政府的腐化現象，以爲比中央政府的腐化，還值得我們注意，這一層我們是同意的。不過地方情形非常複雜，有的是中央權力所能及的，有的是中央權力所不能及的。中央權力所不能及的，暫且置之不論，中央權力所能及的，據何先生說只要「懲治一萬個貪污官吏就行了。但是我們要問：『打倒貪官污吏』不是國民黨自廣東出發以來所高揚的標語嗎？事實上，在國民黨統治的區

域內，不但貪官污吏未能打倒，有的還比其他的地方厲害；這是甚麼原故？據何先生說『這不是中央見不到，實在是沒有決心和毅力去剷除』。我想事情沒有那樣單簡。中央儘管見的到，有決心和毅力，但是沒有指揮地方的能力，也只好聽之而已。換一句話說，除非等到中央自己有了發生效率的組織，和澄清吏治的能力，地方的政治是不能以中央的力量解決的。我們暫時不說地方政治，而主張集中全力以改良中央的政治，也是這個原故。

其次，我們即使有了狠好的制度與計畫，怎樣的實行還是一個大問題。世界各國若比較發表計劃的多少，恐怕要數我國第一，可是若問實行的程度，那末我國非為最末不可。此次五中全會延期開會的理由，據說也是因為前次開會的議決案尚未實行，這可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在黨的最高機關也自認不諱了。』水先生在他的『救國的幾個先決問題』文章裏，說：『孫中山先生說知難行易，他的信徒偏偏組織了一個政府證明他這話不對』。這似乎在開玩笑，其實是確切之論。我們只要看，這幾年來發表的救國大計，從國民會議以至鋼鐵廠，硫酸礆廠，那一件曾經按照預定的日期辦了起來？若說請了外國的高明先生來，走馬看花，不易了解中國的癥結，所以計劃不易實行，

那末，我們要問問上舉的幾件事，那一件不是我們自己審慎考慮的結果？牠的不能實行，又應該歸罪於何處呢？老實說來，我們以為外國先生走馬看花的報告（如國聯教育考查團報告），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我們實行的建議，只怕我們不問青紅皂白，給牠一個『束之高閣』的處分，那使有天字第一號的計畫也不會發生效力。何先生承認君遠先生改革行政機關的意見，以為這是國人從痛苦中認識出來的，比洋大人走馬看花的批評真切的，但是我們要問問這些改革行政機關的意見，在最近的將來有實行的可能嗎？若說不能，這還不能使我們深切的思考一下嗎？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在日下國難極端嚴重的時候，我們所爭的，不是利害問題而是生死問題。起死回生，最怕的是諱疾忌醫。我們固然要有自信心，尤其要緊的是不可護自己的短。明明一事無成，偏說我們已有了相當的成績；明明民族存亡的關頭，偏說是大明以前的黑暗。這樣，我們的自尊心似乎得到一些安慰了；可是蹉跎復蹉跎，一轉瞬間，大難臨頭，恐怕除了順着歷史的公例，重過那宋明兩朝亡國的生活，再也沒有別的辦法。想到這裏，我們何妨趁時間還是我們的時候，過慮一點，委屈一點，圖一個有備無患呢？

日俄衝突的意義

蔣廷黻

一個日本的人才統計

君達

定縣平教事業平議

叔永

我們在農村建設中的經驗

費達生

旁觀者言

聖羽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侯記書社 | 王公府——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立達書局
米市大街——新華書局（代定）
西單——君中書社
志遠書社
平和平書社
陵書社
育中書社
青平社
華光書社
增華書社
社
長光書社
增華書社
廠內神州國光社
佩文齋
廠內——現代書局
尾雲堂
沙灘——北大一院
德信——燕大燕昌號
清華書社
成府書社
天津——燕大燕昌號
大學書局（代定）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精華印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新華書局
亞東書局
新中國書局
南京——新中華書局
正中華書局
鐘山書局
中央書局
樓書局（代定）
天一書局
鎮江——樓書局 | 徐州——徐州廣告社
常口——開明書局
現代書局
真美善
金城
開明書局
新華書局
武邑——新華書局（代定）
胡正
廣州——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華南書局
圖書消費社
汕頭——大東書局
興寧書局
新華書局
新華書局
瓊州——新華書局
新民書局
海口——會文書局
百利公司
書報部
海南書局
師專消費社
永昌公司
濟南——東方書社（代定）
中山書局
青島——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荷署書局
代辦部
安慶——安省立圖書館
蕪湖——海潮書局
中書局
九江——一學社
中書局
漢口——新華書局
統一派報所
蘭州——甘肅書報社
西派報社
成都——現代書局
文報社
重慶——新華書局
新華書局
雲南——東方書社
文化書店
杭州——新華書局
東友書社
福州——萬有圖書公司
廈門——開明書局
衡州——開明書局
衡州派報社 |
|----|-------------------------------|--|--|

第七十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廿二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一角以下爲
 限）代洋九五折。

日俄衝突的意義

蔣廷黻

蘇俄倘要出售中東路，這是可了解的。因為現在日本在東北的政治和經濟的勢力大可以致中東路的死命。無論蘇俄售與不售，這條路是要成爲日本囊中之物的。但是東路出售的交涉簡直是個悶葫蘆。既然要出售，蘇俄何必費事來與日本講價呢？主顧相差的幾千萬盧布值得這樣小題大作嗎？難道蘇俄要爲幾千萬盧布而與日本決裂嗎？我們要記得：近日日俄間風雲的原因——至少直接原因——是路價的爭執。因為講價不成，交涉於是停頓；停頓以後，「滿洲國」就開始逮捕路上之俄方重要職員，於是塔斯社就發表日本的秘密公文，於是日本的報紙就大肆譏罵，甚至聲言有斷絕邦交之可能，於是日本政府才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這樣一來，謎上又加謎了。因為日本何必這樣有急？肉在口邊，再容忍幾秒鐘有什麼大了不得？其實日本口裏的東西還未完全吞下去，何必又進一口？在蘇俄方面，何必在這個時候發表所謂秘密文件？這些文件有何秘密可言？至於說責任在日本，不在其傀儡，這是天下共知的事實，有何證明之必要？且何止此一舉？

這個謎不是我們不知內情的人所能破的。這陣風波將

來是否會平靜過去，我們也不能預料。我們敢斷定的僅僅是這一點：日俄雙方均不會爲幾千萬盧布而致決裂。倘要決裂的話，必不是爲中東路本身，是爲中東路所代表的。那末，這條路代表什麼呢？

這條路原先是帝俄侵略中國的利器，現在還是蘇俄在遠東的第一道防線。蘇俄雖是共產主義的，其人民與他國人民一樣，絕不願意放棄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產業。何況這產業是這樣血錢呢？遠東不保，則全西比利亞將無門戶了，將受日人的封鎖了。反過來說，這條路是日本大陸帝國最後的障礙物，也可說是日本在遠東的霸權的最末遺缺。這個霸權，用不自說，不利於我們，亦不利於蘇俄。這兩年來日本的進取，首家其害者是中國，其次就是蘇俄。不但此也，日本的遠東霸權也不利於歐西及美洲各國。蘇俄現在不過對此霸權盡點抵抗的責任，間接表示蘇俄關於日本霸權立場是與歐美一致的。塔斯社所發表的祕密文件不是爲日本人看，是爲中國人及歐美人看的。這幕戲不是爲日本人唱的；是爲我們，尤其爲歐美人唱的。所以日本人不怪塔斯社侮辱日本的忠誠，而怪蘇俄有意排撥離間。

日人所顧慮的不是日俄關係的惡化，反是日本全般國際關係的惡化。如果日俄的衝突有什麼嚴重性的話，其嚴重性就在乎此。

關於日俄的衝突，我們很容易發生各種誤會。第一，這衝突很像一個世界赤白的衝突。其實，這個衝突與赤色白色全無關係。日俄之間倘無赤白的區別，這衝突也是不能免的。在帝俄時代，列寧和杜洛斯基還是無名的宣傳者的時候，日俄曾經戰過。但是現在俄國既是赤色的，日本人就更有口實了。他們樂得使人相信日本是亞東反赤的惟一防線。去年日本向國際調查團所提出的主要說帖，就是形容遠東赤禍的急迫和日本如何是遠東惟一的救星。倘若日本能使世人相信今日俄的衝突是赤白的衝突，那日本的外交戰已成功過半了。但我們試自問：倘若俄國現在不是共產主義者當權，日本就會放棄向北滿發展的計畫嗎？當然是不會的。反赤的標語不過是日人的宣傳資料；日本的政策決不是因為反赤而有近二年的舉動。在蘇俄方面，她也不能以赤色對白色為其外交政策，因為這樣的政策，實行起來，等於蘇俄對世界。蘇俄的外交家縱愚至萬分，他們也不得採取這個立場。蘇俄深知現代所謂白色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和仇恨遠過於他們對蘇俄的仇恨。這是

蘇俄外交活動的機會。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為勢所迫，亦有樂與蘇俄携手以抵抗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者。現在國際的分野尚未到白色與赤色相對的局面。目前日俄所爭者的與主義無關，明明白白的就是兩國在遠東的勢力。

第二，因為日本近兩年對我們有極大的侵略，許多外人以為日俄的衝突或是我們出路之一。我以為這是一種極危險的誤會。日俄的戰爭不是遠東問題解決之路。無論是日勝俄勝，中國是得不到好處的。乙未馬關條約以後，俄國乘機向我施行侵略，一則修中東路，再則強租旅大。到庚子年，俄國更進而佔全東北三省。那個時期是俄進日退的時期。俄國彼時氣燄之高並不在當今日本軍閥之下。日人遂一方面大講中日親善，一方面又向歐美標榜中國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及列強在華機會均等。中國要人如劉坤一及張之洞就是那時候國內親日反俄派的領袖。他們以為親日反俄是中國的出路。在西洋方面，因日本所標榜的主義是與英美所標榜的相同，亦樂與日本政治的及金錢的資助。在庚子以後的數年，俄國猛進的時候，她在外交上是處孤立的。就是她同盟法國，對她的遠東政策，亦心懷疑懼。日本彼時的地位正相反：她好像名正言順，儼然像全世界對俄討伐的代表。到了戰後，日本遂反其戰前一切的主義

。戰後我們所受的日本的壓迫正與日俄戰前我們所受的俄國的壓迫相等。而英美在南滿不能享受均等的機會亦與戰前相等。美國對此尤其憤慨。日俄遂聯合以抵制美國的投資。三十年前的日俄戰爭不但未解決遠東問題，且反使此問題更加嚴重。

現在形勢是日進俄退的，俄國近來的舉動，倘有國際意義的話，不外向歐西及美國送秋波。她的目的就在取得三十年前日本在國際上所有的優越地位。倘此舉成功而事

實發展又與次日俄戰爭一樣，我們是得不着任何便宜的。俄若勝日，則日本在華北的權利及勢力將為俄有；日若勝俄，則日本之遠東霸主地位將更鞏固了。所以現在與三十年前一樣，日俄兩國的衝突是不能解決遠東的。

這問題的永久解決必須有兩個條件。一個是遠東有個強而有力的中國。一個是日俄英美願對此問題的解決作同等的努力。在這兩個條件未達到以前。所謂解決都不是解決，反是增加糾紛。

十月十五日

一個日本的人才統計

君達

獨立評論第七十一號內顧毓琇先生極力主張『專門人才統計』的重要，並且略舉了幾個中國專門人才的數字。因此使我回想到前幾年所看見的日本大學畢業生的統計。

這個統計載在『科學的日本』書上，其數目是截至一九二五年為止。茲將日本國立大學自從創設以來到那一年度的畢業學生分科列表如左：

校別	法學	文學	經濟學	理學	醫學	農學	工學
東京帝大	一一，四九九	二，九三八	一，三五五	一，三二一	四，〇六四	二，七六三	五，六一二
京都帝大	三，一五五	八二五	八九六	五〇二	一，七七二	六五	二，一九四
東北帝大	七四四			四六九	三二七		二八九
九州帝大					一，五二八	四一	九二八
總數	一四，六五四	三，七六三	二，二五一	二，二九二	七，六九一	二，八六九	九，〇二三

以上總數共計是四萬二千六百一十七人。這單是說國立大學畢業的，此外當然還有私立大學，專門學校以及外國留學的，總加起來人數大約也不甚少。但他們的專門人才究竟要以國立大學的畢業生做中心。日本最老的國立大學是東京帝國大學，始創於一八七七年，但自一八八六年（即清光緒十二年）始成現在制度，分設文法理工醫五科，後又陸續添設農學及經濟二科。京都帝國大學創於一八九九年（即中國戊戌變法之次年）初設法醫二科，其他各科皆後來添設，農科還是一九二三年新添的，所以畢業人數不多。九州帝國大學始創於一九〇三年，原為京都帝大之醫學分院，後乃添設各院，成為獨立。東北帝國大學在一九一〇年始設，當初只有工學院，後乃添加醫工文法。所以在右表內畢業人數之多少，與各校各科設立年份之長短，是很有關係的。但是我們如果從各科的總數來為比較，也可以得到一些關於日本專門人才分配的大略概念。

從上表看來，畢業人數之多第一是法科，第二是工科，第三是醫科。這三科每科皆在七千人以上乃至二倍此數。從這個數目推想他的意義：法學人才是國家及社會組織革新及建設上重要份子，所以他們人數最多。中國現在有

一部份人對於此類人才不甚重視，或可以說此類人才有時自己不甚重視，這種觀念在日本似乎是沒有的。工科是物質建設的必要份子，所以其數居第二位，其中理由是很顯然的。醫科也是科學應用於人生之重要一端，其效顯，其用廣，故居第三。其餘各科畢業人數都在二千幾百到三千以上，其次序是文學，農學，理學及經濟學。文學在外國也似乎不像在我們中國許多人所想像的無用。農。理，經濟三科人數大致相等，而經濟學是近年來蒸蒸日上的一科。

照那時日本本部人口六千萬人計算，每一千人還得不到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一人，但亦相去無幾。按此比例，則中國四萬萬人應該有好好的大學畢業生四十萬人了。又照上列總數與各科人數相比得法科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五，工科佔百分之二十一，醫科佔百分之十八。其餘各科皆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九之間。據顧毓琇先生所說的清華大學畢業生統計，也是法科第一，佔總數百分之二十八，工科第二，佔總數百分之二十四。大致的次序到也差不甚多。

日本大學畢業生雖然是法科的最多，但教授的人數却總是工科及理科的為最多。例如東京帝大法科教授只三十人，而工科教授有八十九人，農科五十二人，理科四十五人。京都帝大法科教授只二十二二人，而工科有五十六人，

理學四十四人。

現在專就在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方面從事於專門研究工作的才，看他們的分配統計如何。這也從「科學的日本」那本書上計算出來，其材料是日本文部省的調查的。第一是在政府機關裏面，雖然附屬在行政機關，但仍有許多技術及研究組織，用了許多專門人才。把他們大略分類造成一表如下。

性	地	燃	礦	權	化	工	農	蠶	牧	衛	專	電
質	質	料	治	度	學	業	林	絲	漁	生	利	工
機關數目	二	二	二	一	業	五	九	二	七	六	一	一
專門人數	六〇(?)	三五	三〇(?)	七九	業	一八六	三二〇	四八	二八五	一八四	二五	二六五

鐵	陸地測量及軍事研究	水道測量及海軍研究	航空	天文及大地測量	氣象及地球物理	具
道	二	二	一	五	一三	計
一	五八〇	五〇〇(?)	四二	五六	一三二	六七
五六						三，〇四七

以上是指官立的機關而言，還有私立的研究機關，大多數是由實業家或大公司捐資設立的，其規模也很可觀，也做成一表如下。

性	地	生	農	衛生及醫學	理化研究	電	治	化學工業
質	質	物	林	學	究	工	金	業
機關數目	一	二	二	二	二	三	三	三
專門人數	一二	一〇	二五	八四	三七〇	九四	九〇	八一

造	船	一	三四
工	業	試驗	四
共	計	二二三	一〇〇〇

從以上二表看來，日本差不多有四千個專門家從事於科學及技術的研究。除了陸海空三項近于軍事研究以外，還有三千人在做着自然及應用科學的研究工作。其中應用方面研究的人格外多，如工程，農業，衛生及醫學皆是。科學研究之中，理化的人最多，因為是最近乎農工醫的應用之故。氣象及地球物理人數不算很少，因為其中包括地震及火山研究，這二項都是日本所特多的自然現象，所以研究以人也多些。做地質的人不甚多，因為日本土地甚少

定縣平教事業平議

在「鄉村運動」與「復興農村」熱潮正高的時候，向來為各方所推崇的定縣平民教育事業，忽然連續不斷地受到各方面的非難，這大約也就是表示一般人對於鄉村運動的注意能！各處非難中的最嚴厲而最重要的，要算中委張滄泉先生的談話。據世界日報十月二日濟南通信所載張先生對於定縣平教事業的批評，大約可分為四層：

，而且做關聯工作的人都已算入別門，又因當統計的時候，日本地質調查所適因地震被焚後規模大加縮小的緣故。生物的人不見得多，也因為許多人已算入農林漁牧諸類裏去了。日本的疆域比中國小十六倍，人口比中國小五倍，而各種專門人才則比例的實在多出許多了。

統計儘管統計，我們還須認清人才之質比量更為要緊，有名無實的專門人才數目雖多也是無用的。而且許多專門事業，經驗學識都不是一時三刻所能養成。日本人固然各事多肯認真努力，但他們在專門學術界的，也很有許多不能登峯造極的地方。中國人如果邁步追趕，出人頭地決不是不可能的。

叔永

一，定縣事業，「直不啻一騙人東西，誰從當地經過就請誰去參觀。」

二，定縣事業，「每年虛糜國幣二十四萬，已有十餘年，耗款有五百萬之眾。考其成績，實不過一隅之發展，何補於整個之農村？」

三，鄉村運動，用不着甚麼高深的學理。「現在一般

村治學者皆鎮日試驗研究，講述高深的學理，反使人以爲辦理鄉村事業如此之難，莫不望而生畏。」

四，鄉村事業，歐美已行之有素，可資借鏡，不必閉門造車，獨出心裁。大可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放大眼光作去，由中央及各省縣共同努力，完成整個鄉村建設。」

以上談話各點，曾經平教會總幹事晏陽初先生去電質問，張先生并不否認（原電亦載十月三日世界日報），則知此段談話，實足以代表張先生對於平教事業的觀察。我想張先生雖然很不喜歡平教總會招待參觀，罵牠是騙人的東西，但此次對於平教事業的批評，必定是參觀以後所得的結論。作者在兩年以前也曾得到一個參觀的機會。現在把自己參觀所得的感想，寫出來做一個平議，大約也是各方所願聞的罷。

一，張先生以爲平教會拿牠的事業來騙人，誰從當地經過，就請誰參觀。這個話殊不盡然，即使有之，也不足

爲平教事業病。據我們所曉得，平教會的人，正因參觀者的衆多，深感到應接不暇之苦。這是觀於每年春間，他們登報廣告限定招待參觀的期間而可知道的。可是要他們謝絕一切參觀，這當然也不行，因爲他們還得向各方募捐以

維持其事業的進行。所以我說招待參觀不足爲病。至於參觀的是否騙人的東西，則完全以該東西的本身價值而定，這是我們以下要討論的。

二，張先生說，定縣事業每年虛糜國幣二十四萬，已有十餘年，耗款有數百萬之鉅。這似乎也有點錯誤。我們以爲中國的許多教育事業都可以說是虛糜國幣，唯獨平教事業不能說這麼一句話，因爲平教事業經費的大部份，都是由私人募捐來的，而且大部份是由華僑及外國募集來的。這個經費來源的錯誤，正與國聯教育考查團報告書所說的平教經費百份之六十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擔任一樣。我想平教會應該多多的發表他們經費的來源及收支報告，以免這樣的誤會再三發生。

可是討論經費的來源，不能影響到張先生對於平教事業本身的批評，那便是所說的：『考其成績，實不過一隅之發展，何補於整個之農村？』我們以爲這一層是平教事業的根本問題，有詳細討論一下子的必要。

三，平民事業，乃以整個的農村建設爲目的，非以一隅的發展爲目的，這是平教會同人所再三申明的。所以，如其有人批評他們花的錢太多，他們就會立刻告訴你，他們的事業是要研究出一個中國各省各縣可以普遍利用的方

滿或方式來。如其就一縣看來，這個方法或方式的代價是太昂貴些，就中國一千九百餘縣分攤起來便不算昂貴了。同樣，如其有人指摘他們工作的計劃須時太久，他們也可以拿同樣的理由來作答辯。因為一個推行全國的計劃，用了六年或十年來研究試驗，本來不算過於遲緩的事體。可是這裏包含下列的兩個問題，是平教會同人所不能忽視的：

(一)是平教會在定縣試驗的結果，果能應用到全國各縣各鄉村去而不發生問題嗎？

(二)是鄉村建設的工作，果然須如晏先生們的精工細緻甚至於使人『望而生畏』嗎？

這兩個問題頗重要，讓我們細細的說明一下。

平教會標榜的四大教育與三大方式(見下注)，有的是可以推行全國而不發生問題的，有的是因地方情形不同，合於此地者未必適於彼處的。舉例來說，如像文字教育，公民教育，我們中國自來保有『書同文，行同倫』的歷史，是不會發生地方問題的，可是關於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就大大的不同了。拿農事工作來說，北方種麥，南方種稻，北方宜畜牧，南方宜養蠶，這種大差異固然不必說了。就以平教會生計教育部所注意的牧畜一件事而論，據實業

部農業實驗所發表的農情報告，江蘇，安徽，湖北，四川等省農家多數的畜產是水牛，黃牛，雞，豬；而山西，河北，甘肅，寧夏等省農家多數的畜產是馬，驢，騾，羊。所以即以牧畜一項而論，在北方研究出來的結果，未必能應用於南方。至於北方種植棉麥的方法，不能應用到南方稻蠶出產的地方去，是更不用說的了。照這樣看來，所謂生計教育的試驗，至多只能得到一個『到農家去』的普通方法，至於所用的特別方法——即改良農作的方法——在當地成功自然也關重要，但在平民教育的全體計劃上是不應該有多大關係的。關於衛生教育的研究，也可以作如是觀。明白這個道理，則平教會許許多多的試驗，都可以減省下來，而人與時的兩方面也就可以得到另外的發展了。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們以為如平教會的過分講求完備，是不必要的。舉例來說，在他們藝術教育裏面，有廣播無線電教育研究設計及攝影研究設計等項，並且以製造廉價的收音機為研究成績的一種。依我們看來，這種工作都不免太早，且不必要。我們只要看看普通城市中能利用這種設備的有幾多，便可以估量牠在鄉村教育中所占的地位。鄉村的人生活本來單簡，平教會如能就他們原有的音樂戲劇各方面加以改良，已足以調劑他們乾枯的生活。至於

無線電照像等設計，新則新矣，但不曉得牠對於平民教育的效果，敵得過對於一般人所發生的『畏懼』嗎？復次，平教會原來的計劃，要在十年或六年之內，除盡當地的『文盲』。我們以爲此種試驗，乃絕對的不必要。『除文盲』的工作，只好如耘田去稗一樣，做一分算一分。若說除非全數『文盲』除盡，這運動不算成功，我想天下無此笨人。且即使在一定時間之內把定縣的『文盲』除盡了，將來他處能不能如法泡製，按時程功，當然還是問題。所以我們以爲這限定時間除盡文盲的計劃，又是晏先生的一種精工玩意，於平民教育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說到此處，我們不能不承認，張先生所說的鄉村事業，用不着做得那樣難，使人望而生畏，實大有道理。我們尤其贊成的，是張先生所說的鄉村運動用不着甚麼高深的學理，至於現今一般村治學者，鎮日試驗研究的是不是高深學理，還是一個問題。我們所要指出的，是此種運動本來單簡易行，並且有些問題，是應該依地方情形，隨發見隨解決的。若把這件事當成一個深奧無窮的學理問題，須把各方面的情形一一想到，各種解決的方法一一研究出來方纔起手去做，那便是俗語說的耗子鑽牛角，恐怕有此路不通之感了。

末了，我們要問鄉村事業，是不是可以把『歐美行之有素的』成法搬來運用，而不必『閉門造車，獨出心裁』？我們的答語，當然是『不能』。因爲既名爲鄉村事業，這些事業必定是十分的鄉村化，地方化。即使在中國，恐怕此地方的成法也不能應用於另的地方，何況要以歐美的成法行之於中國鄉村呢？關於這一點，我們以爲平教會的主張最爲正確，牠的貢獻也值得稱贊。因爲牠的主張是要深入民間去發見他們的問題，而他的貢獻，是在這些問題中間找出解決的方法來。不管牠的成績怎樣，牠的效果怎樣，我們以爲牠的方向是不錯的。平民教育這件事，顧名思義，應當以普及全民爲最後的成績。所以這件事應由政府以全力推行，而不可責之於私人團體的義務上的熱心。張先生的批評，所謂『不過一隅之發展，何補於整個之農村？』是對的。不過這個責任，是應該由政府負呢？還是該由平教會負呢？我們希望大家切實的考慮一下。

二十二，十，十五

（註）四教育，指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他們是拿來治『愚』，『貧』，『弱』，『私』四種病的。三方式，指學校，家庭，社會等方式，他們是用來推行以上四種教育的。

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

費達生

請先提出一個中國農村建設的困難問題。熟悉中國人口狀態的人，都知道中國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每個農民平均只有五畝上下的土地。每家平均五人，則中國的農場平均只有二十五畝。這種狹小的農場，使機械無法引入以增農村的收入。用人力工作的生產方法下，二十五畝土地，除養活五個人之外，實在沒有多大餘力來供給發展中國工業的資本和原料。加上了天災人禍，中國的經濟在現代的世界之中，祇有向沒落的路上了。

中國農民太多已經為留心中國社會的人所共喻的了。但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這種情形呢？若是中國有一天能趕上西洋，只要四分之一的人就够供給全人口的食料，其餘的四分之三的人幹麼呢？我們可以舉一個事實來說明這問題的嚴重性。

去年太湖流域有一部分地方，天熱雨少，大有發生旱荒的危險。本來農民在這種情形之下，是最忙碌的，一天到晚要踏水車灌田。普通的水車，除了養牛的人家外，都是由人下來轉動的。三四個人一天不息的工作，並不能灌多少田。去年政府因為注意了農村事業，所以預備了許

多電力打水機，低價租給農民。以電力代人力，又便宜，又省力。任何經濟學家都會贊成這種辦法，而認為一定能增加農民幸福的。但事實却不然。在蘇州附近有一個賭鎮，據說去年暑期因打水機的應用，利市百倍。我們親見農婦來哭訴她們的丈夫或兒子，因為有了機器，可以不必工作，上賭場裏去把家產都蕩盡了。弄得農村中六神不安。

這一件事明白告訴我們機械引用到農村中去，並不是一件簡單而容易的事。社會決不是一個各部分不相聯結的集合體。反之，一切制度，風俗，以及生產方法等都是密切相關的，這種關係在中國因為經過了數千年悠久的歷史，更是配合得微妙緊湊。派克教授 Rober F. Park 在他論中國一文中稱中國是一個「完成了的文明」a finished civilization 就是這個意思。所以要為中國社會任何一方面着手改變的時候，一定要兼顧到相關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結果，不然，徒然增加社會問題和人民的痛苦罷了，

或者有人說這種情形是由於中國都市工業的不發達。若是都市中開設了大工廠這輩閒空的農民就可不到賭場中去，而吸收到工廠中去作生產事業了。或者甚至有人說，

上述現象是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時所免不了的，等農村人口過剩的壓力增加到相當程度，都市的工業自會發達。歐洲近代史的初葉不就給我們很好的證據麼？但是我們覺得

，資本的耗費，自然對於農村有極壞的影響。熟悉後者的，則認為兩者是相成的，因工業和農業本來互相賴以發達的。

作這些說法的人，似乎應當考慮到現在世界經濟的狀況，和中國所處的地位。用我們幼稚的技術，微弱的資本，要和列強爭一日之長，若沒有可以憑藉的特長，似乎是很難的。換一句話說，我們要追上歐洲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似乎已太遲了。就以熟知的紡織業為例罷，歐戰時，因世界競爭的力量薄弱，居然發達一時，但等到歐美能力恢復後就一蹶不振了。這是證明中國並不是沒有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才能，而是沒有機會。

以為發展都市可以吸收鄉村過剩人口的，自然是指新興的都會。但是新興的都會在中國却有一種特別的性質，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因租界的存在大都不能認為是中國的。除非承認外國經濟及政治的侵略對於中國實際生活上是有利，而我們願意享受這種利益的話，我們似乎不能認為上海式的都會的發達是一件可以引以自慰的事。這一點，在這裏不能深論，希望有機會再作另文討論。

在討論中國鄉村和都市的問題時，還有一點應當注意的，就是中國的都市實有二種不同的性質。第一種是舊式的「城市」，如蘇州等是。這種城市的發生並不是由於工商的發達，而是在於一輩脫離土地工作，依收租為生的地主們安全的要求。從經濟上論，這是一種消費的集團。第二種是新興的都會，如上海等是，它們是西洋文明東渡的產物，是現代的，最重要的是工業和商業，所以可說是生產的集團。論中國都鄉關係的，往往不分別此種差異，熟悉前者的，常認為兩者在經濟上是衝突的。消費者的增加

；而直接地把機械送到農村去時常會發生很多不良的社會結果。一方都市的工業，受外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阻遏不能發達。新興都會的發達，在族國主義的立場上論，又是和中國有害無利的事。至此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相信這個問題一定已絞盡了多少人的腦汁了。我們覺得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還是作實際的試驗。試驗的結果，才是最佳的答案。所以在這裏我們願意將我們十年來在這些問題上工作的經驗，貢獻於國人，以作解決此種問題的參考。

在民國十二年時，我們在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滄擊關）推廣部担任推廣改良太湖流域一帶蠶絲事業時，有機會可以時常到農民中去演講和勸導。我們講的不是任何空洞的主義或是任何不可捉摸的傳說，只是告訴他們如何可以增進他們蠶事收入的方法，如教他們把蠶室消毒，飼育的適當時間等。我們教他們的方法是經過科學的核准的，所以聽我們的人，實際上就能獲得利益。以科學的技術去取得農民的信仰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因為科學知識的本身已給我們正確的保證。所以在十四年時受我們訓練的各戶所繅的絲，比七絲市價增加了四分之一。十五年開弦弓村（屬吳江縣）就有七十多個女子願意上我們的學校受特別的技術訓練。這年的改良絲價比七絲增高三分之一。於是全村轟動，都願意接收我們的指導了。

但是我們不久就覺得發展農村第一雖需要科學的生產技術，但單是技術是不夠的。因為我們有一種成見，覺得一切科學上的發明，應常用來平均的增加一般人的幸福，不應當專為少數人謀利，甚至使多數人受苦。以養蠶製絲而言，我們願意盡我們先得的科學知識用來促進農民一般的利益。但是要達到這目的，單靠技術的改進就感不足，而一定須有一適當的社會制度了。

我們覺得人生中最使人鼓舞而能獲到最大安慰的，也許就在為人服務後，人家對自己的感激。這種精神上的糧食使我們有勇氣能為我們理想的新制度作十年的工作，我想的新制度的原則是很簡單的，就是要使每個參加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報酬。同時在經濟活動上，要能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營業絲廠相競爭而不致失敗。我們絕對認為工作的人不能一天不注意社會價值的問題。經濟生活和其他的生活一般，不過是人類要達到一種目的而發生的活動方式。所以我們不能不時顧到「這一種目的」。這目的就是美滿的人生，是社會的價值。同時在我們的經驗深信一個為社會服務的人，至少一方面要有一種社會價值的鑑別力，一方面要有一種宗教性質的熱忱。在我們這一種小小的事業中，我們幾十個人能放棄安閒的小姐生活，在烈日暴風中奔波，而覺得樂在其中的，在我個人看來，除了一種宗教性質的熱忱之外，是沒有憑藉的。素來沒有宗教訓練的中國人，使他不能在血液散放出一種不為自己打算而為人服務的熱忱，或是中國前途最大的一個障礙。

十五年時，我們因為技術上的方便，已實行稚蚕公育，就是在幼蚕時代，各家所飼育的蚕放在一起，大家輪流

負責，一則可以省事，二則可以便於監督。到十七年因爲木機所製的絲，切斷太多，不能賣高價錢，所以在技術上已需要用汽力推動的繅絲機的設備。於是我們就在這個時期，規定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的章程，先在開弦弓實行。合作社最重要的性質，就是一切生產器具俱由參加工作的農民所有，一切管理及行政的權力，由合作員掌握；一切利益由合作員公平分配。這計劃制定之後，不數日，加入該社的農民，就有四百餘戶。經濟方面不足之數，由我們四處設法籌劃，再由學校方面借一座引擎，按期付款，預期於五年之內一切債務及機械俱由利益項下拔清。開弓弦生絲精製運銷有限合作社就是這樣在民國十八年成立約。

詳細辦法在這裏不能詳述，簡單的說來，各合作員共同飼育稚蚕，長大後分開於各戶，由指導到各戶監督。結繭後共同烘繭，存藏於合作社內，先取價若干，俟製絲出售後，全價歸回。合作員中選有訓練者充當繅絲工人，由技術員指導繅絲工人及職員和其他工廠一般，俱按期付工資。

普通沒有到農村中去過實地工作的人，常以爲農民是愚笨不可教的。但是從我們經驗看來，農民是最善良而馴服的人，並且很聰明。像這種複雜的合作事業，現在一切

都已由他們自己辦理，我們除運銷及技術上加以指導外，一切都歸農民自己負責。該社成立已經四年，這四年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安靜年頭。國際市場的停滯，絲業的衰落，直接給這小小的試驗以巨大的威嚇。但是在這四年的經歷中却給我們發現了他特具的能力，使他可以堅立，並且可以解決在本文開篇時所提出問題的參考。我們可以先把他和營業絲廠比一比。

製絲業中最大問題是在原料。若一廠不能控制他所收原料的性質和品種，他的產品總不易得到圓滿的結果。但是在營業絲廠，這種控制是極困難的。因爲蠶戶沒有組織，就不易使他們養一律的種，和受技術上的監督。雖則現在已有工廠用各種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但決不像合作社的容易。合作社的稚蚕是公育的，同一品種的。飼育時受指導和監督，凡合作社員就有服從指導的義務，不然合作社就可有加以強制的權力。

第二點，是他費用的較輕，費用較輕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在原料方面，我們不必有大注流動資本去購買，運輸方面，須到絲製成了之後才往外運，分量很輕，費用頗少；設備方面，地價低，租息輕；人工方面，因生活程度低，勞力成本亦低。凡此種種都使成本減低。據他們三年

的報告是：

十八年，每担成本一〇八八元，出售最高價一二〇〇

兩，該年純利總額一〇，八〇〇元。

十九年，每担成本一四四四元，出售最高價一一〇〇

兩。該年虧耗三〇一〇元。

二十年，每担成本一二五三元，出售最高價一〇一〇

兩，該年虧耗四一八三元。

十九，二十，兩年的虧耗並不是賠本性質。因為每年要拔回開辦時的債款和付清每股應得的股息。這兩年雖則因絲價的跌落，但是尚能于還債付息後，只差了幾千元的數目。

第三點是這種組織的經濟伸縮力。這是他最大的長處。他使在裏面工作的人，不成爲一單純的工人。她們依舊是兒子的母親，丈夫的妻子。享受著各方面的社會生活。不使經濟生活片面發展，成一座生產的工具，失却爲人的資格。因為他們參加這種經濟活動，並不需要她們全部生活的新調適；工廠就在鄉間，同伴就是本來的鄰里，每天回家可以享受家庭的幸福。在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制度亦因是獲得他的伸縮性。譬如繭子已繅完，就可宣布停廠，工人就可在家裏，經營其他事務。不如城裏工人一日沒有工

做，就發生生活失調的痛苦。在工作忙的時候，工人們都很自願的加工趕製，因為他們所具的態度和營業絲廠中的工人不同。他們的工作是好像是爲了自己，愈努力愈滿足，所以絕不會發生罷工的風潮。態度上的轉變，使許多都市中勞工問題不會發生，同時使這種組織成一富於伸縮性的機體。

第四點是他的生存價值大。富於伸縮性的機體遇到打擊的時候，容易維持。最顯明的一件事，就是一切營業絲廠非每年能獲到利益，就不能維持，因為股東的目的，並不在給工人們工作的機會，而在股息的收入。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地方，資本向高利的流動率愈大。所以企業家一定要使他的工廠能維持一定高度的利率，不然立刻會有倒閉的危險，但合作社則不然。他們的目的，大部分在維持工作的機會。只要每人能有工作做獲得工資，雖則合作社的資產負債表上有虧耗的數目，亦是願意極力維持的。易言之，合作社的維持是建築在活動的每人生活實際的利益，而營業絲廠則建築在股東的息上。兩者相去自然很遠，結果就是前者的生存價值大了。

我們把合作社和營業絲廠相比較，目的是在說明中國要和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競爭時，這是可能的生路

。我們的制度根本上是要使經濟生活融合於整個生活之中，使我們能以生活程度的伸縮力來和資本主義的謀利主義相競爭。這實在就是蘇俄現在實行的原則。他們用國家的力量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政府的腐敗，不易使人有什麼希望，而我們所試驗的制度的確亦是一條可以達到這目的的路，也許比較上更適合於缺乏國家觀念，以家庭為礎基的中國社會。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如何引機械進入農村的問題。我們從絲業入手，一方固然是由於我們特殊處境的原因，但是所以能不發生像抽水機一般的情形，是值得我們留意的。我們並不把機械直接去代替已吸收了多量人的事業，同時我們所吸收大半是女工。女子在村中本來是很忙的，她們的功能是瑣雜的，所以本來織土絲的婦女，因現在有了機械繅絲，不必再作這種工，並不會覺得無事可做而去胡鬧。而且，在鄉村中家庭的組織很重要，家庭的經濟當是公共的。所以一家若本來有二個繅土絲，現在只要一個人去繅機械絲，在一家的總收入上並無出入。在二人

的經濟生活上就不會發生什麼改變，只是一個人可以有空餘來管理旁的事罷了。在這種富於調濟力的辦法中，機械才能慢慢地輸入農村，成為農民生產的工具。我記得幾年前燕大教授秦斐氏就在中國評論報上發生提倡農村小規模的副業。從副業入手，非但是增加農村收入的良法，亦是的用機械的平坦大道。

我們把這一些經驗貢獻於關心和參加農村運動的人，雖則或許這些辦法只能適合於太湖流域的絲業，但我們希望同一原則可以應用於其他地方，其他性質的事業上。本來，我們深信一切辦法只有從實地試驗中得來，人家的成績只能作為參攷的材料罷了。農村運動最重大的條件，還是在從事此種運動的人能有服務的熱忱和技術的訓練。沒有服務熱忱，不以事業的成功為人生中重大安慰者，很容易到農村中去受種種生活上的困苦。沒有技術的訓練，就是到農村中去，亦是容易獲得農民的信仰，實際上，不會有什麼重大效果的。

旁觀者言

聖羽來稿

（時代公論田炯錦先生論景卣四庫全書兩文的讀後感）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學術界上曾起了幾次的波瀾：最

初是新文化運動，繼之以東西文化問題，繼之以人生觀的大論戰。人生觀大論戰以後，中國近代史似乎轉入了另一方向，——革命的空氣掩蓋了一切。近年來唯物史的研討頗爲活躍；然而這只呈一面倒之勢，也不過是革命高潮中的一個漩湫而已。今年的形勢只有江河日下；東三省以外，更找上了熱河；廢止內戰以後，還加演四川大舞台與察哈爾一幕。到處只是悲觀，到處只是政治上的紛亂同不安。在這一種情況之下而有選印四庫全書，而有因選印引起的南北議論，不能不算是一個意外——不帶政治臭味的一個論戰，這是「革命成功」(?)以後破天荒的一次! (?)現在此番爭辯將近結束了，在將結未結的當兒，乃有田炯錦先生的「名流與景印四庫全書」(時代公論七十五號)同「再論名流與景印四庫全書」(同上七十八號)兩篇大文，來添一個錦上之花，不禁使看戲的人有餘音繞樑之感。不過這餘音不是那餘音，而是政治的意味放到這一次爭辯上面的一種回聲而已！

田先生的文章牽涉到「名流」，牽涉到「北平圖書館」，牽涉到個人，這自有負責的人去理論，我是一個旁觀者，犯不着去爲他們辯護。我只願意談談我個人讀田先生之文以後，所發生的一些零碎感想。

田先生兩篇文字，洋洋數千言，綜其大意，其所痛罵者無非兩點：(一)此次的爭論，不應對政府格外苛責；(二)不應對有價值的事，予以批評。通篇語氣只覺得官氣逼人，活像一位政府發言人的口吻！

本來在現今的中國做老百姓委實是太難了！對現在不滿是反革命，隨遇而安，則自己吃了苦頭。然而中國的人畢竟是樂天知命，抱長期不抵抗的人居多，對政府的措施，只有隨順，絕無反抗。所以在中國做官辦事，而說辦不通，而說無成效，那只應該叫那些抓印把子的官兒們反躬自問，老百姓是不負其咎的。老百姓是只配做順民，根本就沒有「責」過政府，更說不上「苛」。這一次對於選印四庫的爭辯，或者要算是例外了。此事只不過選印幾部破爛古書，絲毫牽不到政治，所以有幾位書呆子們才搖筆爲文，各効片獻，萬想不到田先生會加以「苛責」政府的罪名。「苛責政府」再進一步，豈不就是「反革命」麼？田先生固然沒有拿出這一頂大帽子來，但在好搖筆爲文的書呆子們，不能不有履霜之懼呢！其實爲政府着想，這幾年來的老百姓作寒蟬仗馬也就够了。在這一次選印四庫珍本的爭論上，如能寬大爲懷，任其放言高論，未嘗不可以使人感到中國的前途尚有一線的生路，最少在陳死人的書裏面，我們

還可以跑一蹶野馬。如其在這一點小小的園地裏都不能隨意的說話，那豈不令人有人間何世之感？田先生又說「歐美文明國家的人，對政府並不責望過甚，並不吹毛求疵」。但是我們的國家並非歐美的國家，而我們這些老百姓也够不上同歐美國家的「人」相比。至於我們的政府同歐美國家的政府相比，恕我們此刻尙無此胆敢以表白我們自己的感想，只好請田先生原諒則個！田先生想是到過歐美的，也許聽過外國公園裏的公開宣傳；如其不錯的話，那我們便可以彼此「心照不宣」了！

我們不妨再下一句轉語：如其老百姓的意存阻撓同過分責備，能使今日的當局會因此而灰心，因灰心而至於玩下野或出洋考察等等的把戲，未始非古語所說的「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所可慨者我們讀了田先生的危言，只有受寵若驚耳！

其次田先生對於所謂善用筆桿的通儒，也痛罵了一頓，可謂快人快語。這一段罵語之中又牽涉到胡適之先生的哲學史（田先生原文未舉名，茲姑懸測如此，確否待考）以爲是由於吹毛求疵的批評，而致中下冊怕人批評，不敢輕易付印。窺田先生的主張，似乎是有價值的著作便不應批評，只可譽揚；否則就陷於黨同伐異吹毛求疵的不幸現象

，「此風不改，恐將來吾國文化上的落後與破壞，要和政治上一樣」。胡先生的哲學史之中下冊不敢輕易付印，其原因是否如田先生所說，這要問胡先生自己，我們不敢代爲置答，也不敢肆意猜度。不過胡先生的哲學史上冊出版後，因有人不滿意於胡先生的主張而批評，因批評而引起一般人對於中國哲學史更深的興味同研究，因研究而發現了許多新的理論。這種批評同因批評而得到的新的收穫，不僅一般人可以擴大眼界，即在胡先生自己也得了不少的觀摩之益，對於他的研究不無裨補；這我想田先生也是承認的罷。如其胡先生的哲學史上冊出版以後，學術界便亦步亦趨，唯唯諾諾，奉胡先生之言爲金科玉律，絲毫不敢更易，那中國的學術界還不知道要沉淪到那一步田地呢！把學術上的批評牽扯到政治上去，併爲一談，只此一家並無分號」，這是田先生個人的創見，我們不敢苟同。至於田先生爲當局辯論的話，事實最雄辯，用不着我們老百姓去頌揚，也用不着我們老百姓去咒詛。

現今之世，還不會禁止處士橫議，新定的約法上也有言論自由的保障，我希望不至因此一篇「閒囁」的文字，而買天外飛來之禍！單就這一點而言，田先生大約也會爲我表示同情罷！

東西兩大衝突將化爲一麼？

蔣廷黻

平教會與定縣

燕樹棠

跋燕先生的論文

廷黻

論青年讀書風氣

佩弦

蘇俄與美國之對照

Chamberlain原著
秀瑩節譯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東安市場一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侯記書社、王府井一民智書局、良友公司、新立書局、米市大街一君中書社（代定）
志遠書社、和平書店、嘉陵書社、榮華書社、卿雲書社、長光書社、增華書社、宣內一神州國光社、佩文齋、瀋陽一北平書局、星雲書社、德信一景山書社、清華附設社、燕大燕昌號、成府競進分社、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大生書局、文元子、局一精華印刷書局、紫房子、書部一（總代售及代定處）
新華書局、新亞東、新中國、現代書局、光華書局、新中國、定處、新華書局、新中國、中書局、大中華書局、正中華書局、鎮江書局、天一書店、鎮江書店（代定）

徐州：徐州廣告社、振華書局、現代書局、新時明書局、宜美善、金城圖書公司、新書公司、胡正、新生命書局（代定）
武昌：神州國光社、現代書局、廣派、國光社、現代書局、廣州：大東書局、圖書消費社、興寧書局、新民書局、梅州：海報、文書局、百利公司、時代書局、海報、文書局、百利公司、桂林：師報、文書局、百利公司、濟南：方書局（代定）、中山書局、青島：中書局、春記報社、威海衛：吉昇昌、春記報社、安東：文書局、止齋書館、威海衛：文書局、止齋書館、天津：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甘肅：新安書局、統一派報所、西安：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蘭州：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成都：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合川：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雲南：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杭州：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寧波：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福州：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廈門：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衡州：華新書社、統一派報所

獨立評論

第十七四號

日九廿月十年二十廿國民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一角以下爲
限）代洋九五折。

東西兩大衝突將化爲一麼？

蔣廷黻

德國退出國聯的消息傳出以後，全世界的國家都看其身透的槍是否已配上子彈，即時可放。國際形勢的嚴重是九一四年以後所曾未有過的。

裁軍會議的衝突根本是法德的衝突。這是當代西方的大問題。法德有這軍備的衝突，因為牠們有政治的衝突；

軍備都是爲貫徹政策而設，戰爭就是外交的續演。德國雖口口聲聲說，牠是爲平等，爲國防而奮鬥，其實這都是外交官話：「平等」不過是作用，「國防」徒爲口實。近數年來，法國雖握有世界最大的陸軍，世人皆知法國絕無侵略德國的野心。法國不但也不想侵略，且在可能範圍內已對德國表示種種退讓，以求兩國關係歸入友誼的途徑。萊茵河畔的佔領軍提早撤退；賠款始則減少，終竟取消；關於海外殖民地，法國亦表示有商量的可能。法國所不能退讓者就是此軍備問題。因爲什麼原故呢？一則因爲德國的人口比法國要多二千萬，幾三分之一，且加增率較高；目前法強於德，根本德強於法。二則因爲自歐戰以來，德國頭不服輸，要圖報復，把維爾塞條約看作德國的國恥。德國軍備所要貫徹的政策就是這條約的修改；此外德國並無軍

備的目的。法國在四十四年內曾兩次受德國的侵略；而現今德國的當權者又是極端國家主義的信徒。法國只能作政治的讓步，絕不能讓德國有用軍備來實現野心的可能。法德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現今國際的根本事實。裁軍會議的決裂並不出吾人意料之外。

費解釋的不是法德的衝突，是其他列強的分野。第一英國這次的態度完全與法國一致，其當局言語的強硬反過於法國。法德軍備的平等與英國有何不利？她們兩國勢均力敵，英國更能舉足輕重，這就是英國外交之利。大戰以前，英德之間因爲海軍的競爭以致水火不相容。戰後德國的大艦隊沉於海底，現有的軍艦簡直不足當英國海軍之一擊。關於軍縮問題，英國無幫助法國之必要。英國既助法國，那必是因爲法國關於別的重要問題能給英國相當的助力。

意大利是不滿意大戰後世界土地及權力分配的國家之一。牠所處的地位完全與德相同。且兩國均以法西斯主義治國，論理亦應互相提攜。同時法意兩國爲地中海的海權素不和睦。這次在裁軍會議內，意大利反左袒法國。這更

費解釋了。吾人試回溯意大利近代的外交，就知道意大利向不與英國處相對的地位。大戰以前，德奧意三國原爲聯盟，以後反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近年意德關係頗密切，一到緊急的時候，意大利又捨德而就英法。此無他：意大利既以半島立國，牠的出路在與海權國合作。

法德軍備的平等並無不利於美國。此時美德之間全無直接的利害衝突。且上年冬季因爲法國拒絕交付到期的戰債，美法之間的感情一時頗爲惡化。今茲在裁軍會議內，美國代表反與英法代表一致。美國豈不是白爲法國作了馮婦？據吾人所知，國際上最講禮尚往來，絕無白作馮婦的事情。

自九一八以來，法國對於遠東問題一向冷淡，輿論界日常發相日的言論。近來關於中東路問題，忽反常態，大與蘇俄表同情。俄法的接近是今年外交界的一個大事實。

平教會與定縣

平民教育會在河北省定縣傳播它的教義，到現在整整的十幾多年的工夫了。前幾天——雙十節那一天——河北省政府本中央命令所組織的縣政建設研究院，在定縣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到場的都是文武大官，平民教育會的領導者和

法聯俄，無疑的，是爲對付德國；俄聯法是爲對付誰呢？同時蘇俄外長即將應美總統之約，赴美談判美俄的復交。美法兩國的對俄政策如出一轍。

我向來覺得世界儘管有國聯及第三國際的活動，國際的關係不是短期內所能改造的。大戰以前的外交方式究竟是常態方式。國際主義的活動，無論是赤色的或白色的，雖有其影響，尚未到推改常態的程度。日本近年的舉動就是促進世界外交復戰前常態之主要動力之一。戰前英德爲海軍，法德爲亞羅兩省，俄奧爲近東互處相對的地位。久而久之，這三個衝突打成一片，而英法俄與德奧分成兩壘。現在的世界又有兩個大衝突，遠東和法德。最近外交的發展表小列強將作進一步的分野，而法德問題及遠東問題又將化而爲一個世界問題。

十月二十二日

燕樹棠

權威者安陽初先生被任爲院長，在場主席，並拉到些鄉村民衆代表，在場湊趣。安先生在定縣十年前以千字文識字課的小教師，現在做了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的院長，就晏先生個人說，的確是很大的成功。平民教育會十年前在

北平不過一部份號稱教育家聚會之所，現在在定縣竟有會員一萬餘人的民衆；只就平民教育會的本身說，的確也是很大的成功。但是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平民教育會，在定縣

的施設與活動，只聽見了國內外名流偉人的贊揚，向來沒有聽見過被試驗的定縣民衆的呼聲，因此自然更無從知道被治者定縣老百姓的情感和苦痛。我不幸也是定縣的老百姓，雖在外不能分擔縣內父老子弟們物質的苦痛，都因為我生長在定縣，我對他們自然要有無限的同情。我現在所要講的話，不是我個人對於平民教育會的私見，是把定縣平民方面的輿論和輿情，總合起來，代替我們那被試驗的『文盲』的老百姓們，對於那試驗者不文盲的平民教育會的活動，說幾句話。

(一) 定縣民衆懷疑平民教育會利用模範縣招牌之動機，向來對平教運動之領袖不表信任。民國元二年的時候，定縣有一位縣長，名叫孫發緒，是黎元洪的親信，他爲他自己出風頭，把定縣改爲『中華民國全國模範縣』，添設了好些機關，不但人民的負擔隨著增加，借官廳的威勢而欺壓老百姓的劣紳也隨著增加了。當時孫縣長誇耀他辦模範縣的政績，曾招引了許多的人到定縣參觀模範縣。模範縣之內並且辦了一個模範村，更是名稱新穎，引動了外

界人士之注意。模範縣之名因此遠播全國，老百姓沒有得到模範縣的好處，只感覺了增加負擔之苦痛。那位孫縣長却一步一步的高陞爲巡按使爲省長去了。

到了後來，平民教育會的領導者晏陽初先生來到定縣辦理平教，並宣布了『除文盲作新民』大政方針，要改造定縣，一般老百姓，愚者發生再增負擔的恐懼，而黠者却追問他們來到定縣之動機，說道『晏先生是四川人爲什麼不在他的家鄉去作好事？若要在人口衆多的區域，爲什麼不在北京天津？若是在文化低下的區域，爲什麼不在綏遠或甘肅？恐怕是第二孫縣長來了罷？』定縣民衆，自始就懷疑平民教育會的誠意！

(二) 平民教育會把定縣固有之建設冒充自己之成績。平民教育會在外邊無論怎樣宣傳他們的建設成績，在定縣一般人的心中，明了實際的狀況，知道他們虛偽的冒功。定縣的民衆在河北省向來是認爲最努力的老百姓，農業，水利，教育，都有很好的成績。一般的農人對於選擇耕種，利用土壤，及製造又便宜又好的肥料，因有不記年代的久遠的經驗，都有有效的辦法。定縣土厚水深，河水可以溉田的很少，徧地都是人工所鑿掘之水井，舊法是轆轤汲水，新法是用牛馬所拉之水車汲水。所以定縣老百姓常

有『旱不死的定州』之自豪語。去年春夏秋三季禾稼滿地，不見隙土。這都是定縣老百姓自動的成就，而平民教育會的領導者却向參觀的人們宣傳說這田是他們指導着耕種的，說水井是他們指導着開鑿的。定縣在三四十年前就有笨重的水車，十餘年前有一位劉仙洲先生——現在是清華大學的工程教授——他把水車改良，改的輕便了。近年以來這種改良的輕便水車在定縣及臨縣都普遍的應用，而平民教育會說是他們改良的，這豈不是大笑話嗎？

說到教育！平民教育會大聲疾呼的喊叫在定縣『除文盲』。更是笑話！定縣設立學校，為期很早。三十年前，——庚子以後——就有縣中講新學的谷九峰先生等數人創立『定武中學』，始而在縣城設立小學，繼而推廣到四鄉添設小學。近十年來各村莊都有小學，大村莊並有女學，學校在鄉村已經普遍的設立，小學不收學費，無論貧富，都有上學讀書的機會。中小學校畢業的學生沒有統計。大學畢業生有八百餘人，東洋留學的有一百餘人，與平民教育會的領導者同樣吃過西洋麵包的已有七八人。平民教育會在定縣教育上的貢獻，充其量不過是在數百村莊之五六村莊中的小學裏邊附設了幾班識字班，讀讀他們的『千字課』而已，嗚呼哀哉，平民教育會『除文盲』喊聲和成績！

說到平民教育會教訓老百姓們講衛生。老百姓們這樣說明衛生問題：『講衛生！每天把院子掃的乾乾淨淨，把桌子凳子拭的光亮，我們知道，但必須在耕田作飯的餘暇；剩下的飯菜不好吃不可吃，我們懂的，但我們必須留起來再吃；把衣服常常先濯，穿着舒服，我們也知道，但是我們計算——一件衣服若半月洗一次，可以用兩年，若五天洗一次只能用一年，我們沒有錢作新衣服，只有少洗幾次，多用幾月。那麼，我們老百姓雖沒有知識，還勞動醫學博士來教訓我們嗎？』

說到他們的改良牲畜，更加不通！晏陽初先生從美國帶到了幾個大豬，其大如牛，每頭體重有八百多斤，每日須吃大豆高粱四五斤，又肥又大真是好看。據說每人參觀，一定要領到豬圈之傍去看大豬，以博得參觀人士之贊賞。定縣所產的土豬，名為『笨豬』是對『洋豬』而言，大者的體重不過一百二三十斤，是家畜，這些笨豬雖不景氣，但它們吃的東西也不講究——瀾鍋的污水，腐敗的飯菜，混合糠粃，作它們的食料。這類笨豬是定縣大宗土產，以北平為銷場。晏先生對老百姓們說：『你們若把你們的笨豬淘汰下去，都換成我的洋豬，你們就發財了！不患貧了！』的確！去一個笨豬，添一個洋豬，等於增加七百斤

豬肉，若換成一萬頭洋豬，就等於增加七百萬斤豬肉。但大豆高粱是老百姓們吃的！晏先生的洋豬可以與老百姓爭食，笨豬那有這樣的口福！總而言之，平民教育會在定縣的成績，全係有名無實，全是冒功買名的宣傳。

(三) 平民教育會在定縣製造教黨與非教黨之衝突。

從前晏陽初先生在定縣只有一部分的教權，而政權不在他的手中。今年定縣縣長霍六丁先生是平民教育會社會組的主任，全縣政教兩權因此就完全統於一尊了！自然可以爲所欲爲，言所欲言。他們對老百姓誇威風，說定縣人口有三十多萬，他們有一萬名平教會員，以一萬名有組織之民衆統制三十萬無組織之民衆，誰敢不服從！果然，他們一步一步的實現他們這種政策。自霍縣長就職以後，他所組織一切民衆團體，都是以平教會員爲基礎。從前憑借官勢以欺壓老百姓的人不過是數十名劣紳。現在呢？這一萬名平教會員變成了縣長的爪牙。結果：從前一般老百姓受數十人之欺壓；現在反受一萬人之欺壓了！平教會員可以直接面見縣長；非平教會員就沒有這個機會。鄉下人能見縣官就可以欺詐鄉愚。現在平教會員實在是定縣的統制階級，晏陽初先生實在是定縣的「斯台林」了。所以大家呼平教會員爲「教黨」。數月以來，教黨與非教黨之衝突，時有

所聞，彼此間的惡感，日甚一日，一般人大感不安。

(四) 平民教育會在定縣潛伏反動勢力。近兩年河北省軍警當局把定縣劃爲赤區。定縣城南常發現所謂抗債團，抗租團，均糧團，以及各種反動的標語。平教縣長在審理訟案的時候，亦常以農村經濟破產爲理由，訓戒「地主」不得壓迫「租戶」，「債主」不得壓迫「借債人」。縣長對老百姓們，用此類名詞，畫分畛域。因此抗債抗租之事日多，平教縣長只本主義而行，並不依法辦理。結果，老百姓大家愈加恐慌，農村經濟愈走死路，好像平教運動與反動勢力互相呼應而故意製造階級惡感，階級鬥爭，社會恐慌。現在定縣有識之份子都認爲平教會的活動若不停止，全縣民衆勢必至于沸騰崩潰，不可收拾！

(五) 平民教育會提高了定縣生活程度。平民教育會的本部及附屬的機關都設立在定縣城內，他們每年二十多萬的經費大部分用作他們的薪金。城內頭等的房子都被他們租用作了公館，他們雖以平民自居，但佔用城中貴族式的房子，他們還以爲不美觀，都已另加修飾。那些公館內的小姐太太們都是摩登裝飾，摩登衣服。城內的「文盲」婦女固然隨時效顰，那城外的村女村婦也因羨慕而仿效。因此這幾年城內添了好些家綉緞莊洋貨店。前幾年定縣城

內若想吃海參的酒席，必須一個星期以前定作；現在若想吃燕翅席立刻即可做妥。這幾家大飯館全恐平民教育會職員各家公館作他們的主顧。定縣人雖『文盲』無識，也自然而然的垂涎起來。定縣本是老老實實的農業社會，生產力沒有比從前增加，而侈奢之風却日甚一日，平教領袖們的觀感與模範大與有力焉。外邊的人們看見定縣每年由平民教育會帶到了二十多萬大洋錢，認為定縣得到好處，但在定縣一般人方面正感覺受了大害而并且遺禍患於將來。

(六) 平民教育會侮辱定縣民衆的人格。平民教育會的領袖們對定縣民衆的態度，縣內有些知識的人士都認為是侮辱全縣民衆的人格。他們對待一般老百姓們，好像日本在太平洋羣島行使委任統制，好像西洋在中國傳教的牧師。晏陽初先生現在把定縣全縣的政教兩大權操在自己一人之手，當然可以隨時命令縣長隨時傳喚無閒的老百姓們進城來接受院長的訓話。平民教育會本是私人團體，但晏陽初先生從前即能利用縣長的威權嚇令老百姓進城聽訓。前年是晏先生在定縣權威最大的時期——當時晏先生在定縣以平民的資格接連不斷的接到蔣主席和張副司令的召他進京來平的電報。他於是乎請縣長召集全縣各村長村副進城談話，當場晏先生把蔣張兩位大人的電報從兜兒裏掏

出來，向那些鄉村村長村副高聲朗讀一遍，會場肅靜，屏息敬聽，鄉村老百姓們傳頌一時，說晏先生比蔣主席張司令的本領還大；不然，他們為什麼請他呢？但是有的人可欺，不是人人都可欺！有些知識的『鄉愚』而大為憤恨，大說特說的議論，謂這種辦法是『欺詐鄉愚，依勢凌人』，認為是莫大之侮辱。諸如此類的瑣事甚多。定縣一般的民衆對於平教運動，一天一天增加厭惡的心理，全縣三十餘萬民衆，除被誘人而為會員的一萬人而外，都希望『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平教領袖們喊叫十幾年『除文盲』，『作新民』，『救愚』，『救窮』，『救弱』，『救私』，等等口號。一般老百姓心裏漸漸的難過起來，說道：『我們又愚，又窮，又弱，又私，又文盲，又腐敗，可如何是好呢？』平教先生們就說了：『聽我們的話，你們就好了！』老實的老百姓聽過十幾年的教訓，仍然覺着沒有長進！尤其是覺着更窮了，更弱了，更弱即怕官兒了，更怕平教會的官了。那有些知識的老百姓就憤急起來，罵道：『混蛋！你們平教會把我們定縣人看作什麼東西了，豈有此理！』的確！外國的牧師到中國來傳教，把中國人看作可憐虫，前來拯救，即使他們懷抱着真正大慈大悲的善心，中國人也不願自居可憐虫，而

受他們的憐惜，這是人類自尊的天性之反應。難道說平教領袖們真不知道這簡單的道理嗎？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

(一) 依定縣一般人的見解，平民教育會在定縣的工作，不但有名無實，并且將引起民間階級的紛糾；

(二) 定縣的社會成績是定縣固有的，不是平民教育會造出來的；

(三) 定縣一般人認平民教育會的施設是爲他們自己少

跋燕先生的論文

我沒有到過定縣，我也沒有參觀過平民教育會，不過我生長在一個偏僻的鄉裏，至今因爲公私的關係常對鄉村的情形加以注意。我覺得中國的根本問題是鄉村問題。換句話說，中國的問題就是鄉村問題的放大幾百倍，幾千倍，而鄉村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的縮影。各縣的縣城都是小南京；在這裏面，派別的爭權奪利都是齊備的；所不同的，在大南京，人們爭幾百元一個月的地位，在這些小南京裏，人們所爭的是幾十元，甚至幾元錢一個月的小差事，而小差事的爭奪所引起的憤慨和仇恨往往超過大地位

數人的私利，不諒解他們是爲定縣的公益；

(四) 定縣一般人對平民教育會人員所發生的厭惡，積恨日深，恐將發反抗的運動。

以上所說的情形不是我個人的私見，是我們所得來的定縣的公意。我所說的那些情形是在平教會的報告書，宣傳品，出版物，統計表，等等文件的裏邊所沒有的。現在在定縣的平教運動已成爲國內外各界所注意的大事，定縣本地的意見也許有些可以供參考的價值。

☆

☆

☆

廷 黻

的爭執。各縣的各鄉就是全國的各省；處處都是有人把持；彼此都是不合作，不相讓的。同時改革的方案，在各縣如同在全國，必須包括技術方面及制度或社會方面，而這兩方面都是十分困難的，都須程度很高的改革。我們不要認錯了：中國鄉村所須要的不是小改革，是大革命。我們平常不說鄉村革命，僅因爲革命二字在國人的頭腦裏，總是含着殺人放火的意思，而鄉村革命之對象——窮，愚，私——不是殺人放火所能打倒的。此外還有一點我們不要認錯了：小縮影的複雜絕不在大像之下。

因爲以上的見解，所以燕先生所形容的定縣人民對平教會的反感並不全出於我的意料之外。鄉村人民對自外來的一切的運動都是懷疑的。「晏先生是四川人，爲什麼不在他家鄉去作好事？」倘若燕先生到敝縣湖南邵陽去辦平教會，邵陽人也會問；「燕先生是直隸人（鄉下尙不知直隸已改名河北），爲什麼不在他的家鄉去作好事？」其實無論什麼賢人善士到任何縣裏面去，這個問題都會發生。在這種狀況之下，一個人能在異鄉辦點事已足證明那個人多少有點可取。第二，「晏先生在定縣十年前以千字文識字課的小教師，現在做了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的院長，就晏先生個人說，的確是很大的成功」。定縣人若有這種感想也是很自然的，因爲他們不知道這個千字文的「小教師」有個大理想要去試試，不知道「小教」師原來可以作大教授而爲其理想所迫不作，也不知道研究院院長，在定縣以外的人（晏先生在內）看起來，並不是一個頭品頂帶的榮銜。晏先生的人品不在這文討論範圍之內，我確知道他若不到定縣去，他所能得的收穫，在陞官發財方面只有比現在還好。他曾在雅魯大學畢業，後入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院，像他這樣的資格和訓練而在國內各界居高位者比比皆是，這個院長的地位算不得「很大成功」了。

平教會的宣傳，有時我也覺得過火。在中國這個社會裏，招搖就是招嫉招禍，所以單從手段上看，過火的宣傳是不應該作的。但是事有經有權。處平教會的地位，晏先生既非大富翁，政府又不出經費，不能不靠中外人士的捐款。如燕先生的事業也靠捐款維持，我怕燕先生也要注意宣傳。且平教會是一種運動，會中人士務求推廣於全國，宣傳應該是牠的工作的一部份。當然，宣傳不應該冒功，但燕先生所指責的各點不能使我們全無疑問。譬如：「一般的農人對於選擇籽種，利用土壤，及製造又便宜又好的肥料，因有不記年代的久遠的經驗，都有有效的辦法。」這樣說來，中國的農業已是至善盡美，無須改良的。這豈不是替農人「冒功」？又如：「近十年來各村莊都有小學，大村莊並有女學，學校在鄉村已經普遍的設立，小學不收學費，無論貧富，都有上學讀書的機會。」這好像也有一點替定縣舊教育「冒功」的嫌疑，恐怕就是在教育這樣發達的定縣，兒童失學者及成年不識字者仍佔多數。至於燕先生所指責的養洋豬及洗衣服的笑話，證明平教會仍須努力研究，使農民能得着能力所及的衛生方法及改良畜種方法，不是證明平教會不應該提倡衛生及改良畜種。在十九世紀的下半俄國知識階級初作到民間去的運動的時候，這類的笑話也演出不少，可見士大夫階級，不分中外，對於民

間情形，都是一知半解的。我希望平教會不要因為有人批評而停止工作，反而要因此作進一步的研究和努力。

在燕先生的眼光裏，平教會不但無功可言，且在定縣有種種的惡影響。第一，他說平教會使定縣人民的生活奢侈化了，因為會中的職員作了奢侈的標榜。這種影響，我想是可能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試平心靜氣的思想：我們過慣了都市生活的人是否能夠過鄉村生活；並且倘若我們飲食起居各方面事事都平民化，我們是否能夠維持工作的效率。此中的困難不是我們的生活程度過高，是平民的過低。我常聽人說，二十個中國工廠工人始能作一個美國工人所作的工。生活程度的高低與工作效率的高低是很有關係的。我以為少吃少作不是個好辦法，或是因為日常生活不舒服致工作減少也不是個好辦法。我相信燕先生所批評的是有根據，我不過要說明這個生活程度問題還有一方面是燕先生所未顧到的。

第二燕先生說平教會引起了「教黨與非教黨的衝突。」所謂「教黨」就是平教會的一萬名會員，「非教黨」就是未入會的三十萬人民。「結果，從前一般老百姓受數十人的欺壓，現在反受一萬人的欺壓了！」燕先生這段話，我想也是有根據的。總而言之，就是定縣現在統治階級換人了。

。換句話說，平教會無形中在定縣執行了一個大革命。那些原來得勢而現在失勢的人自然不滿意平教會；在革命過渡的時期，社會總有些不安。這都是極自然而且免不了的現象。為國家前途計，比較要緊的是下列諸問題：（1）我不換鄉村的統治階級能執行鄉村改革麼？（2）中國現在能免除統治階級而完全實行民治麼？（3）定縣的新統治階級是否比舊統治階級更加黑暗，還是稍為開明？換句話說，定縣老百姓的負擔是加重呢，還是減輕呢？我以為燕先生這段批評由於偏信定縣的失意的小政客和舊紳士，以他們的言論作為老百姓的言論。如我們以這般人的言論為社會公論，那鄉村的改革是永無希望的，因為他們利在維持原狀。

第三、燕先生說：「在平教縣長審理訟案的時候，亦常以農村經濟破產為理由，訓戒「地主」不得壓迫「租戶」，「債主」不得壓迫「借債人」。他又說：「因此抗債抗租之事日多，平教縣長只本主義而行，并不依法辦理。」這段批評，我相信也有根據，不過我以為平教會的這種辦法是對的。我們若不滅殺地主和債主的壓迫力，鄉村經濟的復興是永無希望的。「耕者有其地」根本是正當的，勢所必行的。惟一的問題是這種改革將由共產黨拿殺人放火的方法來

實行，這是由政府用調濟的方法逐漸執行？可惜平教會還只「訓戒」地主和債主。燕先生說：「河北省軍警當局把定縣劃作赤區。」果然，則足見當局不能分赤白。燕先生又說：「平民教育會在定縣潛伏反動勢力。」「反動」二字豈不是有點不當；有點故意中傷。我們看了燕先生這段批更能了解他的立場。他對於定縣的原狀，無論是農業或教育，是完全滿意的。談到定縣現在的政治，他是與失意的政客和鄉紳表同情的。談到定縣的經濟政策，他是偏袒地主和債主的。所以他的批評，與其說是代表定縣三十萬老百姓，不如說是失意紳士和地主的惡感的反映。

中國農村問題是十分嚴重，十分複雜的。士大夫階級

論青年讀書風氣

大公報圖書副刊的編者在「卷頭語」裏慨嘆近二十幾年來中國書籍出版之少。這是不錯的。但他只就量說，沒說到質上去。一般人所感到的怕倒是近些年來書籍出版之

濫；有鑑別力的自然知所去取，苦的是尋常的大學生中學生，他們往往是並蓄兼收的。文史方面的書似乎更濫些；一個人只要能讀一點古文，能讀一點外國文（英文或日文），能寫一點白話文，幾乎就有資格寫這一類書，而且很

十之八九尚置之不理，以為問題並不存在。政府又只有紙上復興計畫，也感覺無從下手。在這個當兒，幸而有少許志士願到鄉間去試驗。在此試驗期中，錯誤是免不了的，因為誰也沒有得着此中的秘訣；試驗者因個人性情的特別也免不了有開罪於人的言行，因為人都是不完全的；改革的方案總要使一部份人士不滿意，因為利害的關係和人們守舊的根性。我們不到民間去的人，對這種試驗，只應有善意的貢獻意見，不應有惡意的破壞。以燕先生的地位，我相信他能幫助平教會改良工作的方法，同時也能替平教會解除同鄉的各種誤會。我因為燕先生所提的問題的重要，寫了一些淺見，作討論的引進。

佩弦

快的寫成。這樣寫成的書當然不能太長，太詳盡，所以左一本右一本總是這些「概論」與「大綱」與「小史」，看起來倒也熱熱鬧鬧的。

供給由於需要；這個需要大約起於五四運動之後。那時青年開始發現自我，急求擴而充之，野心不小。他們求知識像狂病；無論介紹西洋文學哲學的歷史及理論，或者整理國故，都是新文化，都不遲疑地一口吞下去。他們起

初拚命讀雜誌，後來覺得雜誌太零碎，要求系統的東西；「概論」等等便漸漸地應運而生。楊蔭深先生「編輯中國文學大綱的意義」（見先秦文學大綱）裏說得最明白：

在這樣浩繁的文學書籍之中，試問我們是不是全部去研究牠，如果我們是個歡喜研究中國文學的話。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從時間上，與經濟上，我們都不可能的。然而在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總究非把牠全部研究一下不可，因為非如此，不足以滿我們的欲望。於是其中便有聰明人出來了，他們用了簡要的方法，把全部的中國文學做了一個簡要的敘述，這通常便是所謂「文學史」。（楊先生說這種文學史往往是「點鬼簿」，他自己的書要「把中國文學稍詳細的敘述，而成有一個系統與一個次序」。）

青年系統的趣味與有限的經濟時間使他們只願意只能夠讀這類「架子書」。說是架子書，因為這種書至多只是搭着的一副空架子，而且十有九是歪曲的架子。青年有了這副架子，除知識慾滿足以外，還可以靠在這架子上作文，演說，教書。這便成了求學謀生的一條捷徑。有人說從前讀書人只知道一本一本念古書，常苦於沒有系統；現在的青年系統却又太多，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系統上，系統以

外便沒有別的。但這些架子是不能支持長久的；沒有東西填進去，晃晃蕩蕩的，總有一天會倒下來。

從前人著述，非常謹慎。有許多大學者終生不敢著書，只寫點札記就算了。印書不易，版權也不能賣錢，自然是一部分的原因；但他們學問的良心關係最大。他們窮年累月孜孜兀兀地幹下去，知道的越多，胆子便越小，決不願拾人牙慧，決不願蹈空立說。他們也許有矯枉過正的地方，但這種認真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現在我們印書方便了，版權也能賣錢了，出書不能像舊時代那樣謹嚴，怕倒是勢所必至；但像近些年來這樣濫，總不是正當的發展。早先坊間也有「大全」「指南」一類書，印行全為賺錢；但通常不將這些書看作正經玩意兒，所以流弊還少。現在的「概論」「大綱」「小史」等等，却被青年當作學問的寶庫，以為有了這些就可以上下古今，毫無窒礙。這個流弊就大了，他們將永不知道學問為何物。曾聽見某先生說，一個學生學了「哲學概論」，一定學不好哲學。他指的還是大學裏一年的課程；至於坊間的薄薄的哲學概論書，自然更不在話下。平心而論，就一般人看，學一個概論的課程，未嘗無益；就是讀一本像樣的概論書，也有些好處。但現在坊間却未必有這種像樣的東西。

說「概論」「大綱」「小史」，取其便於標舉；有些雖用這類名字却不是這類書，也有些確不用這類名字而却是這類書——如某某研究，某某小叢書之類。這種書大概篇幅少，取其價廉，容易看畢；可是系統全，各方面都說到一點兒，看完了彷彿什麼都知道。編這種書只消鈔錄與排比兩種工夫，所以略有文字訓練的人都能動手。鈔錄與排比也有幾等幾樣，這裏所要的是最簡便最快當的辦法。譬如編全唐詩研究罷，不必去看全唐詩，更不必看全唐文，唐代其他著述，以及唐以前的詩，只要找幾本中國文學史，加上幾種有評注的選本，鈔鈔編編，改頭換面，好歹成一個系統（其實只是條理）就行了。若要表現時代精神，還可

蘇俄與美國之對照

William H. Chamberlin 原著 秀慧節譯

(見 Atlantic Monthly, vol. 152 No. 1, July 1933)

(一)

蘇俄與美國之間最有力的對照可以概括於「機械化」一詞中。蘇維埃領袖們曾屢次誇示他們在「五年計劃」之下的奢望與成功，許多外國人或竟因此會想像俄國已成爲機械統治一切的一個國家了。實則蘇維埃在此領域中的進步也只是限於新工廠的建設，很少影響及人民的日常生活。

俄國人沒有地下鐵道連他們到事務所去。他們必須在

以隨便檢幾句流行的評論插進去。這種轉了好幾道手的玩意，好像攪了好幾道水的酒，淡而無味，自不用說；最壞的是讓讀者既得不着實在的東西，又失去了接近原著的機會，還養成求近功抄小路的脾氣。再加上編者照例的匆忙，事實，年代，書名，篇名，句讀，字，免不了這兒顛倒那那兒錯，那是更誤人了。其實「概論」「大綱」「小史」也可以做得好。一是自己有心得，有主張，在大著作之前或之後，寫出來的小書；二是融會貫通，博觀約取的著作；雖無創見，却能要言不繁，節省一般讀者的精力。這兩種可都得讓學有專長的人做去，而且並非倉卒可成。

☆

☆

☆

一個擁擠不堪的電車中掙扎着；又須爬上三四階級梯，因爲昇降機總是有毛病的。在辦公室內處理日常工作時候，絕無送信槽，衛生杯，以及許多美國事務室所有的設備。同樣俄國主婦行使她的職務，全然依照她祖傳的舊法，也絕無電氣冰箱，真空滌污器，電燈麵包器，或其他美國家庭間通常節省勞力的新用具。

兩國的對照，在美國小市鎮中，更予我以堅強底實證

。我已經在蘇維埃聯邦境內遊歷過幾萬哩路我熟悉鄉村裏的荒涼景況。那兒惟一的「心身之所」就是「農民之家」，污穢，擁擠，且與害蟲相混雜。那末在美國中部一個小鎮——勞倫斯(Lawrence)，康撒斯(Kansas)——獲得一個佈置舒齊的旅館，有潔淨適意的臥床和近代的浴室，而且能瞭望到充塞着黑壓壓底汽車的大街上，我使似乎不免有點神奇之感。在同樣大小的一個俄國市鎮裏，你簡直看不到汽車，要有也有限，而且由於用之過久及不善運用以致頹壞，——且所有權不屬個人而屬地方政府機關。至於私有車輛則差不多沒有例外都屬於外籍居民。

(一)

俄美的對照雖說如是嚴明，可是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現象：現在兩國都有很多的市民不能獲得滿意或適當的生活。不過這恐慌的原因及其痛苦，兩國簡直有天壤之別。美國視為窮困生活的情形，在蘇聯就可當做一個滿意的生活標準。美國好些城市如米羅高基(Milwaukee)救濟失業的工作很有組織，失業者所得的食物分配量，大致與俄國許多有工作的工人之普通口糧相等。自然俄國人多自少年來就已習慣於一種非常低下的生活標準，——一件遊人容易常常忘記的事實——而現在的情形又因一種艱辛的普遍意識使

人民不感痛苦。況且青年共產黨為建設祖國的信心熱情所燃燒，且昧於國外的生活情形，所以對於他僅足果腹的一點口糧，比起美國技巧的機匠已從舒適的安全生活裏被擲入一種悲慘而不安定的現實中的要快活多了。

兩國之恐慌的根本原因的不同，說起來滑稽極了。在美國，供給遠過於實在的需要；在俄國，則需要遠過於實際的供給。美國式計劃無節制祇為了私利而成功的工業制度現已建設起宏大的生產機械，卻未曾創立相當消費能力的任何保障。但蘇維埃的統制計劃經濟制度也還未證實其能生產使全國人口有一個滿意的或差強人意的生活標準。

試一觀察鐵路運輸問題。我久居俄國之後，再回美國來旅行，簡直感覺到意外的奢侈。在俄國旅行的日常食糧，只是罐頭食品及麥乳餅，和一些靠不住的食物，因為它們只能在偶然停車時用很貴的紙盧布價格向農夫們買着；這兒呢，只要我走進飯中去，就可以隨意叫想要吃的東西。在蘇俄，我常須與當局及鐵路機關辦交涉，請求他們特許我乘已經十分擁擠的車。這種請求的交涉我是辦慣了。但我在美國任何地方的任何車上都容易得着下舖，覺得非常驚異。當我旅行美國西南去時，我是臥車上唯一的乘客對於我自然是很舒服了，但對於鐵路則顯然不利。

於是我想起一個美國鐵道經理嘆息他旅行俄國時，以一種職業的羨妬之意估量着每個車站上擁擠的群眾，「啊，」他慨嘆着說，「假如我們鐵路上能有這麼多旅客，我的財政難關該早度過了！」

再一觀察農業問題。這是兩國政府很迫切一個問題。我們曉得美國是極力勸導農夫減少食物的產量；而俄國則以種種的力量敦促農人們增加生產。蘇維埃報紙費盡苦心曉諭俄國農人說他的領域是如何地幸福，在他田裏，并這像美國農夫一樣，他決不會受沒收抵押品的威嚇與恐怖。這很明瞭，俄國根本無所謂抵押問題，唯一的原因就是無私有財產。可是農人已被逐出他們的住所，和許多在武裝監視之下被充發到邊疆去，作苦工的人數是遠過於美國農夫之被沒收抵押品的。昔日小康的農人所謂「居拉克」(Kulaks)者，差不多有百萬戶之多，現在大都已被「清算」掉了。這是共產黨的一句頂俏皮的官話。而且，如有人不能納足糧額或被證實存怠工，那就是違犯了政府的農業規則，此時便須受放逐應拘捕的普通懲罰。去年冬天，北高加索許多村子的居民使都是因此被強制驅逐出境。

(二)

對於經濟的態度及所採以應時的方法，俄國和美國恰

立於此相反對的兩極端。我想起我正二月間所看見的美國，就像陷在一無可挽救的境界中一般。關於這不景氣的原因有許多極紛歧的意見，而已提出來的救濟方略也都是互相矛盾，且更使思想混亂。街頭行人似乎把這種國民的厄運簡直當作一種流行性感冒，希望它總有一天會自然而然地終結。

反之在俄國所表現出來的思想，都是畫一於統制之下。別的地方，絕沒有這樣的思想統制，只有意大利，和最近的德國或者有此可能。無論何時，我見一個旅行團在蘇維埃公務所，工廠，和集聯農場繞過一遭後，我就確知他們將得着某種回答。負責的共產黨員每逢和外國人接談的時候，總是牢牢記着黨的立場。那就是說，他們解釋共產主義政策和說明。此政策的困難總和他的黨綱及黨報一個鼻孔出氣。誠然，俄國也正如別的國家，有許多個人正在那裏思想，不過自由公開的討論是絕對不能存在的了。

今日之俄國與美國，都有很多可憂慮的事情，可是他那所憂慮的對像卻不相同。我從美國熟人方面探悉他們所憂慮的是目下，或迫近的失業，已經失敗的投資，和現已倒閉的，就要倒閉的銀行等恐慌。這一切，在俄國人看來都是沒有表意的。俄國的職業問題全是由缺乏人工所造成

。投資企業在一個財產公有的國度裏根本不會存在。銀行也不會倒閉，因為它們全屬國有。至於俄國的金錢，也不像在其他國家裏有義意，只有外國錢幣有一定的價值。原因在購買力的不固定。因為擁有過多的紙幣和過少的食物及製造品，俄國人便成一種狠狠的情勢，正如一句流行唯的趣語：「誰是世界最富民族呢？俄國人；因為他們簡直無法使用他們的金錢。」

他們的經濟制度雖說自然而然地使他們逍遙於美國人寢不安席的許多憂患之外，可是他們也有其特殊痛苦呢。莫斯科藝術劇院中所演最早著名的新劇是亞費諾格諾夫（Afnogov）的「恐怖」（Fear），劇中一個老教授宣布他的觀察說，「恐怖」是蘇維埃聯邦中生命的一個助力。賣牛奶的農婦，怕她可以被稱為「居拉克」。工程師怕他會被疑為怠工。共產黨員怕被疑為叛黨。無黨籍的工人則恐懼着「赤司特加」（Chickka）——（蘇維埃公共機關定期實行淘汰不合宜的工人）。

蘇維埃公民也憂患如何得食物，鞋子，及燃料，織物，和擁擠混雜的生活設備迫着大家共用一公共廚房。我們可以用下面的話來說明兩個文化的差異：假如美國人的切身問題只是金錢收入，則俄國人的主要憂慮是用他們所

得的金錢尋求必須購買的東西。

我感覺得：在俄國，現實情形下犧牲最大的是老年人；在美國，受苦的是青年男女。俄國中年以上的人，尖銳地到受着與五年計劃同時產生的物質犧牲之痛苦。他們得不到應用的奶油，砂糖，咖啡，和白麵包。他們對於建設一個如特洛斯基所描寫過的共產主義「現世的樂園」之可能，也不及他們的子孫有希望。在美國，情形就不同了。不景氣的主要犧牲品正是青年男女，因為他們剛開始生活的奮鬥，就遭遇失業。

大戰後的俄國青年，其熱情已被共產宣傳燃燒到差不多近乎一種宗教的程度。他們沒有失業的恐怖，因為現有很多的工作，而且年輕人都佔據着蘇維埃工廠和公共機關中最負責的位置。自然他們也不是絕不感覺物質享受的缺乏，是對於犧牲的感覺少遜於前輩罷了。其故半由於他們富有更大的生命力和忍耐力，半由於他們希望生存長久，從現在努力中滋生出來的報酬，可以由他們開始收穫。此外味於國外的情形也足以助他們保其快樂。他們所知道的僅限於從蘇維埃報紙上所讀到的，而報紙所告訴他們的又幾乎全是資本主義國家中繼續者的罷工，失業，以及壓迫共產黨人的等等新聞。

(四)

報紙實在就是二國間生活與興趣的最大歧異，以及二國的普通意見的隔離之象徵。蘇維埃報紙無論在登載或省略的那一方面，都表現着與美國報紙底對照。我們要想在俄國報紙上看點犯罪的故事可謂白費心機，除了政治案件可證明共產主義者之外。俄國報紙沒有私人戀愛故事，沒有遊戲副刊，沒有服裝時式畫報，沒有社會欄，——沒有一樣像一個美國編輯特標爲「消遣品」的。

莫斯科也常流佈着某要人軼事的流言，說他已經伏屈於人類的弱點，而爲了一個妖嬈舞女竟在革命之前數日遺棄了他的髮妻，可是報紙上連一點暗示也沒有披露過。作丈夫者之不忠實的行爲，在許多美國報紙上是絕對公開的，而俄國則僅以私事目之，這是蘇維埃新聞事業的一個原則。反之，在美國報紙上祇可以偶然於特殊的商業欄裏看到的消息——如鋼，鐵，煤生產的數字——俄國報紙常是接連不斷地登在前面第一頁。蘇維埃編輯連篇累牘地登載現行的經濟計劃的詳情及由此所完成的工作詳情，此外便是黨部會議，公衆言論，國家審判，和公共法令議決案等等項目。滿幅記載的常是實業界勇敢的先鋒伊凡諾夫之勳功偉績，說他如何在一個新工廠裏舖了超量的水門汀；或是粗

笨的工頭彼得洛夫的成功。說他如何抗擊過「居拉克」惡意的怠工的蠢動，並且說他在大雨之前居然能理好他集合農場上的乾草堆。

甚至於最重要的紙報，如政府機關報 *Pravda* 和黨報 *Pravda*，因爲紙張的缺乏而嚴格地限制其篇幅，所以很少超過四頁。出版物受着極嚴厲的約束，在專制之下自是意料中事。假若某報登載着反對任何列強的誹議，那就是政府政策的反映，而非編輯的偶然意見。對外政策從來不會輕於宣布，當局也絕不受批評。凡是發表出來的，都是政府授意的或承認的。

蘇維埃新聞事業中最顯著的一個特性，像平常蘇維埃生活一般，是幾乎全沒有廣告。我們從俄國火車窗內瞭望，絕不見有廣告牌子。莫斯科報紙上的廣告也只是劇院及娛樂的佈告，和關於招攬勞工的佈告。最寫意的是房屋只有一所而要租的竟有五十人；「需要人工」的標題要比「需要工作」的多過幾倍。美國式的廣告在俄國看來，自然是浪費無用，因爲俄國製造品的缺乏已達最堅銳的程度，僅僅有一種謠言，說有一般新到的奶餅和毛織品，便足以引動人民的注意。

另一個足以加重俄美間對照的媒介是電影。荷來塢的

旨趣，浪漫的戀愛和私人的成就，是蘇維埃檢查員所不許的，所許片子很多是表演俄國經濟計劃的進行。

去年我在莫斯科看過一個典型的片子，其中主角是一個青年共產黨和一個與他發生戀愛的女工。結果他誘那女子離開工廠和他同居了的這件事，就如標題所指，簡直是奇恥大辱，不是因為他們的關係是曖昧的，他們早已到過婚姻註冊部登記過了，乃是因為她僅僅為了一種卑賤的家庭安閒之故而離棄了她普羅利塔里亞的崗位。漸漸她的良心——這個字當然有碍共產黨的語法，不過隨牠去吧——開始責備她了。當她想到無人照管的機器時，她終捨棄那個平庸的共產黨員重新回到她的工作凳上去了。自此以後，工廠裏的生產率格外增高，浪費與破壞的百分比則一律顯著地降低。

(五)

常有人說蘇俄對於美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不但顯着挑戰的態度，而且是一種威嚇。這種理論我很懷疑。在生活與思想的各方面，兩國都像在兩個不同的地球之上一樣，遼遠而且隔絕，比較都無從比較，所謂挑戰，更談不到了。

俄國的經濟發展，比美國要落後五十年。她必須先有大規模的道路修築，房屋建造，礦業工業，運輸及交通等

堅的工程，然後再談比較，才不致有滑稽之譏。蘇維埃領袖們，固已一再宣言，說在不久的將來，不但要追上美國，而且要超越美國。可是這目的恐怕於他們是害多而益少的。因為他們的趨勢過於膨脹的工業發展計劃，成績既不好，並且很明顯地加上於機械及人工種種實力之上過重的負擔。

兩國間社會的差別還要比較大一點。美國之開拓和立國都是根據人人自己管自己的原則，落後的人活該吃虧。俄國的基本原則則是萬能的國家要設計并管理國家的生長，不但規定人民的工作習慣，而且及於思想。方法是由一個慘忍而有實力的偵探組織(The G. P. U.)去撲滅那些不適合於統制計劃的特殊個人。問題就在這裏了：究竟那一種制度隱藏着較多的人類苦難呢？可是牠們確實培養着兩種根本不相連繫的心理，所以我們很難意識到二者之間會有挑戰的可能。

北美合衆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聯邦國因此只能作一種對照的研究。純資本主義與純社會主義間之最嚴明的分歧，隨着時間的飛逝，或者會歸於消滅。社會演化的邁進，也許可使她們嚴明的界限漸漸歸於泯滅。到現在恐慌之殘餘最後肅清之時，美國或者會放棄她極端的個人主義

之一部分。同理，俄國或許更要一直沿着史塔林已經指明的路線更進一步，爲了提高技術的水平線，願意給予國家企業領袖們以較高的物質報酬和較大的個人權威。雖說有這樣的變化，可是就再過十年或二十年，美國人參觀俄國

或俄國人參觀美國返回故國之後，當敘述所看見的奇異風俗習慣與思想的時候，還仍然能傳達於其國人以一種自覺自信的快感。

× × × × × × × × × ×

●注意 本刊特定優待法辦

本刊前所特定之優待本年新入校諸君，凡直接訂閱本刊四十期只收刊費一元的辦法。限於本年十一月十日截止，(外地以郵費爲憑)愛讀本刊諸君，幸勿失此良機！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關「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 報 價 目

本市 每月一元
 朝解台 每月一元
 其租地 每月一元
 一三元 每月一元
 港九角 每月一元
 元九角 每月一元
 蒙古庫倫 每月一元
 南洋歐美 每月一元
 四元一角

圖書館界的新轉變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七)..... 吳景賢
 文字學上中國古代社會勾沉(下)..... 丁興廣
 李義山評傳(上)..... 張振珮
 庚子以前之中國新教育..... 陳東原
 安徽叢書第二期全書提要..... 胡樸安

編印及發行：安慶安徽
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期零售一角全
年十期一元

學風月刊

第三卷
第七期
目要

最近中日問題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英文本]

硬布面精裝一冊二元四角

桂中樞著

從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桂君在上海大美晚報特闢“*As a Chinese Sees It*”一欄，著論揭發日人侵華野心及其破壞公理的事實，而於外人相日言，亦多所糾正，議論極合邏輯，而又富於幽默，早已傾動一時。茲特彙印一冊，凡六十餘篇，其中文字實為人類正義所寄託，絕不存有民族褊狹之見。

Memoranda

Submitted by The Chinese Assessor to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參與國際聯合會調查委員會

中國代表處說帖

中英文對照本 一冊二元五角 英文本 三元五角
本編為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附件之一，包含我國代表處說帖二十九種。首為關於中日糾紛問題之總說帖，共分四章：(1)歷史概略，(2)中日條約關係之基礎，(3)日本對華政策，(4)日本之行爲，國際法與條約。餘爲關於平津線問題、日本佔領東三省之事實、二十一條條件、萬寶山事件、日本所謂五十三懸案之事實、日本破壞中國統一之事實、抵貨問題、日本違約侵權之二十七類案件、滬案問題、東三省尚國鹽稅郵政被切之經過、所謂東三省獨立運動……等各項之特別說帖。

- 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 陸奧宗光著 一冊二元二角
- 日本侵略滿蒙之研究 龔德柏著 一冊一元二角
- 中日外交史(新時代) 陳博文撰述 一冊一元二角
- 國聯盟約九國條約非戰公約合訂本 木宮泰彥著 一冊一元二角
- 中日交通史 陳鏗撰述 一冊一元二角
- 日本現代史(新時代) 小泉八雲著 一冊一元八角
- 日本與日本人 胡山源譯 一冊一元六角

- 東省刊目論 藤岡啟著 一冊二元
- 黑龍江 湯爾和譯 一冊一元五角
- 到田問去 湯爾和譯 一冊一元
- 滿鐵外交論 湯爾和譯 一冊一元八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四川軍閥的末路

叔永

世界上的四種國家

吳景超

太原見聞記(二)

陶希聖

我也來談談「心理」與「科學」

趙究靈

鄭鶴聲先生「對於影印四庫全書

輿論之評議」的讀後感

君羽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 (代定)	王府井 侯記書社	景文社 民智書局	公府街 米市	街中 志遠書社	平和平 嘉德書社	中書社 青島書社	社書時 鴻記書社	增內 神州書局	宣內 神州書局	廠甸 神州書局	德信 神州書局	清華 神州書局	成府 神州書局	天津 神州書局	大學 神州書局	書報 神州書局	現處 神州書局	定處 神州書局	上海	新中華書局	上海 神州書局	南京 神州書局	鎮江 神州書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口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局	武昌	現代書局	廣州	真美善書局	汕頭	金城	油頭	神州書局	廣州	神州書局	汕頭	神州書局	廣州	神州書局	汕頭	神州書局	廣州	神州書局	汕頭	神州書局	廣州	神州書局	汕頭	神州書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七十五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五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為限）代洋九五折。

◎本社啓事

本評論自第七十六期起復由胡適之先生擔任編輯。他的通信住址是：北平米糧庫四號。

四川軍閥的末路

叔永

四川軍人，是以勇於內戰著名的。我們只要看民國成

立以來二十二年之間，四川省內的戰爭，據說有大小四百

餘次之多，便可知四川的軍人是如何勇於私鬥，而可以打

破內戰的紀錄了。可是就最近期間川中赤匪的活動看來，

似乎四川的軍人又將以不戰打破剿匪軍事的新紀錄。據十

月八日報載，兩星期前赤匪進犯犍山，渠縣的時候，駐廣

安的楊森部隊，便急急忙忙把家小送到重慶，豫備逃難。

駐犍山的部隊，更是料不到赤匪來的那樣快，所以亦匪到

時他們還在狎妓飲酒，以至於措手不及，只得棄城而去。

無論如何，楊森軍隊對於赤匪是沒有多大抵抗的。最近赤

匪竄擾宜漢，綏定，據報載綏定的失守，尤爲奇特。赤匪

僅僅用了六十人之力，便把綏定取了。綏定是劉存厚的老

巢，他在那裏駐紮了十幾年，這樣的容易放棄，更出人意

想之外。這不消說，又是劉存厚的軍隊，見匪即逃，實行

了『不抵抗主義』的原故。這個情形，看似一隅的得失，

實際非常嚴重；因爲這可以表示赤匪在川發展的可能性和川中軍閥最後的運命。

據四川的通信，去年年底徐向前鄧錚勳兩人入川的時候，所挾的赤匪不過三千人。半月之內，擊破田頌堯的羅酒瓊，李焯如，何瞻如諸部，一鼓而下通江，南江，巴中諸縣，收編擊潰的軍隊，亦衆遂增至萬餘。其後田軍雖然反攻，略有勝利，但至第二次川戰爆發，田軍抽調一部份去防制劉文輝，赤匪遂得乘虛再起，巴南同日再陷。田軍一經受挫，即聞風遠遁，以至赤軍未到之蒼溪，廣元，昭化，閬中，亦先行放棄。由是赤匪占據六縣，騷擾區域在十縣以上，擁衆至十萬有餘，這是川中軍閥防剿不力，以致赤匪坐大的實在情形。目下赤匪似乎擬乘剿赤軍隊尚未布置妥當之際，極力圖竄大江北岸，將下川東一帶佔領，一可以憑江抗戰，二可以威脅揚子江上流的交通。此勢若成，不但匪勢愈張，將來肅清愈難，即現在動員的剿赤各

軍，亦不免處處受着牽制。在這個緊要的當兒，我們對於川中這些軍閥，平時則作威作福，對於人民的敲榨壓迫，無所不用其極，一旦有一點小小的匪禍，就抱頭鼠竄，全不能盡他們保衛人民的責任，除了希望我們的政府（如其我們還算有一個政府的話）用軍法國法，嚴格以繩之外，還有甚麼話說！

可是四川的軍閥也自有他們的立場。他們的軍隊，本來不是拿來清除匪患——更說不上捍禦外侮——而是拿來爲他們做敲榨的工具和買賣的資本的。甚麼叫敲榨的工具？那就是說，在他們防區之內，若是人民不按照他們的意思交納所有的苛捐雜稅，他們可以用軍隊去壓迫。甚麼叫買賣的資本？那就是說，倘若川內的軍閥領地有誰要發生火逆的時候，他們可以依誰家出價的多寡，來定軍隊行動的方嚮。所以在四川的軍閥，無有一個不歡迎內戰的，尤其是所謂二層將領們。因爲一經戰事，他們便可以身價十倍，待價而沽。無論誰勝誰敗，陞官發財的機會總是他們的。這可以說明爲甚麼四川的內戰比任何地方來得特別的多，又可以說明爲甚麼每經一次內戰之後，四川的軍隊便有相當的增加。因爲內戰既不是真的戰爭，那末，軍隊的死亡損傷自然不及其擴充增補的大了。循着這樣的原則，在四

川的軍人們都可以由旅而師，由師而軍，漸漸的繼長增高，又可以顛撲不倒的長久存在。只是他們製造的結果，便是農村破產，便是民不聊生，便是共產黨一入四川，就得到一個求生不得，求死無門的慘苦社會來做他們散播種子的沃土。由此可見赤匪在四川的發展，正是四川軍閥直接間接養成的結果。這些軍閥若要立功自贖，唯有盡力的去防禦剿辦，使赤匪不至於蔓延各處，以害百姓，害國家，爲東西兩方眈眈虎視的強隣，做先驅掃除的工作。

但是川中軍閥自來是以不戰爲自存秘訣的。此次要希望他們出來拚命，恐怕有些困難。我們主張，在這個時候，川中的軍閥也應有一個相當的處置。那便是說，川中軍閥對於討赤的軍事如能切實盡力的，政府不妨寬其既往，許其戴罪立功。其有庸懦無能，見匪即逃，如劉存厚之類，政府則當兩罪并發，於劉存厚本身則科以失地之罪，於他的軍隊，則應根本解決，不令牠依然存在，擾民則有餘，禦匪則不足。這樣，不但可以振起軍隊的精神，於討赤工作自然大有好處，便是四川的軍閥也得了一個天然的淘汰，不至於永久做不倒翁。豈不是一舉而兩善備嗎？

或者有人要說，目下中央政府的力量，既然達不到四川，那末，所謂賞功罰罪的話也不過是一紙空文，究竟有

甚麼用處？我以為不然。賞罰是國家的大權，也是人心公共的是非。能實行固然很好，不能實行而託諸空言，也未嘗沒有牠的用處。我們不必高講理論，不必舉其太遠，就拿最近的事來說。我們會見過歷史上有擁兵數十萬，敵至不戰，因之喪失數千里的國土，而其主將乃不受一紙的譴責麼？我們會見過這樣的事迹以後，這個國家還能希望她的守上將士效死疆場麼？以彼例此，我們可以說四川軍

世界上的四種國家

國家分類的方法很多，我們可以從政治的觀點去分類，也可以從經濟組織的觀點去分類，從宗教的觀點去分類，也可從教育的觀點去分類。但這些分類，都不是我這篇文章中所要討論的。我這兒所說的世界上的四種國家，乃是根據人口密度及職業分派兩點所分析的結果。

先概括的說一下這四種國家的特點。

第一種國家，人口密度頗高，但在農業中謀生的人，其百分數比較的低。

第二種國家，人口密度頗低，但在農業中謀生的人，其百分數也比較的low。

第三種國家，人口密度頗低，但在農業中謀生的人，其百分數比較的高。

關的『不抵抗主義』與兩年前東北方面的『不抵抗主義』並沒有甚麼兩樣，維然一個所對的是外患，一個所對的是匪亂。捍禦外侮和保衛人民，不都是軍人的天職嗎？我們既以數千里土地，幾千萬人民的代價，獎勵了守土將士的不抵抗，希望不要再以四川全省的淪陷，來做幾個軍閥陣脫逃的代價才好！

二十二，十，二十七。

吳景超

第四種國家，人口密度頗高，但在農業中謀生的人，其百分數也比較的高。

這四種國家的生活程度，以及他們在生活中所遇到的問題，都不相同的。我們願意把每種國家舉一兩個例來討論一下，同時也要看看中國在這四種國家中，是屬於那一類。

第一類的國家，可以拿英德兩國來做代表。英國的人口密度，每一方公里是一八一·二，世界各國，除却比利時荷蘭兩國外，就要算英國的人口密度最高了。德國的人口密度，每一方公里是一三三·一。我們如知道世界各國的人口密度，每一方公里在一百以上的，只有七個國家（

除却上面提到的四個國家以外，還有日本，意大利，捷克（斯拉夫），就可知道英德兩國的人口密度，是比較頗高的了。英國人在農業中謀生的，比較最低，只佔有職業的人百分之六、八。德國人在農業中謀生的，也不到有職業的人三分之一，只佔百分之三〇·五。概括的說，這一類的國家，本國的農產物，大都不能維持本國人的生活，所以不得不于農業之外，發展別的實業，特別是工業。他們便以工業的製造品，賣給別國，以賺來的錢，再從他國買進糧食，來維持本國過剩人口的生活。據哈佛大學易司特教授的估計，英國的農產，只能維持本國人口百分之四十一的生活。其他各國的農產物，如俄國，只能維持本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二，意大利只能維持本國人口百分之六十四，比利時只能維持本國人口百分之三十七。又如日本，人口總計有六千餘萬人，但本國的糧食，只能養活四千餘萬人。所以這些人口密度過高的國家，許多都靠別國土地的生產，來維持其生活。這些農業不能自給的國家，既然要靠自己的工業品，去換別人的農業品，所以他們在國際貿易上的商場，如給別人佔去了，本國人的生活，便要起很大的恐慌。我們可以拿英國近年來的情形，做一個例子。英國的紡績工業，在各種工業中最發達的。他們紡績出來的貨物，有五分之四要運到外國去，本國的市場，只能銷去五分之一。這些運往外國的紡績品，在英國的出口貨上，

佔一個極重要的位置，他的價值，要佔出口貨全體價值百分之二十，有時或達百分之三十。這些紡績品，假如在國外的市場上，銷得出去，以所賺來的錢，換得糧食歸來，那自然是很好的。不過英國的海外市場，并不是顛撲不破的。在一八九〇年，英國的紡績品，有百分之四十，銷在印度，近來只能銷百分之三十了。以前有百分之十一，銷在中國，近來只能銷百分之八了。東方的市場，在一九一〇年，要銷英國出口的紡績品百分之五六·四，一九二〇年，便降低至百分之四三·六。在一九一三年，英國出口的布疋，長達七十萬萬碼，近來只有四十五萬萬碼。英國在東方的紡績品市場，所以衰落的重要原因，一因印度與中國的紡績業，日有進步，二因有日本與之競爭。這兩種勢力，不是英國工業的能力所能打破的。所以英國紡績品商場在東方的喪失，不是暫時的現象，而帶有永久的性質。英國的失業問題，有一部份未始不是由于這個重要的原因造成，所以專靠國外的商場，來維持國內的工業，乃是很危險的。

不過這些農業不能自給的國家，其危險還不只此。我們還是以英國來做例子。英國現在糧食不能自給，所以要向外國買進糧食。現在供給英國糧食的主要國家，有澳大利亞，有加拿大，有印度，有阿根廷。印度的人口密度，

比較是高的，所生產的糧食，大部份自己銷耗，只有一小部份運出。這一小部份能夠運出，乃是因為印度人的生活程度太低，正如中國近年有雞蛋輸出，并非因為中國人自己吃了還有得多。乃是因為中國大多數的人民，還沒有達到吃雞蛋的生活程度所致。假如印度的生活程度，略為提高一點，便沒有餘多的糧食運出的。其餘的國家，所以有食物運出，乃是因為本國的人口稀少，農產品用之有餘所致。但是這些國家的人口，還在那兒膨漲的。有一個學者估計，以為加拿大與澳大利亞，在三十年之後，便不能有食物輸出，因為在這三十年內加增的人口，要把餘下來的食品都消耗了。這個估計，也許是不對的，不過這些國家，將來或無食品輸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只看美國在十九世紀，輸出的食品，數量甚鉅，近來因為本國的人口加增，輸出的數量，便減少了。假如現在有食物輸出的國家，將來停止或減少食物的輸出，那麼這些農業不能自給的國家，又要遇到一個嚴重的問題。由此看來，本國的農業，不能自給，想靠別種實業，來維持過剩的人口，雖然時一個普通的辦法，雖然是一個為許多強國所採用的方法，却也是一個帶有危險性的方法。

第二類的國家，可以北美的加拿大，美國，南美的阿根廷，海洋洲的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例。這一些國家，除去美國之外，其餘四國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都不到

五人。美國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也只要一五、六人。除開加拿大不算，其餘的國家，從事農業的人口，都不到百分之三十；從事工業的人，都比從事農業的人還多。加拿大國中從事農業的人，也不過百分之三五。他們從事于農業的人甚少，乃是與第一類的國家如英德等相彷彿的。但有一點與他們却大不相同，便是這些人口密度較低的國家，從事于農業的人雖少，但農產品却可自給。不但是可以自給，還有餘多，可以出售。這些國家的生活方法，是最可羨慕的。他們國中從事農業的人，大都用機器生產，所以每家的農場很大，每人的效率極高。美國從事于農業的人，不過一千萬左右，但美國在一九二六年所產的小麥，要佔全世界所產的百分之二二、八；所產的玉米，要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六〇、九；所產的棉花，要佔全世界的百分之六二、二。他們以少數的人，在農場上工作，便可供給全國人民的衣食而有餘。其餘人口的時間與精力，便可用在別的上頭，來加增國內人口的福利。那些在工業中謀生的，也是用機器來製造物品，所以他們的效率，也較別國的工人為高。一九二七年，李德教授曾在大西洋月刊中發表了一篇文章，比較各國的工人效率，以中國為最低，美國為最高，如下表：

國名	工作效率	國名	工作效率
中國	一	印度	一、二五
俄羅斯	二、五	意大利	二、七五
日本	三、五	波蘭	六
荷蘭	七	法國	八、二五
澳大利亞	八、五	捷克斯拉夫	九、五
德國	十二	比利時	十六
英國	十八	加拿大	二十
美國	三十		

換句話說，美國一個工人的生產力，能抵得過三十個中國工人，這并不是因為美國的工人，有天生的神力，為中國人所不及，乃是因為他們有機需幫助的緣故。他們工作的效率既高，所以工資也高。工資既高，購買力便大。

購買力大，生活程度自然使提高了。現在世界上的國家，沒有一國人民的生活程度，可與美國相頡頏的。美國所以能做到這一步，從我們的觀點看來，一因人口與土地的比例，保持得很適當，既不過多，也不太少。二因他們在各職業中的分派，甚為得法，所以能够做到農業既足自給，工業也很發達。各業中的人民，彼此交易貨品及服務，因

而可使全國人的生活程度，得到平均的提高。我們于此又須注意的一點，便是美國工業品的出路，與英國不同。英國的海外貿易，極其重要。美國本國有一萬萬以上的人口，所以國內商場，較之海外市場，尤為重要。這種建築在國內商場上的工業，其基礎自較穩固，其危險自然較低。加拿大與阿根廷等國，現在是向美國那條路上走，將來人口加增一些，能夠充分的利用本國的富源時，也許可以步美國の後塵，與美國人享受類似的生活程度。不過我們雖然贊美這些國家的人口密度及職業分派，并不就說這些國家中的人民，生活已無問題。近年美國各業的衰落，以及失業人數的衆多，表示他們的生活畏，還有很嚴重而急待解決的問題。但是解決他們的問題，須從經濟制度上着手，不是改良人口密度及職業分派所能救濟的，所以不在本題討論之內。

第三種的國家，可以俄國為代表。俄國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不過六、九，與第二類的國家相彷彿。但俄國的職業分派，根據一九二六年的統計，却與第二類的國家大異。他們在農業中謀生的，佔有職業的人百分之八六·七，在工業中謀生的，只佔百分之七·七。由此可見俄國在實行五年計劃以前，還是一個農業的國家，一個人口密度

很低的農業國家。與俄國的情形相彷彿的，世界上大約還有，不過這一類的國家，文化比較落後，統計每不完全，我們很難引證來作參攷就是了。俄國的問題，不在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而在職業上的分派。他們從事于農業的很多，但他的農業，在五年計劃以前，與美國有一點是大不同的，便是用機械的地方很少。現在他們的計劃，一方面想法使農業機械化，一方面設法發展農業以外的實業，如工業交通業之類。假如有一天，俄國能使在農業中的人民，降低到百分之三十以下，同時在農業以外謀生的人，也能加增到相當的程度，那麼俄國人的生活程度，一定比現在要提高許多，遠非歐亞諸國所可及了。不過那一天如果來到，俄國便不是我這兒所說的第三種國家，而成爲第二種國家了。他在人口密度上，將與美國相仿，在職業分派上，也將與美國相仿。這兩個國家，都有一萬萬以上的人口，都有偉大的富源，所不同的只在經濟制度一點。那時我們比較兩國的生活程度，便可發現到底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人民的享受，是否比得上社會主義的國家。

除却上面所說的三種國家之外，還有第四類的國家，其特點有二。第一，他們的人口密度，比較的高，每一方公里，人口在五十以上。第二，他們的謀生方法，以農

業爲主體。在農業中的人口，要佔百分之七十以上。換句話說，他們的人口密度，有點像第一類的國家，但職業分派，却像第三類的國家。他們與第二類的國家，剛處相反的地位，毫無相同之點。這一類的國家，可以亞洲的印度，歐洲的布加利亞，羅馬利亞爲例。我們中國，也屬於這個團體。這些國家的人口，有一共同之點，便是貧窮。國們主要的謀生方法，既然是農業，但以國內人口繁密的緣故，所以每家分得的農場，平均使不很大。他們辛辛苦苦，靠自己的勢力，在農場上做工，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做到溫飽兩字。一遇凶年及災亂，便有凍餒之憂。他們的收入既然不多，所以除却衣食住的消費之外，便沒有別種享用可言。他們終年碌碌，所爲何來，無非爲自己要吃飯，一家人要吃飯而已。吃飯這一件事，在生活程度高的國家，雖然也佔一個重要的位置，但他們除去吃飯之外，還有別種享樂。據一九一三年的調查，澳大利亞工人的費用，平均花在食物上面的，只佔百分之三四、八。又據一九一八年的調查，美國一萬二千〇九十六個勞工家庭，平均用在食物上的款項，佔全體用款百分之三八、二。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之間，美國勞工局調查了二千八百八十六個農民家庭，發現他們用在食物上的款項，佔全體用款自

分之四一。二。他們餘多的金錢，便用在別的上頭，以滿足他們生活上的慾望。但是像印度中國這些國家，情形便大不同。根據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的調查，印度孟買

工人，全年的消費，用在食物上的，要佔百分之八一。七

。中國各地人民的生活程度不一，但大多數的農工階級，全年金錢銷耗在食品上面的，要在百分之六十以上，高的要達百分之八十以上。他們在食物上面，所花的錢，其百分數雖如此之高，但從營養方面看去，還遠不如歐美的人。別的享受，更不能比較了。這種悲慘的現象，一方面表示這些國家裏人口過多的壓迫，一方面也表示人力的未

盡，不知在農業以外，去開生財之源。為提高這些國家中的人民生活程度起見，人口密度與職業分派兩點都需要改良的。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說，從我們的觀點看去，第一類的國家，人口密度需要改良。第二類的國家，人口密度與職業分派皆頗合式，可為模範。第三類的國家，職業分派，需要改良。第四類的國家，人口密度與職業分派，都有改良的餘地。中國既然屬於第四類的國家，所以中國人的問題最為艱難，而中國人對於改良的工作，也應當特別努力。

太原見聞記 (二)

陶希聖

四 當前的嚴重問題

六七月間，曾下兩次雹子。第一次雹子下後，太原縣來的朋友對我說：這次雹子把沒有成熟的麥子給打倒下來了。麥下的棉種高粱種要悶死。農家沒錢雇短工穫麥，秋收要受損失。這回事情使農家感覺到最後的農本不能希望收回。他們到村長那兒去找他召集地主，要退租約。地主也沒農本借給農家了。六分息也借不到錢。農村生產停頓了。

山西農村的貧困，去年已經有嚴重的表現。今年是一個豐年。雖然有些地方有雹災，有些地方有水災，但多數地方都是豐收。收穫物沒有人買。於是農家最後的資本難於收回的了。一担西瓜到城裏來，八分一斤沒有人要，農夫只得把瓜拋在田裏，空扣子回村去了。水菓這東西，往年貴些有人要，今年便宜沒人要。農家傷心了。

爲了過日子，農家把田出賣。竟有的地方每畝二元，還沒人要。農夫只得遠遠跑到財東家裏去叩頭求買。

太原城裏頗有些人知道這種情形。然而他們却沒有具體的辦法去救濟。長期低利放款的農民銀行，終竟着不見設立。農民銀行雖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但是六分息叩頭借錢的事或許可以減少。

因為錢不流通，鎮市裏的小商家也關門了。農夫先窮，地主後窮，商人也窮下來了。錢只是在大城市裏流通。

五 紙幣與現洋

大城市裏的錢也並不流通得很暢。紙幣尤其是難用。太原的土貨與洋貨交換場所是天津。所以太原使用的是天津中交兩行票。此外便是山西省銀行票。山西省銀行票不離國到省外。離兌銀行只是中國銀行。

商人每有紙幣，每夜必須推出去。手裏不敢多留紙幣過宿的。山西省銀行有準備現金五百萬元，只發得一百萬元紙票，却仍得不到商人的信用。大家知道山西商人是算盤打過十四橋，決不信任別人的，山西鈔破產一箇以後，他們再也不好信任省當局了。中交行票，當榆關事變發生後，商人也不大信任。

蔣委員長到石家莊時，太原的紙幣也起了一回恐慌。雖然蔣先生這回對閻先生是很親善的。

山西商人不信任別人，頗有半原始社會對待陌生人的

氣概。陌生人都是騙子，都是強盜，不然也是魔鬼師。我的房子的租約是房東（商家）起草的，上面寫的「責任」誤為「債任」。我們騰清時騰為「責任」。那商人無論如何不能同意。我說：「你草稿錯了」。他說：「不會！我不會錯的。」結果「責」旁加上「人」字了事。

紙幣對於這種商人真是沒辦法。這種商人是扣着賺錢才賣貨的。虧本傾銷，他們不肯。一有虧本的危險，他們便關門。他們如有現錢，他們或解天津，或入地窖。金融的停滯，這是一個原因。工業家虧本出賣，還可在勞動者身上去找回頭。純粹商人如虧本出賣，他找誰來賠補損失？這是無可怪的。

六 富者的娛樂及其他娛樂

還有一些小事情。做官的人家每家都有一架機器戲。有一晚，小孩要我領他到街上去走走。我們走到新民街。一片的好院落裏，每個都在唱留聲機。

家外戶沒有娛樂。有錢的人在家內戶內娛樂起來。留聲機之外，還有姨太太。每月收入百元以上官吏便可討一房姨太太。我有位同鄉處長，有錢卻沒討姨太太，在太原算是奇人奇事。像這樣的人，和同僚在一起時，

一悲苦於沒有談資的。

第三樣娛樂品是麻將牌。我在南京教書的半年，頗吃這件事的苦。每到星期六或星期日，無論到那朋友家裏去，總是被強迫在桌子旁邊獨坐。如同看電影者不得不看電影廣告一樣。我每回只得看一兩牌，取下帽子而去。太原的牌一樣盛行。但我却沒有朋友家去過，沒吃苦。

家外的娛樂也是女人。

太原的青年人——連老一點的人在內——有一種特點，山西人自己一定不覺得的。——也有人覺得，並且說得出來，但多數人一定不覺得的。如果一個女人穿得稍爲入時一點，她在街上走處。千目迴視，不稍瞬，也不稍含蓄。太原市人對女人太注意了。老到四十歲，小到十二三的婦女都能引起市人不瞬目的注目禮。

山西的娼本極普遍。鄉下村落裏都會有娼，這是湖北決不多有的事。在湖北只有大鎮市大城市纔有娼的。

七 海子邊及南華門林下

有兩處是遊人駐足的地方。一是海子邊，一是南華門街的樹林下。

海子邊遊人或是靜坐，或是打拳。靜坐林下，頗有出世靜靜風味。但是女人一到，老僧也便出定來想隨而去了。

海子邊有幾處汽水店。店門外露天工作者冰淇淋櫃。

倘如你看過這桶和冰，你決不會再進店去要冰淇淋吃了。

海子邊的兩岸有一大佛像所在的廟。廟的一廂掛有「佛經流通處」的牌子。裏面架上只有十幾種禪淨的小冊子，稍爲大一點的經論統統沒有。

然而佛教正在被人——有力的人——提倡着。七八月間，太原曾舉行大學講經法會，法師講的是法華經。這時候，日報上每日有一段說禪學的問答，是趙總參議作的。

書店裏的佛經也很少。只是楞嚴經簡單注釋書還有一種。

大約宗教與讀書是兩件不大相容的事情。假如人會讀書，並且有心得，他不容易做宗教信徒。教條是不許解釋的。教條的信守，不以「知」爲條件，而以「信」爲條件。從前的教書匠，一肩行李，半担書。半担書只是四書講書。四書講書已經教了幾十遍，熟得可以倒背，他也就無須要這半担書，並且無須要兩隻眼。我家鄉有位去世不久的老先生，他在河南光固一帶及我家鄉教書四十年，但他的兩隻眼已瞎了三十年。那時的先生們連史記是什麼也不知道。最多只看見過史記清華錄。

不過現在的教書匠也不是相差很遠的。在一個宗教或

德羅羅之下的先生們也只用一本書做教本而無須再看別書。我說這話，罪該萬死。

八 又一個謠言

在太原住，在我是偶然的事情。然而有兩樣事使我詫異。一是在太原做了一趟陌生入。二是在北平起了一個謠言。

謠言的來源是某學校。我在那兒辭去一件某職務。在當局還沒許脫淨時，謠言說我不回北平了，我在山西做官去了。正在說着，我回北平來了。好在這謠言只在那一校裏流傳。牆外的北平人並不知道毫分；北平人于我的來源本無須知道毫分。

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寫第二段竟

我也來談談「心理」與「科學」

趙究靈

在我讀過評論第三十九號叔永先生的「評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一文之後，對於叔永先生把「歐美人之心理實產生近代科學與專門技術」比做雞與雞蛋先後的爭論一點，覺得不大妥切。本想來發表一點意見，因為沒得工夫，就耽擱下了。後來果然閱仁先生寫了一篇「還是心理與人的問題」，登在第六十五六十六兩號評論裏，對於叔永先生的比擬提出異議。並對於調查團的真意，詳加推敲；現在我不揣簡陋，也來貢獻一點意見，希望叔永與閱仁兩位先生指教。

調查團說：「近代之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不會產生現代之歐美；反之，歐美人之心理，實產生近代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使其達到今日優越之程度。」現代之歐美，當然

是指歐美的文化而言，果然「近代之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不會產生現代之歐美」，那麼我們就要問，到是什麼東西產生現代歐美的文化呢？據羅素的意思，現代歐美文化的泉源有三：一是希臘文化，二是猶太宗教和倫理思想，三是現代工業制度（科學產物）。如果這位西方大哲人說的話不錯，我們要是僅認科學與專門技術是產生現代歐美的工具，那我們就犯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毛病了。所以調查團這個意見是不錯的，沒有可以令人懷疑的地方。

鄙人未曾讀過報告書原文，不知譯文是否與原意相符合，不過從以上節錄一段文字字面看來，覺得「反之」兩字用得不大妥當，因為「反之」下一節的話，不見得是上一節的反面，那不過是從上一節的意思更進一步的推論。

調查團似乎是警告我們不要看重西洋文明的物質方面，而忽略了歐美的「人」。中國果然要想發展科學走上現代歐美的路來，雖然不需要中國人全變成和西洋人一樣的人，但是至少須具有歐美人的心理。

叔永先生說：「此種雞與雞蛋先後的爭論，似乎使我們大大的失望，如其近代歐美的文明，不是由科學得來；反之，近代的科學，是由歐美人的特殊心理發生，那末我們提倡科學的主張，還有實現的可能嗎？」他在答復閔仁先生那篇文章的時候又說：「我們承認中國人的心理自來是不科學的，那末，說到介紹科學到中國來，便成了雞與雞子的先後問題了」。據愚見看來，這並不是雞與雞子的先後問題，到是什麼樣的雞纔會生我們所需要的蛋的問題。有歐美人那樣的雞——心理，就會生那樣的蛋——科學，現在有我們這樣雞，會不會生歐美那樣的蛋呢？假如是不會的，那末，我們就應該想辦法來改良我們的雞種，使牠慢慢地也會生歐美的蛋。現在到是我們能不能改造我們雞的問題，如果能夠的話，我們又何用其失望呢？

叔永先生又說：「我國自來沒有科學，可以證明我們沒有科學的種子，但不能證明我們沒有適宜於科學的土地與養料。考察團的這一個說法，使我們明白土地與養料的

重要，格外留心去培養，却不能使我們認為科學與我們無緣，聽其失敗，放棄」。據他自己解釋土地與養料的意義說：「我們所謂土地自然是指一般民族的智識程度，我們所謂營養料，自然是指社會上對於科學的信仰與扶助——一般人衆對於為學治事的態度在內」。我們不承認中國人的智識比西洋人差，我們亦不相信中國人對於科學的信仰與扶助還不足，中國和日本提倡科學差不多在同時，為什麼日本就能「捷足先登」中國竟「蹉乎其後」呢？其中政治的影響雖然是一個最大原因，但是我們對於學習科學總沒得着一個正確的態度，也不能不算是一個最大的緣故罷？不然，到了今日，我們提倡科學已有幾十年，為什麼還勞調查團提出「心理」問題呢？叔永先生以為我們並不是沒有適宜於科學的土地與養料，據我看來，這正是我們所缺少的。心理好比是土地與營養料，科學好比是一株植物，現代的歐美好比是一朵美麗的花，有了歐美人的心理，科學種子纔會發芽生長起來，產生現代歐美文明之花。我們如果想要把科學移植到中國來，而同時不能具有如歐美人的心理，就如同把一株樹種在瘠瘠的土地上，不加養一料樣，等不到開花，這樹就枯死了。因為中國向來沒有適宜於科學的土地與養料，所以科學的種子就不會發芽生長起來，

如此可見得產生科學的心理，的確是很重要的。

以下我們就要討論什麼是歐美人的特殊心理和他與中

理的，就該駁斥牠去掉牠。時時考察人事的實際變化，創造新制度新信仰，以適合新環境。

國人心理的差別；但是我們先要把調查團所指的「心理」辨別清楚纔是。閔仁先生以爲這「心理」二字所指的是：「對於人生的態度，對於自然的態度，或者是指某幾種他們所通用對於治學行事人的態度」，這是不錯的。不過有一點須要弄清，調查團諸君並不是偏重在民族間一般的「心理」，確是着重在治學的「心理」。科學本是一種學問，他既在西洋發生，那末，歐美人治學的心理實在大堪研究。談到治學，當然脫不掉人生的和自然的對象。

三，專心治學。歐洲在十三世紀以前，一般學者大師，多是教會的長老，他們並負有解決民衆們疑難問題的責任。自從十三世紀大學相繼創立，知識大權就由長老們轉移到一般教授手裏；他們受有與長老們相同的待遇，生活安定，於是委身於學術的探討，爲愛知識而學。所以能在學術上多有發現。

反過來看看我們一般人治學所抱的態度和心理是怎樣呢？我們也可找出三種特點：

歐美人治學的心理究竟是怎樣呢？我以為有以下三種特點：

一，尊人心。中國人崇拜聖賢，往往會到迷信的程度。凡是古人所能做的事，後人是「望塵莫及」的；凡是古人所說的話，全是「天經地義」的。結果，把古人看的太神，把自己看的太無能。

一，探求真實。他們覺得自然界裏的變化無窮，研究物質因果關係，每每發現前人所未發的真理。他們不以古人的發現爲滿足，不認古人的見解一定是真確，拼命考察實驗以求新發現。

二，好古心。因爲尊古人的結果就養成一種好古心。凡是古人所遺傳下來的教訓和制度，全是好的。不是說「先王之法」，就是說「述而不作」，他們以爲古人的法則已是「盡美盡善」，不勞後人重新創作

二，適合環境。他們爲求真實的緣故，對於古人所遺留的經訓和制度不能不懷疑的問：牠們永遠是對的麼？永遠是合乎人生不可變易的麼？他們以爲古人如果是錯誤的，就不該盲目的崇拜他；他們的遺教如果是不適用的不合

三，功利心。自古以來，中國讀書人最大的目標是求作官，所謂「學而優則仕」。兩千年來，中國的學士文人！

差不多全是些官吏。至於一般民衆和青年的教師，大半是些冬烘先生和落魄文人。雖然有些淡薄名利以學終其身的，可謂少而且少，他們這些人既然看破名利，每每自命清高，想法子同他們所處的現實環境脫離，結果對於人生和學術，全無幫助，全無供獻。

我們看了以上所舉的幾件歐美人和中國人心理的特點，就可以知道科學所以能在歐美發生，因為歐美人具有求真知重實驗的精神；反之，中國所以沒有科學，就是因為我們守遺教讀死書的毛病。歐美人的態度是科學的，我們的態度是反科學的，這就是現代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最大的分歧點。不幸這點竟被閔仁君輕輕略過。他說科學所以能在西方發生的，是因為西方人具有老實，直率，負責，認真，有恆，肯幹的態度；他所以不能在中國發生的，是因為我們具有油滑，懶惰，苟且偷安，因陋就簡，不負責任，專檢便宜的态度，我覺得他未免過於偏重道德方面。果然我們若細細地分析民族間普通一般的態度，心理，因為他們的哲學和倫理想完全不同，恐怕我們還能找出一些根本異點，不過那就太近瑣碎了。我以為中國人本來不見得完全如閔仁君所理想的那麼壞，中國人果有閔仁君所指的幾種態度，那全是現代畸形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下必然的

結果；歐美人果然具有閔仁君所指的幾種態度，多半是最近一二百年來良好政治和完善教育的收穫。實在說來，西洋人在中古黑暗時代，社會不寧，爾虞我詐，他們人生態度亦不見得不油滑，懶惰，苟且偷安，因陋就簡，不負責任，專檢便宜。黑西哥嘗是拿來同我們中國對比的，他們不亦是高鼻樑藍眼珠的人麼？但是他們比起英法等國人來就差得多。就閔仁君所指西方人所有的幾種人生態度看來，他們不見得比我們中國人強。

科學的態度是創造的，不是摹倣的；是自發的不是被動的；是自主的，不是盲從的；這種態度，西方人亦不是自來就有的。歐洲一直到第十六世紀末還是被亞里士多德主宰着，就如同中國受孔子主宰直到現在一樣。他們那時人認為亞氏是上帝派來在世上說最後一句話的人，他的遺教全是『天經地義』的，無人敢非議，彼時的一般學士文人，把他們所有的精力全用在注釋推敲他的遺教，不想發明創見。他們學習希臘，羅馬所遺傳下來的知識，未曾跳出希臘人和羅馬人所知的圈外，這與我們中國人尊古心重死書的態度，全然一樣，這能算是科學的態度麼？

轉變西洋人不科學的心理到了科學的心理的最大功人，當是十三世紀的英人洛皆倍根(Roger Bacon)。他曾說過

：『即使亞里士多德的智慧最大，他不過種了一株知識的樹，這樹還未能長足枝葉豐結果實。』他以為人們如果僅就平常事物加以研究，不死讀古書，科學就能做到魔術家所想做的事。他又說：『一定有一天，人們會飛，車不用馬拉，船不用槳搖，而且行的很快』。到了現在，果然就有了他所預料的這麼一個世界。自從他給西方人這樣的一個啟示之後，科學的種子就漸漸的萌芽起來。經過兩三世紀的時間，西方人就不斷的有些新發現。到了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的時候，就有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蓋理略(Galileo)迪卡兒(Descartes)諸位先生出來，對於西方人的心理上，更灌溉了一下，並告訴他們怎樣求知的方法。後人本着他們的精神和方法，於是日有發明，促動科學的進展。梁啟超氏論弗蘭西斯培根窮理之法說：『綜論培根窮理之方法，不外兩途：一曰物觀：以格物為一切智慧之

汽機之理，如此類者，更僕難盡。一皆由用培根之法靜觀深思，遂能制器前民，驅役萬物，使盡其用，以成今日文明輝爛之世界』。他們幾人除了蓋理略都沒有什麼物質的發明，但是他們偉大的功績，就在打破彼時西方人的奴性心理。蓋理略發明重力定律和望遠鏡固然是可貴，而他以實驗方法治學的精神，更是可貴。他們實際所做的工作，就是供給西方人以適宜於科學的土地和營養料，叔永先生把牠比做科學的種子，我是不敢贊同的。

根原，凡對於自然界，至尋常至粗淺之事物，無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觀：當有自主之精神，不可水母目蝦，倚賴前代經典傳說之語，先入為主之自蔽，然後能虛心平氣以觀察事物：此倍根實驗派學說之大概也。自此說出，一洗從前空想臆度之舊習，而格致實學乃以驟興。如奈端(Newton)因萍實墜地而悟吸力之理，瓦特(Watt)因沸水蒸騰而悟

西方人受科學的福利，是在機械發明之後，這纔不過一百幾十年間事；但是從洛皆培根到發明機械的時候，相隔已有四五百年了。可見從科學心理的養成到科學文明的實現，並不是很短的時間。我們中國人對於科學稍有真切的認識，是在思想革命之後，到現在纔不過十幾年。在這樣一個短短的時期裏，希望把幾千年的奴性心理驅除淨盡，當然是不能的。剛剛打倒舊偶像，跟着就崇拜新偶像；不自從古人了，返過來盲從西人，這仍然是我們的老病——奴性心理——作祟：不過這也是在進步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因為調查團說過：『新中國必須振作其本身之力量，並從自有之歷史，文獻，及一切固有之國粹中抽出材料，以建造一種新文明』幾句話，有一般中國的學者，竟誤會

了他們的真義，盛倡復古，並主張學校應該恢復讀經。前些日子報紙上並登了一段新聞，說陳濟棠有令廣東學校添授讀經之議，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上海有一家報紙更推波助瀾地發言論，說經書是再不可不讀了，原因是現在學校出來的學生都不會作好文章，而且白字很多，如果再不提倡讀經，恐怕以後就沒有人會寫文章了。我們先不必論這種『杞人之憂』是否合理，看他們談到讀經，就會能想到作文章，己竟是可笑。本來中國以前是以『文章取士』，人們讀書最大的成就，是要寫好文章，到了今日許多人還是沒脫這個思想。其實不只經是該讀，所有的史子集和一切古書無一不該讀，問題是在我們怎樣讀法，如果還是按着兩千年來我們祖宗的心理和法子讀，讀到末了，果有什麼好處？到了今日，居然還有一般知識分子，弄不清現代知識的領域，真是可憐！

我所說的我們沒有去淨的『奴性』，就是專讀死書不重實驗的老法子。記得在中學讀書時，理化教師偶然高興，把瓶子罐子之類擺上一講桌，給學生作一個實驗看看。因為儀器太少，學生就沒有自己動手來實驗的機會，僅僅看一回大概情形，回去讀讀課本，死記些公式定律，就算完事。你想在這種演幻術的教法下，如何能引起學生研究

自然的興趣？那學校在省立中還算是比較設備完善的，其餘的更不用提了。後來到了大學裏，教書的方法，亦沒有兩樣。我會記得讀了一本西文的關稅史？同學們居然能把英法美德的關稅制度沿革記得爛熟，但是對於本國的關稅情形反到茫然。書店裏雖是有幾本關於中國關稅的書籍，教師想着學生有己會讀的，就不用拿到課堂來參攷來研究，更不要談收集材料研究自家關稅制度之利弊。我想這是我們中國現在學校裏研究自然科學和讀社會科學的通病，不注重實驗，不用思想研究自家特殊環境，僅僅做些龜售，演幻術，抄筆記的教學法，所以引得調查團說：『中國教育欲返乎昔日之安定狀態，端賴一種教育組織，其大部分須建築於固有文化之上，而同時亦須受實驗科學精神深切之激發』。他們已竟看出我們現在的教育，仍然不脫舊習慣，缺乏一種經驗精神。因為中國缺乏現代知識，於是急不暇擇，盡量的吸收不合國情的西洋材料，而不想利用固有的材料，以科學的方法，和實驗的精神，來圖自己文化的發展，這的確是值得吾們注意的。

所以我們要想科學在中國發榮起來，我們定須要堅決的來改造我們的心理。叔永先生以為改造的起點，須要借重洛皆倍根，弗蘭西斯倍根，蓋理略諸位先生的理論和方

法，鄙人認爲是很對的。我們不要憑藉驕傲，應該憑藉心靈的奮發；不要因襲人家的成果，須要創造自己的園地。此後我們學校的課室不妨狹小，但是實驗室定要充實擴大，更要擴大到社會裏。我們的學生，不要造成一種記憶的機械，應該養成活潑天真控制自然主人。我們本着這體心

理去治學，並不需要像歐美人所走的長途，就能達到他們所已成就的地步；因爲他們多年困苦經驗所得的材料，可以盡量的供我們驅使利用，不消幾十年，我們亦就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了。這並不是發空論，東隣日本不是我們很好的榜樣麼？

鄭鶴聲先生「對於影印四庫全書

輿論之評議」的讀後感

君羽

彈爲能事，不免流於浮薄。」

二

國風半月刊三卷六期「選印四庫全書問題專號」有鄭鶴聲先生「對於影印四庫全書輿論之評議」一文，頗值得關心此道者之注意。鄭先生於影印四庫全書問題，留心已久，又供職國立編譯館，有種種的方便。曾綜合舊教育部的影印四庫全書舊檔，及近來各報端各雜誌上與此有關係的文字，作了一篇四庫全書影印之經過載在圖書評論第二卷第二期裏。我也曾拜讀過一次，非常的欽佩；鄭先生把舊檔新檔集合到一起，可以見到民國以來政府關於籌印事件之經過；又把京滬平津的輿論集合到一起，可以見到國人對於籌印事件之主張。都能予讀者以極大的方便，想讀到鄭先生這兩篇大著的人，一定都和我一樣的感謝鄭先生。可是我覺得鄭先生的評議，字裏行間，似乎犯着鄭先生自己所說的：「我國記者，不言則已，言則意氣相尙，以譏

教育部與商務印書館主張用庫本影印，北平圖書館與津滬名流主張有善本者」以善本代替庫本」此爲今日影印四庫全書問題之惟一爭點，亦此次影印事件中一極堪注意之事。所以凡輿論界與影印庫本表同情，或與「以善本代替庫本」表同情者，都應集到一起，討求他們的公共意識，看那個較近於真理。如鄭先生所舉的大公報：「雖聲明以局外地位立言，然其主張『以善本代替庫本』，則全與平館及津滬名流意見相同」，我們把他認作是一種與平館意見相同的輿論，便集合到一起；不可因爲他的意見與平館相同，便說：「記者心理之卑弱，一至於此，良堪歎惜，」時代公論田君說：「北平圖書館按他的計畫進行，中央圖書

館亦按其計畫進行。反正商務印書館負擔印費，公家不惟不損絲毫，且可平白得許多書」我們也把他認作是代表一種「平白得許多書」的輿論，便置在一個地方，以待再有相同的論調。不必因他只顧白得書不顧學術而輕視他，更不必因此就說平館主張影印四庫罕傳之本，便是「言不由衷，固令人不得不懷疑其別有企圖矣！」固然，歎惜大公报記者心理之卑弱及指摘平館別有企圖，這均是鄭鶴聲先生的輿論！可是我們因為尊敬鄭先生，尊敬鄭先生的學問及學術界之地位，覺得不應該這樣的短視說出這樣「意氣相向流於浮薄」的話來！

平心而論，主張用庫本者，以為將庫書取出，就能照像上版，可以省去種種的麻煩，所以就是庫本不好，也就算了。主張用善本者，以為當此千載一時之機會，應當顧及學術上的福利，訪求善本，作校勘記，就是稍延時日，也必須辦的。雙方的理由，非常的簡單，而且非常純粹。輿論界中恐夜長夢多者，便與用庫本表同情；忠於學術者，便與用善本表同情，誠以因為影印四庫全書，是文化事業與學術上不無密切之關係，所以凡是占在學術方面的人，因為尊重學術，自然要和北平圖書館用善本代替的主張表同情了。鄭先生也明明知道：「善本雖較庫本為優，」則似

應主張用善本了，可是偏說北平圖書館「言不由衷，別有企圖」，那是不是「意氣相向」，我們只好請問鄭先生了！

三

執「庫本」之說者，亦可以鄭先生之言為代表。鄭先生評俞吾如先生的主張說：「印行四庫，不用原本，而用他本，則於事實理論，俱斷斷以為不可！如以四庫為名，則不當另用他本，若以他本為用，則不當以四庫為名，兩者必居其一矣！而平館為局部庫本之替代，與此全部庫本之替代，則亦五十步笑百步耳！」這話帶點「白馬非馬」與「狗非犬」的氣味未免太拘滯太狹隘了！從乾隆纂修的時候，到此次北平圖書館及津滬名流主張「以善本代庫本」，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的通人學者，曾經有「以善本代庫本」的例子。郭雍的郭氏傳家易說，乾隆四十年正月翁方綱從永樂大典裏輯出來，編入四庫全書裏，後來浙江鄭大節把家藏的原本進呈，乾隆四十九年三月，遂把翁方綱的輯本抽出，換上鄭大節藏的原本，這是四庫館臣的「以善本代替庫本」。丁丙補鈔文瀾閣書的時候，把魏了翁的尚書要義，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朱右的白雲稿等十餘種書，都用足本把他們補全，這是抄補四庫書的「以善本代替庫本」。阮元進呈的四庫未收書，有善本可代替的逕用善本進呈，而不

採用傳鈔本，這是更進一步的辦法了。鄭先生抹煞這些忠於四庫忠於學術的人，必欲說他們都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那我們還有什麼辦法！況這次並不是整個的翻印四庫全書，是因為這部包括三千四百五十餘種的大書內，今日已有三千一百五十餘種有通行本，尚有三百餘種，刻本流傳的很少了，所以要他們選出來印行。又因為這是文化事業，這是學術上千載一時的機會，不應草率了事，若為學術上造福利，須要於可能的範圍以內，把牠辦到「止於至善」。凡有舊刻舊抄本的使用以代替庫本沒有舊刻舊抄本可代替的，使用庫本付印，這是多麼光明正大的主張？多麼忠於學術的主張？宜乎津滬名流都起來響應，造成強有力的輿論，開明的政府，就立時採納了！入月十四日大公報文學副刊，載袁同禮向達二先生發表的選印四庫全書平議一文，鄭先生認為：「他們是平館的代表人物，」鄭

先生看見他們一則曰「對於抽印四庫全書各種之根本原則，無間南朔，莫不贊同！」再則曰「無論如何，當設法子以翊贊，以期其能底於成，不致再蹈前人之失！」耿耿赤心，久已大白於天下。鄭先生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非要「以譏彈為能事」而不快呢！

現在「以善本代庫本」之主張，經過公共意識的批判已成爲今日強有力之「時代的公論」，並蒙教育當局完全採納了，今庫本業已開始照相，二年之後，定可出書，至影印善本，既決定「各書單行」，則出書之日，必在庫本之前，況善本俱在，乞借何難？真所謂「陳義不高，觀成有期」，「採訪不難，商借尤易」，事實最雄辯，鄭先生及時代公論的田君，似乎可以尊重「時代的公論」了！「是非」及「真理」亦可以藉此大白了，討論的文字，亦可以結束了！

●注意 本刊特定優待辦法

本刊前所特定之優待本年新入校諸君，凡直接訂閱本刊四十期只收刊費一元的辦法。限於本年十一月十日截止，（外地以郵戳爲憑）愛讀本刊諸君，幸勿失此良機！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期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續刊。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埠	每月一元
朝鮮	每月一元一角
香港	每月一元二角
澳門	每月一元三角
南洋	每月一元四角
歐美	每月一元五角
安南	每月一元六角
西藏	每月一元七角

送藍普森公使歸國

再談談怎樣提倡科學研究

專門人才的培養

苔燕樹棠先生

無爲與有爲

通信 (一) 如此牛津！

(二) 更正

蔣廷黻

汪敬熙

顧毓琇

霍六丁

區少幹

劉咸

畢樹棠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 文齋 (代定)

王府井 民智書局 米良友

公府 立新書局 志遠書社

街 新華書店 (代定) 西單

平 和書社 青年書社 榮華

中 華書社 雲華書社 華華

社 增時 雲華書社 光華

宣 內 神州 光華書社 雲華

廠 旬 現 神州 光華書社 雲華

德 信 永 景山 燕大 燕昌

清 華 消 費 社 燕大 燕昌

成 津 進 分 社 燕大 燕昌

天 津 大 學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局 報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現 報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定 報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新 報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書 報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新 報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書 報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樓 報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鎮 報 華 印 書 局 文 元 南

徐州

開明書局 現代書局 金城

濟南

新華書局 (代定) 胡正

青島

華北書局 現代書局

威海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安東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蘇州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大連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太原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西安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蘭州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成都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廣州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汕頭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廈門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福州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杭州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南京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上海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鎮江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蘇州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無錫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常州

文華書局 現代書局

獨立評論

第七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一角以下爲
限）代洋九五折。

電話：東局一〇五六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送藍普森公使歸國

蔣廷黻

藍普森爵士在中國作了七年公使，現在快要歸國了。這七年之內，中英關係的轉變何等的重要，藍普森公使的成績何等的偉大。

當民國十五年冬季藍普森公使來華接任的時候，中英的關係正到危急的關鍵。彼時全國人民都爲「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所麻醉，且認英國是帝國主義的罪魁；我們以爲不打下英國，我們絕無翻身的日子。同時通商口岸的英國報紙也在那裏盡牠們謾罵的能事，把國民黨和學生看作新拳匪，惟獨炮艦政策足以對付。在民國十五年的冬天和十六年的春天，倘藍普森公使的判斷，勇敢，忍耐稍有欠缺，不但中英的關係必致大決裂，就是全盤遠東問題也可演變到一個不堪設想的田地。現在呢，英國政府及藍普森公使已屢次的具體的表示中國的富強就是英國的利益，使這富強得實現，英國願意盡友誼的協助責任。這種態度，我們完全了解且感激。現在我們知道英國不但不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障礙，且是一種助力。從此以後，中英的友誼及合作只須維持和培養，其基礎已在這最近七年穩立了。

我們如要了解這七年中英關係轉變的重要，我們必須

簡略的回溯以往的歷史。直到道光時代——蒸汽機已成新工業的中心的時候——我們尙是閉關自守，獨自尊大。英國會於乾隆末年及嘉慶中年兩次派和平使者來華。他們的外交目的雖多，總括言之，不外善意的勸中國加入國際大團體，放棄孤立的小生活而過世界大生活。到了十九世紀，無疑的我們絕無力閉關了，我們的出路在國際團體之中，不在國際團體之外。所須要的改革是極大的，就是整個文化的改造。此中艱難困苦簡直不是文字所能形容的。不幸，中英雙方的政治家把十九世紀事業的性質看錯了，致于發生兩次的戰爭。在我們這方面，我們的錯處是不知世界大勢，逆潮而行；在英國那方面，他們的錯處在眼光的短狹。

近百年英國對華的政策是一貫的以推廣商業爲前題。英國確實無土地的野心和陰謀。馬夏爾尼爵士在十八世紀末年就對乾隆皇帝的政府作過這樣的聲明。我相信此中並無絲毫的欺僞。因此英國人覺得他們對於中國沒有一點良心的不安。加之自拿破侖戰爭以後，英國的紡織業有一日千里的進步，海外的商場成爲迫不及待的需要。亞當斯密

士的經濟自由主義，經過喀蒲敦的宣傳，簡直成了英國的天經地義。英人覺得商業的推廣不但是良心所許可，且是文化的使命。倘中國人施以抵抗，這就是中國人的頑固，應該用炮艦消滅的。英人不知道商業的推廣及這種推廣方法在中國這方面可以引起嚴重的社會和政治的不安。譬如一口通商改爲五口通商好像是極高尚的文化事業，殊不知這個改變廢了從江浙經江南過梅嶺到廣東的通商大道，而那些開旅館，作担夫的人就變爲失業份子了。倘若英人彼時知道這種社會的惡影響，他們也會置之不顧，認爲與他們無關。天津條約許了英國汽船往來於牛莊，天津，上海之間，於是中國沿海的海船及沿運河的沙船都被這種競爭壓倒了。在同治初年，這些廢船的桅木，如森林一般的，從吳淞口到鎮江，排在英人的面前，英人惟自慶他們運輸事業的成功，並責望中國政府維持治安，不讓失業的水手生事。

爲英國航業開闢這個新路線的是額爾金爵士。他訂了天津條約以後，路過上海的時候，洋洋得意的向英國商會講演說：我們外交家及軍人替你們打了先鋒，你們應該繼續努力，最後你們的機製品究竟能否戰勝中國人的手製品；那全靠你們自己去決定。額爾金爵士是講究政治道德的

；他在上海對英國商人作這個演說的時候，他無疑的想他的天津條約是逐條逐款都合乎基督教義的。他的聽者的感想更不必說了。以後的英國公使如威妥瑪，巴夏禮，朱爾典都出自一個模型。總而言之，十九世紀英國在華的事業就是拿英國的機製品來戰勝中國人的手製品。好了，中國人的手工業節節敗北了，但是他們終久也無能力買機製品了。手工業及農業是中國經濟的兩大支柱，倒了一個，其餘那一個也不能支撐這個大廈了。我這話也不可說得過火；中國經濟的崩潰是個極複雜的問題。外人經濟的侵略不過是其原因之一。並且我們倘自振作，如日本一樣，也不至到如今這個田地。不過這個經濟侵略究竟是我們今日的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結果就是兩敗俱傷。

我們原先不願加入這個國際團體；英國硬把我們拉進去。如同一個人不願意加入一個會社，他的朋友簡直用武力把他拖進去。這個朋友似乎應該盡點責任，告訴他這個會社的性質，及會員必須有的資格。英國在華的外交家，因爲看重了商業，簡直看不見別的了。所以直到近年，英國政府絕不作點文化事業。連留學一事，美國政府，日本政府都提倡過，惟獨英國政府到近來始注意及此。

因爲以上的原故，藍普森公使到中國來的時候，中英

的關係是那末樣的危急。當然，鮑羅廷及其同志與民國十四年十五年反英的空氣是有很大關係的，但如土地不適宜，鮑羅廷所撒的種子也不至有那樣豐富及那樣快的收穫。國人尙記得民國十四年的上海事件及沙面事件及其所引起的香港罷工風潮。十五年又有萬縣的案子。藍普森公使到中國的時候，革命軍已佔漢口。他到了中國，就逕赴漢口，與陳友仁外交部長接洽。他們談了什麼，我不知道；不過藍普森公使於十二月十七日離開漢口，十八日英國外長張伯倫爵士就向列強提出對華的新政策。無疑的，這個政策是藍普森公使未到中國以前英國政府就定了的；無疑的，英國政府深信他與這新政策表同情且有執行這政策的權力然後委任他。所以他的使命就是執行這個新政策。

那末，這個新政策是什麼呢？牠包括六要點。(一)英國願意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二)英國絕無強以外人的統治加諸中國的志願。(三)中國修約的志願是正當的。(四)舊約未修改以前，英國願意關於條約的權利略爲通融。(五)在中國未建設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前，英國就願意與中國維持親睦的關係。(六)華府會議所通過的海關附稅，英國願意中國即時起徵收。

這個政策發表以後，中外多表示懷疑。國民黨的當局

一則疑這政策是拿來作一時和緩空氣用的，一則嫌這政策不澈底，且過於空泛。國民黨的態度至少關於一點是看錯了，那就是關於海關問題，英國明白的表示中國宣布國定稅則的時候，英國希望列強共同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在此以先，讓中國即開始征收華府會議所通過的附加稅；這是很澈底，很具體的提案。但是國民黨積疑太深；鮑羅廷復從旁破壞新關係的推展。十六年正月初遂有強佔漢口英租界之事。這個時候，英人主張以武力對付「暴徒」者正不少。英國政府及其駐華代表雖一面調兵保衛上海公共租界，一面又於正月二十八日致函南北兩個政府的外交部，作進一步的政策表示。(一)英國願意承認中國新式法庭的司法權。(二)英國願意承認中國的國籍法。(三)英國在華的法庭願意實用中國的新民法和新商法。(四)在平等條件之下，英國願意讓中國政府向英國僑民征稅。(五)中國頒佈新刑事法典的時候，英國在華的法庭亦願意實行。(六)租界的政府可修改。(七)英國在華的傳教及教育機關願遵守中國的法律。外國在中國受了挫折以後而繼續讓步：這是初次。二月十九，英國正式退還漢口英租界。十七年年底中英簽訂關稅條約，正式承認中國關稅的自主。十八年，英國退還鎮江租界。十九年，

退還廈門租界及威海衛租借地。同年，中英訂定退還庚子賠款的辦法及其用途。二十年五月，中英法樞草約成立。直到現在，退還租界及租借地者尚只有英俄兩國。其他國家尚未聞有所表示。

藍普森公使的秘訣在乎不以中國的國家主義為英國之敵，反引以為友。在最近這兩年，已起始利用英庚款來作

建設及教育事業。

在我國歷史過程這個當兒，英國政府及其代表願意協助我民族基本事業的完成。這真可算為「友邦」了。

我們雖不願意藍普森公使離別中國，我們借此機會祝他一路順風。

☆ ☆ ☆

再談談怎樣提倡科學研究

(一)

我們有一個根本錯誤的觀念就是：「沒有儀器，不能做研究工作；沒有巨款，不能購置够用的儀器。」研究所是力求買的儀器多。凡是有點志氣的大學沒有一個不是力求儀器費愈多愈妙。一個大學的理學院各系也沒有一個不

所，那一個大學，沒有好多華麗的櫃櫥，裝滿了從外國以高價買來的儀器？但是有幾個人是實際在那裏用儀器工作？有幾件儀器不是擺在那兒做學術機關的裝飾品，任他慢慢老朽呢？研究的結果能够使我們覺得這些款項不是浪費嗎？

是出力爭分儀器費多的。朋友們往往說：「你的儀器多當然可以做些研究了！」近兩年教育部刊行的「化學討論會報告」及「天文數理物理討論會報告」，其中各研究所各學校自己報告自己近况，是不是像「臨潼鬥寶」一般，各自詳述所有的「儀器法寶」！

我的一位朋友批評這個錯誤的觀念最是「一針見血」。他說：「科學家的儀器，同木匠的刀鋸一樣，只是工具而已。如無人用，買他做甚！」我們可以補充着說：「刀鋸不能自己造成抬椅，儀器自己也不能產生研究的結果。」

這個錯誤的觀念似乎是十數年前無能而有名的科學家創立的藏拙妙策。但是國家受害却不少了。那一個研究

人之後，并按着他的需要去買儀器，去買他需用的工具。

如此，則買來的儀器器件得用，款項不至於浪費，並且可
希望有研究的結果出來。

這點簡單的道理一經道破，是大家是可以承認的。那
些有名而低能的中國科學名家當然是例外，當然我們不能
希望他們同意的。

不過有人說，為教學而用的儀器是不能不買的。這
此說也有可議之處。現在所用的教學生做實驗的方法，只
能訓練學生一點用手的技巧，并不能使他們領略科學方法
之真義。只為教一點技術而費巨款買儀器是得不償失的
。如果大學教授能努力做研究工作，給學生一個樣子看
，比能對學生教多幾個實驗的技術，在引起學生研究的興
趣及領略科學方法的意義上，影響大多了。教學生用的
器愈複雜，學生愈是只見技巧，而不見實驗法之真義。
若是買來的儀器是專為做實驗給學生看，更是不值。
SHERINGTON說過：實驗表演越是做的好，學生所得愈
少。況且從看表演所得的，本來就不多吧。

(11)

但是怎樣找人才呢？

我們先說幾個消極的條件。第一，絕不可只憑名氣
。我國學術界仍是幼稚，得名太易。從來沒有做過

研究工作的人，只要寫幾篇通俗的文字，便可成為科學名
家；或者寫幾篇甚長而令人「莫名其妙」的文章，也可變為
科學名人；或者經報紙或朋友吹噓吹噓也可得名。我們
可以武斷的說，我國這些科學老名家，一大半是徒有虛名
。把這種只有虛名的人用在研究所或大學的重要位置上，
絕非提倡科學研究之道。用此種人是阻礙科學研究的發
達最有功效的方法。

第二，絕不可用只是讀書多而未會做過研究工作的人
。我們從前認讀書即是求學，讀書多便是有學問。讀書
多但是「食而不化」的「兩腳書櫥」，在從前可以被認為有
學問的人，給他以機會。現在我們要知道，此種人是絕
對不能對於知識的進步，有點兒供獻的。這種人，我們只
好勸他另尋與他才能相合的工作。研究與教學的職業是
與他不合的。

第三，絕不可用中才而勤力的人。我們對於用功的
人從來是有點兒景仰的。我們都以為智力雖不高，但是
努力用功便可有成。這個意見是錯的。在下棋，十個
低手敵不住一個高手；天資不備，只努力是絕無成高手的
希望。在科學研究也是如此。EDISON是說過他的工作
之成功，是由於「一分神來，九分汗下」。天資中平的人

是得不到這「一分神來」的！在前數年，不妨鼓勵天資中平而努力的人。這是與「千金買千里馬骨」一樣的用意。以後我們只能與聰明而用功的人以研究的機會。

在積極方面，我們以為研究所及大學找人，應以人所發表的工作之質與量為標準。質尤重要過量。要知道人的工作之質和量，主持研究所或大學的人，當然要做一番人才調查的工作。如果肯用這一番力，並且肯詢問國內外與他同行的人之意見，再能自己同他有個人的接洽，自然可以選到適當的人。如果肯如此審慎，方是找人，而不是如現在這樣每學年開始的時候亂拖人了！審慎找人是提倡科學研究的最緊要的初步！

有適當的人，方能有研究的結果，方能給有才能的青年以科學的訓練。

(二)

找科學人才這件事，比為女兒找丈夫，更是困難。因為科學人才實非容易找的。這種人才是國家應該加意培養的。

研究一種問題，必須能夠在一個地方，繼續十年以上，努力工作，方能有效果。所以絕對不可把科學人才也看做學術機關的裝飾品，只願搶來撐門面；搶到之後，就一

點研究的機會不給他。也絕對不可因為黨派的原因，省界的不同，個人間感情之不融洽，不給能研究的人以研究的機會。更絕對不可以因這些原故，將一個已經創立了實驗室而且有結果出來的人，趕出他的實驗室之外。這種事都是使一個科學人才在精神上物質上，受無限的苦痛的；而且是受了之後，只能將這些冤氣吞下肚去，一點社會上的同情得不到的！這是毀滅人才的無上妙法。

所以我們希望，主持研究所大學的人，不但要擇人審慎，而且要能培養人才。培養人才，第一須要給他以研究的機會；第二須要使他能安心長久工作。

研究的機會，是須要教課少，雜事少，開會少，酬應少，而且有一筆可靠的款項。這筆錢數目並不要多。我們可以武斷的說：有本領的人並不需要大筆的錢；要求大筆款項的人未必有本領。

研究機會的重要，是人人可以了解的。長久工作的重要，就不大為人所注意了。我記得有一次同一個朋友談起大學教員搬來搬去之不當；他就說：在中國現在，儀器應該隨着教員走。這種辦法，固然可以免得儀器鏽爛及買重份的儀器的損失。但是這位朋友實在是不知在中國創立個實驗室的甘苦。一次搬動，至少須費半年或一

年的時間，方能工作。在這死氣沉沉的北平城內的國立大學，至少須費一年以上的時間。在首都更難說了。這種時間實在妄費的可惜。顯是因為搬家，而須切斷舊日的工作，再找新路走，更是苦痛！

(四)

以上所說的話，是甚簡單，並且我們也曾說過。簡單的話甚難得人聽從。我們「人微言輕」，也難得爲人所信任。現在我們引兩個外國科學界名人的話，或者我國的名人能相信點兒罷。

一位是現在德國 HEIDELBERG 大學的物理學教授——曾得過 NOBEL 獎金的——PHILIPP LENARD。在他那本 GROSSE NATURFORSCHER 一本書上（九六一—九七頁），論 NEWTON 與美國皇家學會的關係，他以爲英國皇家學會使 NEWTON 答復那些關於顏色問題的討論，太妄費 NEWTON 的時間了。他以爲科學的進步全係來自人的工作，而不來自學會，無論這學會的會員

專門人才的培養

在本刊第七十一號上，我曾討論到專門人才統計的重要。統計乃指已有的專門人才而論，並且統計只能注意到

大體上是如何好。一個學會的目的應該是保護及促進這少數的能求得新智識的個人之工作。

一位是現在英國 CAMBRIDGE 大學的物理學教授——也是曾得過 NOBEL 獎金的——LORD RUTHERFORD。他在今年九月九號出版的 NATURE 雜誌上，有篇評論 LENARD 這本書的英譯本的文章，他以爲上述的 LENARD 的意見是甚對，並且英國皇家學會現在的目的就是如此（三六八頁）。科學研究以人爲重，是這兩位都承認的。我國的名人聽了他們的話應該也以爲然罷。

「人本主義」是提倡科學研究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我國這幾十年來，提倡科學研究之失敗，都是因爲不信這個主義。我們儘可以造房子，買儀器，購圖書，儘可以費幾十百萬的錢；如果不以人爲重，這錢只等於白白花掉了而已！我們應該醒醒了，我們應該少注重物的方面，應該注重能用這些物質材料做工作的人！

一九三三，十一，二。

顧毓琇

「量」的多少，不能指示出「質」的好壞。從國家的立場看，我們需要的專門人才，量要多，質亦要好。要又好又多

的專門人才，便需要適當的培養了，普通人以為專門教育的普通教育一樣，在學校讀完書畢了業就算成功，這是誤會的見解。我個人以為專門人才的培養，大的可分三個階段：

(一)未畢業前——注重學術

(二)新畢業時——注重經驗

(三)已畢業後——注重經驗與學術的互相發明

在未畢業前，基本科學同專門知識都是偏於學術方面的。學校課程無論如何注重實驗，總不外乎基本的訓練。因為專門的農工等等事業，都是千頭萬緒，詳細的部分，學校教育是無從教起的，並且教了也未必有益處。等到畢業的時候，這些未來的專門人才，纔正式踏進專門事業的境域去。學校教育猶如旅行指南，加了插圖或是風景片的，而畢業以後纔真正親臨其境。初到異鄉的時候，或者覺得地陌生疏，旅行指南所大書特書的名勝風景更是不易找到。經過了一番辛苦，這位候補專門家認識了現實的一切。他有把握了，他認識了他的本行。這是從學校教育進而完成社會教育的一個步驟。這種情形，學社會科學的畢業生亦會遭遇到，但是農工專科的學生，所感遇到的更爲着實。

我們必需注意到一點：專科學生畢業後到社會上服務

的時候，他們專門的範圍一定更爲狹窄，所以他們對於一部分的知識跟着經驗而增進，而對於基本的原則或者反會疏忽。但當他們的經驗逐年增加時，範圍亦漸擴大，而對於本行的基本知識亦會有豁然貫通的一天。

從新畢業生到老畢業生，便是從低着頭得經驗到豁然貫通回味到學校教育而重新理舊書的一個階段。至此專門學術與專門經驗方始有互融相會互相發明的機會。

以上大略講了培養專門人才的步驟。

到底誰去培養呢？

第一階段的責任，自然是專門學校的。國內現有的大學工科，有十幾處，如交大，北洋，中大，浙大，平大，清華，武漢，山東，東北，同濟，中法，焦作，金陵，南開等等。農科有中大，浙大，平大，河南，山東，金陵，嶺南等等。平均每處畢業生以五十人計，則每年工科畢業生約六百餘人，農科約三百餘人，共計約一千人。以連續服務年限三十年計算，則共得約三萬人。假定新畢業生平均年齡爲二十五歲，練習工作期間爲五年，則三十歲時可擔任正式專門工作，服務三十年，六十歲時可以退休。三十年後每年退休約一千人，適與新畢業生之人數相等。

根據本刊第七十三號君達先生「一個日本的人才統計」，日本自辦學起一九二五年止，共計國立大學工科畢業

生約九千人，農科畢業生不及三千，共約一萬二千人。東京帝國大學始創於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二五年約為五十年。故日本農工畢業生平均每年約為二百四十人。近八年來，每年以畢業生一千人計，得八千人，連前統計數共為二萬人。所以我們上面所說三十年後有三萬專門人才的預算，比較起來亦不算少。又據君達先生文中報告，日本政府中的專門人才約有四千多人。所以我們若有一個培養專門人才的五年計畫，亦可以達到這個數目字。

從人數而論，現在的大學農工科可以够了。

從品質而論，我們自然希望辦工程教育的人要十分努力。最近我們有幾位朋友預備發起工程教育討論會，我想這是很有意義的。

第二階級，便是怎樣去訓練新畢業的農工專科學生。他們所需要的是經驗，是實地學習的機會，他們不是先要一個位置，一隻飯碗。學了機械辦文書是不對的，學了開礦做會計亦是冤枉。我們對於這種新畢業生，不必希望他們用其所學，且為他們謀一個地方學其所學，已經是愛惜專門人才的德政了。

對於這種訓練，我們現在的政府機關同實業界亦都漸漸提倡合作。今年暑假，建設委員會同交通部都招考了電

務技術員。這些技術員考取以後，就分發到電廠或是電報局電報局實習。這是很好一個例子。還有杭州電廠今夏招考了十名大學畢業生去訓練，以兩年為期，訓練好了自己再到別的電廠去。這種為國家訓練人才的工作，我們確應該加以稱讚的。

鐵道部向來是錄用交大的畢業生的，我們希望他們明年能照交通部建設委員會的辦法公開考選各大學土木科的畢業生。全國經濟委員會今夏亦用公開考試的方法錄用大學畢業生去實習關於道路的工作。

從訓練專門人才的目光看，我們需要專門的事業。國內沒有新式的電廠，我們的電機畢業生，便沒有實習的機會。國內沒有新造的鐵路，我們的土木畢業生，便沒有實習的機會。

有許多門類的專門事業，我們國內仍然太幼稚，於是乎有了四十多年的留學歷史以後，今年夏天政府又考送留英留美的公費生了。我們瀋陽的新式兵工廠斷送於日本以後，我們又派學生到外國去學鎗炮製造。我們的上海北平南京天津受了敵机的威嚇以後，我們又派學生到外國去學飛機製造。這些無非要完成極少數專門人才第二階段的訓練。

借外國的設備，完成我們專門人才一部分的訓練，這是急來抱佛脚很可憐的辦法。多少年前我們的科學教育還不發達，所以不要說專門教育要仰求於外國，基本的科學訓練亦要到外國去學。現在國內的科學已經有了基礎，專門教育亦已漸漸發達，所以專門人才第一階級的訓練，或者可以自己擔負，而新派出的留英留美公費生可以出去完成他們第二階段的訓練，同從前比起來，未始不是一種進步了。

我們希望第二階段的訓練，逐漸可以由國內擔負起來。如同鐵路，道路，水利，電力等等，我們相信國人已能自己經營，自己研究。如煉鋼，如化學工業，如機械製造，我們在小範圍內亦有成績，而其範圍之所以不能擴大，物力財力的不足，或者比技術知識的缺乏更為重要原因。我們最差的是國防工業，因為飛機大炮造起來比較的煩難，並且同開礦煉鋼機械製造等等都有密切的關係。

第三階段的培養，怎樣可以完成呢？這是一個重要的

答燕樹棠先生

獨立評論七十四號燕樹棠先生的『平教會與定縣』一文內，涉及了我的職責，我願意簡明的說幾句話。

我不相信燕先生這篇文章是「有意中傷我」。因為他

問題。我們急來抱佛脚派留學生到外國去接受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的訓練還可以；這第三階段融會貫通發明改良的工作，關係國家未來的生命，我們怎能永久委托於別國呢？我們歡迎國際技術合作，但是我們不能容忍不諳國情的客卿來發號施令。各國的技術顧問只是顧問，他們本不必越俎代庖。我們的技術專家呢，這第三階段的訓練便沒有人能完成麼？

最近洛氏基金會的鐵司台耳博士會同幾位大學教授說他希望中國的科學研究能提高一個階段——從教授自己研究到指導別人研究。

哲學家懷悌黑曾經說：

『這世紀的最大發明便是發明了怎樣發明的方法。』我們需要有組織的研究，大規模的研究。我們希望中國的科學家要聯合起來做偉大的研究。我們亦希望中國的農工專家要聯合起來研究實際的問題，為未來的專門人才作成那第三階段的訓練的先導。 二十二，十一，五

霍六丁

所指責的如『縣長只本主義而行，並不依法辦理……』，與反動勢力互相呼應，而故意製造階級惡感階級爭鬥……等，很能構成重罪。他若有意中傷，他應當向當

局控告而不當在刊物上公開發表。所以蔣廷黻先生誤會了燕先生『有點故意中傷』，我倒願意替他辯護一下。

燕先生說『平校畢業同學會會員（非『平教會員』）』『憑藉官勢以欺壓老百姓』，若有此事，頂好轉告當事人依法起訴，我決不袒護作奸犯科的人。我已經拘押過一個村的委員長，可以作個事實證明。再不然，只要燕先生個人通知我，我也要偵查一下，明白回答。可是有些事僅是私人的恩怨，我們也不可盡聽一面之詞。

至於說『面見縣長，非平教會員沒有機會』。這你有點誤會或誤信了。舉例說吧：我到貴村清風店去過三次，在那裏親自接見過無數次的鄉長副與人民，而貴村並沒有平教會員（燕先生住清風店南關太平莊）。我又到過貴區寺邑，磚路，台頭，岸下，西板……等數十個村莊，這幾十個村莊，說也湊巧，只有一兩個是有平教會員的。

說我審理債務訟案，不依法辦理；我想和志打個賭：由五月截至九月底，受理了一百二十五債務案件內，您若能指出一案是不依法辦理，我便算輸。我前天到監獄視察

無爲與有爲

前在獨立評論第四十九號，得讀適之先生『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爲的政治』一文。當初看到題目，未嘗不使人暗

，民事押犯盡是債務案，當時很使參觀人感慨。至於發起的債務調解委員會，這是合法的，也是對債權債務雙方有利的。打官司雙方都化錢，而且往往是債權人不願打官司。至於委員會的人選；令叔父燕冠卿先生便是貴區三個顧問之一，當不致疑他會引起階級鬥爭吧。

至於增加人民負擔的話；去年地方支出（保衛團在內）是十八萬多；今年是十五萬多；共減少三萬四千餘元。在現在政令之下，我慚愧我只能做到如此地步。

其他的工作及理論思想問題，這裏不必多說了，有機會我再領教吧。

末了，我請問您一件事：您說：定縣以前數十名劣紳憑藉官府欺壓百姓，這是怎麼一回事？現在他們還敢不敢？請指示給我。因為我們在國家人民的立場上，政治法律的責任上，都不許他們『憑藉官府欺壓人民的』，無論因此他們會如何的『發生厭惡，積恨日深，將發反抗的運動』啊！

（完）

區少幹

暗吃驚；但細細讀了內容之後，却又深感着適之先生近來的言論；見解更加深沉，立論更加務實了。這確是放開眼

請看過我們自身週遭的環境，我們農村的實在痛苦情形，和一個貧弱久亂的國家，達到安定富強的境地，所必須經過一段無爲的（撫養培乳的）歷程的歷史；而指給我們爲政者致力建國的一條大路。

最近復在獨立評論六十七六十八兩號裏，看到弘伯先生遠從法國里昂大學寄回來的通訊「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爲的政治哲學嗎？」之後，覺得弘伯先生實在淺看了，或竟是誤解了「無爲」兩個字哲學上的意義？并且忽略了有爲政治成功所必要經過的一個階級。我從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實際生活之下，體認出許多事實，和適之先生所說的話很相合的。我是擁護適之先生無爲政治的人，所以我便不能安於緘默了。尤其是農村的復興，非經過無爲的撫乳培養不可！

「無爲」與「有爲」只是一個先後的程序問題。並不是個對立的體系。這是我們要深切認清的。

適之先生在他的文裏會很鄭重地反覆申明這「無爲」兩個字的定義，他說：

「古代哲人提倡無爲，并非教人一事不做，其意只是教人不要盲目的胡作胡爲，要睜開眼睛來看看時勢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不是可以有爲。所以說：

「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以說：「不爲物先，不爲物後；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所謂「時」即是時勢，即是客觀的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沒有經濟能力，就須用全力培養經濟能力；沒有人才，就須用全力培養人才。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決不能做出什麼有爲的政治。

他又說：

最好的撫乳培養的方法是一種無爲的政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以至於無可再損。這種老子的話頭也許太空泛；我們可以用十九世紀後期哲人斯賓塞（Spencer）的話：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爲政治的摩登說法。……

如果我們沒有認清了對準了這種定義來說話，便往往會坐了「無的放矢」的毛病。不幸弘伯先生的文章裏，往往不免如此。

如說裁兵，是要替被裁的兵想出路，如屯墾殖邊等，這當然在裁兵範圍之內，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無爲政治範圍之內。斷不是裁兵只是把兵裁了，便是無爲；而替被裁的兵想出路，便是有爲。適之先生在他的論文附記裏承認蔣廷黻先生主張承認克復的共黨區域內的田地分配，也是無

爲政策之一。這就很可以明白無爲兩個字的涵義了。

又如弘伯先生他文裏有一段引証說：

請看我們四川的馬路。舉個極小的例來說，從產鹽有名的自流井到富順城，華里不過九十。（英里只三十

）在西方可以數月成之者，在我竟鬧了幾年。爲什麼要延長到幾年呢？因爲樹倒猢猻散。所以辦事人不顧那口好飲食，急急吞下。如果有人把這口好飲食給他們拿走，他們的把戲多得很，消極防不勝防，一轉眼便翻新花樣，另起名目，以求「生財之道」，結果老百姓的錢還是一樣地出，而雛形的建設，可以作爲改良進步基礎的建設，連這點點也會沒有了。

這確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最足以證明怎樣叫做「胡作胡爲」。怎樣叫做「往往擾民而無功」。

講到中國近年來都市的建設，和馬路開闢。我相信沒有任何其他一個都市，比得上我們廣州了。我們有自由開合的大鐵橋，跨過珠江，溝通河南河北。我們有一百二十尺闊的柏油馬路，并不比上海香港外人治下的地方失色。在這三數年間，我們有三千餘輛的汽車，在馬路上跑。我們有十二層高的建築物，這是曾受過中外人讚美的。但最近政府忽然有停止開築馬路的明令，那些預定在計畫內要

開築的，也一律停止；爲的是馬路兩傍的人民即使勉強有錢交給路費，却再不能勉強弄錢建築自己的舖屋。結果是當中一條好好的馬路，襯着兩傍拆得七零八落破敗不堪的爛屋，這不是又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嗎。

不要說「把政府權縮到警察權」是人家十九世紀的睡餘不足學；人家十九世紀爭人權的睡餘，我們到了現在才捨着了，而且還受了很大的打擊，和慘痛的失敗。我們現在的情形，豈只是「諸侯并起，民失所業，而大飢饉」。更够不上「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生者未起，……」這幾句話。在這種情勢之下，却不要經過撫乳培養的一個階級，便妄想「人人自愛而重守法。先行義而後緹耻辱焉」。便妄想「主持建設者，認真作事，將公事看成和私事一般重要，將公款用來和私款至少一般愛惜；不要再掛羊頭賣狗肉；消極不要再毀滅專才，積極還要培植」。這不是更「垂空文」嗎？就是人民要督責政府，這個督責的能力，也要在治安和公道底下才培養得起來。如果沒有確立這個督責權的基礎，謬然出來督責政府，那你只有準備遭殃而已。誰叫我們的國家落伍了這悠悠的一個世紀呢。

大約弘伯先生看慣了西歐的「土地辟，田野治」。和人家的瓊樓玉宇。回看我們這個東亞不知振奮的貧兒，轉

衣百結，食宿無所。忍不住了，就要督促他馬上照樣建築一個瓊樓玉宇。他那懇切望治的心情，我們是十分敬仰的。但連教貧兒擯節儲蓄，都說不必，恐怕反而「欲速不達吧」。衣食足，然後可以言禮義。這雖是一句老話。但無論講什麼，都要先有了衣食才可。這個先後的程序，猶如鐵律一般，是不容倒置的。

適之先生說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為政治的「登摩」說法」但在我們現在來說，我以為應該是：把政府的權力擴張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為政治的摩登說法。因為我們現在的政府，遠遠沒有做到警察權的境界。我們的農民納了正式和苛抽的賦稅之外，還要納土匪的「保護費」。我們四鄉的輪渡，納了正式船鈔稅餉之外，

如此牛津

廷獻先生：

獨立評論五十四號，載有顧克女士 (Gertrude M. P. Coles) 著，劉學濬君譯『那賢明的青年』和 (英人) 俊臣君的『跋「那賢明的青年」兩篇短文，當時讀了，很覺得有點不自在。個人在牛津也讀過幾年書，對於牛津的情形，也略知一二，敢就所見，仍借貴刊發表，對於該文的幾點

還要納各地土匪的「行水」。他們整日整年的勞動，做到「腓無跋，脛無毛」，結果能够上餉納稅，已是萬幸。如果不幸還碰到些天災，那真是不知死所了。所以築路會要他們的命，盜匪會要他們的命，派兵勦匪，更要他們的命。(共產黨的區域不計) 現時復興各地農村，最要緊的是給他們一個翻蘇的機會；最低限度使他們能够繼續呼吸，才可以繼續工作。所以我說：尤其是農村的復興非經過無為政治的撫乳培養不可。政府先把警察權做到了，然後才可以擴張到比警察權更大的權。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先做了「無為之為」，然後可以做「有為之為」。

二十二，十，廿五，

廣州市廣衛路半園區

劉咸

感想。

第一，牛津大學學生會 (Oxford Students' union) 譯聯合會不十分洽當(二月九號辯論的『本會無論遇了任何情況決不為王為國去打仗』(That this House will in no circumstances fight for King and Country) 的那回事，實在值得若何的注意。我們曉得牛津學生會在每學期開

學的時候，每逢星期四都舉行辯論會，雖然常常討論政治問題，但他主要的目的，還是在練習學生的口才，和辯論的方法。辯論的題目，當然以能引人注意者爲上。這次的題目，總算是能引人注意了；但我們又知道牛津在校的學生，總共有五千多人，這次提案的通過，不過是以二七五票對一五三票的多數，就是三月二號（據牛津雜誌（The Oxford magazine）五十一卷十六號所載係二日非十號）晚上再行開會討論銷毀記錄的事，也不過以七五〇票對一三八票的多數，通過反對銷毀前案之建議。以七百五十人的比較多數，能代表其餘四千餘人的絕對多數嗎？能說他們都是「那賢明的青年」嗎？其實這種辯論，不過是一部分學生活動的一種，並不能代表全體學生的意見，更不能對於英國的外交政策，有絲毫的影響，所以我們對於這種舉動，祇能認爲係少數愛出風頭的學生幹的故事，並沒什麼大不了的，值得我們的注意！

第二，這次辯論題的要點，是「不爲王國去打仗」，這是句騙人的話。英國人不是喜歡打仗，那裏來那麼些殖民地。即如上次歐戰前，何嘗沒有一部人反對戰爭，迨募兵令下，投效者風起雲湧，結果能堅持主張，因非戰而下獄，像羅素先生又有幾人？這夥百個血氣未定的牛津學生

，所謂的「那賢明青年」，說不爲王爲國去打仗，我們可以相信的他們過嗎？平時口頭說不去打仗，到了打仗的時候還是去打仗，不爲王去打仗，或有之，不爲國去打仗，恐怕時間還早得很呢！愛國心誰沒有？

再從人類的演化史上看來，人類的天性是好鬥的，戰爭並且是生物界現象的一種，沒戰爭就沒有進步。男子好鬥爭，女子也愛勇敢的肉體。這次牛津通過不打仗議案之後，就有兩個女學院各以大批白羽毛，致送學生會會長，默罵那非爭的爲不武。在一般人的心理，以爲女學生一定是愛和平，惡戰爭的，只要提議非戰運動，準可以得她們全體，或大多數的贊同，和稱羨。這次牛津的女學生却不然，因爲忠君愛國的思想，不但不贊助那擁護議案者，反送白羽毛默罵他們是膽小輩。可知這次議案，不但不能代表牛津學生全體的意見，且不能博得比較愛和平惡戰爭的女同學的同情。

第三，俊臣君在他的跋內，說這回事情，「實在值得中國人的注意」，並且進一步替我們出個主張，「說什麼「無論情況若何，決不武力抵抗日本」，我認爲這句話是有絕大的危險性的，我要提示我們中國那賢明青年注意，切不可受他的麻醉。在強權即公理的世界，「尙未毀

滅以前，武裝是和平的保障以前，人類好鬥的天性，尙未全泯以前，不靠武力抵抗，但憑口頭正義和平，可保障己國的安全，可以阻止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嗎？那才是緣木求魚，自己騙自己的話，我們可不要上他的老當。我以為中日問題最後的解決，不在國際聯盟，而是在喋血長城浮尸鴨綠江上。現在我們或不能戰勝暴日，但人心不死，終有算總賬的一日。中國九一八起至熱河失陷爲止，是喊着「決不武力抵抗日本」的口號，結果是怎樣？是以東北四省的錦繡山河，拱手讓諸他人。上海一二八之役，是喊着「決以武力抵抗日本」的口號，結果是怎樣？是雙方打得落花流水，簽了停戰協定，上海表面上未損尺地寸土。武力抵抗和不抵抗，差異如此，何去何從，不容躊躇，我們還說不要抵抗嗎？倭臣君越俎代謀，教我們要忍耐，「無論情況若何，決不武力抵抗日本」，未免太不忠實，太滑稽了。要是日本這樣欺凌英國，英國也決不抵抗日本嗎？倭臣君這句話，有搖動我們青年思想的嫌疑，大家要認清，要注意！我更希望我國那賢明的青年，要看清我們國家的出路，我們自身的責任，和外國人說話的背景，自己加一番思索，不要盲從倡什麼世界大同，國際和平，非戰非不爭的高調，濫調。這些思想，在幾百年後，也許可以達

到，不過在世界二次大戰，且夕有暴發可能的今日，是不適用的。我們要求自身的解放，國家的安全，除武力抵抗外，沒第二個善法。

第四，再說到牛津學生會的非戰議案，不過是那麼回事，不值得我們的注意。他們在高說非戰入雲之後，又於五月四號晚上，作『廢除國際聯盟』(That the League of Nations should be abandoned)的辯論(據牛津雜誌五十一卷十九號)，曾幾何時，出爾反爾，如其說主張非戰運動，不爲王爲國去打仗，是對的，那末就不該辯論廢除國際的問題。國際是世界上現在唯一的倡導和平，主張合作的機關，應該努力贊助，多方維護，使這根基未穩的幼稚組織，日臻鞏固，俾可以阻止一切戰爭的發生。倘若要廢除國際，發展帝國主義，那簡直就不必唱什麼不爲王爲國去打仗的高調。牛津大學這班二十多歲的青年，本來見解就沒成熟，他們的行動和思想，往往是矛盾的，值不得我們的注意。反正他們說了做了不負責任，壓根兒也影響不到英國的外交政策，所以政府當局，也讓他們胡鬧，不加干涉，認爲學生的舉動，不過是如此，所以牛津也不過是如此牛津。

總上述四點，我個人對於這兩篇短文的意見，都不敢

苟同。而後臣等所指示我國對日應取的態度和途徑，尤所反對。最後希望我國各大學的那賢明的青年，不要像牛津

大學的學生樣糊裏糊塗，漫無目的，與定見，說幾句出風頭的話，取快一時，出爾反爾，有害國家，無補實際。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信心，我們應該先愛我們自己的國家

大學的學生樣糊裏糊塗，漫無目的，與定見，說幾句出風頭的話，取快一時，出爾反爾，有害國家，無補實際。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信心，我們應該先愛我們自己的國家

，我們更應該臥薪嘗膽，報復我們的敵人。這是我所希望於我們中華民國那賢明的青年的。

劉成於青島大學
二二，十一，二。

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信心，我們應該先愛我們自己的國家

☆ ☆ ☆

更正

記者先生：第六十四期拙作「中國的雜誌界」一文，

號，謹此更正，順頌

內有「心理研究所似乎還沒有出過甚麼刊物」一語。

公綏

頃接該所鄧振甫君來函云，該所已出專刊四號叢刊二

畢樹棠十，廿四。

◎本社啟事

獨立評論自第七十六期起復由胡適之先生擔任編輯。他的通信住址是：北平米糧庫四號。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關「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	朝鮮	每月一元	國內	每月一元
租地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	澳門	每月一元
倫敦	每月一元	上海	每月一元	天津	每月一元
南洋	每月一元	歐美	每月一元	四角	每月一元

◎獨立評論社啟事

獨立評論自第七十六期起復由胡適之先生擔任編輯。他的通信住址是：北平米糧庫四號。

建國問題引論

胡適

前幾天，孟心史先生來談，他說：「現在人人都說中國應該現代化，究竟什麼叫做『現代化』？」我們談論之後，他回去就寫了一篇很有風趣又很有見地的長文，題為「現代化與先務急」。（登在本期）他嫌「現代化」太籠統，不如中國老話「當務之為急」。他引孟子的話「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說「急先務」就是「自審於國之所當行者即行之」。他說，用「急先務」作標準，「則先決之問題亦必即為所急之先務矣」。

「現代化」的問題，在本年七月的申報月刊上會有很多位學者參加討論，論文有二十六篇之多，文字約有十萬字。我們讀了這二十六篇現代化的討論，真不免要和孟先生表同情：這些論文好像是彼此互相打消，一方面說，「

使中國現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個地實行社會主義的統制經濟和集體生產」（羅吟圃先生的論文，頁三三）；一方面也有人說「中國生產之現代化應採個人主義」，「欲使中國現代化，以採用私人資本主義為宜」（唐慶增先生的論文，頁六二）；同時又有人說，「中國不是單純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不需要社會主義革命；牠也不是單純的封建主義社會，所以不需要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化；牠僅是介於兩者中間的複式社會，很可以而且需要採取非資本主義的路線」（董之學先生的論文，頁五八）。我們看了這十萬字的討論，真有點像戲台上的潘老夫說的，「你說了，我更糊塗了」。這種討論所以沒有結果，正因為一說到「現代化」，我們不能不先問問「現代」是什麼，我們要化成那

一種現代？這就是孟先生說的：「必有一形成之現代，而後從而化之」。那個「形成的現代」是什麼呢？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歐美是不是已够不上「現代」的尊稱了？一九一七年以來的蘇俄是不是「形成了的現代」呢？

在申報月刊的討論上，又有吳澤霖先生的論文（頁九），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問題發生根本的疑問。他說：

文化是一個錯誤嘗試的過程，中古式的文化當然是走錯的歧路，「現代」式的文化也未免不是一條塞底的胡同。人類真正的出路，現在正還在摸索着。

但他又說：

我們以為中國現在所迫切需要的，不是已告失敗的現代化，乃是正在萌芽的社會化。現代的物質文明當然為這種新文化所擁護而維持的；現代的精神變性 (Spiritual Barbarism) 却是牠改造的目標。在物質生活方面，當然仍舊儘量應用科學，牠更將進一步的把科學加以人化 (Humanization)。

如此說來，我們此時還沒有法子尋得一個「形成之現代」做我們現代化的目標。我們至多只能指着一個「正在萌芽的社會化」做我們的理想境界。

這種遲疑，這種種的矛盾，都是歷史演變的結果。在

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對於所謂「新」，決沒有我們今日這樣的遲疑與矛盾。當日雖然也有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爭論，但在他們的想像中的西洋文明，却沒有多大的疑義。試讀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說」，他那樣熱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獨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險，進步，尚武，愛國，權利思想，……無一項不是那十九世紀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最自誇的德性。那時代的中國智識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當時的智識領袖對於西洋文明的認識本來還沒有多大異義，所以當時能有梁先生那樣熱烈的，專一的信仰崇拜。然而在西洋各國，早已有懷疑的呼聲起來了。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運動早已起于歐洲，那十八十九兩世紀的個人主義的風氣早已招致很嚴厲的批評了。梁啟超先生還不會受到此種及個人主義的熏染，另一位中國領袖孫中山先生却已從亨利喬治 (Henry George) 的著作裏得着此種社會化的理論了。歐戰以後，蘇俄的共產革命震動了全世界人的視聽；最近十年中蘇俄建設的成績更引起了全世界人的注意。於是馬克思列寧一派的思想就成了世間

最新鮮動人的思潮，其結果就成了「一切價值的重行估定」：個人主義的光芒遠不如社會主義的光耀動人了；個人財產神聖的理論遠不如共產及計畫經濟的時髦了；世界企羨的英國議會政治也被詆毀為資本主義的副產制度了。凡是維多利亞時代最誇耀的西歐文明，在這種新估計裏，都變成了犯罪的，帶血腥的污玷了。因為西洋文明本身的估價已有了絕不同的看法，所以「新」與「現代」也就都成了爭論的問題了。中國的多數青年，本來就不會領會得十九世紀西洋文明有什麼永久的價值：現在聽見西方有人出頭攻擊西歐文明，而且攻擊的論調又恰恰投合中國向來重農抑商的傳統思想，不知不覺之中，最容易囫圇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國青年人的議論就幾乎全傾向于抹煞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蘇俄的偉大的，堅苦卓絕的大試驗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聲之犬的嫌疑，因為他們絕不曾夢想到西歐文明與美國文明是什麼樣子。然而無論如何，中國人經過了這十五年的思想上的大變化，文化評判上的大翻案，再也不會回到新民主報時代那樣無異議的歌頌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洋文明了。今日國內人士對於「現代化」的遲疑與矛盾，都只是這十幾年來文化翻案的當然結果。

我們要的現代文化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在今日已成了一個很不容易解答的了。因此，「現代化」差不多只是一種很廣泛的空談，至今還沒有確定的界說。既不能明定現代的目標，自然不能有一致的步驟與程序。不但如此，大家對於「現代」的見解，顯然有相背馳的，所以不但不能一致協力，還有彼此互相銷滅的浪費。若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西洋文明都不足取法，那麼，這幾十年的一點點改革工作，都不值得我們的留戀，也許都得一把劫火毀滅了才快一部分人的心願。若私家的工商業都不應該存在，那麼，中國的生產事業都只好停頓下來，靜候中國的列寧與斯塔林的出現。若近二十年的「文化運動」都只是如陳高備先生（上述申報月刊頁五〇—五一）說的「西洋近代的資本主義文化」，那麼，我們的教育學術也都得根本打倒，恭候那貨真價實的真正現代文化的來臨。——更可憐的，是近年許多青年人與中年人「本其所信，埋頭苦幹」，而因為目的不同，方向背馳，所以有互相壓迫，互相殘殺的慘酷行爲。今日國中各地的殺氣騰騰，豈不是幾種不相容的主義在那兒火併？同是要把國家社會做到各人所信爲「現代化」的地位，結果竟至於相仇殺，相屠相滅，這豈不是今日最可痛心的一件事！

怪不得孟心史先生要提出抗議了。他說：「不要再亂談現代化了！我們應該大家平心靜氣商量出什麼是今日的當務之急。」

然而「當務之急」也是一個相對的觀念，也可以引起無窮的紛爭。孟先生的辦法是：

取現代已有之成法，聚深通世界國情政情之士，條列其可以移用於吾國者，與不必移用於吾國者，質諸當局，證之國論，又加審量其間，而後定其孰為最急之先務。既定之後，即為吾國當務之急。

這個辦法也是不容易施行的。因為「何者可移用於吾國」，和「孰為最急之先務」，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也都依靠各人的社會政治思想。唐慶增先生說私人資本主義適宜於中國的生產；羅吟圃先生必定說「在中國目下的現況，無論從那一方面觀察起來，經濟上的個人主義是萬萬行不得的。」在這種歧異不相容的意見之下，誰配做最終的判決人呢？至於何者為先務也必有同樣的歧異。一部分人必要先打倒帝國主義，一部分人必說先須剿共，另一部分人必要先推國民黨的政權。也許有人要先從教育下手，也許有不少的人要先買飛機重炮。也許還有不少的人（如今日廣東的領袖）要先讀孟先生說的六經四子！孟心史先生懸想

的國是會議或先務會議，依我看來，必至於鬧到全武行對打而散。所以「急先務」好像是比那廣泛的「現代化」簡明多了，然而到底還不能免於紛歧與爭執。何者為先務，與何者為現代，同樣的不容易決定。

我個人近年常常想過，我們這幾十年的革新工作，無論是緩和的改良運動，或是急進的革命工作，都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太偏重主義，而忽略了用主義來幫助解決的問題。主義起於問題，而迷信主義的人往往只記得主義而忘了問題。「現代化」也只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明白說法應該是這樣的：「怎樣解決中國的種種困難，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裏可以立脚，可以安穩過日子。」中國的現代化只是怎樣建設起一個站得住的中國，使她在這個現代世界裏可以佔一個安全平等的地位。問題在於建立中國，不在於建立某種主義。一切主義都只是一些湯頭歌訣，他們的用處只在於供醫生的參考採擇，可以在某種症候之下醫治病人的某種苦痛。醫生不可只記得湯頭歌訣，而忘了病人的苦痛；我們也不可只記得主義，而忘了我們要用主義來救治建立的祖國。

我們都應該回頭去想想，革命是為什麼？豈不是爲了要建立一個更好的中國？立政府是爲什麼？豈不是爲了要

做這建國的事業？練兵是爲什麼？豈不是爲了要捍衛這個國家？現代化是爲什麼？豈不是爲了要使這個國家能站在這個現代世界裏？——這一切的工作，本來都只是爲了要建立一個更滿人意的國家。

這個大問題不是一個主義就可以解決的，也不是短時期就能解決的。這件建國的工作是一件極鉅大，極困難，極複雜的工作。在這件大工作的歷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學問知識，一切理論主義，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參考採擇的作用。譬如建築一所大廈，凡可以應用的材料，不管他來自何方，都可以採用；凡可以供用的匠人，不管他掛着什麼字號招牌，都可以僱用。然而我們不要忘了問題是造這大廈。若大家忘了本題，鋤頭同鋸子打架，木匠同石匠爭風，大理石同花崗石火併，這大廈就造不成了。

現在的社會思想家，大都沒有認識這個當前問題。他們忘了這是一個絕頂繁難的大問題，其中包含着無數的專門技術問題。他們把牠錯看作一個鋤頭或鋸子的小問題了。（上述申報月刊的現代化討論，差不多完全把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完全看作生產的問題。）歐洲人的國家，根本就沒有這個建立國家的大問題，因爲他們的國家都是早已成立的了。因此他們能有餘力來討論他們的社會問題，生

產問題，分配問題等等。然而在我們這國內，國家還不成個國家，政府還不成個政府；好像一個破帳篷在狂風暴雨裏，擋不得風，遮不得雨；這時候我們那裏配談什麼生產分配制度的根本改造！

我不是說生產分配等等問題是小問題。我只是說，在中國的現狀之下，國家生存的問題沒有辦法之前，那些問題都無法解決。例如土地問題豈不重要，然而在江西湖北國軍赤軍連年作戰的狀態之下，土地問題是否能有意義的解決？一切赤區的土地新支配，是否於人民有多大實惠？這種支配的辦法是否值得這連年血戰的犧牲的代價？一方面是少數人抱着某種社會經濟的主張，就去幹武裝的革命；一方面是當國的政府爲了自衛起見，也就不惜積聚全國的精銳兵力去圍剿。結果是人民受征戰的大禍，國家蒙危亡的危險；政府所轄區域內的積極政治無一可辦，而赤區內的社會問題又豈能在這種苦戰的狀態之下得着永久的解決了嗎？

近兩年的國難，似乎應該可以提醒一般人的迷夢了。今日當前的大問題依舊是建立國家的問題；國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衛國家的能力，其他的社會經濟問題也許有漸漸救濟解決的辦法。國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

步，外患侵入之後，一切社會革命的試驗也只能和現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敵人鐵蹄的蹂躪，決不會有中國亡了或殘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區域可以倖免的。

所以我們提議：大家應該用全副心思才力來想想我們當前的根本問題，就是怎樣建立起一個可以生存于世間的國家的問題。這問題不完全是「師法外國」的問題，因為我們一面參考外國的制度方法，一面也許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幾千年歷史裏得着一點有用的教訓。這問題也不完全是「必有一形成之現代，而後從而化之」的問題，因為一來此時的世界正在演變之中，無有一個已形成的現代；二來

現代化與先務急

孟 森

我們的病狀太危險，底子太虛弱，恐怕還沒有急驟追隨世界先進國家的能力。這問題也不是一個「急先務」的問題，因為這個國家滿身是病痛，醫頭固是先務，醫腳也是先務；與利固是先務，除弊也是先務；外交固是先務，內政更是先務；學術研究固是先務，整頓招商局也是先務。

我前幾年曾說過：我們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那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不斷的改革之全功。

我們此後想把我們對這個建國問題的各方面的思考的結果，隨時陸續寫出來，請關心這問題的人時時指教匡正

今之持國論者，以現代化爲最明達之一流。一日，胡

適之先生新自美洲回，予就談此行觀感，因叩之曰：『現

代化有無界說？所謂現代國家，蓋有三種：（一）資本主

義國家，學者間以爲過時之物，而權威尙爲最盛。（二）

共產主義國家，慕之則尊如帝天，畏之則避如蛇蝎。（三）

法西斯蒂主義國家，推翻民主合議等資本主義科律，嚴

禁階級鬭爭等共產主義方式，似乎執其中矣。而又爲國論

之所讎疾；往往詆一人則曰此法西斯蒂也。於是在國內之

所形成，凡傾向資本主義者，以封建思想論，一大罪也。

凡傾向共產主義者，以殺人放火論，一大罪也。凡凡傾向

法西斯蒂主義者，以國家主義派論，其罪爲黨外有黨，則

又一大罪也。然則現代無一可化也。』適之曰：『現代化

者，化其爲用科學施之於一切，而以發達工藝增加生產爲

明效大驗。無論何種主義國家，無不同向此點。吾輩所謂

現代化，乃持此議。於世界之所謂某主義某主義，可以不論也。』

予以爲此在野者之憂國，本不主持國是者之言論也。

若有主持國是之責，則現代化之中，必含有主義在內。國民政府之起也，所鄭重自標者曰：『以有主義，勝無主義』。及今而曰現代化，則以追隨現代爲主義以外之主義，是即示人以無主義而後可也。則又曰，現代化本非用現代之任何主義。若論主義，則自有三民主義在，乃超乎現代主義之上，而爲國定之主義者也。夫三民主義者何？一曰民族主義。昔時以排滿而革命，故以民族爲主義；滿既排矣，猶持此爲主義，則是滿之求庇異國，蒙之自組政府，藏之因隔絕而漸脫離，回之被窺伺而難控制，過問爲是乎？則似非民族主義也。然必不以不過向爲是。是民族主義已移步換形。昔之民族主義，爲民族各爭自由；今之民族主義，爲民族務求融合。是國將有新民族主義，而無奈叛國或準叛國與不得志於國者，方各持舊民族主義以相抗也。總之，民族主義乃種族受人壓迫時之表示。既已脫離他族之壓迫，又不欲以壓迫他族自居，則與其言民族主義，不如不言之爲愈也。夫言民族，則民之感覺不同，猶有煩吾人商榷之餘地。若民之有權與有生，則民自知之，吾可以不必言也。謂民無權，民之中自有有權者。謂民日促

其生，民之中亦自有尙厚其生者。此可云代表之民權民生，乃間接之民權民生，非直接之民權民生。所謂主義者是否如是，且勿斷言。惟民族主義則斷乎已爲時代性之所限，今日欲仍稱三民，則爲矛盾。欲竟稱三民，則又滑稽。然則內國主義爲名不副實之裝飾品，外國主義又爲國論所悉數反對。是真如適之之言，不論主義，惟以現代化爲主義以外之主義，而後可也。然而主國是者則必不能爾也。即以現代化字面而論，必有一形成之現代，而後從而化之。則由此一面言之，由現代化之文體言之，謂之現代化。由彼一面言之，由非現代化之文義言之，謂之師法外國。夫以師法外國言國是，國之人已有異同之論。無論頑舊之人不謂然，即現代化之人，亦曰一國自有國情國故國俗等等，不能即以違國情背國故異國俗之他國政法蒙之，他國人物主之。然則現代化三字，未免籠統。惟現代化之文字，乃謂之『現代化』。其中若分析何者當化，何者不必化，何者不可化，則『現代化』一名不能包括。非現代化之文字，謂之『當務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徧物者，籠統之謂也。現代化者，籠統也，即徧物也。主國是者，自審於國之所當行者即行之，則急先務也，非現代化也。急先務，則師法外國，而不爲舍己田

他人田；聘外國人，亦不爲太阿倒持。國論本不以發達生產爲非，似非現代化者獨具先知先覺之聖。若其求發達而卒不發達，則國是不定之罪，不現代化者固與現代化者，同一束手無策也。

抑又有一現代化之語曰，『先決問題』。先決問題云者，似在科學管理及發達生產之先，非解決不可之謂。俄之五年計畫，其主者生活在丁人之下。在持現代化者果先持此義否？以我觀之，醉心於物質文明，不以加人民之負擔爲疚心，曰民本不應無代價而獲福利也。代價去矣，福利何在？此時仍不疚心，則曰吾自以謀福利而徵代價，其不如吾之所謀，則環境爲之，非吾本意。非吾本意則吾可以告無罪也。此則現代化之政家之態度也。若彼不現代化之政家，則流離破敗之後，惟有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與國之人同甘苦；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則傳聞俄共產政府之主者所謂享用在丁人以下之真諦也。告政家曰，『汝學衛文公，汝學范希文』，此得爲現代化否？惟彼共產政府之主者，則不惜開倒車而爲我知不現代化之人之所爲也。言現代化者爲科學管理及發達生產束縛其定義，不復及超定義之道德操守事項。非不以爲意也，亦曰此不言現代化而已可返求而得，不在我定義之

範圍內也。然或者又有『先決問題』之說，則無乃定義爲現代化，惟『急先務』乃可并包此先決問題乎？

又如『足食足兵』，此不悖乎現代化之語也。曰，必不得已而去，則首先去兵，其次去食；去食則死，死爲自古所皆有，而信則終不可去。此或非現代化之語矣。然試問現代化之國有不欲得其國人之信任者否？能現代化之國，有未嘗先得其大多數國民之信任者否？然則信不可去，似亦未嘗非現代化。惟謂兵可去，食可去，則必爲大反乎現代化者。然今以爲兵不可去，此兵之一名，謂對外之兵耶，抑對內之兵耶？對外之兵，事實上早去之矣。所不可去者對內之兵耳。然而鼓吹盲從，激蕩血氣之勇，以踴躍增加不可對外之武力，豈不號於衆曰，『所屈於強敵者，以武力不如人之故』？然國民之中，除募汗血之金錢，以賣奉湯玉麟之流者外，率不信武力之用，果在對外面非對內也。自古惟對內而需用武力，爲決不可去之兵。若對外則去兵之先例多矣。小國以無兵立國，猶曰吾國非其比也。美國若非以資本主義之過於現代化，致不能爭市場於國外，則當其采門羅主義以前，固以無兵爲國也。弱國而養不對外之兵，以武力壓我者固明知之而姑聽之。若德之於歐洲深諳言兵而忌者猶日日猜防之。苦作航空宣傳，售飛機獎券，不知國際相待如何矣。夫德而尊守條約，則亦去兵

之先例也。是首先去兵，非不現代化之說也。借對外之兵以充對內之兵，非現代化之所有也。至食不可去，而去食則爲吾國之事實。征戰去之，捐稅去之，種烟去之，匪盜去之，時賢之論著，已見者不少，未來者必尙多。海關糧食進口之冊，尤足證明。惟昔時言去食者，尙曰必不得已去；今之去食原因，果盡非不得已而巳否？此則不能無疑之事。然而去兵去食，總之爲事之所已行，而據現時之國論，則奮興於足兵者第一，呼籲於足食者第二。而民信則對民者自謀之，民則因其可信而加倍，處於被動之列。且民之數甚多，我特一民，不敢言其置信之程度如何也。但覺其可去之程度，在兵與食之上，則非現代化者，信條與此相反，即現代化者如上文所舉，似亦未嘗相反也。若不籠統於現代化之下，一一問何者爲先務之急，則或者有一討論之餘地矣。

綜而論之，國是之爲國是，有超乎現代化與不現代化之上者，謂之『先決問題』，則專言『現代化』，似不足包括；言『急先務』，則先決之問題亦必即爲所急之先務矣。更就現代化與不現代化言之，有實係現代所行，而我國自以國情國故國俗之所限，不欲其籠統變化者；亦有不科學管理發達生產之設爲定義以後，而實爲現代之所必

具之信條者。且此信條，不證諸現代，則闕其所出，皆屬倒車之四子六經，下至君主專制封建思想等時流所唾棄之史乘，苟籠統於『現代化』之下，必須予言者以思想落後之罪。一證諸現代，則又反成先決問題。然則以『急先務』之界說御之，今之謀國者，吾以爲應有兩種不可少之工作：一現代化之選擇；取現代已有之成法，察深通世界國情政情之士，條列其可以移用於吾國者，與不必移用於吾國者，質諸當局，證諸國論，又加審量其間，而後定其孰爲最急之先務；既定以後，即爲吾國當務之急，萬不可再以籠統之『現代化』一名淆亂國是。一先決問題之選擇；四子六經所道之原則，與歷史檔案所懸之成式，其爲組織政府之機關，何以能維風紀，而不至寄政府於京滬火車之上？何以能守信用，而不至置法律對付平民之上？何以能留記視，而不至謂已過之政事常在明日黃花之列？古之謀國，以計及百年爲最短；其所謂計久遠者，是否存乎組織之間，而非空言以侈其億萬年有道之長而已？如果存乎組織之間也，則民國以前之政府大小機關，是否有考其功用之必要？較之現代所設機關，孰爲爲事設官，孰爲爲人謀職，一一比較而當務之急亦見。凡非現代化之界說內所有者，安知不反在先決問題之內？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之文字

具在，然意該而言簡，讀之尙不易覺悟。清代檔案，真爲寶庫，其組織政府之機關，多有不與普通人相接，而人不知其所司何事者；一經檢閱其檔卷，乃知稽察所在，督責所出，恆在此不直接外事之機關。然後返觀史志，乃知其

回到母校去

衡哲

寥寥數語之職掌，正歷代相沿之精意。即證諸現代各國之組織，亦必有同此作用者，而今之政府是否尙不注意及此？應聚能嫻國內故事者標而出之，以大張其組織之能力。此則又爲急先務之要端，而不得以現代化籠統之者也。

回到母校去的一件事，不一定能引起一個人的熱心，因爲在『歸家』一類的快樂感想之中，常不免要夾着一點畏懼；同學們是都已水流雲散了，教授們是死的死走的走了，而剩下的幾位我所認得的教授，容許也已把我忘掉。校內的建築和行政呢，隔了十三四年頭，那還有不改變的道理？似這一類的懷疑與恐懼，常能使一個人對於她別離已久的母校，發生一種離心力，發生一個日漸冷淡的態度。至少這正是我十四年來對於我的母校，瓦沙大學

(Vassar College) 所懷的態度。

今年八月底，我們在加拿大西部的班府城開過太平洋國際學會之後，我便動身到美國的東部去。在動身之前，我曾打了一個電報給瓦沙的三位師長，一定不會把我忘了的師長——馬校長，馬夫人，及講教授——說如他們中間有一

位在學校，我便打算回去看看。馬校長的回電說，『熱誠的歡迎回家來，你來時作我們的客人。』雖然我不知道『我們』兩字所指的，是學校還是他和他的夫人，然這一個消息已足使我十分高興了。

到了紐約之後，方知道學校須到九月廿二方開學。在開學之前，除了校長夫婦之外，是見不到什麼人的，故我便決心待開學後再去。同時，馬校長又打電給我，囑我代他邀請胡適先生去演講。

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午，我與胡先生在車站會齊了，一同乘車到柏城去。火車是沿着赫貞河走的，這路我已不知走過了多少次數，閉了眼睛也能認得！那時正值初秋，對岸山上的秋色，正在欲放未放之間。這熟習的景色，尤其是在西風黃葉學子歸巢的時候，引起了我不不少的『鄉思』

——對於曾在讀書四年的第二故鄉的鄉思。火車走了不到兩個鐘頭，便到了柏城的小車站。那時外面正下著濛濛的細雨，我心中也起了一種細雨似的悲歡，下得車來，看見馬夫人正在找我呢。我們歡欣的握着手，我又把胡先生給馬夫人介紹了，一同坐了她的自開車，逕到瓦沙去。這一條路我也是走慣了的，但不乘那五分錢一次的街車，而乘馬夫人的車子，雖然是一種光寵，于回億的企求上，却又不免缺少了一個滿足。

馬夫人自己是一位高明的畫家，一位多才多藝的優美人品。馬校長初到瓦沙做校長的時候，年紀才三十三歲，長得很漂亮，學問又好。做這樣一位女子大學校長的夫人，誰都能知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馬夫人的謙和與才藝，不但戰勝了這個困難，并且得到了歷來同學們的敬愛。她遇事都站在台後，從來不以自己是校長夫人之故，去參加校長與學生們的會議或聚餐，更不用說其他公務的參加或干涉了。但愈自韜晦者愈明耀，只要她自己有發光之點。她所受到的，是全校尊敬與愛戴的榮寵。

到了學校之後，即同大家到校長室去見校長。他的頭髮已禿了不少，人也比前胖了一點，但丰采言談却仍不減當年。那天校長同我們在大飯廳吃飯，同座的都是本年學

生會中種種事業的職員。我因此知道，學生自治的事業是比了十四年前大不同了，許多從前屬於學校當局的權利及事務，如懲罰犯規學生，書品合作社的經營之類，現在是都已移交與學生會，或改爲師生合作的事業了。學生會的組織，也是根據了美國立國的三權鼎立的原則而成立的，故他亦有一個立法院，一個司法院，叫做法院的，和一個行政機關。據說這個差不多完全自治的特權，如今仍在試驗期中。學校當局每隔二年，給予一次重新的許可。假如他們發見學生會不配負這個重任的時候，他們隨時有收回這個許可的權利。這特權的給予始于一九二四年，今年是學生會得到第四次許可的年代。

吃過中飯之後，馬校長又導胡先生參觀學校，我也隨著同去。新的建築有十幾座之多，而最新式，最美觀，最完備的，却要算是那個音樂院了。此外所到的地方，差不多都是我的舊游之地。在這裏，我曾獨自在寒月之下，灑吊過隔牆的一個公墓；也曾獨自聽過雨後紅胸鳥的鳴叫，和夕陽微風中送來的禮拜堂的鐘韻。有時也曾同著兩位同在異國讀書的朋友們，聽過『冷風怒號，萬松狂嘯』，也曾陪着他們嘗過『寒流禿樹，溪橋人語』的清寒風味。如今荒涼的地方是變爲整齊繁盛的校路了，而十四年前的

青年，也都日征月邁的向著人生的中年大道走去！

本日下午是胡先生給學校講演，大的一個學生廳是都占滿了。馬校長在介紹胡先生之前，先令我對聽衆鞠躬。他說，『今天我們學校回來了一位女兒，我要你們認得她』。他又對我說，『莎菲，站起來，向大家鞠躬吧。』這分明是一位祖母對於她的回家的孫女說話時的口氣，含著的是熱忱與得意。我感動極了。胡先生的演講當然更給了我這一個中國女兒不少的光榮面子。聽完講演之後，便有許多熟識——校內的和本城的——來向我拉手與親頰，表示他們的驚訝與歡迎。

晚上是黨教授的歡迎宴，在席上會見了許多舊教授。有一位叫做維而女士的，年紀比較的輕，面貌又似乎很熟。後來方知道她原來是後我一年卒業的同學。真奇怪，這一來，那教授與學生間的矜持與謹慎便立刻被打破了——我到了校中，總不能不感到自己所處的仍是一個學生的地位，無論教授們對我是怎樣的客氣——於是我們便立刻親熱起來，談了許多做學生時代的情事，交換了許多同學們的消息。晚飯後，胡先生回紐約去了。我也疲倦到了萬分，即由事務處把我送到學校的客房——即是創立人瓦沙先生的客房——去住。這于我真是一個莫大的榮寵與記念。

二十七日一早，校長的秘書羅女士給我送來了一張單子，注明在今明兩天中，我應做的事，應到的茶會及聚餐，和應見的人。這些事有一大半是學校代我決定的，一小半是由我自己指定的。我把單子一看，知道尚有今晚的一餐有自由，便請羅女士給我留下了，預備去還一個古怪的債——去陪一位寂寞得很可憐的老太太吃飯的。

今天的早飯是同校刊的主筆聖佳因女士，和她的朋友們吃的，除去回答她們的問句外，我又反詢了許多學校的新情形，知道（一）現在學校不但允許學生抽烟，并且每個寄宿舍中都有一個抽烟室了。（二）強迫做禮拜是取消了，討厭的『級戒指』也被淘汰掉了。（三）學生間的小團體，比了十四年前增加到一倍以上，而其中尤以政治會為最顯著。這自然是學生自治範圍擴充後的一個必然的景象。

談話之後，休息了一會，便到全校例會中，用談話的方式，對學生們講了一點中國婦女的情形。講畢，便同黨教授及教務長陶女士乘汽車到柏城的公墓，去瞻拜手創瓦沙歷史系的沙門女士之墓。我們各獻了一束鮮花，噴著眼淚，肅穆的在坟前站了一會，方悽然走上汽車，回到了校裏。在這十四年中，我所認識的瓦沙師長們，逝世的亦有

四五位，但最使我感傷的，乃是沙門教授，和威利教授二位。威女士是從前英文系的主任，她對於學生人格與學問的影響，與沙女士的不相上下。她是在去年春間逝世的，但因爲葬在另一個城中，我此次重來，竟連她的墓地也不能一瞻，真是感慨到了萬分。

中飯是同馬校長夫婦在他們家中吃的。一樣的飯廳，一樣的座位，只馬家的三個小孩子都變爲青年了。我們如家人團聚似的，很自由很歡樂的暢談了許多教育問題。馬校長告訴我，從前學校對於學生的個人注意——瓦沙是以這個教育態度著名的——尚只限于智育一方面，現在則已推廣到學生的人格方面了。他又舉了一個例子：在五六年前，學校發見一個學生在室中自縊，他們便把她救活了。依照普通的辦法，把一個人救活之後，當然是把她送到她的家裏去，此後便萬事俱了。但瓦沙却不這樣做。他們認定這種情形，比了讀書不及格還要嚴重，糾正牠乃是教育家的責任。故馬校長，馬夫人，和校中負有訓育之責的人，便把這位女生『拿到他們的手中來』。後來經過了細心的研究和數年的忍耐的指導，這位學生現在是不但及格的畢了業，并且已經走上了一個最健康的人生大道了。我聽了之後，不由得不想到我們中國現代的青年男女。他們一個

個騎着瞎馬走夜路，得不着一點點師長或家長的指導。把他們的處境來與這些美國女兒的比一比，真不能不使人感到人生命運的有幸有不幸了。

馬校長又說，『我們很願與中國的智識界有點合作，但中國學生來的是那樣的少，并且孟何立，威而斯來，及斯密斯(Mt. Holyoke, Wellesley and Smith)的三個女子大學(注一)在中國活動已久，我們即使努力，恐怕也將沒有機會。』我的回答是：瓦沙很少中國女生的緣故，一半是因爲現在的女學生不甚了解專門女子大學的優點，不甚熱心到這一類的學校來，一半也是因爲瓦沙的費用特別浩大，中國人不易負擔。關於與中國智識界合作之事，我的意思是：孟何立等三個學校，雖然久已與中國發生關係，但這關係差不多完全是限于傳教士的世界的。他們並不會把非基督教的，中國固有文化的智識界作爲一個合作的目的，容許他們竟還不會注意到這一點。所以這件事業，至今還是一片荒地，正可以待瓦沙去開墾呢。

那天與馬校長整整談了兩小時，知道了這十幾年來瓦沙的許多改革，但因讀者們不知本校的背景，聽來也難感到興趣，故現在單擇幾件比較有普通教育興趣的說一說。瓦沙第一件引起美國人士注意的新事業，是一個優行

學研究所 Institute of Euthenics (注二) 的創立。這是專門研究人與人之間的康健關係的，尤其是家庭中親子之間的問題，和兒童心理及訓育的研究；此外如營養問題，治家問題等，也在牠的研究範圍之內。牠的性質，與中國儒家所標舉的修身齊家的意義，有點相仿，雖然要比後者現代化與科學化得多。牠和學校中各門各系有一個根本上的不同，那便是，牠不是專為本校學生設立的，雖然本校學生有加入研究特權。凡是具有相當條件的人，無論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加入這個研究部。牠是教育界的一個新試驗，而瓦沙大學却不但是牠的首創者，并且至今還是這個試驗的領袖。

第二件新事業，也是與這個優行學有密切關係的，牠可以說是優行學的一種實行。牠是今年成立的一個新組織，叫做『寄宿部』(Board of Residents) 的。牠的部員是各宿舍中的訓育教員們，牠的精神是師生合作，而牠的大目的，乃是在人格的訓育與智識的啓發之間，創立一個密切的關係與合作。因此，每一位寄宿者的責任，不僅僅在指導學生的行動；并且每個學生的人格，智識才能，習慣，康健，等等，都須受到這些住校教員的分析研究，作為教授們授課的根據。這是這個新組織的第一個目標。牠的

第二個目標，似乎是補救學生近年來所得到的多量的自由與自治權。因為在表面上看來，學生的自由自然是比從前加添得多了——如抽煙，星期末的跳舞等——但學校當局却並不會放棄了他們指導學生的天職。不但不能放棄，正因為他們給予了學生這許多的自由和自治特權，他們覺得指導的責任比從前更為嚴重。不過從前的所謂指導，是學校立于施令的地位，學生則是俯首受命的，現在却是兩方面立於平等的地位來合作，雖然學校仍免不了要居于大姊姊的地位。這個情形，在舍監部的變為宿舍部的一事上，便可以看得很明白。從前的舍監，是每舍一位；她們的職權，是代學校施放命令。現在她們是單管一些瑣屑的學生社交事務了，並且人數也由七位減到了『一尊』。而上面所說的『宿舍部』，則不但代替了她們的地位，并且命令也完全變為合作，責任也一直擴充到課室的門外了。因為有了這樣一個積極的學校的指導與合作為背景，學生的自由與自治方能向着那美麗平坦的道路走去。

第三件新事業——或可說是新規則——是剛在我離校那年設立的，那便是，一個學生的功課，無論怎樣的好，假使她不能獨自游泳五十碼，以及使用兩種姿勢，她仍將得不到着瓦沙的文憑。

第四件顯見與前不同的情形，是各教授薪水的加增。有許多從前每年三千金元的教授，如今都改爲六千金元了。馬校長說，瓦沙有一件幸事，即是至今尙不曾受到經濟上的困難，故許多事業他都可以放手做去。他又告我；因學校費用太大，故當局已指定兩個半宿舍，作爲自助學生的試驗所。學生靠了自己做工，每年可以節省二十五元至一百五十元的費用，看所做之工的多少輕重而定。這當然也是美國經費恐慌後的一個現象。

我們一面談着，一面又由馬校長開車，同馬夫人和我到莫亨湖去游覽，這是赫貞江上的一個名勝，從前我也曾去過一次。那裏山高霜重，紅葉已是很燦爛了。我們折了一大把紅黃的葉子，方慢慢的回到了校裏。我與馬校長夫婦道謝作別後，馬校長又把我叫住，說，「你今天下了一個好種子，在肥土上，我們看着發芽吧！」他所指的，是我們談的瓦沙與中國智識界合作之事。

二十八日是我留校的最後一天。那天看了四個課室，每次都爲那一課的學生談了二三十分鐘的話，這四課之中，倒有三處是我從前受課地方，教授與課目也沒有多大的改變。我看着他們給學生分配工作，坐在我原來的座位上——那是我的教授們特意叫我這樣的——那少年時代的無憂生

活便猛然的閃到眼前，撞到心上，使我忍不住一陣心酸，熱淚幾乎奪眶而出。下午我獨自僱了一輛汽車，去訪問了五六位教授們；又到了兩個茶會，看了一會圖書館中的新建設。晚飯是在城中的一位老友家吃的。因爲馬校長夫婦定要我再回去談談，故晚飯之後，仍舊回到了校長的家裏，暢談了一小時。

那晚我乘的火車，是在紐約到加拿大的總線上，但柏城不過是一個所謂旗站，要有人搖着旗，車子方停。不過紐約已經有電話來，說過今晚有一個客人要在此上車，故馬校長夫婦送我到車站的時候，站中的人已經預備好了。到得車站，又見講教授和圖書館的主任包登女士在那裏等着。我們立着談了十多分鐘的話，看看離火車來到之時，尚有二十餘分鐘，我便堅請她們和馬校長夫婦回去。他們最後的一句話，是，「下次不許這樣的淘氣，隔了這許多年再回來！」

那時已是中夜了。小車站中空寂不見一人，除了一立脚夫，和一個票房的同事。我不能再靜坐了，站起來，跟着脚夫到月台上去等車子。脚夫推着放置我行李的手車，很不願意的說道，「在這個時候，從這裏上車的人，一個月不過有一二次。」我給了他半塊金元，說，「真過意不

去，不過我要回到中國去呀！」他把錢放到了口袋中，神色便和氣多了，說，『呵！你是來玩的？』我說，『是來看看我的母校的。』他說，『呵！原來也是瓦沙的姑娘。』

這個淒涼景地了。

二十二，十一，十三。回國半月後補作。

那裏開學了嗎？火車每天都帶來不少的年輕姑娘呢。』我再擡頭一看，只見半圓的新月，已經掛到西方天上了。牠正照着一個萬里長征的孤客，在一個冷暗的車站上。要不是靠了這三日來母校所給予我的溫情與熱愛，把我的心保護著，使牠沉醉在一個美麗的感情世界中，我真將受不住

(注一)這三個女子大學，加上瓦沙和勃利麻(Bryn Mawr)，是美國東方，也是美國全國的最著名的專門女子大學。

(注二)這是我試譯的一個名辭。假如 Luthenics 這字有比『優行』更恰當的譯名，我願意取消這一個。

獨立評論社啓事

本刊第五一號至七十五號目錄現已印好，凡定閱本刊者，隨本期附贈。函索附郵票一分。

◎獨立評論社啓事

我們歡迎各地讀者的投稿。投稿者若不願用真姓名，當然可以用筆名。但筆名之外，投稿者務必把真姓名和住址告知本社。凡只有筆名而無真姓名住址的文字，恕不登載。

我們這個刊物是十幾個書生捐錢捐力氣合辦的；我們至今還沒有酬報投稿人的能力，所以只能送贈本刊若干冊作爲一點點報酬。凡投稿人願意本社贈送本人或他的朋友的，請告知本社。

社會調查所出版 社會科學雜誌

主撰者：陶孟和
曾炳鈞

第四卷 第三期
要目

- 華北鐵路工人工資統計.....劉心銓
- 民國二十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性質和趨勢 陳君慧 蔡謙
- 關於「安國縣樂市調查」.....鄭合成
- 書籍評論.....曲直生等

本刊價目
於出版者，以一角以下，實費在內。郵票代洋按九五折為限。

本卷每卷四期，每月一冊，全年四冊。定價洋六角，郵費在內。零售每冊洋二角，郵費在內。按九五折為限。

社會調查所發行
北平西安門內文津街三號

外交 評論

第二卷第十一期

- 日人在滬建築兵營與外國駐軍問題.....徐公肅
- 悼英國前外相葛雷爵士.....湯中
- 外交人才之訓練與培養.....徐景微
- 德國退出國際聯盟之原因及影響.....袁道豐
- 新疆之民族問題及國際關係.....凌純聲
- 國聯與各國技術合作之一般先例.....王德輝
- 加拿大華僑待遇改良問題.....蕭作梁
- 「老虎」總理克勒孟梭.....昌霞
- 古巴初次亂事之前因後果.....趙迦德

美國承認蘇俄問題之研究.....陶懋

廣田外交之檢討.....南斧

法人侵略果亞之造去與現在.....仲斧

禁版成年婦女議定書草案.....編者

書報介紹與批評.....頭泉

定價：每冊四角全年十二冊連郵四元半年六冊連郵二元二角

出版：南京外交評論社

發行：上海黎明書局

經濟 統計 季刊

第二卷第二期

要目

- 中國貨幣考田.....袁賢能
- 金銀本位國間金銀貨流動的原則反
- 金銀貨流動的解釋.....吳大業
- 中國棉紡織業之製造及銷售.....方顯廷
- 民國二十一年之中國生活費指數及零售
- 物價.....編者
- 二十二年一月至三月中國經濟概況述要.....編者

天津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出版

每季零售一元
壹角
壹元
全年四元
共四元

世界新形勢裏的中國外交方針

胡適

湖南教育一瞥

傅任敢

民族學材料的利用及誤用

吳景超

統計學的治學途徑和

「高級統計學」

林伯遵

答劉咸先生

俊臣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王府井 民智書局 良友	公司 立新書局(代定) 米市	街 新月書店(代定) 四單	平 和書社 嘉陵書社 華	中 華書社 青年書社 華	社 增時 華書社 長光書	社 增時 華書社 長光書	廠 甸 神州國光社 星雲	永 沙 燕大 德信	清 華 滄 燕大 燕昌	天 津 華 滄 燕大 燕昌	成 府 滄 燕大 燕昌	大 學 滄 燕大 燕昌	局 滄 燕大 燕昌	現 代 滄 燕大 燕昌	定 處 滄 燕大 燕昌	書 館 滄 燕大 燕昌	新 華 滄 燕大 燕昌	真 華 滄 燕大 燕昌	南 京 滄 燕大 燕昌	鎮 江 滄 燕大 燕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獨立評論

第七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廿六日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 金城

開明書店 原美善 胡正

新華書局(代定) 胡正

廣州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汕頭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興寧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梅縣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瓊州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桂林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濟南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青島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威海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臨沂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安東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蘇州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無錫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常州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南通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揚州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杭州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福州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廈門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衡州 廣南書局 現代書局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十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

價	甲種(布裝)	乙種(布裝)	丙種(紙裝)
郵費一角	一元八角	一元六角	一元二角
郵費一角		郵費一角	郵費八分

世界新形勢裏的中國外交方針

胡適

自從華北停戰以後，國內國外都有一種揣測，說中國

的外交政策要根本改變了，改變的方向是拋棄歐美的路，重叩日本的門。外長羅文幹的辭職，汪精衛的暫代外交，唐有壬的外部次長，黃郛的回任，華北的中日合作剿匪，

繼續担任全國經濟會議的常委，並且負責辦公了，此種猜疑稍稍減除了一點。然而華北外交的喧傳，岡村與有吉的往來，都還使國內外的人對於中國政府的外交方針不免有很大的疑慮。

以至近日喧傳的接收長城各口，長城設稅關，北寧路通車出關，通郵問題，——這些事都幫助造成國內外的風說。日本的方面自然盡力宣傳中日兩國有接近的可能。日本用威嚇和利誘兩種方式來促進他們所謂中日的接近。威嚇如東京對宋子文的國聯技術合作計畫的警告，利誘如長城各口的退出，如通車設關的引誘。最近財長宋子文辭職，西洋

我們的報紙的議論都說這是和中國外交政策的改變有關係的。他們自然疑心宋子文的辭職是日本的勝利。後來宋子文

我們深信今日當國的人沒有一個敢拋棄「不承認滿洲偽國」的主張的。但同時我們也感覺政府好像沒有何種積極的外交政策或方針，只有一種消極的招架應付。因為國內國外的人只看見那枝枝節節的應付，而不看見什麼積極的政策，所以有種種揣測。這種現象只是一種飄泊，隨波逐流的混日子。在這個嚴重的世界局勢裏，這樣的飄泊是很危險的。詩人陸放翁曾有這樣的警告：

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

譬如東周亡，豈復須大疾？

今日的外交，關係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豈可讓他隨波逐流的飄泊？人說「弱國無外交」，這是大錯。因為國弱，所以更需要外交。外交不僅是應付目前，是要把眼光放的遠一點，認清國際的趨勢，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的朋友和敵人，並且努力增加朋友，減除敵人。現在的飄泊的局面裏，朋友和敵人竟纏不清了。在華北和我們「合作」剿匪的，是朋友呢？是敵人呢？在日內瓦發出通告請各國政府拒絕承認「滿洲國」的，是朋友呢？是敵人呢？如果前者是朋友，那麼，後者的舉動使我們不得自由承認偽國，豈不成了我們的敵人了嗎？

我們承認華北有許多問題都是不能不應付的；我們也承認：政府若在不承認偽國的基本條件之下做到一些局部問題的解決，也許是可以得着國民與世界的諒解的。我們所慮的是，政府與國民只顧得應付日本，敷衍日本，而忘記了我們在世界局勢裏的地位與責任。對付華北的局面，不過是外交問題的一個部分，決不是外交的全部。日本之外還有蘇俄，還有歐美，還有個整個的世界。目前的局部問題之外，還有個中國整個問題，還有個國家民族要在世間和頭見人等問題，還有個中國的前途的問題。

我們一班朋友在這一一年之內，曾屢次說過：中國目前外交的方針應當是：不可放棄國聯與國際，也不必與日本衝突或決裂。（本刊六十六號，君衡的「中央外交方針如何轉變」）現在的情形好像是只想做到不同日本衝突就可以過日子了，而不復顧到那國聯與國際的一條路。一些無遠慮的人的心理只覺得，國聯與國際既然無力制裁日本，我們又何必去拉攏他們呢？況且日本曾屢次表示反對中國勾結歐美國聯的外交，我們既要避免對日本的衝突，何必又去挑日本的惡感呢？——這種心理最足以害事誤國。日本軍閥的慾望是不能滿足的：把整個的中國做他們的保護國，他們也不會滿足的。一個國家的生存自不能依靠一個狼貪虎噬的強隣，何況這個強隣的橫暴行爲又正在替他自己樹立四圍的仇敵，替他自己掘墳墓呢？

無論在平時或在急難時，中國的外交必須顧到四條路線：一是日本，二是蘇俄，三是美國，四是國聯（代表西歐和英帝國）。最上策是全顧到這四線；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要顧到四線中的三線。民國十五六年的外交，鮑洛廷的本意還是近交遠攻，專攻英帝國，而一面親俄，一面敷衍日本而忽略美國。但野火易放而難收，後來竟成了一個「只有敵人而無與國」的孤立局面。民國十八年以後，世

界經濟蕭條，歐美自顧不暇，不能過問遠東的形勢了。我們自己還不覺悟這個孤立局面的危險，以為英帝國尚可軟化，何況其他國家。九一八事變之初，世界各大國都沒有中國的公使，只剩一個施肇基在日內瓦唱獨腳戲！政府裏也只有一个宋子文在北極圈上支撐那危迫的局面！兩年以來，外交方面的成績在於抓住了國聯與美國兩綫，後來又修復了蘇俄的一綫。在事實上雖然沒有多大的挽救，但在精神上却可說是有了很大的成功，就是使中國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大問題，使中國得着世界的文明國家的道德的援助，使我們的敵人成爲整個文明世界的道德貶譏之下的罪人。這雖然是日本軍人努力暴行的結果，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宋子文羅文幹以及施顏顧郭諸位先生奮鬥的成績。

但這兩年的外交成績是很可以在短時期中消滅的。世界對我們表同情，我們自己總要值得人家的同情才好。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決不能在我們的強隣手下討生活；即使那位強隣真肯讓我們過日子，那種日子也不是好過的日子。我們的將來又決不能全靠我們自己的武力，因為時間太晚了，無論如何我們總趕不上武力立國的路了。我們的將來必須倚靠一個比較近於人類理性的國際組織，使強者不輕易侵暴弱者，使弱者也可以抬頭講理，安穩過活。我們

的強隣的暴行，使這種理想境界要展遲出現多少年。但我們不能不認清楚，這個理想境界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也許日本的暴行更可以促進牠的實現。因為那強暴的「王道」「皇道」如果水久勝利下去，不但我們沒有好日子過，這世界也沒有好日子過！我們不看見國聯的許多小國家的義憤嗎？我們不看見美國與國聯的合作嗎？我們不看見最近蘇俄與美國的攜手嗎？

我們對於這個將來的近於理想的世界，雖然不能太樂觀，但也不可抱着一點信心。我們要澈底明白：我們的將來固然不能倚靠那幾隻往來青島廣州到處尋娘討奶吃的海軍魚艦，也不能完全倚靠蔣介石陳銘樞諸公造成的陸軍空軍。從今天起，五年十年之內，我們能造幾隻戰鬥艦？能造多少飛機潛艇？能趕上誰呢？我們的將來，無疑的，必須倚靠一個可以使丹麥瑞士和英吉利法蘭西同時生存的世界組織。我們必須有這種信心，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

我們的外交政策的原則應該是：我們必不可拋棄那國聯國際的大路。在不放棄國聯與國際的原則之下，我們可以和日本作種種事實問題的討論，但我們必須認清楚：今日軍閥統制之下的日本，決不是我們的朋友。君衡先生在

本刊裏（六十六號）曾說：「向國聯和國際求可能的援助，對日本求必要的諒解」。其實日本是不會諒解我們的。我們今日的情形，老實說，只能是：多交朋友，謹防瘋狗。我們若因為怕瘋狗，就連朋友都不敢交結了，那就不够資格做朋友了。

近幾個月來，日俄的形勢緊張，所以世界戰爭的預測常出現在一般報章的社論裏。但我們知道美國和蘇俄都是不願戰的。兩年以來，蘇俄的忍耐不和日本決裂，是近年國際史上一件大成績，無怪有人要主張把本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送給李維諾夫了。此次美俄國交的恢復，換文上鄭重聲明「我兩民族為彼等相互之利益以及全世界和平之保持，將合作到底」。這不全是官樣的文章。這兩個大國的攜手，在全世界和平的保持上，確有很大的權力；因為這兩個國家各有他們的理想主義，他們互相用精神上的援助來維持和平。應該可以使野心的軍閥國家稍稍斂戢他的暴行。如果日本的浪人不鬧出驚人的事件，世界戰爭的爆發也許真可以展緩一兩年。美國在對俄復交之前，已宣布久駐太平洋的海軍明年將回航到大西洋去；這也是羅斯福總統的維持和平的表示。

兩年前日本軍閥窺見世界各大國的無法合作，又無力

顧及遠東，所以大胆發難，不惜撕破一切國際間和平的保障，不惜挑動全世界的敵視。今日世界的形勢已大變了。美國與國聯已幾次合作了。兩年來日本的無敵的經濟侵略——對英國紡織業商場的攘奪，對法國與意國的絲綢業商場的競爭，——使得各國無不寒心。國聯的會員國最近對日本一致敵視，已是不可諱的事實了。世界外交網的最後一個漏洞，美國與蘇俄的不合作，直到昨日始修補完好。兩年前日本軍閥所認為千載一時的國際弱點，現在已不同了。我們不能斷言太平洋上的戰禍可以完全避免，但我們可以預料今後的國際外交必將有重大的新發展。蘇俄的國際理想主張與新大陸的國際理想主義，加上國聯的國際理想主義，這三大集團的結合，應該可以有一種有力的國際和平的主義出現。這種理想的形成，如果可以不流血而有效，那是人類的大幸福。如果此種理想必經過一次大犧牲才可實現，那是人類的愚蠢所招致，雖深可惋惜，然其結果也許可以真做到十五六年前的哲人夢想的「用戰爭來消滅戰爭」的境界。

在這稍急驟的重大的國際變局裏，我們不可不早日考慮決定我們的外交方針。一九三三，十一，二十。

湖南教育一瞥

傅任敢

我想就我所知道的和所見到的湖南教育，提出來談談

。我之所以想談這個題目，是有幾個原因的。第一，在十六年以前，湖南是共產黨的大本營；在十九年七月，長沙又曾一度淪為赤色區域；於今是二十二年了，外面又給湖南加上一頂「模範省」的冠冕。我在湖南整整四年了，做過「蘇維埃」治下的百姓，做過「模範省」治下的百姓；即以這兩重資格來談點異鄉異土的消息，大概是大家所不會反對的。第二，我為什麼不談政治，不談經濟，却捏着這麼一個枯燥無味的題目呢？這並不全是為得守着明哲保身之道的緣故，而是一方面因為我與政治無緣，不敢亂說，一方面我自己學的是教育，這四年來辦的也是教育，捨了教育不談，未免忘本；何況教育還是「立國之本」呢！第三，我常自思自想，我們的作者，假如多談點中國的土貨，少搬點洋書；多談點實事，少發些空論；多注意下內地，眼光別專射在京津滬漢；不講利害，不講別人，至少我個人在茶餘酒後是頗多翻翻書本的。記得三年以前曾以此意函告教育雜誌的編者周予同先生，希望他多登點中國教

育界的實況。現在我自己提筆了，雖然見聞不夠，能力不夠，也還是寧願做個通訊的訪員，不敢望做社論的主筆。

此外，還得申明兩點。一，我打算寫的只是裨官野史，不是正傳，不是官書；只是印象，不是定論；這裏只有短篇小說中的一點一滴，不像本紀世家的必詳必備。想看正傳官書的我可以介紹二十一卷二期的中華教育界上朱經農先生的近年來之湖南教育。二，我這四年來局處長沙，而且局處在長沙的一個學校；雖則有時「以耳代目」，得着不少的消息，但是「耳聞不如目見」，終恐不詳不週；所以我得申明，我的消息來源多半限於長沙，雖則言實言量，長沙都可代表整個的湖南。

我所要談的只有三宗「事實」。

第一，湖南的私立學校一般的比公立學校「好。」這個「好」字包括了兩方面。一方面是學生的成績好，一方面是辦學者的精神好。學生的成績好是有客觀的証據的。四年來湖南舉辦了三屆高中畢業會考，第一二屆平均成績最好的是明德，明德便是一個私立學校；第三屆平

均成績最好的是周南，周南又是一個私立學校；這是就學科而言。湖南舉辦過三次軍訓檢閱，第一次最好的是明德，第二三次最好是岳雲雅禮；明德也，岳雲也，雅禮也，皆私立學校也。湖南每屆的全省運動會，總錦標也差不多不出私立學校之手。這是就體育軍訓而言。至於德育，政府沒有舉辦過比賽，客觀標準也不易定，而且湖南學生的風氣一般的本都不錯，自很難說。不過據大家的意見，私立學校的學生，精神上也似乎更要現得整飭一些。我相信我說的「學生的成績，」並不算胆大，也並不是特別恭維私立學校。說到私立學校「辦學者的精神好」，我拿不出數目字，拿不出統計。可是我能拿出幾宗事實。第一宗事實是職員方面的。明德的胡子靖先生，三十歲辦學，到現在三十多年了。他如果棄了明德，他有無數次做大官發大財的機會；他因為要辦明德，好幾次幾乎「以身殉學。」可是他寧做幾乎「以身殉學」的「磨血工夫，」不去求升官發財的個人快樂。現在他的學生做中委部長的不知多少，可是他仍住着三間破屋，做他的「磨血」工作。此外楚怡的陳鳳荒先生，修業的彭國鈞先生，妙中的方克剛先生，周南的李士元先生，都很有這種精神。公立學校却沒有機會容你幹上二三十年了！第二宗事實是教員方面的。老於教

課的朋友都和我說：公立學校比私立學校好教。公立高中每小時一元六，私立高中多則一元，少則數角；經濟上的算盤是如此。公立學校，下課以後多半可以不必多負課外的責任，私立學校花樣既多，責任又分外重；工作的情形是如此。然而我有許多朋友，却寧願受少許報酬，盡多許責任，在私立學校一直教上一二十年的課！

依常識而論，私人的力量決趕不上國家的力量，私立學校應該是趕不上公立學校的；而且聽說別的省分一般的說來，公立學校也較私立學校好；為什麼獨獨湖南是例外呢？其中原因，我想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關係，一方面是人人的關係。在制度方面：公立學校的最大缺點在辦學人員沒有保障。我可以說個最大的笑話給大家聽。湖南公立學校的校長，月薪只有一百餘元，可是今日不保明日，地位是够危險的，聽說從前有位初出學校的青年當了校長，他的競爭者竟誣他是共匪，提了去，坐了幾月的牢，幾次要提出行刑，幾乎喪了性命！現在却又証明了不是共匪，在中央黨部當委員！校長換了，前任校長的聘約照例無效，新校長不加聘書便算辭退了！好像校長之聘教員是以私人資格，不是以法人資格似的！最奇怪的是，教員也視此為當然，從不抗議。私立學校的教職員，雖則也少有

法律的保障，只因事情苦，校長不常換，這種怪事便「少」多了。所以有人說，揚州中學之辦理得好，其校長不多掉人是個大原因；這話是不為無因的。至於人的方面，辦私立學校是只有虧吃沒有便宜佔的，所以願去的人，無形中已經經過了一番選擇。公立學校呢，跳皮者可作為進身之階，守分者可求衣食之較免凍餒；而政府當局又不慎重人選，以致不是任非其人，便是好的校長不安於位。上下均存五日京兆之心，於是笑話百出，學生吃苦。去年會考以後，有某校學生投函某報，說讀了三年高中，換了六個英文教員，只作幾次練習。又有人說，某省立學校共十一班，却有九個國文教員！諸位，人的關係原是很重要的啊！

第二，湖南教育界的思想「變」了。我只能用一個「變」字來代表。我不能說「反動」，因為恐怕人家誤會我的顏色是紅的；我不能說「右傾」，因為湖南的教育界並沒有「右傾」；我更不能說「進步」或「退步」，因為這一「變」之是進是退我並無把握。大家如果嫌我用的「變」字太含混，我可以申明一句，這個「變」字是有幾種涵義的。頭一宗，他們對於社會國家的態度變了。馬日事變以前，湖南教育界是最愛預聞國家大事的，驅逐張敬堯，響應五四運動，引起六一慘案等等，是他們行動方面的成績

。毛澤東（一師附小教員）之宣傳共產主義，左社等之反對赤色思想，是他們在思想方面的表現。就是外省外縣，一提到湖南人，就不免聯想到「革命」「風潮」「搗亂」等等大家認為不祥的名詞；其實革命，風潮，搗亂就是關心個人以外的事物的證據，不過時機對象容有不對而已。現在不然了，湖南教育界異，無論教員學校，極少信仰共產主義的，也極少「衷心」信仰三民主義的，其他一切主義政黨，他們簡直都視為一丘之貉，不生信仰，甚至不生興趣。一部分人對於社會國家，有時候心血來潮，固然也不免長吁幾口，短嘆數聲；然而積極方面，他們很少能有什麼主張，更難生出什麼行動。這是湖南的民氣消沉了呢？還是湖南的人民穩重了呢？結論我不敢下，事實確是如此。第二宗是他們對於功課的興趣變了。這也不獨湖南如此，恐怕別處亦復相同。從前沒有幾個人學數理，現在却大家爭着學數理去了。長沙有個高中，取錄八十多個新生，只有十多個人自願進文科，因為不好上課，學校使勒令一部分去學文科。聽說清華今年的新生願進法學院的也只有十多個，願進工學院的佔最多數。這種現象之是好是壞，姑不討論，但是連帶有一宗事却是大可注意的。一般學生因為太偏重理科了，別方面的知識之貧乏却很值得驚異。我知

道有一班初三的學生，學業很好，人都聰明活潑，我極喜歡他們。有一次我向他們介紹四本雜誌，獨立評論，華年週刊，生活，論語。他們都瞠目結舌，認爲聞所未聞，不管錢多，爭着要訂。他們的好學之心是很可嘉許的，然而他們的知識之不是多方面的發展，也就够可注意了。第三宗是他們對於人生的觀念似乎也不見得和從前一樣了。如果從前可用「犧牲」「奮鬥」「樂觀」種種積極的形容詞去形容的話，現在再用這些形容詞就似乎不頂適當了。本來中國的局面是如此其紛亂，把個人壓迫得吐不出氣來，從前大家心中存下一線希望，曾作一度臨危的掙扎，掙扎不得結果之後，精疲力竭，安靜地躺一下，也是人情之常。所以全國的同胞，近來似乎都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的消極態度，我們一面固然應該互相鼓勵，提提精神，同時也是不能專怪個人的。湖南教育界都是圓顛方趾的「人」，「自然逃不脫這條「人性」法則的支配！

這種改變，如果原因不是單一的的話，我想下面幾個解釋是可以供參攷的。頭一個解釋可以說是心理上的一種反響。從前大家信仰主義，結果主義無效，或且害之；從前大家懷着希望而奮鬥，結果希望成爲泡影，奮鬥毫無代價。我們知道：希望愈大者，失望亦愈大。我們又知道

：用力愈勞者，疲勞亦愈快。湖南的各界，在歷次革命中都是站在最前綫的，而歷次革命之後，湖南所受的犧牲蹂躪亦最大。「物極必反，」不也是人情之常嗎？第二個解釋可以說是一種淘汰作用。一方面湖南因爲受黨派之禍最烈，所以對於異黨異派的排斥也最兇；二方面共產黨在湖南的歷史最早，勢力最大，真是有信仰，受不了現狀的痛苦的人，都已走到實際行動中去了。現在剩下的人，或是被排斥後的剩餘，或是本沒信仰的第三者。第三個解釋可以說是大家嚇怕了。湖南自經共黨之變，知識階級死的人真不知多少！大家看着殷鑑不遠，深明「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理，也就不敢積極的去求出路，只好消極的麻醉自己了。第四個解釋可以說是由於在上者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本是極大的。舉個例說。去年湖南中學畢業會攷，國文題目是「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平心而論，題目並不難，沒讀四書的也未嘗不可以「望文生義」領略題意。可是許多攷生不懂題意，鬧出不少的笑話，於是攷完以後，好些學校勒令初中學生讀四書，有些學校不肯加授四書的，初中一二年級的學生竟也要求起來，非讀不可。小小一道題目就可以鬧得「滿城風雨」，「禁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這幾年來中央委員有停辦文法科之議，省府主席

有「八德衍義」之作，學風之變，不亦宜乎？

第三，湖南學校學生的數量很可觀了，質的方面却尚有可以改進之點。據二十一年的湘省教育廳報告（書名湖南省最近三年教育概況總報告）說，全省共有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三個小學，二百九十九個中等學校。我們敝縣湘鄉一縣即有一千五百六十一個小學，一十二個中等學校。這等數字比起任何省分都無遜色。學校之所以發達，內中有一個有趣的原因。因為共產黨在湖南鬧得最凶的時候，有田的人多少都捐出一些田產，去辦學校，藉以緩和空氣。捐田的人多了，學校使自然多起來。加之湖南在湘軍時代，出外作官的人很多，作官爲的是光宗耀祖，於是大修祠堂。現在祠堂沒用，便多改爲族學。族學多了，族與族之間互相競爭，於是招收外人，擴大範圍，成爲正式的學校。至於讀書人之多，大概是因爲做父母的認學校爲新科舉，視進學校爲找出路之故。從前我在長沙讀書的時候，我們全族只有兩人，現在却多至十八左右了。我知道某校有個廚工，每月連伙食只能掙十元錢，可是省吃省用，把兒

子送到中學畢業現在居然進了大學。還有一個女校的校工，收入更少，她的女兒也在大學，人民對於學校的熱心可算是無以復加了！可是學校的成績呢？有人說，湖南的中學比外省平均好些，因爲環境佳，用費省，除了英文趕江浙不上以外，什麼都無愧色。我相信這是對的。不過我們同時知道，凡事進展太快，內容便難充實。所以上次會攷因爲教廳再三吩咐，題目比應有的標準低得多。而且不及格的功課一律送加三十分，平均只要五十分便可畢業。而不能通過者仍不知多少。這個現象本是各省皆然，有些省分恐怕還要過之。但是楊哲子先生說過「要得中國亡，除非湖南人死盡。」湖南人既居如此重任的地位，我們不可自滿啊？

最後，我得申明一句。如果大家看了此文而對湖南教育界生出什麼不良印象的話，我應該是那不良印象的對象之一。如果湖南教育界有什麼好處，我不該有分。理由很簡單：我在過去的四年太沒有努力了！

十一，八，清華。

☆

☆

☆

☆

☆

民族學材料的利用及誤用

吳景超

民族學是一門新興的科學，他的職務，是在研究初民社會或野蠻部落中的各種生活狀況及其文化成績。這種研究的報告，每年都有許多印行出來。研究別種社會科學的人，常常利用這些報告中的材料，來解決他們科學中的許多問題，就中以在社會學的園地中工作的人，利用民族學材料的地方為最多。他們所以要用民族學材料的原因，大略有列數點。

第一，一部份研究社會學的人，以為近代的文明社會，太複雜，不易了解。但是文明社會中的各種制度，其模式 (Pattern) 在原始社會中都找得到，所以如欲了解近代社會，可從原始社會下手。譬如近代的貨幣制度，包括金銀本位問題，鈔票問題，銀行問題，匯兌問題，信用問題，物價漲落問題，是非常難懂的，我們如想從這些複雜的事實中，去了解貨幣的功用，不知要花去許多功夫，才可以達至目的。但是我們如到原始社會中去研究貿易的情形，那麼貨幣的功用，便可一目了然。有了這種智識作根據，再來研究近代的制度，是一個由簡至繁的自然步驟，收效一定是事半功倍。這樣的研究原始社會，乃是為了解近代社會立基礎，當然是可取的。

第二，研究社會學的人，從民族學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一種社會制度，可以有多少表現的方式。中國的老學究，以為男女的結合手續，只有一種可能的方式，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些到歐美各國遊歷過的人，知道此方式之外，還有自由戀愛的方式。不過我們再進一步，去看初民社會，就知道除却這兩種方式之外，還可以有掠奪的方式，交換的方式，(甲娶乙家的女兒，乙娶甲家的女兒) (服務的方式，(堵往岳家服務若干年，便可得妻) 購買的方式，租借的方式，轉讓的方式 (甲看中了乙的妻子，可以出若干代價，求乙轉讓)，繼承的方式，贈與的方式，以及其他各種不同的方式。又如婚姻制度，在文明的國家中，只知道有一夫一妻及一夫多妻的方式，但從民族學的材料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下列種種方式：(一) 一妻多夫。 (二) 團體婚姻。 (三) 試婚，以若干時日為期，期滿如女方未生子或未受孕，可以解婚。 (四) 暫婚，男子出

獨立評論 第七十八號 民族學材料的利用及誤用

獵或遠行，與女子定數月或半年之婚約，期內同居并盡經濟上互助的義務，期滿解散。除婚姻外，別種社會制度，我們也可在初民社會中，發現種種不同方式。由這類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在不同的情形之下，人性有何種不同的適應及表示，許多環境論與遺傳論的官司，都可以利用這類的材料來解決。

第三，我們可以利用民族學的材料，來研究文化中各部份的相互關係。譬如現在最流行的經濟史觀，以為文化中的經濟部份，對於別的部份有莫大的影響。經濟組織是社會的基礎，別的文化，如家庭，政府，宗教之類，都是上層建築，只要經濟組織變動了，別的文化，非跟着變動不可。我們很可利用民族學的材料，來考察這種理論，是否可靠。英國已故的社會學者霍布浩，就做過這種工作。他搜集了好些關於初民社會的報告，依着他們的經濟狀況，分爲八組：（一）低級遊獵民族，（二）高級遊獵民族，（三）與農村爲鄰的遊獵民族，（四）低級畜牧民族，（五）高級畜牧民族，（六）低級農業民族，（七）中級農業民族，（八）高級農業民族。這八組的生產方法，是不同的。霍布浩更進一步，分析這些民族的別種文化，看他是否因生產方法之不同，而呈不同的花樣。結果是不盡

然。生產方法不同的民族，在別的文化部份，可以相同，如低級遊獵民族中，有母系家庭制，在高級農業民族中，也可以有母系家庭制。反之，生產方法相同的民族，在別的文化部份，儘可大不相同，如中級農業民族，有行一夫一妻制的，也有行一夫多妻制的，也有兩種制度兼行的。霍布浩的研究，是從經濟制度出發的。我們可以仿效他的方法，從政治制度出發，或從宗教制度出發，看看在不同的政治制度及宗教制度之下，別種文化，是否也不相同。這種事實的研究，如果加增起來，我們也許有一天，可以回答社會學中一個中心的問題，便是各部分文化相互關係的問題。

以上所提出的三種人，可以算是善于利用民族學材料的，可惜在中國做這種工作的人還不很多。另外還有一種人，他一樣的利用民族學的材料來解決一個理論的問題，可是這一種人，與其說他利用民族學的材料，不如說他誤用民族學的材料。我所指的這種人，便是那些以進化論的眼光，想從民族學的材料中，來追溯文化演進的過程及階段的。中國現在能利用民族學材料的人雖少，而誤用民族學材料的人，却已層出不窮。特別是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已經譯爲中文，許多研究社會的人，受了他的暗示，

誤入歧途的頗爲不少，所以我們對於這一派的學者，不得不加以批評。

這些誤用民族學材料的人，腦筋中都有一個問題，而這個問題，又不是用歷史上的材料所能解答的。他們研究文化的發展，從現代追溯而上，到沒有歷史記載的時代，還沒有看到這些文化制度的起源。人類的歷史，最少也有百萬年，其中只有數千年有歷史的記載。所以人類所演的戲，前幾幕的情形如何，不是從歷史中可以得到答案的。

但是研究文化史的人，總要想法去猜這個文化原流的謎。他們從歷史中既然得不到答案，於是轉移眼光，到民族學的材料中，去求答案。他們以爲這些文化落伍的民族，可以代表我們老祖宗的情形，假如我們想要知道我們的祖宗，過的是什麼生活，只要去看看這些野蠻民族就行。用這種眼光的去研究民族學的人很多，到了摩爾根，可謂集斯學之大成。他的古代社會，是于一八七七年出版的，他在這本書的第一章裏，把人類文化史分爲七個時期：（一）野蠻初期，自有人類起至火的發現及知捕魚時爲止。（二）野蠻中期，自知捕魚及用火起，至弓箭的發明爲止。（三）

爲止；在西半球，至玉米的種植及灌溉技術的發明爲止。（五）半開化中期，起點已如上述，止點爲鉄的發現及利用。（六）半開化上期，起于鉄器的利用，至文字的發明爲止，（七）文化時期，自文字之發明起以至于近代。摩爾根以爲在野蠻社會中，發現了我們文明社會的上古史，所以他說，假如我們想知道我們的祖宗在野蠻時期的生活，可以去研究澳大利亞的野蠻民族。如想知道他們在半開化時期的生活，可以去研究北美的紅印度人。

摩爾根所定的階段，是以全文化爲對象的，此外還有研究經濟，家庭，政治，宗教，藝術等制度的人，用同樣的方法，把每種制度的演化，分爲若干階段或若干時期，如把經濟的進化，分爲採集，漁獵，畜牧，農業，工業等時期，把家庭的進化，分爲雜交，團體婚姻，母系，父系，一夫一妻制等時期，乃是最流行的。他們所根據的材料，差不多都是民族學的材料，因爲上面已經說過，歷史家是不能告訴我們人類原始的情形的。

爲什麼我們要說這些階段論者，誤用了民族學的材料呢？

第一，我們要知道階段是一個時間的概念，而民族學所供給我們的，乃是一些空間的材料。民族學告訴我們澳

大利亞有些民族，還在過採集的生活，非洲有些民族，過畜牧的生活，美洲的紅印度人，過農業的生活。澳大利亞的民族，是否會發展到畜牧的階段，科學家如只是根據事實說話的，自然不必預言。紅印度人是否經過了前兩個階段或三個階段而達到農業的階段，科學家如只是根據事實說話，自然也無從推測。摩爾根的階段論以及其他學者的階段論，若是關乎有史以前的，都是一種假設。這種假設，不是用民族學的材料來變戲法（把空間各民族的文化方式，變為時間的各階段，等如一種變戲法。）所可證明的。

第二，階段論是與許多文化傳播的事實相衝突的。

我們知道文化的發展，不只靠本族的發明，也靠異族文化的傳播。非洲用石器的人，不必經過銅器的階段，就可以到鐵器的階段，因為那些用石器的人，一與用鐵器的歐洲人接觸，就做起鐵器來了。拜物教通行的民族，不必要經過若干時期的發展，才達到一神教。歐美的傳教師，在他們的社會中活動，就可使他們的宗教，向另一途徑發展。所以這種循序漸進的階段論，是與許多事實不符的。

第三，階段論沒有知道文化的發展，可以循四種不同

路線的。同樣的起源，同樣的結果，是一路線，也是階段論者所看到的路線。異樣的起源，同樣的結果，是第二路線，或可稱為殊途同歸的路線。如希臘時代，有奴隸生產制度，美國的南部，在十九世紀初葉以前，也有奴隸制度，但這兩個國家，是由異樣的起源達到同一制度的，他們在採用奴隸制度以前的社會狀況，決不相同的。同樣的起源，異樣的結果，是第三路線，如基督教的起源，是相同的，但在意大利，在西班牙，其發展的結果，與在英美的基督教不同，便是一例。異樣的起源，異樣的結果，是第四路線，我們如以現在文明各國的文化，與天涯海角的部落文化相比較，便可明瞭此點。假如我們承認文化的發展可以有後列的三條路線，便不能承認階段論。

由于以上的討論，我們便可知文化并無循一固定路線發展的理由，也無可以證明人類已往文化，係循一固定路線發展的事實。那些想從民族學的材料中，追溯人類文化發展史的，不是緣木求魚，便是刻舟求劍，結果是一定勞而無功的。

統計學的治學途徑和「高級統計學」(書評)

林伯遵

書名 高級統計學

著者 艾偉

出版者 商務印書館

從前有個笑話，說世界上有三種謊，第一種是不可容忍的瞎話，第二種是善意的欺瞞 (White lie)，第三種便是統計了。雖然是笑話，很足以代表一部分人對於統計的懷疑。實際上統計應用在力學及化學這一些自然科學上面，不但不謊，而且異常準確；只是應用在社會科學上面，就常常弄出令人懷疑的結果來了。甚麼原因呢？有人說：自然現象在相當條件之下是比較固定的，易於推斷的；社會現象是人為的，因時而變，因地而異，若利用統計來研討牠，難得普遍的結論。爾格德 (Chas. A. Ellwood) 說：

「從事於社會科學的人，還沒有認識統計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價值，是為社會本身的特質所限制的」(見十月份 Scientific Monthly)。

他以為統計在社會科學上的應用範圍，沒有在自然科學上的大。有些「人中」了皮耳生 (Karl Pearson) 所說「科學即是

計量」的毒，不拘甚麼問題都要借重統計來解決，自然不免鬧出許多笑話來。越過可能範圍去應用，可算是造「謊」的原因，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很多「統計謊」是對於統計方法根本不大明白而偏要應用牠的人所製造出來的。

博阿斯 (Frans Boas) 是美國一位有數的人類學家。他在人類學的造詣甚深，對於統計的了解大約不很透徹，所以他用統計來研究人類學的文章，竟被費許 (Arne Fisher) 標作「冒牌的數學分析」。「應用」在目前雖則是個極時髦的口號，可是在學術上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體。我們在應用一種知識以前，對於這種知識須得有適度的了解，對於這種知識要有適度的了解，又須對於牠的基礎有充分的準備。這是必然的道理，正當的途徑。研究社會科學的人要想利用統計學，也得循着這個途徑才能達到他們的目標。譬如如拿統計方法去研究教育問題罷。不從基本知識入手，單「一學期的教育統計學，每週授課三次」，最高限度的效果，也只能介紹一些乾燥無味的名詞和無數來歷不明的公式。應用起來，所得的結果，能不令人懷疑嗎？所以我們主

張凡從事於社會科學而想利用統計方法的人，應有充分的

上實在是正當的途徑。

基本數學訓練。在應用統計學上有成就的，如以前所說的

×

×

×

皮耳生及費許這般人，在數學上都是很有根底的。誠然，

我們不能希望每個要應用統計方法的人，都得學過近世代

「高級統計學」是本年十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作者為國立中央大學教授艾偉先生。他鑒於：

數和積分方程這一類的功課；這是事實上不容易做到的。

但是至少應用上必需的數學原理和方法，總得要弄清楚，

「統計學教本，在坊間所出版者雖已汗牛充棟，然他們大半為譯本，或由幾本外國書編譯而成，欲求

否則普通的演算工作，就會發生困難，直接產生統計理論

一富有研究材料的書，實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

上的誤解，間接產生應用上說的結論。這不是我們過甚其

……」。

辭，在下面有例子可以證明的。容許把統計當作工具的人

因為不滿意已有的教本，所以他在

，以為他們的主科功課，已經够忙的了，不能不犧牲一點

「最近七年之中，於授課之餘，嘗自設題研究以求解

基本工作，挪出時間來致力於他們要利用統計去研究的材

決，或於授課之時，常常更換方法以資比較。最好

料。這種態度似乎不大妥當。人類學家抱這種態度造出了

莫如學生之間難，因有所開始有所答，所答而不能

「冒牌的數學分析」；從事於社會科學的人抱這種態度，難

解其惑，則思之，重思之，以求新的解釋，簡單的

免不造出一些足以影響社會政策，經濟政策，教育政策……

解釋，或清楚的解釋……」。

的「統計謊」。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情！從事於社會科學

有了這樣的努力，才編著了這本「高級統計學」。作者「

的人，應當明白這種危險。偷工減料的辦法，在手工業上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這書

猶且不可，在學術上是萬萬要不得的。新近我們見着一本

裏確是有許多新穎的材料，如像綫距寫法（第十三頁）和

應用統計學的教本。作者是一位虛心治學的人，然而這本

分散全書的實例。不過我們若是從基本知識方面着眼，書

書上很有些基本知識上的錯誤。在後面我們可以指出幾點

裏有些解釋似乎尚有商量的餘地。

來，用以證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學術應用

（一）作者講相關係數（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的

時節（第七頁），說：

「這相關係數是個純粹的數目，并無單位：例如身以尺量，體以磅權，此兩數相乘在機械學上固有所謂尺磅（Foot-Pound）之單位，但是求相關係數并不用這單位，因為相關之兩數不止用尺用磅，有時年齡與身長，有時年齡與體重。若是每兩個數目成一單位如尺磅一類豈不麻煩，所以相關係數還是用純粹數目的好」。

單位在計算上是一件要緊的東西，因為怕麻煩而把牠廢棄了，在自然科學上，未之前聞。相關係數的單位是由於牠自己太不單純而被拋却的，這在統計學上，實在也該算「新的解釋」。作者若是不怕麻煩，可以把他所用以求相關係數的公式（第二百二十九頁），重行細細的分解一次，就會明白牠應該是個純粹數目，麼根兒就沒有單位，如同人類一出世就沒有尾巴一樣。這個相關係數是皮耳生發明的，因此又叫做皮耳生相關係數。最使人詫異的是作者教了七年統計學，并且聽說最近還親身到過高耳敦試驗室（Galton Laboratory），從皮耳生學習了一年，倒把他的重要發明判了一個不單純的罪名！像這樣的錯誤，當然是基本知識上的錯誤了。

（二）在第五十四頁上，我們碰見了下列兩個算式：

$$Md. = 21 + \frac{(14/2-7)}{0} = 21, Md. = 24 - \frac{(14/2-7)}{0} =$$

24。作者說「其實這兩個結果都是對的，因為(?)結果的不同，並非演算的錯誤，乃係數分配的差異」。我們注意到算式裏有兩個分數都可以化為零除零。零除零在數學上叫做不定式 (Indeterminate form)。計算的當兒萬萬不可親近的。用了不定式求出來的結果，應當叫做「不定的結果」。換句話說，像這樣的結果，任憑怎麼解釋都沒有意義的。初級數學上的「禁品」，竟然應用到「高級統計學」裏來了。這也不能不說是基本知識上的錯誤。

（三）作者說「幾何均數常常比算術均數小」（第七十八頁）。又說「大致用調和均數計算，其結果比用（算術）均數的小」（第八十六頁）。據代數學的證明，幾何均數及調和均數一定是比算術均數小的。我們不敢武斷的說凡經證明了的東西便不該懷疑，但是懷疑總得要有理由。作者既把均數列為統計學上重要部份之一，那便該把關於這部份的基本概念敘述得確切些，使學生應用均數的時候遇着演算錯誤，不致於以為「并非演算的錯誤」。

（四）機率 (Probability) 是統計學的礎石。可惜「高級統計學」和「坊間所出版」的統計學教本一樣，沒有給

以比較詳明的解說。在本書中討論機率的僅有一節（第四十九節）。這一節的第一句話是「現在我們要討論機率了」。第二句是「所謂機率者英文曰 Probability」，自此以下便是關於機率的例子，連定義都沒有。第一個例子是買彩票，作者說彩票的分數有十萬個，中彩的只有一個，以P代表成功，以Q代表失敗，可以得下列的公式：

$$P + Q = 1.$$

這樣的解釋，似乎不大清楚。P實在是代表成功的機率，Q代表失敗的機率。P和Q的來歷是應當敘明的，這個極容易引申的公式，既迭經應用，也應當有個交代才好。作者應用的辦法，似嫌操之過急，機率的理論，用Probability一個英文字就討論完了。

(五)取樣 (Sampling) 也是統計學的礎石。作者對於他的敘述比較機率又詳細點，竟用了整整的一章（第十六章），來討論「取樣的可靠性」。就這樣，我們還覺得作者的討論有待補充。試看他在這章裏所舉的「一個機誤的實驗」，我們便自信不是在吹毛求疵了。這個試驗用卡片一〇二四張，「每張各有一數由零到十，其分配即照 $(a+b)^{10}$

之展開式，就是零與十各一張，一與九各十張，二與八各四十五張……共一千零二十四張。在這總數裏我們隨意取出三十二張，而計其每張所有之數目。旋將這卡片歸入總數內使其混雜，然後再抽三十二張。如是凡三十二次……三十二個樣子……求出各樣子的均數，及其機誤和差誤」。這個試驗裏面有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旋將這卡片歸入總數內使其混雜，然後再抽」。為甚麼要多費一道手續呢？別的試驗是否應取同樣或類似的步驟呢？設若沒有這個條件，樣子還是不是可靠呢？這個「獨立取樣」(Independent Sampling)的必要條件，作者絲毫不加以說明，而「七年來十次統計班上常好發問以求清楚的解釋的同學」也輕輕的把牠放過去了！

上面的幾點，從理論及應用兩方面說起來，都是極嚴重的「挂漏遺誤」，尤其第一第二兩點是很難令人諒解的。雖然有這些遺誤，這本書也自有牠的特長，自有牠的用途。把牠提出來討論的本意，不過是要提醒專攻社會科學而想利用統計學的人，不可忽略了統計學的治學途徑。

答覆劉咸先生

俊臣

編輯先生：

貴刊第七十六號有劉咸先生的通信，題為「如此牛津

」，其中說「俊臣君……主張……」無論情況若何，決不

武力抵抗日本」。鄙人的原文說的是：「這並不是說中

國人應該一定仿效牛大的態度，而說『無論情況若何，決

不武力抵抗日本』；是否應該取這樣極端的立場，當然是

須中國自己慎重重重的去考慮而後才定主意。」劉咸先生

未免誤解我的原文了。鄙人原跋登在貴刊第五十四號，距

今已逾五個月了，讀者或不憶及原文。故特備函，乞允為

登載。

俊臣 啓 二十二，十一，十七

◎獨立評論社啓事

我們歡迎各地讀者的投稿。投稿者若不願用真姓名，當然可以用筆名，但筆名之外，投稿者務必把真姓名和住址告知本社。凡只有筆名而無真姓名住址的文字，恕不登載。

我們這個刊物是十幾個書生捐錢捐力氣合辦的；我們至今還沒有酬報投稿人的能力，所以只能送贈本刊若干冊作為一點點報酬。凡投稿人願意本社贈送本人或他的朋友的，請告知本社。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關「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
朝鮮、台灣、日本及	每月一元二角
其餘各地	每月一元五角
香港、澳門	每月一元二角
南洋、歐美	每月一元四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大雜誌

本館發行之**東方雜誌**、**英語週刊**、**兒童世界**及**兒童畫報**四種雜誌，自去年十月復刊以來，在**內容及形式**兩方面，均較前益加精進，實為業餘課外之良好讀物。**東方雜誌**每年發行特刊四次，篇幅特別擴大，預定者概不加價。

東方雜誌

今年廿四冊連郵三元八角
半年十二冊連郵一元九角

英語週刊

今年五十冊連郵二元五角
半年廿五冊連郵一元三角

兒童世界

今年廿四冊連郵二元四角
半年十二冊連郵一元二角半

兒童畫報

全年廿四冊連郵一元六角
半年十二冊連郵八角五分

出版已三十年，為國內歷史最久之刊物。凡社會經濟、政治潮流、中外學術探討，靡不有翔實之記載，精審之批評，為留心世界之勢者所必讀。且一經感情，即通世界經濟狀況，指示中國經濟之路，並廣約國外功學，和繼海外通信。其所有之「文藝」、「教育」、「婦女與家庭」各欄，則新內容，時時更有「采

出版歷十七年之久。內容分論著、翻譯、文法、字彙、故事、知能、公民、尺牘、問答、學生投稿、英文、特約海內英文名家撰有譯述，取材以適合於代英語學者之需要為依歸。文字淺顯，間有艱深文字，皆附中文字譯，為自修之導，且以之津潤。每十號起，每隔十期與行雜餐抄稿一，以引起讀者之興趣。

亦有十年以上之歷史，實載有益身心之兒童讀物。每期除原有之故事、童話、小說、劇本、歌、詩、歌、世界珍聞、圖外，並新闢「談話」、「健康」、「兒童」、「各地兒童通信」等欄。特別注重兒童科與精神的培植，羣體生活的提，和藝術與趣的陶冶。最適於初高級小學。

已出版十餘年。復刊後更大加革新，一律用彩色精印。內容注意時令、修辭、常識，及兒童可以手做的材料，同時並顧到兒童的興趣。凡足以給與兒童不良之暗示及影響之材料，一律剔除。文字淺明，圖畫優美，為小學低年級生良好的課外讀物。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二號

福建的大變局

胡適

商人參政與國家經濟

守愚

改進西北農業應取之程序

沈宗瀚

「平教會與定縣」(通信)

李明鏡

獨立評論

第七十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三日

寄售及代定處

鎮江	南京	真茹	上海	天津	平西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王	公	街	平	中	社	宣	原	水	清	天	成	大	局	現	書	定	書	館	新	書	樓	鎮
江	京	茹	海	津	西	平	安	華	井	司	新	和	書	時	內	甸	滄	華	府	府	府	華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江	京	茹	海	津	西	平	安	華	井	司	新	和	書	時	內	甸	滄	華	府	府	府	華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江	京	茹	海	津	西	平	安	華	井	司	新	和	書	時	內	甸	滄	華	府	府	府	華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報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一角以下爲
 限)代洋九五折。

福建的大變局

胡適

十一月二十日，福州忽然有所謂「人民代表大會」出現，通過了一種「人民權利宣言」，並且一致議決了建立一個「人民革命政府」。新政府就在那天晚上成立了，定名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國旗也有了，是上紅

下藍，中嵌五角黃星的；政府的組織是先設軍事，經濟，文化三個委員會，和財政外交兩部，政府委員十一人，主席是李濟琛，委員中有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戴戟，陳友仁諸人，他們的宣言和通電的要點是（一）否認南京的政府，（二）打倒國民黨的系統，（三）建立生產人民政權。現在李濟琛陳銘樞諸人都已通電脫離國民黨了；福建的國民黨各級黨部也都解散了，新政府通令各機關，把中山遺像和遺囑都撤廢了。據報紙所載，二十日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席黃琪翔也通電脫離「第三黨」。這個運動的領袖至今好像還沒有宣布什麼特別政黨的組織。

陳銘樞李濟琛諸人二十一日聯名發電給廣東廣西的胡漢民諸人，電文中的大意又好像是說這個革命運動是專為討伐蔣介石的！前日報載兩廣領袖的覆電，對於「討蔣」，

雖然表示贊成，對於「脫離國民黨，廢止黨國旗，內結共黨，外親日本，聲稱推翻黨治，組織農工政府」，則認為「盡喪所守」，「必將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福建的變局，是這四五個月來留心時局的人都料到要爆發的。但爆發成一個完全反對國民黨的局面，這却是很少人能預料到的。道路遙遠，報告不完全，我們很難知道這個運動怎樣演變成十一月廿日以後的形勢。但我們研究三四個月以前陳銘樞蔣光鼐運動粵桂領袖的情形，參較近日驟變的局面，我們可以想像最近的急驟變化也許不是陳蔣諸人的本意；他們的本意只是不滿於南京，不滿於蔣介石而已。在那個立場上，他們才可以期望廣東與廣西的一部分領袖的贊助。但野火是易放而難收的。十九路軍原來出於第四軍，其中本含有很激烈的左傾分子；而十九路軍的新將領中又有翁照垣一類的顯然反對國民黨的右傾分子。我們猜想，在那些高級首領還在奔走醞釀的時期，中下級軍人早已有一種更急進的有力聯合了。十一月二十日的變局，從報紙上的記載看來，頗像是一種陳橋兵變，黃袍

加身的故事。陳銘樞並不會到場，而大會上最有力的指揮者却是前第四軍長黃琪翔。人民權利的宣言是黃琪翔宣讀的。閩皖代表提出了「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提案，黃琪翔即宣稱「大會決定無條件的接受此項提案」。這提案當然無條件的一致通過了。於是翁照垣丘國珍即展開他們準備好的五角黃星旗，這就成爲新政府的新國旗了。（參考十一月二十六日大公報的福州通信）

依我們的推論，陳銘樞蔡廷楷諸人豈不知道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諸人是不能在這個反國民黨的旗幟之下和他們合作的。然而此次閩變竟然成爲反黨（或者甚至於聯共）的革命，這裏面的消息頗值得尋味。最近情理的解釋似乎是這樣的：高級領袖也許還在做反蔣護黨的夢，中下級軍人已暗中結合決心做反國民黨的革命了；持重的領袖也許還想與粵桂合作，而急進派已準備不要粵桂的合作了；兩棲的陳濟棠本來是他們要打倒的，那無實力的胡漢民也用不着了。在這種最後決心之上，閩變就忽然成了一個根本推翻國民黨的運動。最持重的如蔡廷楷等，也就像辛亥革命時躲在牀下的黎元洪，不能被擁戴做那人民革命軍的新領袖了。

如果這種揣測是不大錯的，那麼，今日的閩變已超出

了陳銘樞蔡廷楷諸人的原來意向，所以由「反蔣」變爲「反國民黨」了。此種變化，只是羣衆心理的尋常現象，毫不不足奇怪。徐謙曾對蔡元培說：「我本來不想左傾。不過到了演說台上，偶然說了兩句左傾的話，就有許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覺的就說的更左傾一點，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熱烈了。他們越拍越烈的拍掌，我就越說越左了。」一個前清翰林，妄想領導羣衆，就這樣被羣衆牽了走。世界多少英雄好漢，幾個能逃出那種「拍花」的迷惑！今日的閩中局面，還只是唱當年克倫斯基的二月革命的老戲。將來越走越遠，也許有揭開面幕，老實參加共產革命運動的一日。到那時候，——也許等不到那時候，——今日七拼八湊的聚義羣雄，其中也許又有人回過頭來，做當年的李濟深，做當年的蔣介石，清共的清共，護黨（自然不止國民黨）的護黨，戲又唱回到民國十六年的老腔調了。——然而國家與人民受的物質與精神上的無限損失，是永沒有賠償的了！

我們對於閩事，就現有的不充分的材料看來，只能作如此的觀察。如果此種觀察能得着事實的證實，那麼，這一回的閩變只是一羣「同牀異夢」的軍人政客，用驟然的手段，臨時湊合成的一個反國民黨的革命局面。我們檢查十一月廿日到場的「人民代表」名單，其中至少有十分之

一是我們平時聽或知道的人。我們覺得他們這回的舉動是深可惋惜的。「取消黨治」何嘗不是一個很動聽的名詞？「保障人權」又何嘗不是我們平日主張的？但我們要記得：六七月間馮玉祥方振武所揭起的「抗日救國」，那豈不是更能號召人心的旗子？何以那樣時髦的旗子不能得到全國的響應呢？豈不是因為一班人的心理總覺得，在這個時候，無論打什麼好聽的旗號來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國家的嫌疑？危害國家是不會得着大多數人的同情的。我的朋友蔣廷黻先生在七月間說過一段很沉痛的話：

現在的競爭是國與的國競爭。我們連國都沒有，談不到競爭，更談不到勝利，我們目前的準備，很明顯的，是大家同心同力的建設一個國家起來。別的等到將來再說。（本刊五十九期，頁六）

這幾句話最可以代表大多數愛國的人心裏要說的話。大家豈不願意抗日救國？但他們心坎裏明白：必須先有個國家，然可以講抗日救國。掛了「抗日救國」的招牌，事實上却是要使一個無力的政府更無力，要使一個不團結的國家更分裂：這就是人人都看得透的「掛羊頭，賣狗肉」了。

今日之事，正與察哈爾事件相同，多數有心人雖然常

常感覺許多事實不能滿意，他們總不免有一個同樣的感想：必須先要保存這個國家；別的等到將來再說！這個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這個國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人權」固然應該保障，但不可捐着「人權」的招牌來做危害國家的行動。「取消黨治」固然好聽，但不可在這個危急的時期借這種口號來發動內戰。今日最足以妨害國家的生存的，莫過於內戰；最足以完全毀壞國家在世界上殘留的一點點地位的，莫過於內戰。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內戰的大罪惡！

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日的英名，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榮譽的事。我在加拿大和美國各地旅行，凡有中國人的地方，無論是洗衣舖子或雜碎館子，總看見壁上掛着陳銘樞蔡廷楷蔣光鼐三位的相片。然而我們不要忘了：一般人對於賢者，求全責備之心自然更大。鎗口向外的熱血換來的英名，一旦鎗口轉向內時，都會化作飛灰而散盡。這是我們最感覺十分惋惜的。

二十二，十一，二十七夜

☆ ☆ ☆ ☆ ☆

商人參政與國家經濟

守愚

留心近五十年來中國社會變遷的，大概都有一個最深刻的影象，便是商人地位的抬高。自追隨士紳，百事被動的時期，進而與上紳抗衡，參與中央地方設施的諮詢，再進而直接影響到中央地方政權的推移。他的進程，要以國民經濟的衰落，和國家財政的困難，而成爲反比例的發展：就是經濟財政愈窘迫，商人勢力愈擴充。其間又以沿江海的商埠，如上海天津廣州漢口的商人，材力比較超越，知識比較新穎，所以最能利用機會，他們的勢力最爲強穩雄鉅。到了今日，一般商人的地位，可以說是登峯造極。我們試看中央的機關，如全國財政委員會全國經濟委員會和附屬的已出現未出現的各種統制委員會，前任中央造幣廠廠長，招商局總辦董事，從前的財政總長部長和收稅的處長局長等，真是不勝僕數。這些人似商非商，似官非官，因爲一方面固然做官，另一方面從沒有脫離本業，照舊的在商場上活動。他們的原底子都是純粹的商人。再看商人間接的勢力，潛移默化，尤爲驚心。譬方每一次換財政部長，大家便不約而同的聚談，他上台後是否銀行界肯

爲幫忙，在後撐腰；某某資格學識都好，可是和銀行界沒有淵源或久已失却聯絡，恐怕上台後，沒有辦法；某某雖然資格稍差，但是有某大銀行家極力幫忙，自身和銀行界亦有關係；大概總可維持。諸如此類的話，任何人都聽見過，亦許他自己就談過。我們再看地方政府，要是想整理金融財政，或舉辦某種事業，省主席使遠如甘陝，亦來上海求銀行界幫忙。到了現在，差不多移樽就教的是通例，不來而委託親信代表商談的是例外。無論那一省，各地商會會長銀行行長大錢莊舖長，掛着省縣政府或駐軍顧問諮議參議的頭銜的是常例，沒有被請爲顧問等等的是例外。固然這些頭銜亦許不時引起頭痛，但是「方亦足表示他們的重要和地位。試問在各省除了銀錢業大商家而外，又有誰值得地方政府的邀請和諮詢呢？

我們對於商人地位的抬高，認爲發展民主主義的最好趨勢，亦是任何國家經濟進程中應有的現象。但是對於商人的基本經濟觀念，和與國家經濟衝突的地方，不能不進一言。我們姑且不論合組「公司」鑽營縣長或稅收局長，

或者利用在官地位，去作證券投機或挪用公款私營企業的種種不法行爲。這些事情，固然在中國已是司空見慣，弊端嚴重，但是他們的活動範圍究竟還小，並且做這套把戲的，亦不盡屬商人。惟有目下政府的經濟設施，如招商局，如統制委員會等，他的範圍却是很大，他的舉動，不獨影響於全國，並且結果於將來，我們應有慎重的考慮，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

談經濟的人向來分經濟爲公的和私的，或照英美的習慣分爲政治的經濟，與商業的經濟。其間的區別，是政治的經濟，以社會福利爲前提，商業的經濟以私人利益爲目的。因爲如此，所以譬如一個私家銀行，覺得發鈔票是有

利的，總是設法要求發鈔權；國家却不能不顧及鈔票濫發，不獨影響持票人的權利，並且擾亂整個市場，所以不能不有禁止或取締。譬如利用資源，一個私家公司，亦許因爲地曠人稀無利可圖，或許贏利須待一百年後，方可實現，不願進行；國家可是不能不顧及全民的福利，竭力提倡，雖暫時損失亦所不計。譬如勞工，一個私人公司，儘利用工人的愚蒙和貧苦，極力壓低工資，待遇苛刻，設備可粗陋，以使減低成本，加增贏利；國家可是不能不想及工人生活程度過低，不獨影響目前的社會安寧，並且後來

人民體格的薄弱，知識的淺陋，亦由此種惡根，故不得不爲工人特別保護。所以在十八世紀末年以及到十九世紀中期，雖然自由主義盛行，競爭猛烈，公私利益一貫的學說風靡一世；但是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即起一種反感，覺得私人的利益不獨和公衆的利益不一貫，並且時常衝突，所以德國採取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施行工業保險老年恤金等等，英美法等國，亦莫不有各種勞工保障國家保險等法令。但是當他施行以前，沒有一個企業家不反對的，因爲這些法律，處處干涉私人經濟的自由權，減低利潤的機會。歐戰以後，像蘇俄的計劃經濟，意大利的集團經濟，祇是澈底否認公私利益一貫的學說的表現而已。

我們說了一大堆商人所謂高談理論無裨實際的空話，爲的是說明商人心目中看見的祇是私人利益。我們還應申論這個利益亦許是他們私人獨得，亦許是在他企業範圍內的人分得。譬如銀行投資政府的公債，索取高利，享受贏餘的，當然不限於股東經理和其他辦事人員；凡是存款於銀行的都可分得。可是這個，仍舊是私人利益，因爲銀行向政府承銷公債，索取高利的時候，他們的股東和存款人，固然照顧得。沒有存款於銀行的絕對大多數老百姓，因爲公債利息高，而負擔加重，銀行家幾會想着？再如設想

國家有方法可以借筆大款，把所有高利公債，掃數收回，發行低利公債，可是銀行適巧歷來便靠公債利息而得贏餘，現在債利減低，無贏餘可得，銀行還是贊成政府收回高利公債呢，還是反對呢？我想我們可以不必代為答覆。當他沒有收回以前必有種種辯詞，如擾亂金融哪，維持大信哪，甚至於說爲大多數人民生活所寄哪，但決不會說這個辦法根本侵犯他私人牟利的機會。這種事實，歷史上亦有先例。譬如英國的「立梭爾」，我們似乎亦鬧過一次，可是修改不大，影響私人利益甚輕。（因爲原來的利息太高，就是商界中人亦承認因爲債利太高，投資工業，遠不如投資公債來得穩妥合算，因此間接影響小企業。）

商人儘管口裏或紙上說爲大衆謀利益，其實隨時隨地所盤算的，是他們切近的私人利益。一個銀行家可以不問全民負扣，革命政府可以投資，軍閥政府亦可以投資，亦許自動，亦許被動，但是他們不能不顧及股東和存款人的利益，從革命中軍閥中巧取高利。一個公司經理，可以不顧輿論，不擇手段，奸取詐奪，可是不能不顧及公司投資人，因爲謀利是他們的職務，亦是他們存在的理由。但是天下事，往往有因爲保護投資或存款，而認爲這就是爲社會服務，爲大多數謀幸福。究其實圖謀私人利益是主產

品，有餘力纔輪着社會。所以社會的福利，就私人經濟而論要是真個實現，祇是一種副產品，有時還須犧牲這個副產品專謀私人利益。我想這種以私人利益爲目的，任何商人任何商業經濟，都不能否認的。因爲如此所以在我們政府起始所謂經濟建設，施行所謂統制的期間，聘用大批商人，付以經濟大權，同時這些商人，仍舊執行他們本身的業務；或名義上雖然脫離，實際上仍是藕斷絲連的；像這樣半官半商，非官非商，就國家經濟而論，實在值得討論他的得失。我在一個月以前的本刊內，談及統制經濟的人必須能利用統制經濟的名詞和機關，而謀個人更大的利益；更好的是肯犧牲向認爲個人應得的利益，而謀公衆的利益；最好的是能受公衆制裁，不拘成見，不狗僻好，而唯以社會的福利爲前提。這些亦就是在此地所談國家經濟施行上應有的標準。我想時人談統制經濟的，亦必以此爲箴規。除非有人大加的公開的說，各種統制委員會，他的目的，完全是救濟有關係的各業商人的利益，或和各該業有關係的銀行，所謂謀大多數利益，都是假話飾詞。

我想政府任用商人付以經濟大權，其動機不出乎（一）政府人員辦事效率太低，能力不足，（二）官吏尤其是中國官吏，不但人民，就是政府自己，亦在猜疑個個都有弄

弊的可能，(三)商人同官吏比較。辦事認真迅速，(四)商人對本業澈底明瞭，響應氣求，進行上不致有何窒礙，(五)政府借此可以聯絡商人，以後通融借款，比較更為順利，(六)聯絡商人，作政府的後盾，政治的中堅，(七)經濟建設，在在需錢，商人掌政款項自誤，政府無籌款的困難，而得推行經濟建設的美譽。這都是就好的動機來說，就是近今各種行政改革中最充足完美的理由。但是商人執事掌經濟大權以後，要是國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發生衝突，他們肯不肯就私人方面退讓？要是絕對矛盾，是否肯完全犧牲私利？要有可以幫助私人利益的時候，是否都公允待遇，絕無偏好？要是借着政府名義，可謀絕大私人利益，是否肯放棄機會，一以社會福利為前提？要是事關百年大計，是否能放開平素商人的眼光，而謀長久的計劃？譬如絲業的衰落，其原因極為複雜，人造絲的競爭，消費習慣與化樣的變動，華絲粗細不勻，長短不等，不合國外機織，和近年世界商業的凋零等等，均須考慮。要是光以人力提高絲價為目標，而不究根本改良的方法，不獨成效難期，亦且虛耗國幣。但是講求根本改良，需時費錢，豈是目下一般絲業中人所希望？這種公私矛盾，是「統制」上極難解決的問題。譬如紗業，廠家希望美棉越賤越好，國家却

有借款關係，須還本付息，不能不考慮將來國庫負擔。提高紗價為一般紗廠主人共同的希望，可是紗價提高，紗布當然亦提高，這個便影響大部分國民生計。並且廠家肯承認生產方法有改良的餘地麼？要是承認，又肯負擔損失麼？假如洋貨競爭仍在，我們暫時用人力提高紗價，又能永保這種優勢麼？這裏又很明顯的表示着公私經濟的衝突，統制的人又怎樣辦？一個存紗問題，便鬧得紗布交易所停拍三日。就報紙所載，似乎完全是商家與商家利益的衝突，還談不到國民將來的負擔和生計呢。招商局與國有鐵路訂立水陸聯運辦法，而私家航業呼號反對，言詞激烈。招商局收歸國營，不是統制經濟麼？加入水陸聯運，不是統制經濟施行時應有的步驟麼？當政府要人高唱「統制經濟」時，沒聽見有人反對，並且似乎商人亦默認為救國良方，何以實行時便目為共產行為呢？揣其意，當然是國家利益，商人均沾，有一向隅，便不平則鳴了。我們看了這種新聞，不禁發生少數私人瓜分國家利益的感慨。然而現在掌理航業的，適巧是一批商人，他們又將怎樣應付呢？

亦許有人說：「現在中國的政局如此混亂，官吏苞苴滿道，人民顛沛流離，商人求私利極為正當的事，還有不知多少要人，出其智千變萬化，正當和不正當的收入，投資工

商業，或存款中外國銀行；試想國家的經濟，固然有時與商業經濟互相衝突，但是掌握國家政權的私人經濟，却與商業經濟相符，要是爲國家，私人經濟或須受損失，或無大增益，要是利用地位，幫助商業，不獨對於某種企業範圍以內的人，可以幫忙，得其擁護，就是他們自己的經濟，亦可直接或間接的增進廓充。再說現在國地的財政，完全是過一天算一天的打算，將來有求於商人的，爲日正長，政府以某種經濟大權讓渡於商人，亦是酬庸的一種辦法，那裏還談得到百年大計，民生政策，國家經濟等等？」

要真是如此，那是明白的不計利害敷衍過日官商勾結，斂取民財。那麼社會科學實在無用，尤其是讀經濟的人，定貽不識時務肆口空談之譏了。但是一個國家，上而執政，下而小民，統以私利爲前提，國使不成國。我們當然希望政府無論是商人政府，還是官僚政府，總還有少數賢良，肯犧牲私利，爲社會謀健全永久的幸福。

又許有人說：「你這篇論述，完全缺乏歷史眼光。試

問那一箇國家，那一個時期，沒有統治階級？那一個統治階級，不依靠政治力量，圖謀私人的經濟利益？」誠然誠然。譬如俄國，帝俄時代貴族壓迫人民，蘇俄時代，工人佔據超越地位。譬如美國，工業家銀行家操縱政府，把持關稅政策和資源利用，雖則人民生活程度，較任何國都優越，可是利益享受，並不平均。可是不要忘掉：統治階級並無一定；階級鬥爭亦是歷史上的事實。如何削弱或減少鬥爭的動機和激烈性，使其逐漸演化推進，如意大利現在集團經濟所希望的目的，這是值得政治家經濟家深切的注意，尤其是現在紛亂的中國，說不出階級鬥爭的實質和趨勢的時候。我們聽見英美的人說現在勞資雙方齊往政府進攻，奪取經濟利益，可是把大多數的消費人利益，整個漠視或忘記了。在中國，我們希望時刻要錢不擇手段的政府，和圖謀私利多多益善的商人，兩者之間，不要忘記數萬萬人民目前和將來的生計和福利。

十一月十九日

改進西北農業應取之程序

沈宗瀚

致西北諸省窮苦之主要原因有二，交通不便與雨水缺少而已。華洋義賑會有鑒於此，乃與省政府合作提倡水利

，遂有民生渠及渭涇渠之興築。所可惜者，振興水利，原爲農業。而此渠之成全由工程師主持，初末請農業家及其

他專家之諮詢。作者于今夏赴歐美考察農作物育種事業，道出美國西部，因即就灌溉農業專家C.S. Scofield, D. Wees等，旱農專家E. F. Gaines, J. H. Parker, C. E. Legnty, H. M. Wansen等，即以灌溉農業之發展，及旱農方法之研究。得悉每年雨量，在 Washington州Lind 僅七八英寸，在 Oregon 州 Moro 僅十一，五英寸，在 Utah州 Nepu 僅十三英寸，其乾旱程度，竟在甘國西北旱區之上。（每年雨量，在西安民國二十一年為二十九英寸弱，薩拉齊今年五月至九月雨量特多為二十二英寸。然普通每年約十三英寸。蘭州二十一年九月至二十二年六月為五英寸強。然其最多雨量為七月與八月，全年約十英寸許。）灌溉事業美國于十九世紀中葉即有進行，主其事者，其所見與我國主辦民生渠與渭渠者同。彼等以為建築溝渠，乃工程師之專責，故專請工程家主持之。迨鉅金既費，溝渠告成，出水灌田，而弊端叢生。初以為渠水灌田，利必倍蓰，政府積極提倡，商人踴躍投資，而結果則非但利無所獲，即築渠資本，亦付東流。如初築之渠，一部分早已荒棄。此非由于築渠灌田政策之根本失敗，乃由于主其事者，將此關係農工經濟，及以往各方面之重要工作，委諸一二工程師之身。習工程者，僅知工程而已，土壤之性質不

知焉，作物之適應漠然焉，渠水之成分不問焉，貿然興工，失敗亦意中事耳。美國自受此創痛後，深覺以前之非，故後築之渠，皆請工程師，農業家，法律家及其他有關之專家，相互討論，共同設計。于土壤之利益，作物之適應，灌溉之便利，工程之堅固耐久及排水之靈便合用等問題，攷慮週詳，務求所築之渠，能實地福惠民生而富國庫。作者有鑒于西北灌溉之重要，築渠不慎之危險，深望主張開發西北以振興水利為前提者，對於興築溝渠，不蹈美國七十年前之覆轍。荒地成為沃土，或良田變為不毛，成敗利鈍，反掌之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慎也。

水利與農業之關係——開發西北，事業繁重，即就振興農業而言，亦千端萬緒，罄竹難盡。今姑就解決西北之乾旱問題而論，則開闢水源，改良旱農，實為當今急務。據伊氏及哈定氏所著之灌溉論，（參攷書三）水利與農業關係，依各地雨量而不同，茲列表如下：

氣候分類	乾	旱	半乾旱	多雨
每年雨量	少于十五英寸	十五至卅英寸	多于三十英寸	
水利與農業之關係	必須灌溉否則作物難于生長	灌溉可以隨便	灌溉祇宜於特種作物（如水稻）	

凡每年雨量，少於二十英寸之處，播種麥類，高粱，

粟等，尙屬可行，惟產量之多寡，全隨每年雨量之多少而定。若水利振興，灌溉便捷，產量必較豐而可靠。振興水利時，可參照水源而分築渠與掘井兩種辦法。山川附近，建築溝渠，以資灌溉。平原地下水位較高之處，可掘井以資灌溉。

溝渠灌溉——吾國東南諸省，河流衆多，灌溉便利，故農產豐富。惟在秦漢之時，阿甘一帶，溝渠縱橫，灌溉亦稱便利。故彼時之西北，原爲吾國福地，農產豐而文化盛，不遜於今日之江南。五代以還，溝渠淤塞，旱災屢見，迄今而有十年九旱之稱。故主張開發西北者，咸以築溝灌水爲救濟旱荒之第一問題。作者有鑑于美國十九世紀築渠之失敗及我國西北古代溝渠之淤塞，故于我國之振興水利特主慎重。攷西北各部之土壤內含鹽類極多，（據金陵大學張乃鳳先生分析陝西土壤之結果，表土溶液濃度約爲百分之一，底土溶液濃度較高，約爲百分之二，）河水多鹼性及泥漿。故在築溝造渠之前，對於當地之土壤，氣候，水質，作物，工程計劃，及經濟，管理等，均須先作調查及設計。然後根據調查及設計，擇其最宜築渠，而灌溉收效最大之地，先行興築。迨農產因灌溉而增加，國家財源，亦因此得稍恢復，乃就收效次大之地興築。故興辦水利之

第一步工作，爲審定灌溉區域之狀況。舉凡土壤，氣候，作物，工程，及運輸，銷售，管理等，均須詳細調查，瞭然于懷。茲將必須調查諸點分述於下：

（一）土壤關係——土地高低相差太大者，需人工以平整之，費用浩繁，實不宜於灌溉。土內鹼性太重者，需水多而得利少，故亦不宜灌溉。沙土瘠薄，不能積水，灌溉時費水多而收效小。粘土質密，水不易滲透，灌溉時，水中所含鹽類，（如鈉）滯留土中，妨害作物之生長。表土淺薄者，根不能深入，亦不宜于灌溉。最宜于灌溉者，爲平坦的壤土，能容水至相當程度，及相當深度，俾根易於吸水，而水有餘剩時，心土亦能滲透，使水中鹽類不致滯留。有時表面爲壤土，心土則爲粘性之土壤，或爲岩層，水不能滲透，鹽類漸積，一經陽光蒸發，鹽類隨水上升，增加表土的鹼性，極妨植物之生長。美國若干灌溉區域，其所築之溝渠，終于放棄不用者，由于築溝之前，土壤性質，未曾注意，迨溝成灌田，而弊端叢生。我國西北平原，欲利用水位高低以排水，頗爲困難，或竟須築渠滯水，開溝排水，雙方並進，亦不爲奇。

依我國土壤調查之結果，華北平原，多係黃土，土質差異較少。美國普通乾旱區域，土質差異較大于多雨之區

。故每有在同一區域內，一部分之土壤，宜于灌溉，而農產品之產量，因灌溉而增加。其他部分，因土質不同，收效或適得其反。工程師常因工程之便利，及經費之節省，而將灌溉區域，集中一處。其實為便利農業計，溝渠散佈各地，實較集中一處者，為易收效。據美國一九三〇年之統計，（參攷四）美國政府用于灌溉事業者共為美金二萬五千萬。原來計劃，此項資本，可由灌溉田畝之收入，逐漸償還。然據一九二六年之調查，灌溉區域內，因圈入惡劣土壤，資本之不能收回者已為二千七百萬元有奇。此由于事前土壤調查未曾完備之故。要之我國西北旱區之必需灌溉者，目前急須着手于土壤氣候及作物之調查，短期內完畢，作為灌溉工程之參攷。

（二）氣候調查——作物之生長時期，及所需之溫度，因種類不同而各異，故除注意于土壤調查外，尚須調查測量其溫度，雨量，降霜期與下雹期等。例如美國加州南部，終年溫暖，本為乾旱之地，因灌溉而得廣植柑桔，銷售我國之花旗橙，即由灌溉之賜也。

（三）作物試驗——灌溉區域內之生長費，既因灌溉而增加，栽培作物，自宜力求其利益最大者。在西北交通不便之地，所種農產品，當取其容積小，而便于運輸，其品質

不易腐朽，而能久藏。目前西北之農業機關，即可進行作物試驗，審定何種作物馴適當地環境，何種作物利益最大。依作者初步觀察，棉花，小麥與煙草，利益頗大。西裁氣候，宜于牲畜，如因灌溉而得栽培牧草（如 Alfalfa）大畜牛羊，輸出皮革與羊毛，獲利必厚。我國所用糖類，大半由國外輸入，西北灌溉區域，宜試栽甜菜，苟有希望，宜即以之為製造甜菜糖之預備。靈寶所產生之美棉品質最好，苟陝西中部與西部之氣候適宜，則灌溉發達時，棉花區域，能向西推廣，于我國國防用具上，實一大助。棉花為製造炸彈火藥之原料，美國軍部製造火藥，專用南加魯拉那州（South Carolina）所產之棉，取其纖維細長，品種純潔，品質整齊，以之製造火藥及炸彈，燃燒力與彈炸力整齊一致，鎗炮射擊，得以準確。我國現製彈藥，多取材于海門崇明等處所產之棉，非特纖維較美棉為粗短，且品種不純，品質雜亂，為鎗炮射力不準之一主要原因。

（四）水質與水量之調查——水中含有物之種類與質量，因水源與經過地方及四季時期而不同。其對於作物生長之利害，及土質變遷，關係甚大，故灌溉水之性質必須經過理化的分析，審定（1）水中含有何種鹽類 Salts 及其數量，（2）鹽類的來源，（3）灌溉水出入農田時所含溶解鹽

額數量的差異。凡鹼性或鹽類太重之水，不宜灌溉。

水量的調查，為決定灌溉畝數的先決問題。夏季水量，常患不足，冬季則患太多。灌溉水之耗發，與能為植物

利用的數量，依美國 B. A. Etcheverry 及 S. T. Hardins (參攷二) 研究結果如下：

種 類	最低限度%	普通狀況%	最高限度%
土面遺失	〇—三	五	一〇—二〇
心上滲透	五—一五	二五—四〇	五〇—六五
土面水分蒸發	五—一〇	一〇—一五	一五—二〇
除存而能為植物利用者	七〇—八〇	四〇—六〇	二〇—三五

砂礫土壤的心土滲透極易，土面遺失殊少，土面水分蒸發較普通狀況為少。反之在斜坡的粘土，則土面遺失與蒸發增多，而心土滲透量減少。在最好之環境中，植物所能吸收者，不過灌溉水量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在普通之環境中，植物所吸收者不過二分之一，在不良之環境下或因灌溉水量太多或太少，植物所能吸收者，常少於三分之一的灌溉水量。

灌溉之水，大部分由土面及植物葉面蒸發，土中溶液濃度，因以大增。在灌溉土中，濃度百分之〇·五，為常

見之情形，有時高至百分之一。(參攷一) 植物所能吸收之溶液的濃度，因種類而異。然普通的限度為百分之一·五。

農夫灌水，切忌太多。普通工程師，注意於灌溉，而忽視地下排水工程。遂致灌溉水量太多時，停滯土中，而鹽類集積，同時因土面蒸發上升，增加表土之鹼性，土質劣化。

(五) 灌溉農事試驗場——灌溉事業最穩妥之方法，當于工程，水質，土壤，氣候，作物及管理灌水等工程，先作小規模之試驗。待有成效，然後着手于大工程之推進。美國對於灌溉事業，自經初次失敗後，即改變其工程師獨裁政策，而易以各專家之互相討論。先照其設計作小規模之試驗，待進行順利，然後作大規模之進行。

(六) 工程計劃經濟攷慮及管理問題——灌溉事業之關係農業方面者，已經調查明白，而研究妥當後，乃請工程師計劃工程，與農學家共全攷慮經濟之得失，而定工程之進行與否，最後聯合法律家討論灌水及溝渠之管理問題。待灌溉事業完竣後，則須合作家及運輸家計劃農產品之銷運與販賣。要之，灌溉事業，關係甚廣，斷非一二專家之所能解決者也。以此關係數方面之工程，委諸于一二工程專

家，流弊必多，美國已食其惡果，我國當引為殷鑒。

西北旱農問題。乾旱之區凡土壤水質氣候工程等宜於築渠或掘井以引水者，自當變為灌溉區域。其有不宜於灌溉者，祇能仍為旱農區域。旱區農產，雖遜於灌溉區域，如能育成抗旱品種，改良農具，整地，與耕栽方法，則農產品亦可增進，此美國之所以於最早區域如 Lind, Moro, Nepin 諸處（各處雨量見第十面）均設有農試驗場也。

我國西北旱區，小麥，高粱粟等栽培最多，育成抗旱品種，當從此種最主要之作物入手。此外各種牧草，果木及樹類等，亦當試栽，俾知何種最為相宜。依作者在 Sind（每年雨量為七，八英寸）考察所得，牧草以 *Vicia Villo-sa* 生長尚佳，餘多早死。小麥品種 *Deart* 抗旱能力最大，產量遠超其餘品種。豌豆以 *Kaiser* 品種最佳。質言之，抗旱能力，依各品種而大異。用育種方法，以試驗何種品種抗旱力最大，甚為緊要。他如播種，與耕耘之日期及深淺，對於產量亦大有關係。旱况因地而異，旱農試驗場，宜因乾旱程度及自然環境之差異而設立。

德國殆沙砂土，從前祇能栽培質劣量少之蕎麥 *Rye*，年產三百萬噸。近十餘年來，人民喜食小麥麵包，而厭棄蕎麥麵包，故蕎麥供過於求。Bath 及其同志將普通小麥

Triticum Vulgare 與蕎麥，及異種小麥如 *T. Spelta* *T. dicoccum* 又野草 *Aegilops*，等雜交，已育成小麥新品種，得在瘠薄之沙土中栽培之。

俄國乾旱區域，極為廣大，佔地約五百四十萬方畝，米達 *Square Kilometers*，為全俄面積四分之一。各處每年雨量均不及十六英寸，即與綏遠甘肅旱况相類似。俄在該地，設大規模之旱農試驗場（如 *Saratov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Saratov, U.S.S.R.*）研究何種作物最為適宜。例如小麥，蕎麥，葵花，粟，高粱，玉蜀黍，馬鈴薯，及牧草 *Alfalfa, Brome grass* 等作物耐旱力較強。凡交通不便或雨量不甚可靠之處，多栽牧草，飼養牛羊。牧草根深，較普通作物為耐旱。牛油羊毛容積小，價值高，而運輸便此外更設立示範農場，實地應用試驗場研究之結果。其政府一方面更借與農家資本，獎勵試用旱農新法，數年以來，生產倍增，貧苦之旱區，漸變為繁榮之農村。此實為俄國五年計劃中之一要政。俄國一方面固能用政府權力，協助農業專家，使其研究結果，得以實行。同時對於徒託空言之專家，則又嚴予警戒。有某著名農學家，自謂對於某種農作物之育種，有大發明，惟農家應用其發明而不收特效，政府即下此農學家於牢獄一年，然後令彼繼續研

究。

在我國西北不能灌溉之區域，宜按雨量之多寡，及氣候土壤之差異，設立旱農試驗場，注重旱農方法。參考各國已有之成績，實地改良品種，及栽培方法，防治病蟲害，提倡畜牧及造林。五年後必可稍有成就。十年後研究之結果，當可推廣。西北農村常漸入繁榮之境矣。

西北農事教育。西北貧瘠，教育程度較底，目前宜先設灌溉農業試驗場與旱農試驗場各一，集中優秀人才，實地改良。二三年後，研究事業稍入軌道，乃開辦農業專科學校，以研究成績，為主要教材，短期訓練實用人才，備為試驗場助理員及推廣員。以後隨農業之發展，依自然區域而分設試驗場，最後設立大學農學院，培植研究人才。

結論

一，西北各省面積廣大，開發西北，非但為解決民生問題之要道，亦為鞏固邊防之要題。

二，開發西北首重交通與農業。

三，改進農業，首重振興水利與旱農方法。

四，有河流及山水可利用之處，宜建築溝渠。平原無此種水源者，祇好掘井。惟目前政府急須調查土壤氣候水質及研究栽培最有益之作物，以為擇地灌溉之準

備。

(五) 灌溉事業須由農業家，工程師，經濟家，及法律家等共同設計。絕對不能僅由工程師完全負責進行，免鑄大錯。

(六) 西北灌溉區域，宜設灌溉農事試驗場；旱農區域，宜設旱農試驗場，注重育種，栽培，防治病蟲及提倡造林畜牧等試驗。

(七) 西北農事教育，從實地改良入手，以後將研究之成績作主要教材，訓練實用及推廣人才。

(參考)

(1) Scofield, C.S. (1923)—Agriculture on Irrigated Land.

"A. Survey of Reclamation," Mc Graw Hill co. N.Y.

(2) Scofield, C.S. (1933)—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1971 meeting of the Synopsis Club. (Unpublished)

(3) Etchevery, B.A. and Harding, S.T. (1933)—Irrigation Practice and Engineering, Vol. I McGraw-Hill Co, N.Y.

(4) Weeks, D (1933)—American Irrigation Policies.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平教會與定縣』(通信)

李明鏡

編輯先生：

前天在獨立評論上見到燕樹棠先生「平教會與定縣」

論文，及蔣廷黻先生跋文，展閱之餘，腦海中不禁生出無限的感想，總覺有話要說。不過燕蔣兩先生，俱係中外知名的學者，我僅係一個平教會平民學校畢業生，當然相形見拙，絕不敢以論辯的口詞自比。但蔣先生既非定縣籍未蒞定縣境，而燕先生雖係定縣人，確已多年拋離故鄉久客在外。我自己不但是生於斯住於斯，而且係平教會平民學校的高才畢業生，並現任同學會指導員，與我們的會長晏陽初先生，主任霍六丁先生，曾談過許多次的話，對平教會與定縣的情形，要按聽過不如見過，見過不如經過的原則，比兩先生的道聽途說總覺確實真切，所以放膽的寫幾句。

燕先生第一條所述「定縣人懷疑晏先生辦平教會不在其故鄉四川，不在人口衆多的平津，亦不在文化低下的隴綏，而在久稱模範的定縣」。這一點定縣人或有一部分如此設想，但是許多人尤其是我們同學會員，都能明瞭其中

的原因，而不懷疑，因為我們會長曾經說過「都市文化較高，人心奸詐，僻壤的民智太低，過於魯鈍，這兩種社會的人，不是狡猾難訓，就是朽木難彫，推行政策實為不便。今為推行容易，收效迅速起見，不能不擇定在稱模範的定縣」。即使就我個人的眼光看來，定縣也底確是一個萬無一失的良美試驗場，因為既稱模範，比平津固然是望塵莫及，然比其他縣份，總是略高一籌，且民性誠樸，不似平津人民難治，在這種地方來試驗，不但政策易於推行，成績易於顯著，即或試驗失敗，亦不至毫無成績可言，總能憑藉原有成績，足吹一氣，使世人信仰之深，使美國大財閥竭力捐助，并使其主義立於安全不敗的地位，依此看來，這試驗區域，是至美至善毫無可疑。

燕先生謂定縣民衆，對平教運動之領袖，向來即不表信任的話，未必盡然。何以言之，平教會於民國十二年在翟城村設立分會，當時規模狹小，即晏先生亦不常來，然該村供給地址幫助建設，不信任，何能如此；至民國十七年將總會全體挪到定縣，供給會址自不必言。其他種種便

利，難以歷述，從此大事宣傳，廣爲鼓吹，我縣一般患着

員的供應品了。

愚窮弱私的老百姓，見有對症下藥的神仙駕臨，莫不爭先恐後竭誠歡迎，如唐城，牛村，高頭，馬家寨，大深河，南支合等村尤爲熱烈，幸均蒙劃爲首先中心試驗村，於是各該村的平民班，表演班，農民循環訓練班，均相繼成立，我被求知心的驅使，亦同加入就課。如謂不信任者，何能如此？不過後來因種種情事，感觸我的精神，趨於不滿意的途徑，就漸漸懈怠了。茲分述各種情形如左：

一。務虛名不講實際。其中職員工作，及一切設施，十之七八係爲應付參觀者之欣賞，對社會實際改良，並不注意。譬如以前當內政部次長甘乃光先生及美國某博士來定參觀之際，會中前一日即派員到各村預備一切，囑我晝夜加工建了幾所新雞豬羊的窠房，由會上送雞豬羊數個充實其中，同時並攜來誘蟲燈兩個，拌種機一個，並囑余對參觀人說此物使用已久，成績頗佳等語，臨行又囑託屆期務盡力捧場。當時我心中雖十分不滿，然既受託，終久照樣應付了一下。其他無論何時，凡遇參觀人來，總要作滿意的表示，可是要無參觀人的時候，那平教會的職員，可就杳如黃鶴了。偶有一二，多係差役人等，後來聽說旁的村莊，亦同是如此。哈哈，我等數村人民可算成了參觀人

二，新設施之不適應用。蓋以所講述者，非中國故有通用舊說，即外洋不相倫類的新法，人民絲毫得不到改良的好處。有一次會中衛生部長，（老師姓名恕不發表）講授臭蟲，跳蚤及蚊蠅治除法，當時聽講人的踴躍，教室內竟無隙地，老師莊嚴的先述各蟲之害，次治除方法，應將房屋用石灰週抹一次，打上灰頂棚，窗糊紗門懸簾絲毫不留孔隙，並備蚊帳，粘蠅紙，蚊蟲香等物。如無力購置即勸拿勒打亦可驅除云。又一次生計部長談，謂農業及牧畜，中國人對設備及方法不求改良，生產落伍，乃必然之結果，以後對農業要用火犁深耕，藥品拌種，肥田粉施肥，對牧畜之豬羊雞應絕對採用洋種，用潔淨糧草，按時飼喂，方可改良。諸位不見會上所種盈握的美國棉，逾尺的俄國玉蜀，及所養八百斤重的波支豬，產四磅奶的瑞士羊，及產二兩重卵的來杭雞嗎？諸位不必懷疑，照樣作去行了，我一聽此言略加循思，就是可惜吾資財太少，糧食有限，終久未敢試驗。現在各村除吾儕一部同學會員仍希望更好的方法領受外，其餘大多數的老百姓，可以說毫無信任之可言了。

總而言之，定縣人對晏先生在定縣辦理平教會初期的

時候，定縣人何常不是神仙般崇拜信仰？後來因種種事實，纔變為失望，疑惑，不信任的觀念。

再進一步言之，就是定縣人對平教會由不信任而變為反對態度，其中亦有許多事實，原因略述如下：

甲，因為好的成績不及壞的影響大。就衛生言之，平教會在鄉間所指導的衛生政策，固然行不通，然在城內所設之保健醫院，曾經治療過許多的病人。就教育說，十年經營畢竟造就出來了三千多名平民學校畢業生。（燕先生說一萬名，實在只有三千多，或者算入旁的份子，亦未可知。）就職員之工作言之，十年以來會中盈筐的計劃書，

滿櫥的調查表，這些東西，都是苦心勞力的結晶，雖大部免不了閉門造車，虛添冒寫的弊病。（開會中有一種每月活動表，據我所知各處同學會員實行工作的很少，而累次表冊，總是逐項齊添，並在報上大乎其吹）而不合於實際，但是多少總該有點有用的。凡此種種絕不能不算是成績；並且是定縣空前無有的。燕先生說平教會在定縣的成績，全係有名無實，全是冒功冒名的宣傳；實在有點過火。不過定縣民衆近十年來因平教會擴大挑撥之宣傳，及闊綽浪漫之薰陶，於不知不覺之中，潛移默化，而變作矯慢囂張奢糜淫侈的民性，以致團體黨派盲目無知之徒，如春筍

般的相繼而起；長此以往，民氣蓬勃，必至無法收拾，而終歸於崩潰糜爛的地步。這種社會危機，與以前的成績相較，實在是天淵霄壤不可以道里計了，

乙，平教會員欺騙鄉愚 出口便述那冠冕堂皇仁義為懷的口頭禪，然考諸實際，實在有對不起老百姓的地方，我曾聽說有一次會中生計教育部農場裏邊所飼養的洋雞，通同得病，養雞專員，恐一旦雞死去失名譽，乃以推廣為名，將所有病雞，全數散給唐城村民，但日子不久，不獨送去之洋雞全數死亡，即該村原有之中國雞，亦被傳染而死，同時并波及臨近數村。

丙，同學會之跋扈驕橫 按說同學會員，都是受過三個月之平民教育，由文盲而變成的知識份子，本來應以先知先覺之資格領導其他一般愚民才對。但是同學會良莠不齊，大部份無業流氓，（因為有職業者無餘暇與平教會去周旋，）而所受的教育，又係浮的，誇張的，其習性遂變作驕傲放縱的氣象，更加以霍主任係接充縣長，急於圖功，利用此輩為行政作治之膀臂，於是同學會干涉村政，爭奪權利，惡劣份子則乘機肆虐，魚肉鄉里，一般愚民對平教會既失却信仰力，復受種種凌辱，豈有不痛恨的道理呢？（下略）

〔編者附記〕李君此文中所指燕樹棠蔣廷黻兩先生討論「平教會與定縣」的文字，登在本刊第七十四期。又第七十六期有定縣縣長霍六丁先生「答燕樹棠先生」一文，請閱者參看。

李君此文太長，我大膽刪去了一部分。如末段

(丙)項原文舉一事例，我們有點懷疑，所以刪去了。此文(乙)項所舉唐城村病雞一事，李君說是「曾聽說」的，我們也有點懷疑，希望本地的朋

友給我們一個有力的證實或否認。

最後，我要聲明：我也是沒有到過定縣的人，但我對於平教會的態度大致是和蔣廷黻先生一致的。凡是一種社會改革，總免不了「民怨沸騰」。我們替定縣的改革家發表一點「民怨」，也許可以給他們一個辯正解釋或參攷的機會。子產說的好：「夫人朝夕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適)

◎獨立評論社啓事

我們歡迎各地讀者的投稿。投稿者若不願用真姓名，當然可以用筆名，但筆名之外，投稿者務必把姓名和住址告知本社。凡只有筆名而無真姓名住址的文字，恕不登載。

我們這個刊物是十幾個書生捐錢捐力氣合辦的；我們至今還沒有酬報投稿人的能力，所以只能送贈本刊若干冊作爲一點點報酬。凡投稿人願意本社贈送本人或他的朋友的，請告知本社。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
朝鮮	每月一元二角
台灣	每月一元五角
日本	每月二元
國內	每月一元
香港	每月一元二角
澳門	每月一元五角
南洋	每月二元
歐美	每月三元
海參	每月四元
威	每月四元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第三卷

學風月刊

第九期

要目

- 對於「讀圖書登記略說後」的答辨雀懷怨
- 金山花近樓詩日解題(九).....金 濤
- 城南草堂曝書記(一).....王立中
- 李義山評傳(下).....張振瑛
- 諸子百家兼通互見攷.....吳壽錢

- 婺源風土誌.....李聚非
- 黔縣著述人物攷.....蔣元卿
- 合肥廬江著述人物攷補.....李孝瓊
- 編印及發行：安慶安徽省立圖書館
- 定價：每期售洋一角全年十期連郵一元

外 交 月 報

第三卷第五期出版

- 廿二年十一月號要目
- 不平等條約消滅期.....吳本中
 - 英日同盟之經過及與中國已往暨.....
 - 將來之關係.....吳柳隅
 - 最近之日俄關係.....張松筠
 - 德國退盟與中日問題.....拙 民
 - 美俄外交關係與中國(續本卷二期)張慎修
 - 蘇聯農業之集體化.....李彭齡

廣田外相就任之始末.....曹謙之譯
 日本亞洲政策之經濟的結果.....方鍾徽譯
 日本對我國棉麥借款等措.....借 徽
 施之態度.....借 徽
 (此外譯稿稿件尚多不及備載)
 零售 每册大洋三角 國外五角 半年六
 期內一元五角 國外二元五角 全年
 十二期 國內三元 國外五元
 社址 北平府右街運料門裏外交月報社

平 明 叢 書

出版預告

本社自明年年度起，精選各國名著，編譯平明叢書，每月至少出版一册，第一種各書書目如次：
 第一種 世界危機一九三六年(明春一月出版) 徐繩祖譯
 第二種 統計經濟原理(二月出版) 向井鹿
 第三種 中國的土地與勞動(二月行版) 一月起始預約) 唐
 第四種 蘇聯的民族主義(三月出版) 二月起始預約) 康 恩

社址：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街十二號

革命與專制

蔣廷黻

原則政治

瀟瀟

重游北美的幾點感想

衡哲

爲中小學教員說幾句話

希聲

介紹農民化的湖南修業學校

吳奔星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 侯文齋(代定) | 景華書社 侯記書社 | 王府井 民智書局 良友 | 公司 立新書局 米市大 | 街 新中書社(代定) 西單 | 中和書社 志遠書店 | 平和不書社 嘉陵書社 | 中書社 青年書社 華 | 社 時代書店 長光書社 | 增 神州國光社 星雲 | 廠 內 神州國光社 星雲 | 宣 內 神州國光社 星雲 | 沙 灘 北大 一院 德信 | 永 景山書社 | 清 華 消費社 燕大燕昌號 | 成 府 競進分社 | 天 津 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 | 局 精 華 印 書 局 紫 房 子 | 書 報 部 | 現 代 書 局 (總 代 售 及 代 | 定 處) 新 月 書 店 亞 東 亞 | 書 館 光 華 書 局 新 中 國 | 新 中 華 書 店 | 新 中 華 書 局 正 中 書 局 中 | 鐘 山 書 局 大 中 書 局 花 牌 | 央 書 局 (代 定) 天 一 書 店 | 江 蘇 店 |
| 南京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南京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南京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
| 上海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上海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上海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
| 天津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天津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天津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
| 平西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平西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平西 | 新中華書局 | 鐘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花牌 | 中央書局 | 大華書局 | 天一書局 | 江蘇店 | |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 | 振華書局 | 現代書局 | 新 | 開明書店 | 時代書店 |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 | 廣州 | 神州國光社 | 現代書局 | 新 | 廣州 | 神州國光社 | 現代書局 | 新 | 廣州 | 神州國光社 | 現代書局 | 新 | 廣州 | 神州國光社 | 現代書局 | 新 | 廣州 | 神州國光社 | 現代書局 | 新 |

獨立評論

第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革命與專制

蔣廷黻

自閩變的消息傳出以後，全國人士都覺得國家的前途是深黑的。中國現在似乎到了一種田地，不革命沒有出路，革命也是沒有出路。

你說不革命罷，這個政府確不滿人意。要想使牠滿人意，單憑理論是不行的。倘若你手無槍桿，無論你怎樣有理，政府——上自中央，下至縣市——充其量，都是忌而不顧的。因為政府倘若要顧的話，不是政府裏面的人的私利受損失，就是外面有槍桿的人的私利受損失。胡漢民先生近來說，政府這兩年來沒有作一件好事。這句話，一方面是過分，一方面是不足。過分，因為好事確作過，但不濟於事，且所作的好事恐怕還抵不過所作的壞事。不足，因為不但這兩年的政府是如此，近二十年的政府何嘗又不是如此？其實，中國近二十年來沒有一個差強人意的政府，也沒有一個罪惡貫盈的政府。極好極壞的政府都只在地方實現過，沒有在中央實現過。因為中央就是有意作好，牠沒有能力來全作好；中央就是有意作惡，牠也沒有能力來作極惡。這二十年來，從袁世凱到蔣介石，各種黨派，各種

人物，都當過政，大致都是如此的。照我個人看起來，就是北洋軍閥如袁，段，吳，張，都是想作好的，但都是無了不得的成績可言。因為他們的力量都費在對付政敵上去了。在對付政敵的時候，他們就不得不犧牲建設來養軍，不得不只顧成敗，不擇手段。問題不是人的問題，是環境的問題。在這個環境裏，無論是誰都作不出大好事來。中國基本的形勢是：政權不統一，政府不得好。

你說革命罷，我們的革命總是愈革愈不革。假若我們說，我們有個真實為人民謀利益，為國家求富強的革命黨，牠能濟事麼？在現今割據的環境之下，牠能以全盤精力來改造社會麼？牠斷然也是不能的。牠的精力也會費在對付政敵上。牠也必須打仗，必須練軍，必須籌餉。在牠的統治之下，無論牠怎樣想為人民謀利益，人民的負擔也是不能減輕的。且在這環境裏，牠也不能擇手段。附和者只好聯絡或收容。久而久之，所謂革命軍大半就不是革命軍了，所謂革命黨也不革命，只爭地盤，搶官作了。等到事情過去以後，人民只出了代價，絕沒有得着收穫。

這個代價之高，是我們不可思議的。我們中國近二十年爲革命而犧牲的生命財產，人民爲革命所受的痛苦，誰能統計呢？此外因內爭而致各派競相賣國更不堪設想！孫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純潔大概是國人所共認的。但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他也不惜出重價以謀日人的協助。民國三年五月十一日，他寫給大隈伯的信有這樣一段：

願以革命軍之自力，而無援助，則其收功之遲速難易非可預期。．．．日本與中國地勢接近，利害密切，求革命之助以日本爲先者，勢也。．．．日本既助中國，改良其政教，開發天然之富源，則兩國上自政府，下至人民，相互親善之關係，必非他國之所能同。可開放中國全國之市場，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獨占貿易上之利益。．．．中國恢復關稅自主權，則當與日本關稅同盟，日本製造品銷入中國者免稅，中國原料輸入日本者亦免稅。

孫先生不但願意出此大價，並且要大隈伯知道他所出的價是比袁世凱所願意出的還大。在這封書內，他繼續又說：

現在之中國，以袁世凱當國，彼不審東亞之大勢，伴與日本周旋，而陰事排斥，雖有均等之機會，日

本亦不能與他人相馳逐。近如漢冶萍事件，招商局事件，延長煤油事件，或政府依違其間，而嗾使民間反對，或其權利已許日本，而翻授之他國。（看參王芸生輯六十年中國與日本六卷頁三四至三五）

以孫先生的偉大人格尙且出此，其他革命家不屑說了。中國現在談革命，就離不開內戰。一加入戰爭，無論是對內或對外的戰爭，那就無暇擇手段了。這也不是個人的問題，是個環境的問題。比較說來，已得權者給外人的利總是比未得權者要低些。此中心理，孫先生也說過：

就另一方面言，則中國革命黨事前無一強國以爲助，其希望亦難達到。故現時革命黨望助至切，而日本能助革命黨，則有大利。所謂相需至殷，相成至大者此也。

革命黨既然靠外援來奪取政權，執政者亦只能以同樣手段對付。民國三年八月十三日袁政府的外交總長孫寶琦給駐日公使陸宗輿的電報有這一段：「我政府正籌中日免除根本誤會，以圖經濟聯絡之法」。後四天的電報又說：

前小幡面告，日政府確有取締亂黨之意，望代達主座。日前又提議，中國如願日本實行，可提出希望條件，惟須有交換利益，日本方可對付。

這樣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國就多革去一塊。久而久之，中國就會革完了！讀者不要以為我故意張大其詞。孫袁的競爭不過是個例子。假若不為篇幅所限，我可證明民國以來的外交，沒有一次外交當局不受內戰的掣肘；我更證明沒有一次內戰沒有被外人利用來作侵略的工具。九一八事變為什麼在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發生呢？一則因為彼時遠東無國際勢力的均衡，二則因為日本人知道彼時中央為江西共黨所累，為西南反蔣運動所制，絕無能力來抵抗。在中國近年的革命，雖其目的十分純潔，其自然的影響是國權和國土的喪失。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在我們這個國家；革命是宗敗家滅國的奢侈品。

這是就目的純潔的革命說。但是誰能担保目的是純潔呢？誰敢說中國今日能有一個「為人民謀利益，為國家求富強的革命黨」呢？我們平日批評西洋的政治，說是資產階級壓迫勞工的政治。無論如何，西洋至少尚有為階級謀利益的政治。我們連這個都沒有。我們的政治都是為個人及其親戚朋友謀利益的政治。所謂革命家十之八九不是失意的政客，就是有野心的軍人；加入革命的普通人員不是無出路的青年，就是無飯吃而目不識丁的農民。這種人，如革命能改除一時的痛苦就革命，如作漢奸能解除目前的

痛苦就作漢奸。拿這種材料來作建設理想社會的基礎，那是不可能的。

從歷史上看來，這種現象是極自然的，那一國都不是例外。西洋英法俄諸革命先進國，原先都與中國一樣，有內亂而無革命。如同英國，在十五世紀，所謂玫瑰戰爭，也是打來打去，絕無成績的。在十五世紀末年，亨利七世統一了英國而起始所謂頓頓朝代（Tudor Dynasty）百年的專制。在這百年之內，英人得休息生養，精神上及物質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等到十七世紀，政治的衝突於是得形成實在的革命。史學家共認沒有十六世紀頓頓的專制就不能有十七世紀的革命。法國在十六世紀正處內亂時期。奇斯（Guise）及布彭（Bourbon）兩系的循環戰爭鬧得民不聊生。彼時有識之士如 Bodin 及 L. Hotellier 一流人物就大提倡息爭主義，以息爭為法國第一急務。在這種思想潮流之中，看透了內戰的全無意義，及絕不能有意義，於是布彭朝的亨利四世收拾了時局，建設了二百年布彭專制的基礎。經過路易十四光明專制之後，法國也成了一個民族國家。於是在十八世紀末年，政治一起衝突，法人就能真正革命。因為專制的布彭朝培養了法人的革命力量；換句話說：經過布彭朝的專制，革命不致引

起割據，民族的意識太深了，不容割據發生，王權雖打倒了，社會上有現成的階級能作新政權的中心；外國雖想趁機漁利，法人的物質及精神文化均足以抵禦外侮。所以法國史家常說，布彭朝有功於法國十八世紀末年的革命。俄國亦復如此。在十六世紀末年及十七世紀初年，俄國也只能有內亂，不能有革命。經過羅馬羅夫朝三百年的專制，然後列寧及杜落斯基始能造成他們的偉業。世人徒知列寧推倒了羅馬羅夫朝代，忽略了這朝代給革命家留下了很可貴的產業。第一，俄國在這三百年內，從一個朝代國家（*d-yinas tistate*）長成爲一個民族國家。革命就不能有割據的流弊。第二，專制的羅馬羅夫朝養成一個知識階級能當新政權的中核。第三，專制時代提高了俄國的物質文明，使援助白黨的外人無能爲力。

中國現在的局而正像英國未經頓頭專制，法國未經布彭專制，俄國未經羅馬羅夫專制以前的形勢一樣。我們現在也只能有內亂，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我們雖經過幾千年的專制，不幸我們的專制君主，因爲環境的特別，沒有盡他們的歷史職責。滿清給民國的遺產是極壞的，不够作

革命的資本的。第一，我們的國家仍舊是個朝代國家，不是個民族國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對個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對國家的。第二，我們的專制君主並沒有遺留可作新政權中心的階級。其實中國專制政體的歷史使命就是摧殘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權中心的階級和制度。結果，皇室倒了，國家就成一盤散沙了。第三，在專制政體之下，我們的物質文明太落伍了。我們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漁利，我們簡直無抵抗的能力。

總之，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爲兩個階段，第一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作，談不到第二步。西人有個格言，說更好的往往是好的之敵人。中國現在的所謂革命就是建國的一個大障礙。現在在中國作國民，應該把內戰用客觀的態度，當作一種歷史的過程看，如同醫生研究生理一樣。統一的勢力是我們國體的生長力，我們應該培養；破壞統一的勢力是我們國體的病菌，我們應該剪除。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國家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不是個那種國家的問題。

十二月三日

☆

☆

☆

☆

原則政治

瀟瀟

最近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發表一篇「建國問題引論

」，末尾的結論，說今後擬將建國各種問題逐一提出公開

討論，胡先生那篇引論裏面所討論的，是一個現代化問題

，統觀胡先生和孟先生所討論的兩篇文字，問題中心是「

現代化」，他們覺得「現代化」那個名辭太籠統了，但是

我們若從建國的一個前提來看，胡先生和孟先生所說的話

，似乎也覺籠統了。我們覺得在眼前的中國，多數人近年

來實在受了籠統名辭或口號的弊病太深了。這也許是中國

人的本能：襲了一個極時髦的名辭，去做最落伍的事情；

甚至蒙了一個最新穎的題目，去做最腐惡的勾當。舉一個

眼前的事例：我有一位熟朋友，他新近戀愛上一個女性，

預定不久到歐洲去，人家問他對戀愛問題如何解決，他說

家裏的黃臉婆暫時不離婚，先帶那個新戀人到外國去同居

，他很自負的說這是他的「創造」，我聽了好笑，中國人

的多妻主義，幾千年來就很發達，那用現在再有人來創造

。創造是一個好名辭，也是一個籠統名辭，因為太籠統，

所以好的壞的都可以混淆進去，新青年的諸位先生提倡兩

性真操是創造，我的朋友提倡多妻也可說是創造，專家政

治技術治國可以說是現代化的政治，整天開茶舞會穿大禮

服發表廣播演說也可說是現代化的政治，這是值得提倡現

代化的人們去注意研究的。我們十二分欽佩胡先生提出建

國問題的討論，然而我們不希望在前討論建國問題，再

引出許多籠統的名辭或口號，牽動論壇上無謂的論戰。

從歷史及現在許多事實上看，建國固然離不開別種力

量，然而政治是超過一切的，建國是一個政治問題，離開

了政治要想建國，不是玄想便是空談。以我個人而講，幾

年來對於這個問題的思想，會經過不少的變化，我曾經深

入社會的各方面，用旅行調查及訪問各種方法去解決這個

問題，不過到了現在，我確實相信建國的過程中，政治是

一個超過一切的重大力量，從政治方面去建國，功效比從

任何方面去着手來得敏捷或者可以說是健全。中國近年來

有不少現象，不能說他不是光明及進步的，有許多人及

事業，不能說他不是成功的，我們親眼看見許多數十年專

心於一種事業的志士，那種事業的今日，已有斐然的成績

，又親眼看見許多人，情願拋棄世俗所謂尊榮，隱藏在一個窮僻地方去做社會事業，事業是相當成功了，而地方情形的轉變還是極少，這正真因爲這許多人和專對建國的効果是一點一滴的。固然，「河海不擇細流，」然要使細流匯成河海，在眼前的中國，實在等待不及了。

雖然有許多人要說我們的見解是落伍，然而我們確堅信建國的樞紐在政治，只有從政治上下手，國家的建立是事半功倍，只有政治上了軌道，一切的現象會跟着走入軌道，這或者是英國費邊社的學者爲什麼要加入工黨，馬克斯的信徒爲什麼先要攫取政權。在西方的情形尚且如此，在美國的情形尚且如此，中國當然不必說。照中國的情形，假使講努力的效果，一百個晏陽初梁漱溟或者及不到一個中央的領袖同樣地努力。這絕不是我們對於晏梁兩位先生有絲毫的輕蔑，我們對於兩位先生的努力是只有佩服的，然而晏梁兩位先生充其量整理了定縣及鄒平，這兩個縣怎樣經得起中國整個環境的激盪，這一點晏梁兩位也許是自己承認而浩歎的。

建國既然應以政治爲樞紐，我們的說明暫止於此。

怎樣的政治才能建國？

這似乎是跟踪追來的一個問題，也是我今天想要討論

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性質看上去似乎又太籠統了，題目籠統是我承認的，然而我的答案却一毫不籠統。我今討論建國的政治，決不是效法拍拉圖的分類法，先來討論政體有幾種，更不去效近代政治學者先在主權論下起一場論戰，便是數年來國內論壇中所喧擾的黨治民治，或者更具體點說如開放政權等問題，我今天的討論，却看這種論辯是全不着實際的，全搔不着現實政治的癢處。黨治的成績我們看見過，不消說，提倡民治的人，到今天也看見他們試驗若干年月了，更不消說，或者所謂人民政府的生產政治，不久也必有明白的事實可以使全國人恍然大悟。二十年來的中國，外國的理論及榜樣，什麼都搬來試驗過，什麼都是一個慘敗，甚至招牌愈新鮮，內幕愈惡濁。獨立評論的幾位先生正在討論現代化的問題，而在區區看來，今日還如何再去討論現代化，因爲現在中國的大人先生們，思想和行爲，簡直是與沒有開化前的蠻族無異，高唱民主主義的人，一朝權在手，儘可假借各種勢力去壓迫言論侵犯自由。整天廣播演說的人，儘可開廠製造毒物，經營違禁貿易，荷包裏滾進去的非法金錢，數量與報上發表的談話演說同樣的多！大禮服高帽子的裏面靈魂上還是一個生番的原形，在顯微鏡下觀察前的政治，如果還要希望政治

的改良，全國的領袖及名流們，切莫再談政治的原則或理論，更不必化了精神，爭黨治民治，論法治人治，這都是徒然，都還談不到。所以我們不勸人家再談政治原則而勸人家談談

原○則○政○治

原則政治比起政治原則實在簡單多了，並且還太原始時代化了，如果針對獨立評論最近的論文，原則政治或者是太不現代化了。原則政治是原始時代化，我們接受的，然而我們並不以其原始時代化而排斥他，這是爲了惟有原始時代化的「原則政治」才針對我們眼前的病狀。中國今日的衣冠人物，現在是返歸到原始時代了，要對這班人談政治教育，最好把原始時代人群相處的基本原則，把他們訓練一番中如果他們能够恪守這個原則，暫且什麼都不談，國家自然會慢慢建立起來。這個原始時代的原則是什麼？隨便來講，信義是不能缺乏的，兩人以上的社會，缺乏了信義，這個社會便無法安定，因爲無信無義必致互疑互猜，於是就要發生爭奪。政治上的領袖如果能够澈底恪守這個簡單原則，領袖與領袖之間，決不會發生「誤會」，由誤會而「分離」「戰爭」，領袖與人民之間，更決不會對領袖一舉一動，都有惡意的推測，因有惡意的推測而萬事不

信任不出力，萬事處於被動的地位，安危成敗，悉聽領袖們去獨擔獨幹，此其一。是非與賞罰的符合，說來誰也懂得，然而幾年來誰又做到？賞罰的標準，不在是非而在利害，勢力或在情面，如此的榜樣，做的是便是傻子，做非的便是識時務之俊傑，積聚了無量數的作惡作非的人，那還有什麼政治可言？此其二。貪贓枉法的必須嚴格裁判，在今日的世界，那裏還有討論的餘地？布爾什維克也能，汎繁黨也能，民主政治也能，貪污總是絕對不能容許存在的，有了貪污便沒有政治，貪污的人混在政治裏面，無論他所幹的事是。直接吞吃公款或是間接假藉政府勢力以謀利，政治便無法露出光明。今日的中國，君主專制也能，民主立憲也能，黨治也能，總不能允許貪污的存在，這是一個原始的原則，此其三。鴉片嗎啡海洛英的毒害中國，誰還曉不得，毒物的當禁，誰不明白，財政沒有辦法，不能不到鴉片上去着想，猶之家庭經濟沒辦法不能不叫妻女去賣淫，子姪去竊盜，同是一個極簡單的原則，此其四。懲治貪污要從貪污巨魁下手而不可專辦小竊，具體點說，懲辦貪污要多槍斃幾個特任官，而不可專尋着薦任官或委任官，槍斃一個特任官，抵得上槍斃幾個薦任官或委任官，此其五。無論那一類的治體，總要拿法律做標準（不管法律是如何產生），自己政府公布的法律，至少自己要

當他是神聖的東西，不好拿感情來替代法律，更不好拿利害來抹煞法律，此其六。教育是樹人的大計，未來民族的製造所，辦教育的人，定要可以做人模範的人去辦，至少也應在靈魂上是一個人而不是非人，然後被教育的青年才有希望，此其七。這一類的原則，例子太多，不勝一一枚舉，然其性質是簡單到極點，我說他不是現代化而是原始時代化，就是這個道理。在建國時期中，無論政府或社會中的人，要大家先注意這許多原則，然後可以有羣，可以建國，否則根本不能有羣，尚何有於國？今天的領袖們，情願整天爭論民治黨治，共產主義，汎繁主義，或三民主義，整年辨難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統制經濟或自由經濟

，而絕沒有人提到上述任何的一個問題，他們的意思，或者以為那許多問題是不值得討論的。我們的智識雖然淺陋，但是政治理論及制度却也化過十幾年功夫專門去研究，化了多少年功夫到各國去看過，回到中國後，把我們在本國看見的去參證在外國所學的所看的乃至在國內繼續在書本研究所得的，然後恍然大悟，中國的問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救中國的初步只要叫人人注意恪守原始人類生存的原則，中國建國的首要，也只要政府中人注意恪守原始政治時期的原則，我們暫時不願再論什麼政治原則，而單單提出這個「原則政治」問題，我們堅信：惟有原始及簡單才針對中國的病象！

重游北美的幾點感想

哲衡

——在燕京大學演講——

我此次出國三個月，除去海上旅行之外，在北美整整的住了八個禮拜——八月十二星期六，從溫哥華上陸，十月七日星期六，從同樣的地方放洋回國。這個短時期的旅行雖是十分匆匆，但因為牠所給我的經驗與聞見，都是反映

的印象，似乎也就有點特別意味了。今天司徒校長要我把我在北美的聞見來向貴校的師長同學們談談，這當然是非常願意的，雖然我不能把那些印象都瑣瑣屑屑的向諸位報告。現在我且選擇幾件比較值得注意的觀察與感想，來與諸位談談。

在一個六年留學的背景之上的，故牠們在我意識中所留下

現在先說加拿大。加拿大所給我的印象，是廣大。是

一個廣大的土地，一個廣大的人的心胸，和一個廣大市場的需要。

當我坐了火車，自東方向那落機山西行的時候，我差不多以為是從南京坐車向北平了。這兩條路上，有的是一樣的廣漠平原，一樣的無涯的麥田，一樣的北國淒涼的景色，一樣的向着一條橫行的大山脈衝去。所不同的，一是這兩條路恰恰相差九十度——在加拿大是南北行的山脈丁着東西行的火車，在中國却正相反——二是加拿大人烟的稀少，以及貧苦現象的不存在。加拿大的面積有三百六十八萬四千餘方里，比歐洲全部的面積只少了百分之二，但牠的人口却還不到一千萬——和大紐約城的人口差不多。我們試想，若把北平人口的七八倍，放到兩倍于中國二十二行省的土地上去，（中國本部和東北四省的面積，是一百八十九萬六千餘方里。）該是多麼的通暢舒服！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的問題將是，『糧食沒人吃，怎樣辦？』，而不是『人沒糧食吃，怎樣辦？』；將是，『貨物沒人用，怎樣辦？』，而不是一個牛馬勃，竹頭木屑，都變為窮人的奢侈品的情形了。加拿大以這樣大的面積，載着那樣小的人口，而能不感到麻木與荒廢，乃是全靠了牠的一個大規模的交通組織。拿加大全境有兩條橫貫大陸的鐵路。

一條叫做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一條叫做加拿大國家鐵路。這兩條路把太平洋與大西洋聯絡起來，再加上了一個偉大的航海事業，遂使倫敦與馬尼刺的交通，比了北平到河北定縣的旅行還要便利。這個巨大的交通組織，不但給了那個廣大的北國一個流通的血脈，并且可以說是加拿大對於世界文化的一個大貢獻。

在數年前，我曾在中國遇見過兩位加拿大的領袖，他們所給予我最大的印象，是一個廣大的心胸，和一個誠懇的友誼。我當初以為這不過是一個偶然的現象。此次到了加拿大，會見了在班府開會的許多加拿大的代表，我的印象還是一樣，只更加深刻了一層。後來我又到了三四個加拿大的家庭去作客，每次都曾見了許多當地的領袖——教育界和工商界的——而我的印象還是一樣。我覺得他們有的是一個偉大的胸懷，一個真誠的友誼態度，和一個溫暖仁厚的心。我曾在我的一位居停主人的留名簿上，寫了這樣的一個句子：『一個廣大國裏的廣大家庭，一個廣大家庭中的廣大的心。』這是一句真實話，也是我對於加拿大人民的最大讚譽。

但是，想到了一個市場的追求，我們便不能那樣的樂觀了。加拿大的最大農產品是小麥，但巨量機器的生產小

量的吃，結果是糧價低落。加拿大的工業品也是供過于求，結果是人民只好有時以較大的代價買本國的貨物，雖然美國貨的價錢要比較便宜。這叫做做了一家人，沒法子。但一家人的幫忙還是不夠的。即以小麥一項而論，牠近年的產率，大抵都在四萬萬 Bushels 之上——每一個 Bushel 約合中國半石——比了二十五年前，要增加到四倍以上。這個巨量的加增，原是歐洲大戰時激勵糧產品的一個結果。大戰完結之後，歐洲經濟情形漸漸恢復了原狀，尤其是俄國，現在竟侵到加拿大的母國，英國的市場中，成爲她的——一個勁敵。雖然最近靠了英國征收外麥的稅則，加拿大的小麥在英國市場中，佔到了一個優越的地位，但這還是不夠的。因此，他們便不能不關心到小麥在中國的市場了，我相信這個加拿大的小麥，不久定要在中國的商戰中，佔到一個重要的地位。

再說美國。我對於美國感想，不能盡講，正也不應該盡講。比如關於抽象的論列，如從美國人有組織能力等等，則是近于老生常談，故不講。又如關於有爭辯性的事情，如美國近來的復興運動等，則因牠的利害尚在黑白不分明之間，故也不講。再如關於美國近年的婦女情況，教育上的趨勢，及一般人士對於中國人的態度等，則因牠們

的範圍太寬，或是題目太大，數個星期的觀察是不够得到結論的，故我也不願意講。經過這樣的淘汰之後，我對於美國的感想，就容易說話了。我今天所要說的，是兩三件與十三年前顯然不同的情形，牠們都是經過我的親身觀察的，并且也都足以代表此十數年來，美國在社會上，教育上，以及經濟上的問題與趨勢的。

第一件我要說的，是一個汽車的新紀元。美國汽車的統計數目，最近的我雖然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數年前已是每四人有車一輛了。如今當然只有加增，沒有減少。因此，凡是我所看見美國在工程上的新建設，差不多十分之九是與這個汽車文明有關係的。新的大鋼橋我看到了四五個——或在橋下仰頭看，或由主人出一元或半元錢的通過費，特別領我坐車過橋去——都是爲著大規模的汽車旅行而造的。新的空中大道，是那樣的寬，那樣的高，那樣的堅固——我曾看見整個的城市，靜靜的伏在牠的下面。新的地道，如紐約到紐約的荷蘭地道，是那樣的整齊與美觀。據我所知，這些地道和空中大道，不但是專爲汽車旅行而建造，并且普通行人是不準通過的。還有許多所謂道旁的小屋，是一種小旅店，也是專爲長途汽車旅行而設的。最近回國的趙元任先生，便是這個汽車新紀元的一位信徒。他

自己開了汽車，載了家眷——一位太太，三位小姐——帶了爐灶伙食一應傢俱。九月十三日，自華盛頓起身，一路游山玩水，吟歌作曲，好不『寫意』！餓了還有太太在車上燒的飯吃；倦了合家便在車上打瞌睡；汽油用罄了，路上有的是

家庭，是每個人的心理，尤其是一個做了母親的女子。爲了這一點，我對於這個汽車文明紀元的降臨，便不得不由冷淡的態度，一變而爲欣羨的熱忱了。

是油站；晚上據說都是住在那些路旁的小屋中的。這樣的曉行夜宿，走了十餘天，直到西雅圖方上船回國。趙元任先生的一家，真可以說是這個汽車文明時代中的一個中國先鋒了。這個汽車作霸的情形，在美國有兩個特別顯著的結果。一是火車的被打敗，一是郊外家庭的加增。我此次凡是坐火車的時候，每次都見車上空空的。有時還可以見到一輛整個兒的空車，黑越越的不見一個人影子。聽說美國近年來，因爲汽車已經成爲旅行的一個主要工具，火車的生意壞極了，而從紐約到潘省的一條幹線，更差不多到了破產的地步。但同時，靠了汽車的便利，許多在城市中服務的人，現在却都到郊外住家去了。這些家庭我曾到過兩三處，牠們都是庭院空闊，花草滿地，山光水色，相映成畫。女主人無不歡欣相告，這是她夢想的實現，一個鄉村中的舒適家園。本來呢，住鄉村本非難事，要舒服——指浴室的設置，與醫生的接近等等——也做得到，但要兩者兼全，却只有在汽車文明中方能得到。希望有一個這樣的

第二件使我不得不注意的情形，是大家知道的所謂失業恐慌。在一般知識低下的人羣中，這個情形的嚴重自然不消說，即在所謂知識階級中，失業的恐慌也似乎占據了他們生活的中心點。現在我且舉一個經驗作例子。我到紐約的第四天是一個星期日，故那天便不約而同的有好些位老朋友來看我。我們大家坐在一間臥室裏——是我一位同學做工寄宿的地方——大家談天，但『天』的中心似乎也旋轉到一個『位置』上去了。在這一羣朋友的中間，先來的是四位女的，中飯後又加入了兩位男的，他們一共是六位。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知識才能都在水平線以上，有的還有獨具的技能。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不感到失業的恐慌，有位置的感到位置的不穩固，沒有位置的感到找事的艱辛，有一位朋友說，『假如我這個五十元一個月的位置還保不住——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在美國是等於一個女傭的工錢——我只好登廣告求傭爲使女了。假如那再不行，我就只好自殺了。』又有一位說，『假如你不幫助我到中國去的話，我就只好跳赫真河了。』中飯過後加入的兩位男子中，有一位

是學新聞事業的。他說，『你能幫助我們很多。只要你肯，我們可以常來聽你談天，再把那些談話寫出來，我們便可以在報界中找到很好的買主。』這真所謂想人非非，太可憐了！我聽到了他們這樣的申訴生活的苦痛，又看看他們，不禁聯想到了傳教士。這個情形假如發生在一百年或五十年之前，這一輩的人物不將盡變為中國的福音宣傳員嗎？但這件事業如今已失了牠的引誘，凡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都不願再來做這個喜劇中的演員了。但他們雖不做演員，他們眼光的集中在中國，却仍是一樣。我們看了這個情形，豈能不深思？那天我們談了兩個鐘頭，看看已近

午飯時候，我便說，『我們出外吃飯吧。』因為我是這一羣中的唯一外國人，怕他們要請我，故我又加上了一句，『大家荷蘭』，那便是說，各人自己會鈔，不要請客。我說了這句話後，大家仍舊不動身。我覺得奇怪，但當我再看看他們的表情時，我明白了，便說，『讓我來作東，請你們到雜碎館去吃飯吧。』他們說，『你是客，那能讓你作東？』我說，『因為是中國的雜碎館！』這個解釋似乎很滿意，大家便默不作聲的站了起來，同我向着那飯館走去了。那天的結果是，一個窮國中的窮旅行家，用了那銀元變成的金元，請了四位美國青年女士一頓中飯！我們

說這個情形是例外嗎？此次我到的地方不多，我那敢說這不是例外？但在美國今日的社會中，像這一類的人物，我却敢斷言，是絕對不以這幾位我的窮朋友為限的。要不然，那豈不等于說，只有我的朋友才是窮光蛋？那就真真豈有此理了！

對於美國近來教育的發展，我已經說過，因為時間和觀察所限，所得的材料不備，故今天不能向諸位報告。但這七八年來，美國教育界中有一個很值得我們注意的新趨勢，我却忍不住要說一說。這新趨勢即是那個所謂優行學（Euthenics）的研究與施于實用。優行學的目的，是在研究和改良一個人的整個生活。換句話說，即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健全關係的。他所包括的，有家庭中親子之間的問題，社會上各個分子的關係等等。在一九二五年，瓦沙大學首先創設了一個優行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Euthenics）專門研究這個學說和牠的實用。凡是大學卒業生，無論男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做牠的研究員。研究的科目，則有兒童心理，成人心理，心理的健康，營養問題，美的家庭等等。研究所中還附設了一個育兒院，和一個模範小學，俾一個人自呱呱墮地時，便可以得到種種應付環境——人和天然的——的訓練。因為瓦沙是這種研究所的首創者，

故一方面牠便成爲全國中這個試驗的領袖，一方面牠又是最能努力把這個學說施諸實行的一个學校。

瓦沙學生的數目，向來是以一千人爲限的。因爲有這樣一個重質不重量的優勝情形，瓦沙的教育政策，向來便能以對於學生的個人注意，著聞于美國的教育界。但從前的注意是偏重在教室之內的，如今則因靠了這個優行學的鼓勵與合作，個人的注意便由腦筋推廣到整個的人生了。舉一個例子。從前管理學生的教員，是每舍一位的舍監，她們的職務乃是代表學校施放命令。現在舍監制已被淘汰了——雖然至今校中還有一位舍監，但她不過是秋風中的一片黃葉，孤另另的掛在樹枝上，作爲一個過去制度的記念而已——起而代之的，乃是所謂『寄舍者』的組織。她們的

職務，是學生生活的監察與指導——即是優行學的實施——她們的方法，是與學生代表合作。她們須把她們對於學生人格的觀察，如才能，康健，習慣，行爲等等都在內，不斷的向教授們報告，作爲後者授課的依據。換句話說，即是把智識的訓練與人格的陶育，打成一大片，使牠們變成一個整個的問題。在這樣情形之下，一個瓦沙學生在人生上的失敗，在學校及教授們的眼中看來，便覺得比她在功課上的不及格還要嚴重，覺得有受到更大的注意與糾正的需耍了。在現代美國教育界中，學生自治的範圍是到處向着擴大的路走去的。但我以爲，必須有這樣一個積極的學校指導與合作爲背景，這個新獲得的巨量的自由與自治，方能向着——一條康莊大道走去。

爲中小學教員說幾句話

希聲

這個國家若是還有前途的話，她的前途是必在今日中小學的學生；若是還要前途的話，就不能不從速努力於中小學的教育。關於中小學的教育問題很多，而最迫切，最直接影響於中小學生的智識與行爲的，是中小學教員。關於中小學教員的問題也很多，而最迫切，最能影響于他們

教學的效率的，是他們的吃飯問題。

北平與河北在不久前都會發生過這問題。北平經過小學怠工，犧牲了多少學生的學業，纔暫時的解決了。近來見報載十一月份仍未足發薪，而爲中央一部份協款，地方當局與小學教員似又有所爭執。其實爲數有限，無論

在中央在地方都應早爲解決，並不是力量辦不到的事。在小學教員應顧念學生學業，不可輕易怠工；在當局更應早爲設法，不可再把小事化爲大事，然後纔求敷衍了事。此雖地方一隅之現象，殊使人感覺中央與地方都把國家更基本的中小學教育——尤其是小學，十足的表示其輕忽！

平心而論，越是小學，對於國家負的責任越大，而教員的待遇也越苦。大學的經費，近年來漸漸能夠解決了，自然保障還講不到；何以更基本的中小學經費，反倒發生欠薪？保障更無從講起！是不是就只因爲辦大學的人，容易與當局接頭；越到小學，對當局越是堂高簾遠，越被忽視？即以北平而論，校院的經費，勉強解決；中小學的中央協款，不及十分之一，反不肯解決；而中小學的學生數目，又在大學生十倍以上，其重要最少是不減於大學。地方不爲設法，社會也不大注意，豈不甚怪！這時代的醉生夢死，是麻木透了的！難道連將來的一點希望也斬盡殺絕。

這裏關係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當教員的在社會上地位，因而引起他對於職業的尊重心與自好的負責心。舊日家庭的先生，東修雖薄，而禮貌甚隆，論貧富則先生爲窮酸，講地位則先生爲上客。先生有事主人就商；飲食禮節

，不敢稍闕。以精神上之尊崇，補物質之不足。當先生的也因而能自知愛好，尊重所業。身雖貧窮，志節可尊。我們不是尊敬先生，實是尊敬學問，尊敬國家的前途。

近來風氣一轉，師道盡棄，真所謂千年養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有餘了。廳長局長之流，官職越小，威風越大！我想大家都能想像出來，一位教育局長見了一位小學教員，他那份十足的神氣！大家也能想像出，一位每月領二三十元薪水的小學教員（鄉間有月薪十幾元的），家裏養着一羣孩子，早晨挾着一本書，在冷風中縮肩曲背的走進教室，學生們哈哈一笑，「先生，你那袍子後面，怎麼有多們多的窟窿！」若再加上欠薪，菜舖子同米店的老板會在街上攔住侮辱他，會到他門上謾罵他。他除了低頭忍辱，還有什麼法子？記得上次爲要求欠薪，北平的小學教員代表會說過，「肚子不能積欠——妻子不能打折」，這真是痛心的經驗之談。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希望他們能自尊自好，能敬重他們的職業，那當然是強人以所難。我們似乎忘記了他們是小孩子們的先生，是將來作社會主人翁的師表，是將來國家生命所寄託！

欲挽救這種情形，并不十分困難，自要當局能平平常

常的作幾件分內的事就夠了。

一，保障教書職業 一件事要作得好，先得有恆心，然後纔會發生興趣，利用經驗。在現在局面之下，一位廳長到任，必更換多少局長；局長到任，再更換多少校長；校長到任，又更換多少教員。人人無恆心，事事不能作。要想教育辦好，當然是不能。應即定爲律令，明示保障，使從事教育者有所恃而無恐！作官用人者有所私而不能。

二，保障教育經費 在目前的財政狀況之下，欲求提高中小學教員的待遇，恐非一時所能，但將決算通過之經費，指定的款，加以保障，實在不是難作的事。應國家與地方總使困難，也決不會困難在這點上，這比之軍費，不過九牛一毛，比之國家所取于民者，又不及十分之一。況且鬧來鬧去，欠薪總須清還。不過教育多受幾番挫折，當局多添幾次麻煩罷了。何如早定百年大計，使百姓在萬般失望之中，還有可以謳歌之一事！

三，宜速實行按年進薪及養老恤金等 除了教育有成績的，應當加以褒獎（同時成績不良者應分別懲處廳長局長校長等，更爲重要），予從事教育者以精神上之鼓勵外，更應予以物質上之實惠。仕宦者可以升官，貿易者可以

發財，教小學的升到中學，教中學升到大學的事可是希奇，不獨希奇，並且古怪。但人都希望生活有點進步，那怕只是一點。小學的教員既一時不能提高待遇，終身只是二三十元的月薪，前途漫漫，長夜何旦！況且人如若進步的話，生活總是一天高似一天的，所以必有個逐年加薪的辦法，纔可以救濟。但總使加薪，小學中學都必有最高的限制。平時既不容易儲蓄，老年不能教書或未老而爲公殘疾，也是必然或偶然的事，在以前家庭制度未壞，年老時希望有孝子順孫養他，現在他連這希望也沒有了！所以養老與恤金的辦法，也爲時代所必需。只使規律切實可行，令行各校遵辦，並不必是一件難作到的事。

以上幾點，誠是卑之無甚高論，但能實行的話，總然講不到尊師重道，而教學的職業有了保障，也未始不可逐漸養成他們敬重職業的心理，以至于自愛自好，日求進益，爲國家奠定這整個的教育的基礎。而在國家方面，先能盡到對於教員的義務，然後再講怎樣的養成與選擇師資，以求質的完善，也就比較的更有把握一些。

介紹農民化的湖南修業學校

吳奔星

我閱過傅任敢君湖南教育一瞥（見獨立評論第七十八

號）一文以後，覺得有許多的話要說。我以為湖南教育應使國人知道的，不是普通中等學校的情形，而是農業教育的狀況，雖說湖南的農業學校僅有省立高級農科職業學校，私立修業學校及私立開務學校三個，量的方面似乎太少；但是質的方面，是值得推揚的。可是嚴格說來，這有限的三校中，真值得為全國農校的模範的，又只有私立修業學校（又稱修業農校）。因為省立高農的師生，尙未脫公子派教農學農的神氣；開務是初級農業性質，規模又小，故不值得介紹；惟修業學校方是站在改進農業的立場上來辦農業教育的學校；牠有特殊的辦法及特殊的精神，頗足為國人一告。現在且老老實實將牠介紹於國人之前，尤其是

一班高唱生產教育的先生們。

一，修業學校史略

修業學校自開辦到現在，已有整個的三十年了，清光緒二十九年三月，長沙明德學校開辦，富於革命思想之青年，相率入校肄業。沒有多久，該校教員周道腴氏與劉某

意見不合；學生王楨幹等十二人也與劉某齟齬，於是先後

退學，倡議另辦修業學校，推周道腴俞經詒及許玉屏三先生為總辦，校中事務，則由發起之十二學生分担，租長沙南門高碼頭民房為校舍，八月十八日（光緒廿九年）開學。此革命青年組織的修業學校於是成立。此後因經費支絀，校舍屢遷，故所經歷，類多艱苦。至民國九年，該校當局以普通中學不適社會之需求，乃有添辦農科之決議；至十二年乃正式加辦農科於離城十里之新開舖。十六年馬日政變，學校停辦，僅設立一棉稻試驗場，由彭先澤氏主司其事。民國十七年，該校以湖南普通中學過多，乃停辦中學，僅辦農科；小學則為學生研究農村教育之用。直到現在，整個五年了，這個辦法，尙無變更。

現今湖南長沙南門外新開舖之修業學校（小學設城內馬王街，亦有屋宇數幢，面積二百八十五方丈，本年又增一百二十六方丈，合計四百一十一方丈），有房屋六棟及農場四百畝；若是不知道牠的歷史的人看來，誰相信牠是由十二個學生孕育出來的呢？

二，修業學校的施教方針及其環境

修業學校的施教方針在修業學則上說；「本校教學，採教學做合一之原則。而目標有二：（一）使學生獲得有用之知能；（二）使學生自動研究，獲得經濟的學習方法」。

修業所標榜的教學方針，雖與普通農校大同小異，但是牠是確能見諸實行的。只要是到修農去參觀過的人，想都知道修業學生的教室，什之九為田間；他們的教本，什之九為「馬牛羊雞犬豕」及「稻粱菽麥黍稷。」在研究方面，確是自動研究，教師不過是一個「指路碑」而已。修業既採這樣教學方針，故學生畢業後，有用之知能極多，且個個有出路，而為社會所信賴。

至於修業學校的環境，也是值得介紹的。牠離開喧囂的長沙城有十里路的樣子，城市奢華氣習，很少侵入進去；因此學生可以潛心地從事農學的研求。修業的校址雖說偏僻，可是交通甚為便利；第一，可以在新開鋪乘湘潭至長沙的汽車到城內小吳門；第二，離校半里許即為湘江，隨時可以買舟直駛長沙大西門。修業的學生或農夫所收穫的農產品，均可利用這兩條路線運往城內去售賣。除此之外，修業的風景也不錯，所有校舍全隱在古老的樹林中，自成村落。出校向右走，有金盆嶺之勝；向左走，又沿湘

江而下，不到一里之遙，便是著名的猴子石，由此渡口，可到嶽麓山。在猴子石的左側，則為寶華玻璃工廠；修業化學室所用的燒瓶玻璃管之類，均可在此購買。

三，修業學校師生的生活

我以為值得為修業學校介紹的，不是牠悠久的歷史，也不是牠美好的環境，而是其間師生的一般狀況。因為牠與時下所辦的農業學校的師生是不同的，而且是值得一般農校去模倣的。

（一）服裝 跑到修業學校去參觀的人，除了在容貌的老少上能辨別誰是教員，誰是學生及誰是農夫外，簡直沒有方法區別師生和農夫了。因為該校的教職員和學生所穿的衣服，固然不能發現洋服，即是摩登的學生服，也是難找着的；所能找着的，全是用土布製的農人衣服。一年四季除了下雪及傾盆大雨外，你總看見他們的頭上戴着箬笠；身上穿着漢裝捲起衣袖；兩條腿比夏季各大城市的女郎的摩登，來得澈底，連鞋也沒有。皮膚蘊藏着無限的泥土氣。記得在民國十八年的夏天，該校主事彭先澤赤着腳在田間工作，馬路上進來了幾個參觀的人，走前的一個便向他喊道：「喂！請你找彭先澤先生帶我們看看學校！」那人說完後，拿出一張名片，遞給他，他接了後，便說：「就

是我！』接着便邀着他們往辦公室走去。

(二)火食 修業師生的火食，與該校所僱農夫的火食一樣。一日三餐，每餐的菜，全是素的；並且不拘形式，桌上放着一個大綠色的土鉢，兩旁放小碗一個；裏面盛的菜，是該校菜園的產物；統計每月不過三元多錢的樣子。首先動議提倡這種火食辦法的，便是將到六十歲的老者彭國鈞（現任校長）氏了，他對師生訓話，不要光在口頭講平等，應該腳踏實地的去幹平等工作；於是由教員學生及農夫共同組織食事委員會，自辦火食。他恐怕一班教員及學生不能吃苦，便親自與農夫吃飯。

(三)田間工作 修業師生在田裏作事的時候多，田間可說是他們的教室，草木蟲魚，便是他們研究的材料，書局所出農業課本，不過是為他們的參考而已。在春季師生與農夫一塊兒趕着牛耕耙田地，整理好了之後，便是他們共同插秧的時期。這個時期，是他們最快樂的時期；因為學校裏為他們備有豐富的肉食，勞苦一天之後，他們便拖泥帶水地走到食堂去，狼吞虎嚥地享受他們辛苦得來的代價——肉。到夏末時，田裏的稻，快要熟了，他們便到田間將他們所要試驗的一百多種稻子，分區來量牠們莖的長短，數牠們分蘗數的多少，穗數的多少，以及其他要實驗或

觀察的項目。這個時期過了之後，便是他們收穫農作物的時期了。過了這個時期之後，該校師生便將所收穫的作物，在實驗室裏或顯微鏡底下，施以觀察和考查，辨別優劣的品種，以便來年將劣的淘汰。這種工作，他們從民國十七年起今年止，沒有停止過。在水稻方面，已得到了許多成績，如「小南粘」，「穀兒子」，「七十早」等十餘種稻子，經過實驗，定為優良品種。並由該校師生將這十幾種稻子，分發到長沙附近；聞最近的將來，亦擬推廣到全省各縣。所以我敢說湖南稻作之改良，實修業開其先河。

培植稻作，是他們一年中固定的工作。此外，每年夏季，該校還舉行「除草大運動」一次，每個教職員穿着農服領導學生往他們的大農場去除草。如果在除草時他們發現了特殊的昆蟲或奇異的植物，便如考古學家發現了古物一樣，連忙拿到實驗室珍而藏之，俟作工完了，便請他們的昆蟲教員或植物教員來講述；有時一般學生也找來幾個年老而富有經驗的農夫，替他們用「土法」解釋，作教員解釋的參考，他們這種「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是值得介紹給全國青年學子的。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值得紹介的，就是修業當局，為

所有的學生劃一小土地，面積約四分之一畝，要他們栽種作物；所得利潤，校中得三分之一，學生自己得三分之二。我在長沙時，該校學生對我說，他們培植小土地得來的利潤，可作三月餘的火食費。我聽了，對於修業這種辦法，不僅贊同，而且欽佩。因為此辦法不特養成學生的勞作精神，而且養成學生「自食其力」的本能。畢業之後即使找不着出路，也可自己經營農場。

介紹修業的話，大致說完了。最後我還要說幾句的，就是今後中國不辦農業學校則已，若辦農業學校，即須真正到田間從事實際的研究，像修業師生一樣；切不要將農業學校設在城市中。在吾本上談農業，學些農業上的名詞和理論，因為那都是不適用的；那種農業教育也不是中國所需要的農業教育。

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寫於師大。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價目：
甲種（布裝）二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市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獨立評論社啓事

我們歡迎各地讀者的投稿。投稿者若不願用真姓名，當然可以用筆名。但筆名之外，投稿者務必把姓名和住址告知本社。凡只有筆名而無真姓名住址的文字，恕不登載。我們這個刊物是十幾個書生捐錢捐力氣合辦的；我們至今還沒有酬報投稿人的能力，所以只能送贈本刊若干冊作為一點點報酬。凡投稿人願意本社贈送本人或他的朋友，請告知本社。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報目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	每月一元二角
朝鮮	每月一元五角
租地	每月一元五角
香港	每月一元五角
澳門	每月一元五角
南洋	每月一元五角
歐美	每月一元五角
海參	每月一元五角
威	每月一元五角

建國與專制

胡適

中國歷史上的集權與分權

陶希聖

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可以實行麼？梁子範

編輯後記

編者

寄售及代定處

鎮江	南京	上海	天津	平西	北平
鎮江書店	中央書局 經山書局 新華書店 （代定）	定報部 （總代售及代定）	天津大學 華印書局 （代定）	清華大學 燕大 （代定）	東安市場 民智書局 （代定）

獨立評論

第八十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衡州	福州	杭州	貴陽	重慶	合川	萬縣	成都	開州	太安	按察	燕湖	安慶	臨清	荷澤	青島	濟南	桂林	柳州	汕頭	廣州	武昌	漢口	徐州	
衡州明報社	萬有圖書公司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新友書店

建國與專制

胡適

上期蔣廷黻先生發表了一篇「革命與專制」，根據歐洲的近世史立論，說：

中國現在的局勢，正像英國未經顛頭專制，法國未經布彭專制，俄國未經羅馬羅夫專制以前的形勢一樣。我們現在也只能有內亂，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我們雖經過幾千年的專制，不幸我們的專制君主，因為環境的特別，沒有盡他們的歷史職責。滿清給民國的遺產是極壞的，不够作革命的資本的。第一，我們的國家仍舊是個朝代國家，不是個民族國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對個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對國家的。第二，我們的專制君主並沒有遺留可作新政權中心的階級。其實中國專制政體的歷史使命就是摧殘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權中心的階級和制度。結果，皇室倒了，國家就成一盤散沙了。第三，在專制政體之下，我們的物質文明太落伍了。我們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漁利，我們簡直無抵抗的能力。

蔣先生的結論是要指出：「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作，談不到第二步。」「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他的大意，不過如此。

可是他給了這篇文章一個很引人注意的標題，叫做「革命與專制」。他列舉了英法俄三個國家的歷史：英國若不經過十六世紀的頓頓朝（Tudor 錢端升先生譯為推鐸爾朝）的專制，就不能有十七世紀的革命；法國若不經過二百年布彭朝（Bourbon）的專制，也就不會有十八世紀的大革命；俄國若不經過羅馬羅夫朝三百年的專制，列寧和杜洛斯基也就未見得能造成他們的革命偉業。我們讀了他的歷史引證，又回想到他的標題，不能不推想到三個問題：（1）專制是否建國的必要階段？（2）中國經過了幾千年的專制，為什麼還沒有做到建國的歷史使命，還沒有造成一個民族國家？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3）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職責我們今後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

我想，讀了蔣先生那篇文章的人，大概都不免發生這

三個推想。蔣先生將來一定還有更詳細的說明。我現在先把
我個人對於這三點的意見寫出來，請蔣先生和讀者指教。

(一)專制是否建國的必要階段？

關於這一點，我的觀察和蔣先生有一個根本的不同。
蔣先生所舉的英法俄三國的歷史，在我看來，只是那三個
國家的建國史，而建國的範圍很廣，原因很複雜，我們不
能單指「專制」一項做建國的原因或條件。我們可以說那
三個朝代（英的頓頭，法的布彭，俄的羅馬羅夫）是建國
的時代；但我們不能證明那三個國家的建立都是由於專制
。英國的頓頭一朝的歷史，最可以證明這一點。亨利七八
兩世做到了統一的功績，亨利八世的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
繼續王位，尤其是他的小女兒伊里沙伯女王享國最久，史
家稱爲伊里沙伯時代。英吉利民族在這一百年之中，成爲
一個強盛的民族國家，是有種種原因的。頓頭一朝的幾個
君主雖然也有很專制的，如瑪麗女王在三四年間因宗教罪
過燒殺男女異教徒至三百人之多，但這種專制的行爲只够
引起人民很嚴重的反抗，而不能增民族國家的建立。瑪利
女王的末年是英國人民最痛恨的；她的恢復天主教的政策
，也是最違反民意的行爲。史家說她的時代的英國是幾百

年來最紊亂的時代，「不但法紀廢弛，無領袖，無武備，
無精神，無統一性，平時戰時俱受侮辱；而且無論從那一
方面講，英國只是西班牙的一個附庸國。」（錢端升譯屈
勒味林的英國史，頁四〇九）頓頭一朝的兩個英主，前有
亨利八世，後有伊里沙伯，都能利用英國人民的心理，脫
離羅馬教皇的管轄，樹立英國國教，扶植國會，培養國力
，提倡本國方興的文化。凡此種種，固然也可說是開明的
專制。但英國民族國家的造成，並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國
語的新文學的產生與傳播，英文翻譯的聖經與祈禱書的流
行，牛津與劍橋兩大學的勢力，倫敦的成爲英國的政治經
濟文化的中心，紡績業的長足的發展，中級社會的興起；
這些都是造成英國民族國家的重要因子。這種種因子大都
不是在這一個朝代發生的，他們的起源往往都遠在頓頭朝
之前；不過在這百年的統一承平時代之中，他們的發展自然
更快了。

蔣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說統一的政權是建國的必
要條件；不過他用了「專制」一個名詞來包括政權的統一
，就不免容易使人聯想到那無限的獨裁政治上去。其實政
權統一不一定就是獨裁政治。英國的亨利第八時代正是國
會的勢力抬頭的時代；國會議員從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

而國王建立新國教也須借國會的力量。所以我們與其說專制是建國的必要階段，不如說政權統一建國的條件，而政權統一固不必全學羅馬羅夫朝的獨裁政治。

(二)中國幾千年的專制何以不曾造成民族國家

關於這一點，我和蔣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照廣義的說法，中國不能不說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國家。我們現在感覺欠缺的，只是這個中國民族國家還够不上近代民族國家的鞏固性與統一性。在民族的自覺上，在語言文字的統一上，在歷史文化的統一上，在政治制度（包括考試，任官，法律，等等）的統一與持續上，——在這些條件上，中國這兩千年來都够得上一個民族的國家。其間雖有外族統治的時期，而在那些時期，民族的自覺心更特別顯露，歷久而不衰，終於產生劉裕朱元璋洪秀全孫文一流的民族英雄起來做民族革命的運動。我們今日所有的建國的資本，還是這兩千年遺留下來的這個民族國家的自覺心。

這個民族的國家，不能不說是兩千年的統一政權的遺產。最重要的是那個最光榮的兩漢帝國的四百年的統一。我們至今是「漢人」，這就是漢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覺心的結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統一，使那些新興的南

方民族至今還自稱是「唐人」。有了漢唐兩個長期的統一，我們才養成了一個整個中國民族的觀念。我們讀宋明兩朝的遺民的文獻，雖然好像都不脫忠於一個朝代的見解，其實朝代與君主都不過是民族國家的一種具體的象徵。不然，何以蒙古失國後無人編纂元遺民錄？何以滿清失國後一班遺老只成社會上的笑柄而已？我們所以特別表同情於宋明兩代的遺民，這正可以表現中國早已成爲一個民族的國家；這種思古的同情並不起於今日新的民族思想興起的時代，其種子早下在漢唐盛世，在蒙古滿洲人主中國的時期已有很悲壯的表現了。

至於蔣先生指出的三種缺陷，只可以證明舊日的社會與政治的惡果，而不足以證明中國不是一個民族的國家。第一，「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對個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對國家的。」這是因爲舊日國家的權力本來不能直接達到一般人民，在那「天高皇帝遠」的情勢之下，非有高等的知識，誰能超過那直接影響他的生活的親屬而對那抽象的國家表示公忠呢？十八世紀的英國名人布爾克（Burke）曾說：『要人愛國家，國家必須可愛才行。』難道我們因此就說十八世紀的英國還不成一個民族的國家嗎？今日一般人民的不能愛國家，一半是因爲人民的教育不够，不容

易想像一個國家；一半是因爲國家實在沒有恩惠到人民。

第二，「我們的專制君主並沒有遺留可作新政權中心的階級。其實中國專制政體的歷史使命就是摧殘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權中心的階級和制度。」歐洲各國都是新從封建時代出來，舊日的統治階級還存在，尤其是統治階級的最下層，——武士的階級，——所以政權的轉移是逐漸由舊統治階級移歸那新興的中等社會的領袖階級，更逐漸移到那更廣大的民衆。我們的封建時代崩潰太早了，兩千年來就沒有一個統治階級。科舉的制度發達以後，連「士族」都不固定了。我們又沒有像英國那樣的「家子襲產制」，遺產總是諸子均分，所以世家大族沒有能維持到幾代而不衰微的。這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太平民化的結果，雖有專制君主有意維持某種特殊階級（如滿清之維持八旗氏族），終敵不住那平民化的自然傾向。辛亥革命之後，那些君主立憲黨也無處可以請出一個中國家族來做那候補的皇室，於是竟有人想到衍聖公的一門！因爲今日中國社會本無「可作新政權中心的階級」，所以我們的建國（建立一個任

現代世界裏站得住的國家）事業比歐美日本要困難無數倍。但這是一個政權中心的問題，而不是民族國家的問題。

• 第三，蔣先生又說，「在專制政體之下，我們的物質文明太落伍了。」物質文明的落後，是由於我們的知識不夠，人才不夠，又因爲舊式的民族自大心的抵抗，不肯急起直追。這是和專制政體無大關係的，也不足以證明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以上所說，只討論了蔣先生的論文引起的兩點。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第一，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制。第二，我們今日要談的「建國」，不單是要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中國自從兩漢以來，已可以算是一個民族國家了。我們所謂「建國」，只是要使這個中國民族國家在現代世界裏站得住。

還有第三個問題：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這個問題，今天談不了，且留在將來再談。

二十二，十二，十一。

☆

☆

☆

☆

中國歷史上的集權與分權

陶希聖

一、三種國家形式

自西元前二世紀以來，國家的組織大體可分為三個形式。

(第一)是秦漢的形式：各地方社會是多族並立的。政府組織站立在各地方社會之上，對於多數家族鎮撫，監視，並有裁判爭訟或調解爭訟的任務。各地方社會裏面的官，就是由當地的家族來担任。鄉三老，縣會長，郡守，以及郡縣的屬僚都是當地的家族。這時候，社會及國家的組織很鬆懈。政府對於各地豪族是很忌視的。政府每每遷徙豪族到首都的附近，並且以六條察地方政治，其第一條便是強欺弱，衆暴寡。政府對於各家族祇收取租賦及徭役，但政府有很多的奴隸刑徒，徭役常折收錢幣，不必事事都役使各家。總之，政府是多數家族中的最大家族，精確一點說，政府是多數奴隸主中的最大奴隸主。

(第二)是東漢以後到中唐的形式：土地兼併，家族并吞家族。少數的豪家成了士族，多數的家族成了部曲，佃客，衣食客，僧祇戶，奴隸。地方社會裏面，強族壓倒弱

族。強族做官，卻不做小官(即吏)。官吏分開了。政府成了保障強族支配弱族的工具。強族及寺廟的土地免稅，人口免役。政府是強族的調解人，是強族分割國稅的處所。爲了保護強族，政府有兵。政府的首領便是統兵的大將。大將換了姓，強族加了官，沒有什麼死節之類的事。這是西晉南朝的現象。北朝及隋唐稍爲不同一點。政府是強族中的大強族。政府自有大批的土地，按人口分給沒有地種的人們去種。政府的權很大。總之，政府是保障大族的軍隊，或是大族裏面最大族，精確的說，政府是莊主中的大莊主。

(第三)是中唐以後的形式：地方社會裏，鄉下有大家族，城裏有大商。國家的收入，鄉下出一半，城裏出一半。國家不專靠地主，也不專靠商人。國家拿了他們兩下的錢，養下大批的官員和雇兵。國家的權力既大於地主，又大於商人。地方社會裏的權力在紳商手裏。紳商和衙門裏的吏卒打成一氣，辦了地方一切的事情。政府派了一個官和一支兵來了，替他們「保富」，替他們判案，替他們和事，對待條件是壽款。派來的官那能控禦地方的吏卒和紳商？紳

商吏卒所籌的款——稅捐——是從地方民衆拿出來的。紳商吏卒籌了二十萬，他們祇拿五六萬出來給官，官也沒有稽考的。於是有那精通地方錢穀的師爺——幕友——替官來稽考那紳商吏卒。地方權力之上的國家權力，要以幕友做聯鎖。官是代表國家的，吏卒紳商是地方的人士。

無論那個時代，中國的政治組織總含有兩個相反的成分。一個是集權的，一個是分權的。地方的權力和國家權力總是背馳的。現在多說一說第三個形式裏面的兩個背馳的力量怎樣結構着。

(一)先從縣政府說，紳商吏卒是為地方的（實際是為自己的），縣長是為國的（實際也是為自己的）。幕友是其間的綫索。

(二)次從省政府說，縣官是為地方的，省政府是來監督縣官的。從前的府道及各種委員是其間的綫索。

(三)再從全國說：省政府是為地方的，中央政府本身乃是國。各部及欽差等大使乃是其間的綫索。

幕友如果和吏卒紳商打成一片，縣官便吃虧而不能統制一縣。縣官如和紳商吏卒打成一片，省政府便沒法統制這一縣。省政府如果和縣官打成一片乃至和紳商打成一片，則中央便不能統制這一省。

好在縣官是在紳商吏卒之間的，他可以懲處任何一個弄弊的紳商吏卒。省政府是在多數縣之上的，他可以懲處任何一個縣長。中央政府是在多數省之上的，他可以懲處任何一個省長。

所以集權有兩個條件：

(一)各地方互相牽制，

(二)上級政府有大於任何一個地方的實力。

一縣的地方權力是很小的。集小而成大，所以省的權力使大些，各省（地方高級行政單位假稱爲省）的互相牽制，和中央政府有大於任何一省的實力乃是中央集權或全國統一的條件。

省的關係大，所以過去的政府對於省制看得很重。但是割據的趨勢老是向前發展的。在第一個時期，用來監督太守的監御史漸漸變成割據的州牧。在第二個時期，用來監督各地軍隊的都督或存撫使觀察處置使節度使也漸變成割據的首領。在第三個時期，宋把省政府分成四個互不相轄的官，所謂帥（軍政）漕（財政）憲（司法）倉（財）。漕司管轉運，他後來便控制了別個官。真宗以後，領兵官的經路安撫使有兵，便趨向于割據。明代對省，三權分立，布政使管民政，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揮使管軍政。

中央還不放心，又派尙書侍郎都御使分巡各省，叫做巡撫，這巡撫便將成割據的首領。清代於巡撫之外又加總督，大約巡撫主要管民政，總督主要管軍政，下面又設布政使管財政，按察使管司法。他們四位，都有單獨上奏權。清代省制，可以說是三權分立，而其中民政軍政又是對立的。但是這總督或巡撫後來又形同於割據。民國以來，沒有幾天是統一的。民初的都督固然是分權的，督軍與省長分治時期，督軍仍然是割據的首領。國民政府的命令公文及全國以後，省政府委員會依然操在軍人手裏，目前竟然弄出獨立的國來了。

二 集權與分權兩極端的結合

集權與分權兩極端的推移如此，所以歷代對於中央政府常常注重他的所在地。用意是在使中央政府的實力大於任何一個地方的權力。西漢都最富的關中，同時派重兵駐防河南中部。後來關中富力破壞了，東漢改都洛陽。中古時代，財富固然漸漸移到東南，兵力却以西北較大，於是隋唐都西北，而轉運東南財富到西北。爲了漕運的便利，宋都東移，元明又東移去遷就海運去了。於今政府竟到東南去就上海。於是中國由此又表現出從來未有的危機。假如財富是要靠海口，現存的海口是分散在沿海的，並且都

被列強所控制。目前的分權或割據，比從前又加上海口分散一個要因。

大體上說，文武官吏總是傾向分權的。這個傾向可以從歷代政府對省政府重重牽制重重監督的事實作證明。爲什麼有這樣的傾向呢？我現在指出兩點來看一看：

(一)從來的行政祇有地方的行政。全國的行政是沒有的。中唐以後，江南財富的轉運可以說是全國的行政，但是財富的徵收仍然是地方政府做的。自從國外貿易發達及國內交通事業開創以來，纔有國家行政。如鐵路航路乃是超越省界的。關稅的徵收也是國家行政。此外大學是國家行政，反之中小學便是地方行政了。

從來的各部只是對公文審查的機關，而內閣乃是公文起草及批閱機關。近數十年來才有行政事務歸他們辦，但是很少的。綜之，除縣裏的吏卒紳商是直接支配人民財物以外，縣官有時直接支配他們，以上的巨大官僚組織只是一套的公文系統，用來監督指揮縣官的。

(二)大都市並不是沒有，但從來的都市只是商業的。商業都市全靠各地地方社會隔離，才可以發達起來。商業都市不比大工業都市，後者是要直接統一廣大市場的，前者則要各小市場互相隔離着。這樣的都市不能支持集權的統

一 國家。

近幾十年，大工商業都市抬起頭來了，但是他們都是由於外國商品和中國商品的交易才發達的。他們的地域固然在中國，他們的經濟根本卻在外國。上面說過，這種海上都市又是中國地方分權的一個要因。

(二)個人的財富大抵是地方的，如土地是過去官員的重要財產。土地是分散在各地方的。商業財富又有如前段所說，要地方社會彼此隔離才能積累起來。

由於上面所說各點，文武官吏總有地方分權的傾向。然而地方社會之上向來常有一個統一國家出現是為什麼？

(一)官吏們在這裏可以分得賦稅。

(二)這裏有力量任免各地方的官吏。

由於前者，各地的讀書人一羣一羣上京求官。由於後者，中央政府才有力支配這些官吏，使他們爲了中央政府去支配各地的地方社會。如中央政府裏賦稅無可分的了，又如中央政府沒有力量任免地方官了，地方割據便馬上出現了。

三 將來的趨勢

☆

☆

☆

☆

將來的趨勢是走到集權國家的路上去的。隨都市工業

商業的發達及鄉村對都市的依賴，地方社會漸以都市爲中心而合小成大。民國以來，很顯赫的，一省一省的割據漸趨于幾省共舉的割據。從前由統一而割據，將來割據的局而擴大，又接近於統一了。

但是中國的民衆要想得到統一的國家，集權的政府，還得大做一番工夫。前面說過，爲外國商品服務的海口乃至於以這些海口爲出發點而向內地延長的交通綫，大體上說，是向心的形勢比離心的形勢來得大。如果今後的建設仍然是照這種趨勢走下去，恐怕統一國是永不出現的。並且海口中心的經濟與政治網，沒有能力對列強抗爭。他們炮艦一來便把海口支配住了。我們那有力量去抗爭呢？

今後的工夫要從這些點上去救正。今後中國要以內地能够避開敵人主力攻擊的地點做中心，建築經濟的政治的組織，一切交通都集中在這一點。預定敵人把海口占領或封鎖以後，中國還能够存在若干時，這樣不獨內的統一可以做到，即外的獨立也可做到了。

二十二，十一，四，北平

☆

☆

☆

☆

「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可以實行麼？

梁子範

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的時候，他的開宗明義的話是：

「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民族和民權兩主義所包括的問題是諸種政治問題，我們姑且不談，我們在這篇文章所要

不對？

(2) 「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是否可以並且應當實行？

(一) 平均地權

關於民生主義的文章，除掉周佛海先生著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以外，據我所知道的只有馬寅初先生曾演講過一回「平均地權」。周氏的「民生主義」，大概因爲是在「流浪飄泊的生活之中著成的」（原書序），不但有好多拉雜及武斷的地方，而且他好像要借題發揮，處處去過他自己理想的社會主義的癡，對於「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本身的問題，他多未曾論及。馬氏那篇講演，除掉申述利加圖（Ricardo）的地租論以外，也只是東扯西拉說了一些隔靴搔癢的話。我們是不拜任何偶像的人，只想用真實的理論，憑着現實的情況，來討論民生主義的方法。

換句話說，我們要討論：
(1) 「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所根據的理論究竟對

我們先用中山先生自己的話，簡述一番平均地權的理論和方法。「中國到今日，雖然沒有大地主，還有小地主

。在這種小地主時代，大多數地方，還是相安無事，沒有人和地主爲難。不過近來歐美的經濟潮流一天一天的侵進來，各種制度都是在變動，所受的頭一個最大的影響，就是土地問題。……好像上海黃浦灘的土地，現在每畝要值幾十萬，廣州長堤的土地，現在每畝要值十幾萬。所以

中國土地先受歐美經濟的影響，地主便變成了富翁，和歐美的資本家一樣了。」中山先生爲防患於未然起見，因擬定一解決土地問題的辦法，那就是「平均地權。」「這種辦法是什麼呢？就是政府照地價收稅和照地價收買。究竟地價是照甚麼樣定法呢？依我的主張，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政府照他所報的地價來抽稅（值百抽壹），……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地價定了之後，我們更有一種法律的規定。這種規定是什麼呢？就是從定價那年以後，那塊地皮的價格，再行漲高，各國都是要另外加稅；但是我們的辦法，就要以後所加之價，完全歸爲公有。因爲地價漲高，是由於社會改良，和「商業進步」……照我們的辦法，都收歸衆人

公有，以酬衆人改良那塊地皮周圍的社會，和發達那塊地皮周圍的工商業之功勞。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將歸衆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參看國民黨改組宣言之「對內政策」第十四條及建國大綱之第十條。）

「平均地權」所包涵的經濟問題非常之多。我以爲要討論牠是否可以實行以及牠根據的理論對不對，非從四面下手不可：

（一）地主是否能報「折中的市價」？這既報的所謂「折中市價」將來會有什麼影響？

（二）地價的漲高，是否真正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漲高的地價，準準可以「完全歸爲

公有」麼？

（三）平均地權和貨幣脹縮及經濟恐慌——。

（四）怎樣處置收買的田地？

（一）地主是否能報折中的市價？這既報的所謂「折中市價」將來會有什麼影響？

供求律支配市價的成立，這是學過經濟入門的人都知道的。然而只說供求律支配市價，這話不但太籠統，而且對於我們所要討論的地價也沒有什麼顯著的補助。想要瞭

瞭亮地明白地主自己無估量「折中市價」的可能，非先知道下面三個市價分析不可：

(甲)支配供給和需求的各種條件。

(乙)市價對供給和需求彼此的關係。

(丙)各種市價經緯相繫的關係。

(甲)支配供給和需求的各種條件

(1) 支配需求方面的條件

第一：就本題所討論的地價說，支配需求方面的第一條件，要看需求地畝的多寡。在一個人煙少地畝多的地方，地價是不會太高的，因為需求隨時都可以滿足。反之，假若某村的農人大半都感覺耕種的田地不夠的話，那四圍的地價大約總比旁處高。

第二：要看需求者需要地的程度如何。大凡需要的程度愈高，地價愈高，反之愈低。譬如某閩老要想起一所寬大的住邸，（如起家廟，起官宅）已有的地基不甚够用，另外還要買一塊毗連的地方，那這塊小小的地方一定可以得價很高。

第三：要看需求者出價力量的大小。需求者需要的程度雖高，却沒有出高價的力量，那或者買賣不成

，或者賣主將就買主，將地價減低。反之假若某方興未艾的大銀行要買地皮的話，那所成的地價總容易高一些。

第四：鄰近的地價，也會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鄰近的地價低的話，需求地的人一定會試驗在鄰近而不在本處買地。

第五：要看需求地的目的，是否可以間接達到。假若需求的地是為種麥子，而恰巧從美國運來的麥子比自己收穫的還要便宜，那當然甯肯買舶來的麥子，不肯買地自己去耕種。

(2) 支配供給方面的條件

第一：要看賣主對那出賣的地畝會費過多少本錢。假若某人要出賣三年前費四百大洋買的，而中間復費了一百大洋改良過的一塊地皮，那他當然要試驗使賣價不在五百大洋以下。

第二：要看出賣地皮的大小。一個傾家敗產的人同時要出賣幾千畝，平均起來當然價錢較低。反之，若某人只出賣一畝地的話，他自然可以利用所有的機會，把賣價抬高。

第三：要看鄰近賣價的高低。鄰近賣價高的話，此處

也不能太低，反之，也不會太高。因為買主總是趨向賣價低的地方，這趨向不久會使賣價較低的地方的地價慢慢抬高，也會使賣價較高的地方的地價慢慢減落。

總之供給和需求的許多條件，一面彼此結合，一面彼此衝突，才會漸漸促成市價的成立。供給和需求的條件天天變更，所以市價也跟着天天不同，一成不變的市價是不會有的一樁事情。供給和需求對市價的關係既然弄清楚以後，我們再進而看看市價對供給和需求彼此的關係，以及各種市價經緯相繫的關係。

(乙)市價對供給和需求彼此的關係

要考究市價，對供給和需求自然應當注意，對已成的市價也不應忽略，因為已成的市價對供求是有密切關係的。市價高的話，供給多需求少；市價低的話，需求多供給少。所以市價和供求是互為因果，互相監束的；沒有連續不斷的過去的市價（即所謂 *Historischer Preis*），供給和需求不能憑空成立；沒有已往的供求的基礎，真正的市價也不會憑空成立。

(丙)各種市價經緯相繫的關係

上面那市價和供求的分析只不過是指着地畝一項說的

，實則市上十百萬的市價和他們的供求是彼此有連鎖相繫的關係的。牛肉貴了的話，所用的飼料也會慢慢貴起來的，因而種植飼料所得的利益就高，因而需求適於種植飼料的地畝也格外多，這種地畝的市價當然也會漸漸地抬高。這種例子，可以隨便添。

市價的成立，市價和供求及其他市價彼此的複雜關係，既然剖析清楚以後，我們當進而應用這個分析，去研究「平均地權」論所說的「折中市價」是否可以成立。照建國大綱第十條說，「每縣開創自治之時，必須先規定全縣私有土地之價，其法由地主自報之。」可見所謂「折中的市價」，是要一縣或一城的地主同時去估量來的。這種估量，表面看去，就像不違背常情，就像沒有什麼困難和妨礙似的。實則不然。叫一個地方的地主同時估量全地方的地皮是不會有「折中的市價」成立的；因為地主除掉拿過去的市價作個參考外，自己沒有出買的必要，他方也沒有買主的對象。那就是說地主並沒有供給和需求條件作個根據，只怕納稅或國家收買，才杜撰個價錢報告官廳。這種被迫而成的「報價」，既然不是由自然經濟趨勢促成的，牠的弊病以至於牠的不能存在，也必不久由自然經濟趨勢的變動而證明。因為一則供給和需求條件的變遷，會在數月

之內叫地主覺得有改那「報價」的必要，二則因為其他與地價的有關的諸種市價的變動，不久總會波及地價的，地價受了波及之後，地主自然也覺得有改那「報價」的必要。既然人民感覺有改的必要，自然會有醞釀，有醞釀以後自然會有民衆的反動，這反動在政府方面當然是不能漠視的，結果只有推翻已定的「報價」。旁的弊端，在後邊再談。

(II)地價的漲高，是否真正由於「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漲高的地價，準準可以「完全歸爲公有」麼？

地價漲高，當從兩方面觀察，一方從隨時變動的市情出發，一方從長期經濟趨勢的變遷出發。從市情出發，當然要先研究供求和市價的關係，以上面討論的結果，我們知道，地價受供求和其他市價的支配，隨時有降落或漲高的情事。那就是說，社會雖已改良，工商業雖已進步，地價會受供求及其他市價的影響因而低落。反之，社會並不改良，工商業並不進步，地價也會漲高的。所以按着市情說話，地價的漲高與否，與社會改良不改良和工商業進步不進步，不一定有直接關係的。

從長期經濟變遷的趨勢方面觀察，地價漲高是由於地租的產生。地租可分爲三種，即鄉地的地租 (Ricardo 及

Thunen)，城地的地租 (Weser 及 Hermann) 以及工商業

標準地，(Standar t) 的地租 (Roscher, Schunacher,

Alfred Weber 及 Predohl 等人)。我們先簡略分析三種地租

(另外還有礦山地租，比較起來關係小，所以不提。) 成立的條件，然後再說他們和地價漲高的關係。

鄉地的地租又可分爲三種，一種是由於種田本身的饒瘠而產生的。假若第一等的肥田可以滿足需求的話，地租不會產生的，趕到需求的田畝漸漸增加，那生產費用得多的二等地也要耕種的時候，耕種一等地的人才能得到地租，例如：

壹等田收穫壹百升麥子用壹百元的生產費。

二等田收穫壹百升麥子用壹百二十元的生產費。

三等田收穫壹百升麥子用壹百八十元的生產費。

耕種三等田的人收穫麥子的代價是當該只能抵償生產費的，他得不了什麼地租。耕種二等田的人，雖然少用了三十元的生產費，而得的代價却和耕種二等田的人相同，所以他結果得到三十元的地租。因爲相仿的情形，耕種壹等田的人可以得八十元的地租。所以地租是需求田畝增加 (人口增加) 及已成市價的結果。

第二種鄉地的地租，是由於種田擔當肥料及勞力等的

多少而產生的。爲的滿足較多的需求，墾種較次的地固然是個方法，在已耕種的地上加肥料和人工也是個方法。但由於收穫遞減律的影響，用第二個方法得到的產物並不能和加增的肥料及人工成正比比例。用人工或資力較少，而收穫却較大的地，因而產生地租。例如某甲在一方地收穫壹百升麥子，用肥料和人工等兩百元，假若他想在這地方收穫兩百升麥子他非用五百元的肥料和人工不可，因而他用第一回資力比用第二回資力的效力較大壹百元，也就是他從第壹回所用的資力得到壹百元的地租。

第三種鄉地的地租，是由於田地距城市的遠近而產生的，Thunen 在他的「Der isolie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schaft und Nationalökonomie」一書裏，分析得最清楚。假若有肥瘠相同的地兩塊，所收穫麥子的升數相同，所用的生產費也相同，而且兩個地主一定要把收穫的麥子在一個市上出賣，所不同的只是甲田較乙田遠一百里，甲田的麥子運到市上去的時候，多費十元。在這種情形之下乙田因爲離城近的關係，產生出來十元的地租。

城地地位的支配的條件約略如下（1）住宅區的空氣清爽與否，（2）住宅的日光够不够，（3）臨旁的街道吵鬧與否，（4）離城市中心的遠近，（5）離公共設施

（如電車）的遠近，（6）住樓的高低，（7）作廣告容易不容易，（8）運轉靈便不靈便等等。

工業標準地的分析，到了韋貝爾（A. Weber）才詳盡而有系統。選擇標準地的目標有三個：（1）原料標準，要看所用的原料便宜不便宜，（2）勞力標準，要看附近的勞力便宜不便宜，（3）消貨標準，要看出廠貨容易不容易消賣。總之，凡選擇工廠基地的地皮，必因着本廠營業的情形，生出來一種較周圍的地皮多的價值，這較多的價值，即是標準地之地租的源泉，那地租的高低完全看乎營業的好壞。

述完了地租成立的條件以後，我們進而看看地租和地價漲高的關係。凡生產地租的地，在出賣的時候，地主必索價較高，究竟高多少要看所產地租的大小，以及當時及當地的利率的高低。（所以平均地權也涉及資本問題，但本文的範圍不容談）假若有壹畝地每年產地租十元，而那周圍的利率是年利壹分，地主出賣這畝地的時候，當該多要壹百元，這就是所謂地租資本化。所以由長期經濟變遷的趨勢方面觀察，地價漲高是地租資本化的結果。我們由上面的討論，知道成立地租的條件非常之複雜，而且這些地租決不是一成不變的。農業化學及農業技術的進步，往往

可以改瘠爲肥，並且加增擔當資力的量，因而可以有新的地租產生。交通發展可以收遠爲近，新的地租雖可以產生，而舊的地租也可以因此消滅。餘如某工廠營業大盛的時候，那工廠基地的地租即抬高，反之必降落。總之地租的成立和消滅是繼續不斷的。（在共產社會，裏也要利用成立地租的條件，以保經濟的發展。）試驗找新地租的源泉，是使着經濟發展的吸引石，亨利喬治（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孫中山受他的影響很大）達馬什凱（Damasche）以及奧彭亥穆，（F. Oppenheimer: "Zodensperlehre"）未能認清地租，所以才有不勞而獲等離奇的言論。孫中山只談「地價漲高」及「社會進步和工業發展」不會剖析地租及成立地租的條件，所以才有沒收地價漲高的主張。實則地價漲高的原因，是不能以「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行」一類籠統的話可以解釋的；（孫中山從上海廣東等城市作出發點，也是使着他結論錯誤的一端。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當然要先研究農莊的土地。）而且由地租所促成的地價漲高，並不是千古不變的，牠也會在三年五載之內跌落的。漲高了的時候歸公，跌落的時候找誰呢？

假設按着法律，漲高的地價必須歸公，實際上國家或地方政府能得到不能得到這個漲價還是問題。由上面的討

論，我們知道地價漲高在買賣地皮的時候才變成明顯的事實。無論什麼買賣，買主想買價減低，賣主想買價提高，在買賣地皮也是一樣。現在張三要出賣他三年前會估價（即報給官廳的「報價」）兩百元的壹畝田，李四有心想買。假若張三該賣三百元的話，那他必須給公家壹百元。張三和李四是與衆相同的人，公益和私益分得很清楚，張三不願意把多買的壹百元充公，李四也不願意多出壹百元去買這畝地。在這種情形之下，張三和李四自然可以背地作弊，雖然實際的買價是兩百五十元，張三却只報說兩百元，李四亦公然和之，公家分文得不着，他們兩個每人却分了五十元。法律是當該順着人情和自然趨勢走直路的，不當取巧，也不能取巧，取巧必弊端橫出。

（Ⅲ）平均地權和貨幣脹縮及經濟恐慌

由上面市價，地租及地價漲高的剖析，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平均地權所根據的理論不健全，實行起來難以成功。但最足證明平均地權之錯誤及無實行之可能，尙在貨幣脹縮及經濟恐慌時期。我們在這裏用不着去仔細分析那繁雜的貨幣及幣制論以及那千絲萬縷的經濟起落，我們只要把貨幣脹縮及經濟恐慌對物價映射出來的影響指出，即足夠證明平均地權之毫無穩定的根基。在貨幣膨脹時期，最顯

著的現象是物價漲高，漲高的倍數要看貨幣膨脹的程度，這在德國戰後亂發馬克票爲然，在中國亂發銅錢或銀元票亦然。假若貨幣膨脹了十倍，則地價或其他物價也必隨之漲高五六倍或十二三倍不等。這類地價漲高是由於貨幣膨脹產生的，與「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是絲毫沒有關係，此其一。地價漲高的數目歸公，其他物價漲高的數目不理，這在情理上說不過去，此其二。假若政府袖手旁觀，這漲高的數目仍歸地主，那政府的稅收不是從百分一減到千分之一了麼？在旁的方面，貨幣消縮及經濟恐慌雖然是廻乎不同的經濟現象，然而他們最普遍的影響或結果却都是物價跌落。現在假設地價因爲貨幣消縮或經濟恐慌陡然跌落下來，從前報五十元的地，現在出賣只值十元，這四十元的差額，政府是置之不理哪？還是給增添上去？假若不理的話，那政府只知道沒收漲高的價格而不管跌落的價格，這種漁利不負責任的態度可使人民悅服麼？復次，地價縮到四五倍，稅也常照樣縮才對，那就是說報價五十元之地，現在只應當納一角不應當納五角的稅，假若政府不容許修改報價，也不減低稅額，那人民遭負擔的痛苦，能不抱怨政府麼？至於官方和人民應付地價起落的手續，我們完全不提。我們所不能不提的是不只中國現在的官民受不

了這手續的麻煩，連最有訓練的德國官民也受不了那麻煩

(Ⅳ) 怎樣處置收買的田地？

收買土地，需要財力。以中國現在的財政說，中國政府一半時是不會有這種財力的。現在假設政府有這種財力買了好多田畝，處置這田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總說起來，政府可以有三種處置的方法。第一，國營，就是國家用資力去耕種田地，這不但是孫中山所不會擬定的，也是和平均地權的原意，大相逕庭的，至於國營的弊端我們可從略不提。第二，租給農民種。不說租金的高低難定，只說農民懈怠，不盡心去耕種田畝，已經使我們知道這方法不妥。第三，國家仍然可以將收買的土地仍然出賣，但是國家賣價低的話，國家虧本，這是國家不能常作的事；他方賣價高的話，又有什麼人去買？而且這內中的手續又豈是中國目前的官吏和士紳所可以勝任的事情？

(Ⅴ) 土地問題不是整個的農業問題！

中國的農業問題非常之多，土地問題不過是內中的一個，把土地問題完全解決了，農業問題仍然還有與土地問題佔同樣重要的諸種問題等待解決。我的意思，要討論中國的土地問題最好在整個的農業問題和農業政策裏討論，這不是一篇短文裏所可作的事，所以我在這裏暫抱絨

默。我在這裏不能抱緘默的，除掉說「平均地權」不當而且不能實行外，還有兩點：第一，新的繼承法要真正在鄉下實行以後，中國的土地問題恐怕更糟而且更難解決；第二，土地問題雖然用政治方法可以解決，然而這種解決以後

的結果，不能不提前按着經濟的理論計算計算，所以對社會科學毫無研究的人，（閱獨立評論「西安通信之一」）不當該轉動一回腦海，就冒然擬出一些解決土地問題的包治方法來淆惑觀聽，

未完

編輯後記

編者

△本期論「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的長文，是梁子範先生從德國寄來的。梁先生是山東人，現在德國專研究經濟學，是一位家貧苦學的青年。

△陶希聖先生的「中國歷史上的集權與分權」是他在北京大學史學會的講演的綱要，承他寄給我們發表。這個題目太大了，這個綱要裏只能指出一些粗枝大葉的觀察，不能逐項詳細發揮。例如他的第一節說兩千年來的三種國家組織的形式，就可以做一部大書的題目。我們讀了這種雖然富有暗示性而不免太簡單的論斷，也許不能完全了解或同意。我們希望陶先生將來能有更詳細的分題討論給我們發表。

△校對是不容易的事。本刊近來頗多誤排的字，有些是「手民先生」不會依校樣全改的，可是有時是我們校對的

人的過失。上期瀟瀟先生的「原則政治」一篇裏（頁八，下十四行）有「財政沒有辦法，不能不到鴉片上去着想，猶之家庭經濟沒辦法不能不叫妻女去賣淫，子姪去竊盜」一句。第二個和第四個「不」字，是編輯人一時不小心誤加上去的。印出後，我們才發見無心中說了一句笑話。我們借此更正，並且向作者道歉。

△本刊第七十五號發表了君羽先生一篇討論鄭鶴聲先生「對於四庫全書輿論之評論的讀後感」的文字。鄭先生寄了一封長信來，對於君羽先生的話有一些答辯。這封長信寄來已好久了。我們想，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的事，現在已在上海開工攝影了。影印善本書的事，現在也已由北平圖書館和商務印書館商訂契約了。這個問題似乎已過了辯論時期。所以我們把鄭先生的來信擱起不發表。這個問題就算這樣結束了，——至少在獨立評論裏。我們希望鄭先生能原諒我們。（適）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再論建國與專制

胡適

工程師的任務

詠霓

蘇維埃聯邦之勞働政策

朱經霖譯

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可以實行麼？梁子範

歐美勞作教育的沿革(上)

邱椿

編輯後記

編者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天津	成華書局 進分社 燕大燕昌號
平西	清河書局 進分社	上海	現報部 新華書局 亞東圖書
天津	大學書局(代定) 聚元南開	南京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花牌中
鎮江	鎮江書店	蘇州	樓中書局(代定) 天一書店

徐州	開明書局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開明書局 真美善 金城	漢口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
武昌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興寧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梅縣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汕頭	神州國光社 現代書局

第八十八號

國民二十二年十二月廿四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再論建國與專制

胡適

上一期我討論蔣廷黻先生的「革命與專制」，曾提出一個主張，說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制。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比較更迫切的問題：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呢？

這個問題，並不算是新問題，只是二十多年前新民主報和民報討論的「開明專制」問題的舊事重提而已。在那時候，梁任公先生曾下定義如下：

發人其權力於形式，以束縛人一部分之自由，謂之制。專制者，一國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於被制者之外，而專斷以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者也。由專斷而以不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野蠻專制。由專斷而以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開明專制。凡專制者以能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飲水室文集，乙丑重編本，卷二十九，

頁三五—四一）

現時有些人心目中所懸想的新式專制，大概不過是當年梁任公先生所懸想的那種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標準的開明專制而已。當時梁先生又引日本法學者寬克彥的話，說「開明專制，以發達人民為目的者也」，這和現在一部分人所號召的「訓政」更相近了。所以當時民報社中，有署名「思黃」的，也主張革命之後須先行開明專制。當時孫中山先生還不曾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主張，那時他的三期論的第二期還叫做「約法」時期，是立憲期的準備。「思黃」所說，似是指那「約法」時期的開明專制。汪精衛先生在當時雖聲明「與思黃所見稍異」，但他也承認「政權生大變動之後，權力散漫，於是有以立憲為目的，而以開明專制為達此目的之手段者」。這正是後來的「訓政」論。

平心而論，二十多年前，民黨與非民黨都承認開明專制是立憲政治的過渡辦法。梁任公說：

若普通國家則必經過開明專制時代，而此時代不必太長，且不能太長；經過之後，即進於立憲；此國

家進步之順序也。若經過之後而復退于野蠻專制，則必牛革命。革命之後，再經一度開明專制，乃進於立憲。故開明專制者，實立憲之過渡也，立憲之準備也。（同上書，頁五四）

民報裏的「思黃」說：

吾信以爲欲救中國，惟有與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以開明專制，以爲與民權改民主之預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同上書，頁八一引）

民報與新民報走上了一條路線去了。他們所說的，其實不在開明專制，而在「最初之手段」是不是革命。梁氏希望當日的中國能行開明專制，逐漸過渡到立憲，可以避免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而革命黨人根本上就不承認當日的中國政府有行開明專制的資格，所以他們要先革命。汪精衛說：

論者須知行開明專制者必有二條件：第一則其人必須有非常英傑之才，第二則其人必須爲衆所推戴。如法之拿破崙第一，普之腓力特列第二，是其例也。（汪氏全文引見同上書，卷三十，頁三五—五八。此語在頁四七）。

當日的政府確然沒有這些條件，所以辛亥革命起來之後，

梁任公作文論「新中國建設問題」，也不能不承認：

吾蓋誤矣！……民之所厭，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同上書，卷三四，頁十五）

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政論之言，是值得我們今日的回憶的。二十多年以來，種族革命是過去了，政治革命也鬧了二十二年，國民黨的訓政也鬧了五六年了。當年反對革命而主張開明專制的人，早已放棄他的主張了。現在夢想一種新式專制的人，多數是在早一個時期曾經贊成革命，或者竟是實行革命的人。這個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驟變，也是時代變遷的一種結果。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憲是最令人欽羨的政治制度。十幾年來，人心大變了：議會政治成了資本主義的副產，專政與獨裁忽然大時髦了。有些學者，雖然不全是羨慕蘇俄與意大利的專制政治的成績，至少也是感覺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國將來試行民主憲政的無望，所以也不免對於那不會試過的開明專制抱着無窮的期望。還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倣蘇俄的一階級專政，或者意大利的一黨專政。他們心目中的開明專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時代那樣的簡單了。現在人所謂專制，至少有三個方式：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最近美國總統

的獨裁，是由國會暫時授予總統特權，其期限有定，其權力也有限制，那是吾國今日主張專制者所不屑採取的。）其間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國民黨的民主集權的口號是第二式；如藍衣社的擁戴社長制則是領袖獨裁而不廢一黨專政；如共產黨則是要一階級專政，而專政者仍是那個階級中的一個有組織的黨。

我個人是反對這種種專制的。我所以反對的理由，約有這幾項：

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二十多年前，民報駁新民叢報說：

開明專制者，待其人而後行。

雖然過了二十多年，這句老話還有時效。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國民需要較高的知識程度，他們不知道專制訓政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孔子在二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訴他的國君說：「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今日夢想開明專制的人，都只是不知道爲君之難，不知道專制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拿破侖與腓力特列固然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列寧與斯塔林也是富有學問經驗的天才。俄國共產黨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餘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

的。就是意大利的專制也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不要忘了，那個小小的半島上有幾十個世間最古的大學，其中有幾個大學是有近千年的光榮歷史的。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够資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與訓練的人才可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日夢想一種新式專制爲建國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時後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我們試看蘇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志的專政歷史，人才之外，還須有一個富於麻醉性的熱烈問題，可以煽動全國人心，可以抓住全國少年人的熱血與忠心，才可以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基礎。中國這幾十年中，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

「日救國」的口號也還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熱心。那一個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國問題還不能團結一個當國的政黨，還不能團結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最可痛心的教訓。這兩年的絕大的國難與國恥還不够號召全國的團結，難道我們還能妄想抬出一個蔣介石，或者別個蔣介石來做一個新的全國大結合的中心嗎？近年也有人時時提到一個「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裏，什麼口號都看得破，什麼魔力都魔不動，雖有臭索里尼，雖有希忒拉，雖有列寧杜洛司基，又有什麼幻術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向來崇拜議會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說那是人類政治天才的最高發明；向來攻擊議會政治的人，又說他是私有資本制度的附屬品；這都是不合歷史事實的評判。我們看慣了英美國會與地方議會裏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認那種制度是很幼稚的，那種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於說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話。照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資本主義的社會應該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應該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團」政治，不應該讓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都走到科學工業的

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統治國家。（柏來士 Bryce 的「美洲民主國」曾歷數美國大總統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會想到英國的政治領袖也不能比同時別種職業裏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蘭斯頓如何可比他同時的流輩如赫胥黎等人？）有許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斗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斗。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這種僻見，好像是戲言，其實是慎重考慮的結果，我認爲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者們

的思考的。

二十二，十二，十八夜。

工程師的任務

詠霓

(十一月十八日在北洋工學院講演大意略加補充)

我記得有一個故事：康熙帝南巡時，有一次在鎮江金山寺遊覽，看見舳艫如織，檣帆相連，江上人數甚多；他問一位寺裏的和尚說：你看那裏有多少人？那位和尚很哲理地答道，我看只有兩個，一個爲名，一個爲利。

新的光明。我想中國老式教育——讀書做文章——唯一的好處，只在叫人稍稍能够整理思想，說起話來還像一句話。但實在不易從書上得到實際的知識。除非少數天才能够跳出文字的牢籠。

我們也可學那位和尚的腔調，說中國人向來只有二種人，第一種與第二種。第一種人，就是讀書人，就是士大夫。那一種人從來是五穀不分，出門不能辨別東西南北，走三里路便要喘氣的。但是他們自有他們的本事。在從前——沒有與西洋文明接觸以前——他們的本事是能够讀四書五經，更好的能够讀諸子百家。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中國最早的文章，却也是相當的根據事實，從實際經驗上寫出來的，所以的確值得研究，他們所句藏的意義到今天還沒有研究定，還值得我們去用功。但大多數老讀書人往往不去搜求書上實際的意義，而只在做文字的工夫，所以讀來讀去只在這幾本破書，即使有所著作，汗牛充棟，也不過把這本書上的東西搬到那本書上，搬來搬去很不易搬出

自從西洋文化逼到我們不能不接受之後，我們便廢科舉，開學堂，拋了四書五經來讀外國的 Text books。不幸，讀的書雖然不同，而讀的方法往往相去無幾。因此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學生的程度愈高，與實際社會也相離愈遠。學校內讀完了教科書還沒有工夫到實地上去印證去應用，立刻又拿了那教科書去教別人。如此輾轉相傳，讀書與實際工作也愈去愈遠。要給這種情形找一個實例；我們只要想學採礦的學生，假使讀完了葛利普的本地質學教科書，再加上他的二本中國地質史，腦筋裏充滿了背脊上角滿身長刺怪動物的想像，背得出塞武紀海進志留紀海退一萬萬年以前的古地理圖，書固然讀得不錯了，但是從來不做一次好好的地質旅行，沒有看見過一塊磁鐵礦，不能分別一個接觸鐵礦與水成礦床，這樣知識試問是否有用。

幸而我們還有第二種人，就是不是讀書出身的老百姓，非知識階級。如果只從第一種人看，我們幾乎要想中國人是世界上極無用極無能的民族。試想國內國外大學內學機械畢業的有多少，其中有幾位會開機器廠，自造機器。用十分的力去學，却只拿一分力去用。幸而有第二種人足以證明中國人的能力。即就做機器說，天津便有不少鐵工廠，他們能做很好的鍋爐水泵等，我在河北山西許多煤礦裏都看見天津出的機器，我在四川都會見由天津買去的鍋爐，都說是價廉物美。但這是誰做的呢，天津許多鐵工廠裏面很少有大學專門畢業的技師，這許多機器都是沒有讀過教科書的技工從實地經驗上學來的工頭做出來的。

諸如此類，現在不是有許多人說是爲國防大計要辦酒精廠麼？今天一條陳，明天一計畫，到現在還只有一個酒精廠在漢口，還是法國人辦的。但我還記得六年前在黑龍江省大黑河附近，我曾親見一個資本技術完全中國人辦的酒精廠，機器設備十分講究，不過那位中國人字却識得不多，他是從俄國工廠得來的經驗，回國仿辦的。能仿辦便是能力，但他也只算是第二種人啊。

我們在礦言礦，第二種人也有許多貢獻。別的不談，只說江西湖南的鎢礦，足稱天下第一的豐富。他的發見，

既不是你們探礦家，也不是我們地質家，乃是在馬來半島開錫礦的華僑礦工，在外國認識了鎢礦，回鄉來時偶而發現的。因此我又想到在南洋群島游歷時的感想，儘管說是不平等待遇，中國僑民在社會經濟上還是佔第一等的地位，許多大糖廠橡皮業金雞納廠都是華人辦的。在中國租界裏有許多華人爲外國資本家做工，在外國殖民地內却見許多外國技師事務員爲中國資本家服務。這也見得中國人經營事業的能力不差，但這班事業家也都是第二種人。

因此，是否便可斷定中國人的天然能力本來很好，但都是都被不良的教育斷傷壞了？我想這個結論有一小部份是對的。但也不可一概抹殺，說中國教育完全不良。中國教育實在也有好的地方，所以效果不很良的原因還在乎教育出來的人不能好好的用，不能從實際工作上去磨鍊去發展，而專是從虛文或虛名上去活動，所以成了一種做裝飾品的特殊階級，而且有的時候做裝飾品都不很高明。因爲中國向來把第一種人看得太高了，小學畢業便稱先生，大學畢業便是專家，無論在何國溜了一趟，回來便非做教授不可。得志太早，便不上進。欲望太高，常易灰心。在一種專業上步步上進始終不息的，真如鳳毛麟角不可多見。青年人的進身只靠資格靠名義（靠人情的更不必論），不問

能力，不問成績，當然他們不肯努力工作，不能養成實在的知識和真正的能力了。第二種人却必須多少有些真本領才能吃飯，才能成功，所以天然的能力也就磨鍊出來了。

但是一個國家決不能專靠第二種人工作，而使第一種人完全寄生。尤其是科學發明之後，有許多事第二種人的習故蹈常不識不知的是做不下去了。例如湖南山西的鐵礦是中國從前很大的生產，他的生鐵和鐵器最盛的時代能够南到南洋西到新疆。但是因爲一切礦冶都在第二種人手中，二十年來沒有改良進步，老百姓們雖然家世其業努力工作，然而時代不對，新法的鐵又好又賤又多，老法的鐵業便不能維持了。新法開採大的鐵礦，如大冶，宣化，皖南等等，却都是曾受專門教育的地質家或工程師所發見，測量，估定的。新式的化鐵爐煉鋼爐更非讀過專門教科書的專門家來指導不可了。就是開煤礦亦然，有許多人還想開煤礦只要請唐山的把頭或機器師使行。其實只要規模略大一些，讀過教科書的先生們還是省不來的。所以我說中國從前只有二種人，第一種人在紙上做文章，第二種人在實地做工作。彼此幾乎各不相通，說話都彼此聽不懂

，不用說互相幫助。現在却要有第三種人，有知識更能實行，能做工還能研究。這就是你們工程師。工程師要有很高深的學問，但又要能够把這學問直接應用到實際問題上去。工程師是第一種人，因爲他們可以穿上長衫，到專門學會內與博士教授們討論學理，也是第二種人，因爲他們也能拿起斧頭，到礦井底下與工人們一起做工。

北洋大學是中國工科學校最老的一個，我雖然只到過二次，但可以說是認識很深的，因爲我在各省旅行，到過許多礦廠，從東北的吉林，到西南的四川，差不多到處看見北洋畢業的工程師，這也證明中國的工科教育在生產事業上實已有了相當的貢獻。而且我覺得真正在礦業上工作的，本國畢業的工程師比例的較外國畢業的更多，這即使不證明本國畢業的比外國畢業的更切實用，至少表示本國畢業的史多肯受較低的待遇，做較實在的工作。這便是大好事，因爲做事要少拿錢要多就是第一種人的大壞處，你們要做弟三種人，便應該以得了學問實際去用爲最大目的。在建設新中國途中，你們應該認識你們特別的責任，努力前進。

△ △ △

△ △ △

蘇維埃聯邦之勞働政策

中島仁之助著
朱經霖譯

(一)緒言

蘇維埃聯邦是人所共曉建設在共產主義秩序之下，企圖實現將來無階級社會的國家，這一層，所謂必須經過勞働階級獨裁的過渡階段，然後纔能完成前項理想的意思，乃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唱道的一點。因此，這種勞働階級獨裁的制度，構成了蘇維埃聯邦的基本特質，同時國家的組織和政策，亦于此有其一一切的基調，所以蘇維埃聯邦的勞働者，在法律，政治及社會上，保障着其他任何勤勞者所不能享受的特權地位。不但如此，即是從事同一的勞働，因其社會地位並非隸屬勞働階級而係一般的勤勞者，故其待遇即不若勞働階級的優厚；尤其是占國內住民大多數的農民，更受非常差別的待遇。此外能與今日勞働階級均當同樣特權的，僅不過限于特殊場合的專門技術家而已。要言之，蘇維埃聯邦的所謂勞働階級，乃是唯一的特權階級，這一點，當我們在考察蘇俄勞働情狀的時候，是必須緊緊牢記的。

蘇維埃聯邦的總人口，依據一九三二年的統計，約共

一六五〇〇萬人，其中三五〇〇萬人居住都市，剩餘的一三〇〇〇萬大多數人口，居住在地方農村。關於勞働或被雇傭登錄名冊的，有一八，一〇八，〇〇〇人，內中五，四一四，〇〇〇人，即屬所謂勞働階級。

(二)勞働時間

蘇維埃聯邦的勞働時間，一九二八年以前，由國際勞働局規定，還是蹈襲一般資本主義諸國所適用的一日八時間制的原則；但到一九二九年以後，採用了獨特的七時間勞働制。此項七時間制採用的根本動機，一半是由于蘇維埃聯邦反對資本主義諸國以世界不景氣爲口實，實施勞働的強化，因而要以知縮勞働時間的實例，誇示勞働階級專政國家的勞働者，是處于如何優遇的地位，所以多少含有幾分宣傳的意味。不過此外還有重大的理由，是在于藉此企圖抑止當時增加失業的傾向。總之，此項七時間勞働制的採用，從政治的見地來說，確是非常賢明的措置。勞働時間短縮的結果，蘇維埃聯邦的失業者是看不見的了；不過另一方面生產的發展，却因此受到相當的阻礙。再說當

時能够服從政府法令的，僅是少數大企業而已，所以對於七時間勞動制的採否，在蘇維埃聯邦國內，也似有相當的議論；且其實施的結果，從經濟上立論，也未必就算成功。但是政府爲更求於一年內遞減勞動時間起見，於是創例的採用了一週五日制。如此，知縮勞動時間所生經濟的損失，可以不斷運轉機械的獲益來抵補。就業勞動者分別編成六組，其中五組是繼續工作，餘剩的一組，彼此就輪流休息。可是不久，一週五日制，發生許多不使的缺點，因而又改行了一週六日制。爲什麼呢，因爲在一週五日制實施之下，早期日的休假，當然是廢止了，而同時除開列寧紀念日，勞動紀念節，革命紀念日等極少休日之外，諸如其他資本主義諸國含有宗教的乃至國民的意義那些祭日休日之類，概不存在；這種祭日休日過少的缺點，即可以用一週六日制來補救。

三 生產力問題

私的企業，在蘇維埃聯邦，因爲受着極大的限制，所以個人拔卒的動議權很少發動的餘地。一切事業，依據所謂社會主義的原則而規劃，所以像資本主義國家追求利潤那樣生產的刺激，是完全沒有的。於是，爲增加生產力計，不能不于追求利潤之外，另外找一個新的誘致動力。在

新經濟政策實施的當時，私人企業還能在可能範圍內有相當的許可，所以爲增加生產計，希冀發見替代利潤另一新的社會主義的誘因這種企圖，乃是當前頂緊迫的切要問題。該項新的企圖，自從一九二七年所謂劃期的五年計劃實施之後，總算是實現的了。迨一九二九年，前項企圖，更有長足的進步；所謂社會主義的競爭制度云者，即是耳。這種制度，以列寧工場及莫斯科同一工場之間所行的製品生產競爭，肇其端倪。此後，該項競爭制度，漸次形成組織的形態，迨至一九二八—二九年採用所謂工場協定制，更進一步達到了高度的發展。一九三一—三二年實施的工場協定制，包括擴張了的新團體協定在內，以迄於今。這裏，與社會主義的競爭相關聯而應爲特別記載的，即是突擊隊的組織。突擊隊是由從事產業的勞動者中，選出最富有社會主義熱情的精銳分子組織起來的；同時此外又與突擊隊的組織相呼應，編成了各種的「班」。例如：生產促進班，是鞭撻生產步調遲緩的工場，使之奮起追及一般水準效率而設的；作業監視班，是連絡工場內部的各部職工，使之益臻緊密而設的；品質向上班，是志在改良生產物的品質；合理化班，是以促進作業活動合理化爲目的。他如管理班，是監督工場的一般經營，對於諸種改善事項

予以必要的指示。如此，「班」的名稱，雖是各異而互有不同的功用，但是在社會主義產業的內部，極力企圖增進其生產能力這個中心目標上，是彼此完全同出一轍的。在現在蘇維埃聯邦國內，無論是若何的生產機關，沒有不設立突擊隊制度的；統計起來，總數大約超過三百萬。突擊隊員，是蘇俄勞動者中最自覺的活動分子，所以彼等于日常生活中，享受不少物質配給等特殊的待遇，并且保持着社會上高級的地位。

在經濟上否認私的動議權和排斥利潤追求的蘇俄聯邦，對於增加生產的誘因，這是當然的要根據與資本主義諸國完全不同的別種基礎，採用獨創的異樣形態。不過，這種新的企圖，究竟幾分達到目的，這是不易斷言的。就是拿實際的成績來說，在某一產業部門，固然突破當初的計劃而示生產的增加，可是于另一其他部門，就遠不若豫定的見效；不過平心而論，突擊隊及「班」的活動，對於蘇俄產業的生產增加上，具有促進的功用，這是不容疑慮的。不過這種增加勞動生產力新的企圖，有如史丹林所說那樣，並沒有獲得充分的效果；因此，蘇維埃聯邦的政府，不能不捉摸一個匹敵資本主義追求產業利潤，增加生產的強力誘因，將其改正而適用於社會主義的產業，這便仍然

是當前的困難問題。這個問題，蘇俄聯邦直到現在，尙未根本解決，並且成了產業上煩惱的種子；不過此次增加生產力的問題，因為新近差別貨銀制的復活，已經見了幾分實際的解決。

四 貨銀工資政策

蘇維埃聯邦勞動者的貨銀，原則上是以貨幣支給的。不過當革命後所謂戰時共產主義時代，曾經有過一時貨銀是以實物支給的。不久，新經濟政策時代出現，貨幣恢復了本來的機能，於是實物給付制度廢棄，以迄於今。貨銀的決定，是根據勞動組合和雇主方面——蘇俄聯邦勞動力雇主的機關，不待說，大部分是國營企業——之間的團體協約；但最低貨銀額，是由勞動人民委員會設定的。據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伊斯維基新聞的報載，蘇維埃聯邦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廢止勞動人民委員會，將其機能——包括社會保險的管理——委任勞動組合總評議會，果爾，則今後最低貨銀的設定，當然是歸屬總評議會的掌管。貨銀是全體分成十七等級；即不熟練勞動者是四等級，熟練勞動者是五等級，下級技術家是四等級，高級技術家是四等級。

十七等級標準的貨銀率，如左表：

指數	等級	不熟練勞動者	熟練勞動者	下級技術家	高級技術家
1.0	1	不熟練勞動者	熟練勞動者	下級技術家	高級技術家
1.2	2				
1.5	3				
1.8	4				
2.2	5	熟練勞動者	熟練勞動者	下級技術家	高級技術家
2.5	6				
2.8	7				
3.1	8				
3.5	9	熟練勞動者	熟練勞動者	下級技術家	高級技術家
4.2	10				
4.6	11				
5.0	12				
5.5	13	熟練勞動者	熟練勞動者	下級技術家	高級技術家
6.2	14				
6.7	15				
7.2	16				
8.0	17	熟練勞動者	熟練勞動者	下級技術家	高級技術家

上表是一般的標準數字，此外當然隨企業種類，勞動

九六〇〇萬盧布；同年靜養所的利用者，計有七九〇・四

條件，勞動契約內容等而有若干不同之處。居住蘇俄聯邦

〇〇人，避暑地的利用者，計有一一〇・〇〇〇人。前項

都市的一般被傭人數，依最近數年間月份賃銀的平均統計

數字，到次年一躍而增加為一・三三三・〇〇〇人及一八

，一九二七年是七四・六盧布，一九二八年是八〇・六盧布

七・六〇〇人；此等利用者中，百分之九十是屬於勞動者

，一九二九年是八五・六盧布，一九三〇年是九一・二盧

階級。靜養所，避暑地之次，尚有醫療問診所，疾病豫防

布。產業勞動者每月的平均賃銀，一九二七年是六四・六

等衛生設施；計一九三二年度，投資該方面的金額，幾及

四盧布，一九二八年是七・九四盧布，一九二九年是七七

九五・〇〇〇萬盧布。此外，又為勞動者階級建築住宅家

・六五盧布，一九三〇年是八三・三〇盧布，一九三一年

屋，設立學校圖書館等，支出巨額的經費。據政府公表的

下半年以後，是九九・八三盧布，由此觀之，可見蘇俄聯

數字，蘇俄聯邦勞動者享受的社會賃銀，平均每人約當貨

邦的勞動賃銀，數年以來，全體是顯有增加的傾向。誠然

幣賃銀的百分之二十四又四，即月額平均為十九盧布。

五 社會保險

，此種賃銀的增加，是由於盧布價值的跌落，而係物價騰

蘇維埃聯邦的勞動者，不問其業務之種類性質，報酬

貴結果的直接反映；不過在蘇俄聯邦，要是單以勞動者各

賃銀及契約期間如何，一律令其加入社會保險。保險的費

自所得的貨幣賃銀額，來測定其實際的賃銀，也是不得其

用，雖隨業務種類而別，但概由雇傭者方面負擔全額，不

當的。此外於貨幣賃銀之餘，蘇俄聯邦的勞動者，還在各

種社會的福利設施方面，受到附加的價值，名之謂「社會

的賃銀」。此種社會的福利設施，主要的有靜養所，避暑

臨時救濟金。勞動者如因作業中發生事故，因而致永久不

地等是。投于此等設施的金額，單是一九三一年度，幾達

能勞動者，可以享受同前賃銀的全額；其計算標準，是平

均事變前三個月的賃銀數而決的。因病致永久不能勞動的，按月支給十八盧布生活費，如無醫療費必要者，給以月額十二盧布的救濟金。又，病人如能從事比較輕易的工作者，接月額九盧布的扶助金。失業勞動者——目下無有——規定給付月額二五乃至三〇盧布的生活費。其他，兒童之產生，養育，死亡等，也規定支給若干扶助金或救濟金。社會保險的資金，依照昏盧布計算，一九二九年總額是一二五·八〇〇萬；一九三〇年是一七六，〇〇〇萬，一九三一年是二五七·三〇〇萬。保險者人數，一九二九年是一一六〇萬，一九三〇年是一四四〇萬，一九三一年是一六六〇萬。

六 職業組合

蘇維埃聯邦的勞動組合，稱謂職業組合；該項職業組合的數目，現在是四十四個，組織于產業的各個部門。勞動者雖然並不強其加入組合，可是因爲組合員能够享受種種特殊利益的結果，所以不啻就近于強制的性質。外觀上，職業組合的機構，與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組合，是大致相做的；不過從牠的機能及目的上來說，就有非常不同之處，這也許是根據蘇俄國家本質而生的當然的差別吧！詳細點說，職業組合雖然不是國家及黨的直屬機關，

可是牠與國家機關並立，構成蘇俄獨裁制有力的支柱。因此，蘇俄聯邦的職業組合，就不像資本主義國家勞動組合那樣，當做對抗雇主方面的鬥爭手段；因爲壓根兒在勞動階級專政的國家，支配的勞動階級與國家機關之間，是打成一片而無所謂鬥爭的。關於蘇俄制度下勞動組合的新機能，即在共產黨幹部之間，也有當初尚未充分認識的人士；例如考茨基，他就以爲勞動階級政權樹立之後，完全不必要有勞動組合的存在。關於這一點，考茨基是反對主張存續一九二一年勞動組合的列寧的見解，而以勞動組合的本質，堅決認爲勞動者階級鬥爭的解放手段；殊不知蘇俄制度下的所謂職業組合，與其常做勞動者擁護階級利益的手段，無寧說是作爲國家機關來得更有重要的意義，這種新的事實，是他當時完全沒有想到的。湯姆斯基 (Tomson, Michail 1880) 也是依然固執着勞動組合是階級鬥爭機關的見解，對於蘇俄制度下職業組合的新機能，始終就不能了解。他以爲職業組合既以擁護勞動者階級利益爲其當然的權利，本來的義務，所以要是他們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即便是對方是國家的場合，也是應該毫不躊躇，訴諸總同盟罷工的手段。信然，在新經濟政策實施的時代，即在蘇俄聯邦的內部，也還有私的資本主義殘滓的存在，

因此勞動組合也尚有與之繼續鬥爭的必要，所以考茨基，湯姆斯基的見解，就不能一概斥其錯誤。不過，自從五年計劃實施以後，事情就為之一變；于此湯姆斯基之受排斥，恐怕是活該如此。今日蘇俄聯邦職業組合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擁護勞動者的階級利益，防衛國家的榨取，而是涉及軍事，政治及經濟的全分野，強化勞動階級獨裁制這一點。不待說，職業組合關於勞動者雇傭，就業及決定賃銀等事項，它是與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組合相彷彿，盡着並無大差的機能；可是蘇俄聯邦職業組合最顯着的特色，即在帶有政治，軍事的性質。詳言之，即是職業組合，設立各種國防團體，射擊團體，半軍隊的體育團體等，助成其飛躍的發展。構成著名的國防飛行化學協會之組織的中堅

分子者，亦即職業組合的組合員。此外，職業組合又于社會福利方面，實行着相當驚人的活動，而訓練勞動階級教育的主要任務，也是由職業組合擔當的。

本此目的，在蘇俄聯邦到處的工場，設立着勞動者的俱樂部。此等俱樂部，對於勞動者的社會文化生活上，頗占重要的功用。俱樂部中，有通俗圖書館，讀書室，體操場等附帶的設備。其他，職業組合，又于大眾之間，努力根絕文盲者，或是利用設置運動場，召集體育競技會等，圖謀勞動者體質的向上，或是發行新聞雜誌，啓發勞動者的知識，故其活動分野，是多歧多端的。總而言之，職業組合這樣廣範圍的活動，其目的在求于勞動大眾之間，澈底散佈國家成立基調及其指導原理的共產主義的精神罷了

(未完)

「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可以實行麼？(下)

梁子範

(一) 節制資本

我們先用民生主義的字句，大體看看「節制資本」的意義。民生主義第二講說，「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為外國富，

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是節制私人資本，還是要發達國家資本。」何以要節制私人資本呢？「是要用一種防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何謂製造國家資本呢？就是「發展國家實業是也，其計畫已詳於建國方略第

二卷之物質建設。」怎樣去發達國家實業呢？「這三種大實業，（鐵路，工業及礦產）照我們中國的資本學問和經驗都是做不來的，便不能不靠外國已成的資本，……又不能不借用外國有學問經驗的人材，來經營這些實業。……這三種收用，（鐵路，工業，及礦產）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國家經營，所得的利益歸大家共享，那麼全國人民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

我以為節制資本的理想在中國是否可以實現，完全繫於兩個問題：

（I）外國的資本是否可以借得來？

（II）公私經濟究竟孰優孰劣？

我們先仔細討論這兩個問題

（I）外國的資本是否可以借得來？

投資事業的第一個條件，在乎投資者有信心，在乎他覺得他的投資安全，這是在國內和國際投資都可以時常觀察的現象。中國幾個資本家，把他們的資本偏偏喜歡投在租界裏的事業，雖一方由於他們的愛國心不強，而他方實在由於他們覺得投資中國他地的事業不大安全。德國在一九二四到一九三零吸引了不少的外資，因為外國的資本家那時對德國的政治和實業有信心。一九三一以後，那些資

本家相繼把他們的投資抽去，因為德國的政治和經濟情形使他們感覺不安。中國現在的情形怎樣？政治未上軌道，社會不安，經濟事業都站在風雨飄搖的當中，這種情形能够吸引外資麼？眼未離開現實的人，誰也不能說有那種可能。

在投資者有信心以外，還要看投資事業有沒有利潤的希望。那要興辦的實業的利潤希望愈高，吸引外資的力量愈大。反之，誰也不肯把他積得的資本送到賠本的事業裏去。中山先生之實業計劃裏所要興辦的實業怎樣？他要開三個大商港，他要修十萬英里鐵道，他要開運河，他要興辦鋼鐵業和礦業等。這種舉辦對中國的工商業當然有益處，然而對投資的外國人却未免太苦，因為這類舉辦或根本就沒有大的利潤可圖，或在十年三十年以後才許有點利潤。恰爾多智的外國資本家是不會進我們的圈套的。

經濟投資，沒有希望，只有政治借款有時可以引動外國人。屬於政治的事，我們暫時不談。

（II）公私經濟究竟孰優孰劣？

這是指所謂公經濟，是指看國家或地方政府所經營的經濟事業；所謂私經濟，是指個人或個人集和起來辦的工業企業。

私人經濟的原則，在迎合消費者的慾望和需要，去製造或運轉物品，從中謀利的。營業有沒有利潤，是各個企業或商店的生死問題，所以企業家和商人都兢兢業業的去整理他們的營業以加增利潤。他們一方面要力求出品好而且賤，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他方復利用新的發明新的技術等等去減低成本，以超出同業的競爭。合理化 (Rationalisierung) 是私人經濟的秘訣。這種息不休的推進力，是過去一百年經濟進步的源泉。至於求利潤的邪路以及弊端，在有力量的政治之下是可以制止的。政治上軌道，經濟是隨着政治走的。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 以及 Manchester 派的錯處，大概就在沒認清這一點。

公經濟是當以社會大眾的利益為原則的，冷眼看起來，似乎很討歡心，實行起來，却有好多難免的弊端：

第一：在官吏式的營業裏，不說營業者沒有企業家的膽識和經驗，他們也處處掣肘於政治，沒有全力以應付營業的可能。

第二：公經濟是以公衆利益為原則的，但是公衆利益有好多時候不容許你量。一條長而且廣，對轉運很利便的馬路，誰說對社會沒有利益？但這種利益誰能去直接量？誰能說這條馬路賜的利益比去年高？而且高多少？

第三：對公共有利的營業或興辦，往往不是在短時間可以收效的。闢海港，修運河，在十年二十年之後對公衆也許是很有利益的事，但目前是決乎看不到的，計算錯了，白費了開關費，也是常見的了。

第四：因為公經濟的利益往往不容許量，而且多在好久以後才可以實現，加上管理的不得法，所以營業的時候沒有一個實際的把柄，所以就生出第四個大毛病，那就是公經濟多流於不經濟。

因為公經濟有這許多病端，所以公共事業近來多趨於取長補短的公私合營制。

總之，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是不會實行的，試比較最近的「四年計畫」和從前的「十年計畫」，就可以看出了。整個的中國實業問題，當然不是本文所能涉及的。

中山先生對中國民族的功績，是千古照著，永不磨泯的事實，假若他還生在今日的話，中國的諸種問題也許都可迎刃而解。但是他講三民主義是為救國的，假若他知道，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不足以解決民生，不足以救國的話，那他一定會說：高尚的目的是不當移轉的，成事的方法是，並且應當隨着環境的需要而變更的。希望國人

和國民黨今後能體貼中山先生的真正目的，去努力作救國的大事，不要再拘泥紙上的文字，而貽誤國家的百年大計

。最後我用希臘哲人一句話，結束這篇文章：『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 (完)

歐美勞作教育的沿革(上)

邱椿

西洋勞作教育，導源於希臘和羅馬；據說當時的機械師，建築師，庖師，理髮匠等都有專校培養。中古時代僧院學校中亦略有勞作教育的萌芽；其課程除文法，聖經，修辭學等外，還有木工，銅工，紡織，成衣，建築，農藝等科。但中古以前，缺乏史料，其詳情殊難考證。茲從文藝復興時代說起，分七個時期，敘述歐美勞作教育的沿革如左。

(一)烏托邦時期的勞作教育。關於理想社會的名著，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當首屈一指。在這烏托邦內，每個公民都要熟練一種技藝和一種農作。教師常領導學生到農場和工廠內，觀察他人工作並隨時參加。拉貝來(Rabelais)在其理想教育制度內，規定教師應領導學生觀察鑄鐵，打銅，琢玉，雕刻，做金器的歷程；應使學生隨時留意織布匠，鐘表匠，成衣匠，印刷匠的工作。在校內，學生要學習木工，鐵工，塑像，農藝等。他以為這種教

育有三種教育價值：(1)增進學生對於產業的趣味；(2)豐富兒童的多方的經驗；(3)強健兒童的體格。培根在其新亞達蘭提司(New Atlantis)內，主張國家應設立研究院(Solomon's House)，實驗工業製造。闕盆尼拉(Camparella)於一六一〇年刊布其太陽城(City of the Sun)。在此城內，有六大畫壁，為實施成人教育的場所；在第六個畫壁上，張貼種種工業書片。城內最精良的技師常受政府任命，為全城學徒的教師。參觀工廠亦是學校內的正式課程之一。在安突里(Andreoe)的克里提安諾波里司(Christianopolis)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男生上午上課，女生下午上課；保姆和學者都是他們的教師。學生半日讀書，半日做工；所做的工作大抵為手工，家事，科學實驗等，每個學生可根據其天才以選擇職業。』在其提阿非亞司(Theophrastus)一書內，他主張學校應使學生熟習多種手藝，以訓練其機械的技能。這些烏托邦學者只標出

勞作教育的理想，但並無具體的計畫。

(二)十七世紀的勞作教育。甘米尼烏司 (Comenius)

在其大教育學 (Great Didactic) 內，主張設立四個職業學校，並介紹工藝和農作於普通學校的課程之中。他以為勞作教育有四種價值。第一，牠能適應兒童心理上的需要。

他說：「兒童歡喜將物件從某處搬至另一處，歡喜佈置傢俱，歡喜製作或拆散一件東西，歡喜結繩解繩等。這些都是兒童歡喜做的事情。這些活動都是心靈要表現於生產的徵象；我們不應阻止他們，而應鼓勵及指導他們。」第二，勞作教育能指導學生選擇其職業。他說：「學生應學習機械工藝最重要的原則，使他們在一方面能熟悉工業社會狀況，在他方面又能發見學生對於某種職業的特殊天才。」第三，勞作教育能增進學生健康。第四，牠能養成勤勞，忍耐，好動的習慣。甘米尼烏司是近代大教育家，其理論對於後來勞作教育之發展，有頗悠久而普遍的影響。

同時「百科全書」派的教育家，反對形式的古典的課程，而主張將工藝一科介紹於課程中。這派代表為摩爾呵夫 (Morhof)。依他的意思，教育應是多方的，課程應包含文化中一切要素。他以為課程可分為三大部：即自然，歷史，工藝。他所謂歷史，即是社會。後來蘇俄教育家分

課程為自然，社會，勞工三大部分和摩爾呵夫可算不謀而合。他又主張學校應搜集種種工業上器具與機械。

唯理主義者也提倡勞作教育，這派代表為笛卡兒 (Descartes)，來布尼茲 (Leibnitz)，洛克 (Locke)。笛卡兒主張設立工人學校。依他的計畫，工人學校應建築許多大廳，代表種種工業。各個大廳有一個博物館，一個研究室。在博物館內，陳列種種工業器具與標本。每個研究室內有一教師，其職務在解答工人疑問和指導其工作。笛卡兒弟子維格兒亦力倡勞作教育，他說：「學生應在工作 and 行動中求得智慧，知識與能力。知識不應自他人說話中尋找，而應自手工中求得之。」這段話頗能發揮由行而學的原則。

依來布尼茲的主張，凡不能從事理智工作的學生，應使其學習手藝。他以為強令貧賤低下者讀書，在學生為一種痛苦，在國家為一種損失。他們應學習技藝，才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在其法律新教授法一書中，他主張工藝訓練是普通教育的一個要素，自十二歲至十八歲的青年都應學習手工。

洛克以為手工教育不但有益於平民，而且有益於貴族。他說：「勞作教育有兩種利益。第一，技能的本身是有價值的。第二，勞作有益於健康。一個紳士應學習園藝，

畜牧，木工等。他可以指導園丁的工作，可以製作許多有用的器具。但製作並非主要目的。我的主要目的，是使紳士們在深思苦學而感覺厭倦時，可暫時轉習手工以增進其健康。」

在十七世紀後期，英國教育家因受培根和甘米尼烏司的影響，都極力鼓吹勞作教育。杜里 (Dury) 說：『學習工藝和科學，對於各種人民都有利益：(1) 平民學了，可從事於手藝和卑賤的工作；(2) 有知識者學了，可發展科學和訓練青年；(3) 貴族學了，可處理其平時和戰時的公務。』在革新的學校一書中，他主張從十三歲到十四歲的兒童之教育，應特別注重職業訓練。

當時還有一個教育家，名勃提 (Petty)，也是英國勞作教育的推動者。他主張設立一個「文學工廠」(Literatum Literarum)，其目標在使『學生能讀，能寫，並能謀生』。在這個新學校內，富貧子弟都可入學；實物的提示先於書本的閱讀；全體學生，不管其家長社會地位如何，都要學習工藝。至於應學習的工藝之種類有圖畫，雕刻，鑲箔，建築，造船，染色，鐘表製作，儀器製作等。他又主張編輯一本工業大全，詳述種種工業的歷史，機械，歷程，情況，報酬等。青年讀了這本書，可選擇其情願從事的職業。這是一個極好的建議，現代職業指導家也有提議

編輯這類書籍的。至於勞作教育的價值，他以為平民子弟可養成勤勞的習慣，富家子弟可獲得一種消遣的方法。那時詩人考來 (Cowley) 也鼓吹勞作教育。他在一六六一年刊布其哲學院計畫。該院分若干部，工藝是其中的一部。工藝部教授要研究各種工業製造的秘方和分析種種工藝品的成分。

這些教育家的理論在美洲引起同樣的教育思潮。哈佛大學校長郝爾 (Hoar) 曾久居英倫，感受該地教育家理想的影響，於一六七二年回美時，即建儀哈佛大學應建設廣大花園和機械博物院。一六八五年柏德 (Burd) 刊印其辦學計畫，他主張學校課程應包括各種工藝；工業和普通教育應完全合一。他說：『男生應授以手藝秘方：如打鐵，造鐘，紡織，做鞋，和他種技藝的秘方。凡學校所能教者，都應教給學生。女生應授以紡紗，織布，縫手套，做襪子，針工，編織草帽和籃子等，及其他學校能教的技藝。』他又說：『學生在上午應以二小時學習閱讀，書寫，簿記等；以二小時學習其所願學的美術、技藝，製造的秘方等。在下午，學生有二小時可吃飯和休息；有二小時可從事於其職業的工作。』這是他的工業與教育合一的具體計畫。

弗蘭克林 (Franklin) 在其學校計劃內，頗注重工業史一科。他說：『關於工業史的知識是最有用而最有趣的。商人學了工業史，更瞭解商品的質地；工人學了工業史，可利用新機械，新混合物，新原料以改善其工作；新製造法和新耕種法亦可由工業史中得着若干暗示。』在其改良潘錫外尼亞 (Pennsylvania) 教育意見書中，他主張生物學的教學應與農作取得聯絡。他說：『教生物學時，應同時教授園藝，接枝，種植；應領導學生參觀附近最優良的農場，觀察其生產方法。農藝的改良是利於社會全體的；農藝的技能至少是無害於任何個人的。』他又主張歷史的教學應與工藝有相當聯絡。教通史時，應同時教商業發達史，工藝發明史，工業革命史等。學生讀了這些歷史，對於工藝和勞作自然發生更濃厚的趣味。

(三) 十八世紀初期的勞作教育。十六世紀有勞作教育的理想，而無具體計畫；十七世紀有具體計畫，而未嘗見諸實行。至十八世紀初年，教育家始介紹手工一科於學校課程之中。勞作教育真正的開山祖要推德國的佛蘭加 (Franke) 和森勒 (Semler)。佛蘭加在哈拉 (Halle) 創設一貴族學校。在這個學校內，手工不是必修的正式功課，而是餘暇的選修學科。學生拿手工為一種娛樂，為一種有益

的運動。有時教師嘗領導學生參觀商店和工廠。該校又購置數架機器，並僱用一工人，教學生做木工鐵工等。後來又增設鑄銅，磨石，雕刻等科。至於勞作的價值，佛蘭加以為有五種：即強健身體，善用餘暇，鼓勵創作，訓練眼手，獲得正確觀念等。這個學校後來逐漸發展，稱為佛蘭加學院，也可算是全世界第一個勞作學校。

當佛蘭加在哈拉創設貴族學校的時候，森勒在同一地方創設工人子弟學校。他曾建議於市政府，設立「數理技藝學校」；市政府雖嘉獎其建議，而未能實行。於一七〇八年，他在家中開辦工人子弟學校，是時入學者只有十二人。他每週教課二小時，其內容為數學，機械學，手工，園藝等。翌年他介紹手工於普通課程之中。他以為手工不但有職業的價值，而且有普通陶冶的價值。這個學校因經濟困難，不久即停辦；但會引起很普遍的勞作教育思潮。一七三八年森勒又重新開辦其數理技藝學校。一七四〇年森勒卒，學校又停辦。森勒創辦的學校是德國實科學校 (Realschule) 的鼻祖。

森勒死後，能繼承其遺志而努力於勞作教育之發展的，首推赫克 (Hecker)。他於一七四七年創設「經濟數理實科學校」其目標『在使那些不能讀書而頗有經商，耕地

，做工的才能者，得發展其天才，並獲得初步的職業訓練。』赫克學校的組織和課程都頗複雜，對於後來勞作教育的推廣有很普遍而悠久的影響。

(四) 十八世紀後期的勞作教育。這個時期有一種自然主義和民本主義的思潮，對於勞作教育運動也有極大的影響。盧梭在一七六二年刊布其愛彌兒，對於勞作的價值大加發揮。他以為勞作教育可打破貴族階級歷來輕視手工的惡習；可以協助青年謀生；可以養成獨立自尊的觀念；可以訓練思想，增進健康，供給娛樂等。勞作教育的主要目標，不在職業訓練，而在文化的陶冶。他說：『我們要學做工人，尤其要學做堂堂地一個人；學做堂堂地人難於學做工人。』依他的意思，普通教育應和職業教育並流而行。

巴斯豆 (Basedow) 創設「慈幼院」(Philanthropinum)，將盧梭的關於勞作教育的理想實施於其學校。在慈幼院內，學生要熟練木工，鐵工，紡織等技藝，要隨着教師參觀工廠商店。第六年級的學生每季要和農夫同住兩星期，以獲得農業上的經驗。他們要野宿兩星期，在海口商店

及孤兒院住宿各一星期。最後他們要在法院內參觀一月。

巴斯豆弟子沙爾斯曼 (Salzmann) 在施耐分達爾 (Schneppenthal) 又創設一慈幼院。他的課程分爲三部：形式訓練，體育，手工；頗似現代葛雷制 (Gary plan) 的讀書，遊戲，做工。他以為勞作教育的實施可減少學校訓育上的許多困難。他說：『如果教師使學生於讀書完畢時熟練其手工，訓育上許多問題都隨着解決了。教師不必要爲學生找娛樂，學生會自求娛樂。教師不過是一個旁觀者，一個顧問。學生所得利益是不勝枚舉的。第一，學生活動的本能可以滿足，他們不會因活動受壓迫而倒行逆施。第二，學生獲得最純潔而最真實的愉快，即逐漸接近與達到其目標的愉快。在平常教育方法之下，學生只是盲目地服從他人的思想與指導。在勞作教育之下，學生自己形成其觀念，並發明工具以實現其觀念。』這段話是極合現代教育原則的。沙爾斯曼的同事波拉沙 (Blashe) 則主張以手工爲學校一切活動的中心。這種主張和現代勞作學校的理想完全吻合了。

(未完)

編者後記

獨立評論 第八十二號

編輯後記

△本期裏的一篇論「歐美勞作教育」的文字是北平師範大學教育學教授邱大年先生從美國寄來的。他受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補助，現在海外攷查「勞作教育」，這是他要著作的一部專著的一個楔子。

△「蘇維埃聯邦之勞働政策」的原文見於日本的「社會政策時報」的十二月號。

△「工程師的任務」的作者「詠寬」，多數讀者自然認得是翁文灝先生。他說，他自己不很得意的文字就用他的別號；更不得意的文字就用他種筆名。可是我們總覺得，他無論用什麼名字，他的文章沒有不值得細讀的。

(適)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至二五期及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現在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圖書評論要目

- 陽明：馮和法編中國農村經濟資料
- 阮毅成：民主議會政治下行政首領權力之擴大
- 趙奉生：張虹君譯近世政治思想史
- 陳恭祿：張德堅總纂的城情彙編
- 李惟果：海士蒙合著近代史之兩種譯本
- 張德昌：中美兩國文化的接觸
- 沈達材：顧實著中國文學史大綱
- 賀永年：盛成著我的母親
- 李嘉言：王禮錫著李長吉評傳
- 梁實秋：傅東華譯失樂園

訂閱價

本期零售大洋三角
國內半年一元二角
國內全年二元四角
國外半年二元四角
國外全年四元八角
第一卷合訂本上下兩冊特價叁圓

社址：南京將軍巷七號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
朝鮮台日國內
其租地每月一元三角
一租地每月一元三角
港澳門每月一元
元九角
蒙古庫倫每月一元
南洋歐美每月一元
四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

蔣廷黻

蘇維埃聯邦之勞動政策

朱經霖譯

歐美勞作教育的沿革(下)

邱椿

漫游散記(二十)金沙江

丁文江

編輯後記

編者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東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 王景華 侯記書局 | 公司 民智書局 | 街 新書局(代定) | 中書社 嘉陵書社 | 平利書社 志遠書社 | 中書社 青年書社 | 社 時代書社 農華書社 | 宣內 神州光社 | 廠 北平書局 星雲堂 | 永 燕大燕昌號 | 清華書社 | 天津 成文書局(代定) | 天津 大學書局 | 上海 精華印書局 | 現報部 新書局(總代售及代定) | 定處 光華書局 | 新華書局 | 鎮江 鎮江書局(代定) | 南京 中央書局 | 鎮江 鎮江書局(代定) | |
| 廣州 | 汕頭 興寧書局 | 廣州 神州國光社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廣州 新南書局 | 廣州 興寧書局 |

獨立評論

第八十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

蔣廷黻

近百年世界的一種大潮流是民族主義。未統一的國家賴此主義得有統一了，如德意志，義大利。已統一而地方分權的國家賴此主義提高中央的權力了，如日本的尊王廢藩，如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威的自然長進。在這種普及世界的大潮流之下，我們這個國家反從統一退到割據的局面。這是什麼緣故呢？

近代的國家每有革命，其結果之一總是統一愈加鞏固及中央政府權力的提高。帝俄已是一個統一集權的國家，但是現在的蘇俄更加統一，更加集權。德國革命後的一九一九年的憲法比畢士麥一八七一年所定的憲法就統一集權的多，而今年國社黨的革命又進一步。法國在十七十八世紀也已成爲統一集權的國家，但十八世紀末年革命的主要使命之一就是剷除各區域的差別，成立法人所謂一整個，不可分離的法國(France, one and indivisible)。我們的革命反把統一的局面革失了，而產生二十餘年的割據內亂。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這是一個何等痛心，何等重要的問題！中國士大夫近

年關於什麼政治經濟問題都討論到了，惟獨對於這個基本問題沒有人去研究，去注意。因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本國的政治沒有認識。因爲沒有認識，所以我們才高談，暢談，專談西洋的自由主義及代表制度，共產主義及黨治制度，而我們愈多談西洋的主義和制度，我們的國家就愈亂了，就愈分崩離析了。西洋的政治和中國的政治截然是兩件事。在我的眼光裏，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實，排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若忽略這個事實，不但現在的汪精衛，蔣介石，國民黨無能爲力，即汪精衛失敗以後的汪精衛，蔣介石失敗以後的蔣介石，國民黨失敗以後的任何黨，任何派都將無能爲力。

我們平素好罵軍閥——其實他們應該受罵；我們平素好歸罪於軍閥——其實他們真是罪惡貫盈；我們說，軍閥把中國弄到這種田地。這種話當然是有理的，但是反面的話更加有理；不是軍閥把中國弄到這種田地，是這樣的中國始能產生軍閥。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我們試先研究這種意態。

民國以來，我們政界有一種極普遍的現象。有許多軍閥高倡「保境安民」主義，如歷年的山西——稍有例外——，現在的山東，廣東，廣西諸省。最奇怪的是民衆渴望「保境安民」，不少的士大夫贊揚「保境安民」。民國以來的「模範省」和「模範省長」都是保境安民的省分和省長。我們仔細想想，這是一種什麼意態？軍閥割據的心理基礎不在乎此嗎？這種意態普遍的國家能算得一個「民族國家」嗎？這是有省而無國；軍閥利用之，於是成立割據。

我們反過來看看別國的形式又怎樣。法德兩國領土太小，不能與中國比，所以我們不必討論。俄國的面積比中國還大。上次大革命的時候，革命黨與反革命黨，一樣的，同等的，無偏安的心思，更無割據的心思。西比利亞，在中國軍閥的眼光裏，豈不是一個很好的地盤？當年白黨領袖柯車克 (Kolchak) 很可據此以成區域的政權。雖有人對他作種種建議，他和他的同志都以為這種計劃是反俄國歷史，背俄國民意態，斷乎不可爲，不能爲的。就是在西比利亞東部的無賴之徒，倘被日人利用以遂日人宰割的野心，無論日人怎樣聯絡，就爲俄國正人君子所不恥。白俄與赤俄雖勢不兩立，但兩黨均信俄國是一整個的，不可分離的俄國。爲貫徹主義而割據俄國，他們尚且不爲。

與我們比起來，真有天壤的分別了。此無他，中俄兩國人民的意態不同：中國人的頭腦裏有省界，俄國人的頭腦裏無省界。

我在留學時代，常聽外人談中國人畛域之見之深。我當時很不以爲然，心中常想外人的觀察是膚淺。等到回國以後，仔細一看，始發現外人的觀察實很深刻。中央政府的各部，無論在北京時代，或在現在的南京，部長是那一個省的人，部中的職員就以他同省的人居多，甚至於一部成爲一省的會館。在大學裏，同鄉會與各種學會同等的活動。一省之內又有同路或同縣的畛域之分。湖南有省議會的時分，議員就分東路中路西路而從事活動。現在何鍵在湖南的成績總算過得去，然而湖南士大夫批評者很不少，因爲他所用的的人大半是他同縣醴陵的人。

因爲中國人有省界縣界的觀察，所以割據得成家常便飯；又因爲中國人的窮，所以軍閥得養私有的軍隊。日本人費少許錢財，就能雇中國貧民來殺中國貧民，「聘」中國士大夫來對付其他的中國士大夫。這還算一個民族國家麼？「私有軍隊」這四個字就能大半解釋中國之所以產生軍閥。一般民衆既無國家觀念，又爲飢寒所迫，何樂不爲軍閥的戰品？自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軍隊裏面也有種種

救國救民的宣傳標語，好像中國一部分的軍隊已經革命化，國家化了。我承認我們的軍隊近年在意態上（當然也在軍器上）有相當的進步，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一班兵士倘有忠心，還是私忠（對官長）比公忠（對國家）要緊。我們更不要忘記公忠必須有相當的環境及相當的時期始能培養出來，不是你我寫一篇文章，演一次說可以喚起的。

總而言之，軍閥的割據是環境的產物。環境一日不變，割據就難免。在這種環境裏，無論革命家播怎樣好的種子，收穫的是割據的軍閥。

那末，我們要繼續問，什麼樣的環境，什麼樣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始能促成統一，避免割據？第一，我們必須有一個中央政府。我不求這個政府的開明，雖牠愈開明愈好。我也不求這個政府是英德俄式集權政府。近來福建標榜聯邦：如果我們中央的權力能如北美合衆國中央政府之權力，那我也心滿意足了。我只求中央能維持全國的大治安，換句話說，能取締內戰及內亂；此外，中央在其職權以內所發的號令各省必須遵從，換句話說，全國必須承認牠是中央。有了個這樣的政府，我以為我們的環境就自然而然的會現代化。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不是一個無爲主義者，我想適之先生也不是爲無爲主義而提倡無爲主義。我

不過覺得我們在此時候，不要貪多而全失。所以我所要求的是政治的最低限度的條件：換言之，有一個中央政府。

有了個這樣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業，及交通就自然而然會進步。甲午以前，維新派的領袖如奕訢，文祥，曾，左，李諸人都是在朝，在野的人十之八九都比他們還守舊。甲午以後，民間的維新運動就比在朝者急進多了。現在我們如能有個担任現代化事業的政府固好；沒有，只要政府維持大治安，民間的事業有民間的領袖會去推行。就是在這二十年的內亂之中，民族的基本事業如教育，工商業，及交通尚有相當的進步，不過爲內戰及內亂所阻，進步很慢就是了。一旦這阻力能除却，那我們的進步就會快的多了。在這裏，我們要注意，這種進步均是與割據的勢力相反的。一個現代的銀行和現代的工廠都是超省界的，甚至超國界的。一條鐵路的統一人民意態的功効是很大的。人民衣食有着而又受了相當現代化教育就不甘心作軍閥私爭的戰品。

以上我所講的都不成大問題。國人的意見也沒有什麼大衝突。引起辯論的是過渡方法的問題。適之先生相信我們不須經過新式的專制。他相信我們現在就能行，就應行維多利亞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代表制度。從理想說來，我

以爲這種制度比任何專制都好，從事實上看起來，我以為這種制度絕不能行。人民不要選舉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麼人。代表在議會說的話不過是話而已。中國近二十年的內爭是任何議會所能制止的嗎？假若我們能够產生國會，而這國會又通過議案，要某軍人解除兵柄，你想這個議案能發生効力嗎？只要政權在軍人手裏，如現在這樣；又只要民衆樂爲軍人所使用，又如現在這樣，你的國會有一連兵就可解散了。何況中國新知識階級對於這種古典的代表制度絕無信仰呢？

幾年前，適之先生還提議過割據的妥協。他的意思，就是割據讓牠割據，但大家成一妥協，一方面不彼此打仗，一方面共擁一個權力較小的中央政府。如能作得到，這個提議我倒贊成，因爲這種妥協能給上文所講的各種現代化的事業一個機會去長進。可惜這種妥協絕不能成立，正如國際裁軍會議不能成功一樣。

此外還有現在福建的方法，再來一次的革命。我認爲這個方法也行不通，因爲在現今中國這種狀況之下，一切革命都形成割據，都會內亂化。這是在本刊第八十期已經討論過的。

我以為惟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我的理由可以簡

單的說明出來。

第一，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市是專制的，省也是專制的。人民在國內行動不過從一個專制區域行到另一個專制區域。至於權利的保障，處處都是沒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大專制勢必取消各地小專制，不然，大專制就不能存在。從人民立場看起來，他們的真正敵人也是各地的小專制。正如英國的頓頭，法國的布彭，俄國的羅馬羅夫，他們專制的對像是各地的諸侯，直接壓迫人民的也是各地的諸侯，所以君主專制在這些國內曾受人民的歡迎。我們簡直把中國政治認錯了。我們以爲近二十年來想統一中國的人如袁，吳等把人民作爲他們的敵人。我們未免自抬身價了。嚴格說來，我們不配作他們的敵人，因爲我們有什麼力量呢？我們實際也不願作他們的敵人，因爲我們並不反對統一。統一的敵人是二等軍閥和附和二等軍閥的政客。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連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士大夫階級反對專制的議論，不是背西洋教科書，就是二等軍閥恐懼心，忌妬心的反映。中國現在專制的對像不是人民，是二等軍閥。從人民的立場看，個人的大專制是有利的。

第二，我們以為個人的專制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較高。破壞統一的就是二等軍閥，不是人民，統一的問題就成為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他們既以握

兵柄而割據地方，那末，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於公忠，以個人為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這個為中心的個人必須具有相當的資格，以往當局的人及現在當局的人是否具有這種資格，那是人的問題；我這裏所要討論的是制度的問題。適之先生引民報駁新民叢報的話來為難我，說：「開明專制者待其人而後行」。他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中國今日有無其人，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們要注意，我所注重的是能統一中國的

人；「開明」是個抽象的名詞，恐怕各人各有其界說。我們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凱及吳佩孚一流的人物，離統一的目的，僅功虧一簣了。

第三，不少的讀者對於我的「革命與專制」一文要問：二千年來的專制不濟於事，再加上一短期的專制就能濟事嗎？二千年來，中國有朝代的變更，無政制及國情的變更，因為環境始終是一樣的。現在外人除加在我們身上極大的壓力以外，又供給了我們科學與機械。這兩個東西不是任何專制政府所願拒絕的，所能拒絕的。就是政府完全無為，只要牠能維持治安，這兩個東西就要改造中國，給她一個新生命。

蘇維埃聯邦之勞動政策（續）

中島仁之助著
朱經霖譯

七 技術專門家的地位

蘇維埃聯邦的技術專門家，處于非常優遇的地位。爲什麼呢，因爲自從五年計劃實施以來，巨大建設事業的進展，感到了有能技術專門家的缺乏；因之使政府當局不能不講求優待技術專門家的手段。照現在授與技術專門家的特權而論，往往比勞動者還來得廣泛。例如一工場續動三

年以上的技師，得賜休假專心從事自己專門的研究；如轉職到他處工場，得保持其從前的特權。又如往僻遠地方勤務時，得增加其俸給，至三年續勤之後，賜以三個月有給的休假。此外，關於住宅的佔有，子女養育及教育，靜養所避暑地等設施的利用，食料品及日常消費貨物的減價，均與勞動者階級享受同樣的優先特權。

八 婦女及少年勞動者的狀態

蘇維埃聯邦的婦女勞動者，比較革命以前，顯有增加。成年的婦女勞動者，無論于法律及實際上，完全與男子勞動者享有平等的地位。一九三一年的婦女勞動者，約占全產業勞動者百分之三十七。

產業各部門婦女勞動者的數量，紡織工業是百分之六三·六，木材工業是百分之二六·三，金屬工業是百分之二四·九，炭坑工業是百分之二〇·五。照蘇俄聯邦勞動法典的規定，凡認為于健康上特別有工作過重及妨害的生產勞動及地下勞動，禁止用女工；關於夜間勞動，原則上也不許用女工，但實際上亦有例外。妊婦及授乳婦女的夜間勞動及工作時間額外的勞動，無條件概行禁止。從事肉體勞動的婦女，產兒前後各給與八個星期的休假；並且在此休假期內，可以支取工資的全額。從事事務或智能勞動的婦女，通例給與產前產後各六個星期的休假，但從事某種事務或智能勞動的如圖書館管理員，打字書記，電話接線員，巡回指導員，監察員等者，還可以與肉體的勞動者享受同樣的休假期。至於少年勞動者，則適與婦女勞動使用範圍擴張相反，比諸革命以前宛有天淵之別。具體的說，少年勞動者在一九一三年，占全勞動者總數百分之九

●八；現在呢，勞動者的總數雖是非常增加了，可是少年勞動者的比數，却是減少了很多。依據勞動法典，禁止雇傭不滿十六歲的未成年者，但于無妨身體發育而屬輕微工作的場合，允許經過醫師健康診斷之後，雇傭十四歲以上的少年勞動者。十四歲到十六歲年齡的勞動時間，一日是四點鐘；十六歲到十八歲年齡的勞動時間，一日是六點鐘。少年勞動者的工資，隨其勞動時間而定；工資率約占成人勞動者工資的百分之六十五。再因為少年勞動者大部分入工場附設的學校設業，所以實際的勞動時間是很少超過一日四小時的。

九 失業及其對策

蘇維埃聯邦的失業，在五年計劃尚未實施以前，很有相當的數字。當時，政府為抑止失業的增大傾向起見，曾經講究過千方百計的手段，但結果並無實效，徒然每年支出救濟失業事業巨額資金，使國家財政肩荷莫大負擔。迨五年計劃中巨大的建設事業漸次興工，失業者的數就急速減少；到現在非但無人失業，有時反感到勞動力供給的不足。雖然，蘇俄政府採取此項政策，很有點勉強之處；因為當資本主義諸國遭襲世界不景氣，大家正在苦惱于產業蕭條和失業的增加的時候，蘇俄政府採取該項對照的政

策，很有點因為希冀誇示其社會主義秩序下的產業比衆不同而有飛躍的發展，所以才這樣果斷的強行該項建設計劃。這一點，蘇俄的政策，與其從經濟的現實方面去求說明，無寧說是作用于政治的動機。惟其如此，所以五年計劃愈近完成，該項政策上破綻的傾向，也就漸次顯現了！因此，蘇俄政府改變從來的方針，採用了更加接近經濟的現實的政策。此項新政策，考慮的容納經濟的算計，要求各生產單位努力實行能率本位的合理的經營。雖然，欲求充足此項要求，必須要勵行廣範圍的產業組織的改造，而其結果，再度又顯露了失業的新徵候。但是，蘇俄聯邦自從五年計劃實施以來直到現在，並無失業的存在，縱然有時顯露若干失業的徵候，但不久即被克服，這是一個事實。今後的問題，就在這樣失業者絕跡的狀態是否能永遠繼續下去。這從經濟的觀點上看，很有疑問的餘地。爲什麼呢，因爲蘇俄倘若要使失業者絕跡的話，必須以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像過去那樣保持其地位不受世界不景氣的影響爲前提條件。可是世界不景氣的重壓正是日益深化，所以各國對於蘇俄聯邦生產物的購買力，往後將要愈形減少；果爾，則蘇俄聯邦建設計劃實現上必要的機械及材料之類的物質基礎，豈不是不能像從前那樣暢達的自國外購入而

成困難了嗎？老實說，今日蘇俄聯邦的社會主義建設，要不是依靠外國的資本和技術，它是不能期待其實現的；而且往後巨大的建設事業，恐怕隨其進展而增大其國外的依賴性，所以蘇俄聯邦祇要它于任一經濟的意義上不能完全自給自足，那麼無論它是怎樣社會主義的國家，畢竟終逃不出世界經濟的影響。要是標榜勞動階級國家的蘇維埃聯邦，也與它所攻擊的資本主義諸國同樣的存在着失業增大的傾向，那麼其及于勞動大衆心理的影響，怕是很深的吧！蘇俄聯邦的建設計劃，往往不能啣接經濟的現實，而動輒左右于政治的動機，這也許自有牠不得已的苦衷；這一點，可說是政途途上蘇俄聯邦最大的煩惱罷！

十 勞動者的一般生活狀態

一九三一年蘇維埃聯邦產業勞動者的平均工資，是月額九十八盧布。要是單就名目上的金額來說，月額九十八盧布的所得，比諸先進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所得，可謂毫無遜色。不過仔細觀察起來，蘇俄的貨幣與資本主義諸國的貨幣之間，很有購買力的懸殊。同時，蘇俄聯邦供給個人需要必要的消費貨物，比諸資本主義諸國，相形之下顯見量的不足和質的粗劣，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所以說，單以名目工資的數額，不足斷言蘇俄聯邦的勞動者簡直就已經處在實質上優惠的生活狀態。誰都知道現在的蘇俄

聯邦，施行着一種通貨管理制度。盧布的價值，不任自然的決定，改由人爲的即政治的決定。貨物的販賣，大部分均係國家獨占，甚至連分配和消費，都受着嚴密的統制；所以自由購買的餘地，可謂毫無存在。加之，政府爲實現龐大的建設計劃，不得不將必要的機械及材料，仰給于國外的輸入；因此爲了這層關係，就是犧牲國內的消費，也不能不極力勵行大量的輸出。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建設之飛躍的發展，和另一方面基於國內物資缺乏所生人民生活的窮狀，這兩種矛盾消息宣騰報章，正是前項理解的一種說明的借鏡。蘇俄政府當局豫言五年計劃完成之日，國內勞動者及一般大衆的生活標準，就可向上提高；可是實際上蘇俄政權基礎日益鞏固的今日，國內人民的生活狀態，反而愈形惡化，因此這種全俄官民的期待，祇得望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再求實現了！

十一 社會的文化設施

蘇維埃聯邦勞動者物質的供給狀態，雖然名目工資很高，但是因爲貨幣購買力微弱和國內物資極端缺乏的緣故，反倒處在並不怎樣良好的狀態。反之可是他們共同的社會的文化生活，却不能一概籠統的冠以貧乏之稱。政府爲勞動階級謀福利，投擲莫大的資金，用于社會保險，普及教育，醫藥扶助，改善衛生設備，建設住宅學校等大規模

社會的文化的福利設施。自來蘇俄政府的政策，與其說注重在勞動者個人的物質享受，無寧說是傾注心血在增進勞動者社會的文化的共同福利。于此，關聯前項社會的文化設施而應爲特筆大書者，即于蘇俄勞動者之間，已經完全剷除了文盲者。此外從前舊存的勞動者的陋屋，是已漸次絕跡了，同時曾爲富豪貴族住所的大邸宅，也爲勞動大衆實行了開放，並且新築的勞動者住宅，日在興丁建築之中。一九三二年支出建築勞動者住宅的金額，達七〇，〇〇〇萬盧布；雖然說盧布的價值，跌風很盛，可是這許多數額，很有可觀的了。再同年浴場及洗濯所的建設費，計五〇〇萬盧布，「兒童之家」的建築及維持費，計八七〇〇萬盧布，幼稚園的建設維持費，計二四〇〇萬盧布，此等款項均由社會保險金中支出之。要之，蘇俄聯邦勞動者享受的物質生活，雖然很有改善的餘地，可是社會的文化的

生活，就是現在已經頗有可觀的成績了！

最近，蘇維埃聯邦的工資政策，已見能有興味的轉向，並且又採用了視前適應經濟現實的方針。據一般人的推測，在新工資政策之下，因爲生產可期視前增加，所以勞動者物質生活的水準，也有提高的希望。蘇俄政府，向來當其決定工資之際，差不多無條件的信奉着馬克思所謂「

各人視其能力盡其所能，各人應其必要取其所需」的公式；但是現在呢，此項公式已不通行。一九三一年六月，自東丹林于國營工業理事會議席上發表有名的演說以來，蘇俄聯邦的新勞動政策，主張工資的高低，雖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也應該適應勞動者的作業程度而定，反對依照勞動者的必要而轉移。如此，機械的工資平等論，既被排斥，於是富有彈力性的差別工資制度，就被採用了！換言之，就是決定工資的指導原理，一反「各人視其能力盡其所能，各人應其必要取其所需」的舊公式，而換以「各人視其特殊能力盡其所能，各人應其特殊業績取其所需」的新公式。結果呢，重新引起勞動者之間的競爭，授有能力者以刺激和向上的希望；而同時于一般大多數勞動者的內部，形成了與資本主義社會勞動條件相似的不平等狀態。

十二 結論

蘇維埃聯邦勞動的一般情狀，已如前述約略的敘述過了。這不獨是勞動情狀如此，就是其他一切關於蘇俄的事實，莫不隨觀察者視線角度的差異，而有種種主觀價值的判斷。甚者竟至連對於同一事象的觀察，發生極端背馳的對立見解。就是姑且離開主觀價值的判斷，置身于蘇俄同一的立場，對於其所採的政策和設施，也還有種種問題的

餘地。至於從外部去批判，那是自然更甚于此。不過，本文的主旨，在求介紹蘇維埃聯邦勞動的一般實情，所以關於外部的批判，可俟諸異日再談。這裏，我們有一個比價值批判更重要的問題須待說明的，就是蘇俄聯邦勞動者的自身，對於其國家制度，懷抱怎樣的感情，採持如何的態度？這一點，須要稍為考察一下。

原來，蘇俄聯邦公然標榜係一勞動者階級的國家，所以對於規律勞動的國家機關和勞動力雇主的經濟機關——國營企業——暨勞動組合這三個機關，可以同樣看做是勞動者階級的機關。因此，在蘇維埃國家機關及經濟機關的勞動組合和對於各個勞動者關係之中，當然沒有像資本主義諸國那樣有階級利害衝突的存在理由。當否如何且不說，而在資本主義諸國的勞動者，目指雇主的資本家為其勞動的榨取者。勞資兩階級利害，根本對立，所以把對抗榨取者資本家的鬥爭，看做勞動者階級擁護其自身利益所不可避免的手段。這種見解，在蘇俄國家，是全然不允許的。今日蘇俄聯邦的勞動者，以為對於國家出以苟且的反抗行動，即不管是侵害勞動者階級全體的利益，結果呢，無異是自殺的破滅行為。這種見解，就是勞動者不這麼想，也要教他們去這樣想。這種意識，從所謂勞動者階級國家

本質上來推論，至少在論理上是正當的。加之，于此儼然存立着全世界無有比類發揮獨裁威力的國家的強權，所以蘇俄的勞動者，在這樣強權的威壓之前，充分知道自己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不過，以此就認為蘇俄的勞動者祇有用這種強權的威壓才能使之服從，那就是認識不足了。前項現實的國家強權之外，我們還不能不承認此外由蘇俄政府，共產黨及勞動組合三者協力而行的大規模的教化宣傳。該項憑全勞動大衆使之無條件信奉蘇俄現制度的各種教化宣傳的方法，實在不勝枚舉。大抵是利用一日中每分鐘時間和機會，在工場，事務所，俱樂部，劇院等場所，以講演，討論，演劇，電影，無線電話及其他方法，勵行各種教化宣傳。這種不斷的努力，在勞動大衆精神上的效果，可說是很大的。雖然，無論是怎樣大規模執烈的宣傳，也有牠自身的限度。我們若想像蘇俄的勞動大衆，沒有一個不謳歌現存制度，那也是不明事實真相。誠然，狂熱擁護現政權的支持者，在勞動者階級中當然是大有人在；不過他們是否堅持到底與現政權共一命運呢？這一層，就是蘇俄國家也把他们當做最富革命意識進步的勞動者階級分子，而絕對信賴其活動。然而，另一方面對於現政權表示不滿和敵意的分子，也有不少存在于勞動者階級的一

角中，這是我們不能抹殺的。這種不平分子，特別在從事季節職業的勞動者，或是報酬最低的青年勞動者，這般受國家恩惠比較稀薄的勞動者層中，較為多些。此外，雖然不敢表示積極的反抗氣勢，而對於現政權的成績，沒有什麼關心和興味的勤勞大衆，却比較廣範圍的更多些。具體的說，占國內人民壓倒的大多數，而在極度差別的待遇之下，度着困苦窮乏生活的農民，即其顯者的例子。雖然說同是勞動者階級國家那一句話，可是在蘇維埃聯邦占中心的特權地位者，任屬所謂勞動者階級而已，其他廣汎的勤勞大衆層，却完全站在下風的地位。如此，蘇維埃聯邦雖然以其所謂勞動階級革命的手段，廢止了資本主義的差別制度，可是另一方面，新的差別的制度，却又代之以起。今日蘇俄國內反動勢力的抬頭，即不外乎此種差別制度具體的反映。誠然，在目前，這種反動分子的勢力，還是很微弱，而且就其運動而論，也猶在潛行中秘密進行，就是一旦表面化，也不難一鼓蕩平，可是我們却不能因其微弱之故，把牠輕輕地看過；因為這是所謂勞動者階級國家所生新的社會的矛盾之必然的結果。這種社會的矛盾如不剷除，則恐蘇俄國內的反動勢力，往後將要有增無減。國家的強制權力和注射的教化宣傳，就是能够把反動勢力一時壓服或是緩和，但這些以上的效果，斷然不能達到。隨伴

新的差別制度發生了的反動勢力，要以何種應付策略去求
解消呢？這是蘇俄政權要求維持永續，然而不問其國家理

論如何，須待切實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完)

歐美勞作教育的沿革(下)

邱椿

(五)前期工業革命時代的勞作教育。所謂前期工業革命即自十八世紀末年至十九世紀初年的英國工業革命。在這時代，勞作教育中有三大運動：即工業教育運動，貧民教育運動，文化的工業教育運動。

這時期的工業教育之鼻祖，要推斯密司(Adam Smith)。依他的意思，自汽機發明以後，分工愈細，工作愈單調，工人理智上的發展愈受障礙。所以學校內應有勞作科目並應注重應用科學，以訓練學生思想，使其獲得理智上最豐富的發展。換句話說，自家庭工業衰滅以後，兒童已無手工訓練的機會；這種訓練的責任應由學校擔負，所以有勞作一科。那時民衆教育家蘭克斯持(Lancaster)首先介紹勞作學科於民衆學校之中。他教學生自己做鞋，做衣服，做籃子和其他器皿。另一民衆教育專家柏爾(Bell)在斯王內支(Swanage)亦創設一以工業為基礎的學校。社會主義者歐文(Owen)在紐哈莫尼(New Harmony)亦曾介紹許多勞作學科於學校課程之中。一八二三年柏白克(Bi-

lbeck)創立機械工程學校，其目標在使工人瞭解關於機械工程的基礎學科。這類學校在英美發達最快。

那時有些文學家也提倡勞作教育，其最著者有羅斯金(Ruskin)。他以為手工是發展思想與想像力之最有效的工具；手工教育可以化除勞心者與勞力者畛域。他說：『近來勞心者和勞力者的界線日見顯著。如果能使一切都變為優良的手藝匠，如果能完全剷除一般人輕視勞力者的心理，那是再好沒有了。』他以為手工有經濟的，道德的，藝術的價值。他說：『在我的體育計畫中，全國青年——從皇太子往下算起——應學習用手做精細堅實的物件，才知道精勤勞動的價值，並獲得關於許多事物的常識。結果，則中產階級的家長與子弟都能自製其傢俱，可以淘汰市上粗劣物品與器具之製造。』又說：『勞作最大價值在能防罪犯於未然；牠的功用是創造的，不是改造的。』依他的主張，每個小學校應有一個花園，一個遊戲場，一塊耕地，許多小工廠。他的言論影響於英國工業教育之發展極大。

貧民教育運動發端極早，在十七世紀初年英國已有許

多為貧民而設立的藝徒學校。在十八世紀後期，金德曼

(Kindermann) 介紹手工於教區學校內，使貧苦子弟半工

半讀，學生作物售得的錢，恰够學校一切費用。這類工讀

學校，在德奧會風行一時；後來因為牠們不能使勞作學科

與其他學科取得聯絡，漸為教育家所厭惡，也逐漸衰敗下

去了。裴斯泰洛齊 (Pestalozzi) 是最著名的貧民教育運動

家，他以為提高貧民地位的最好方法在介紹勞作學科於貧

民學校之中。在柏格多大 (Burgdorf) 和伊弗東 (Yverdun)

二校內，勞作學科有縫紉，刺繡，紡織，木工，園藝，農

作等。他以為勞作教育，不但有經濟的價值，而且有倫理

的與心理的價值。但他對於勞作教育的貢獻仍是間接的。

關於勞作教育有更直接的貢獻者為其弟子法倫柏格 (Fellen-

berg)。他以為工業的和農業的勞作是貧民教育最大的工

具。他說：『生活需要強迫我們從職業中找出教育的工具

；所以貧民子弟的職業教育應與普通文化教育取得最密切

的聯繫。』因此當兒童在田裏耕種的時候，他教他們研究

土壤的性質，土壤的成分，重量，化學作用，保溫量與保

水量等。又教他們植物學與植物構造等。在測量和區分田

畝的時候，他又教以數學和幾何學。這種以實際工作為中

心教學法是他的最大的貢獻。

文化的工業教育之先鋒是海星格爾 (Heinsinger)。他在

一七九七年刊布其利用兒童本能以引起活動一書，大意在

發揮手工對於文化陶冶的貢獻。他以為兒童有用手做事的

本能，利用這個本能以實施文化陶冶是教育最大的責任。

至於手工教育的價值，他以為有九種：(1) 能訓練思想

並防止兒童趨於懶惰；(2) 能滿足兒童運用心與手的本

能；(3) 能增進健康；(4) 能準備職業；(5) 能培

養審美觀念；(6) 能增加兒童對於精良物品的欣賞力；

(7) 能培養用手的與心理的技能；(8) 能獲得關於實

用學科的知識；(9) 能使教學的歷程在最自然而最直接

的狀態之中順利進行。他也主張手工教學應與他種學科取

得聯絡。

文化的工業教育之理想，海星格爾僅發其端倪，集大

成而卓盛名者為福祿培爾 (Froebel)。他從心理的觀點，解

釋勞作之教育的價值。他說：『請看！這個小孩在他的父

親的農場的旁邊，造了一個花園；他在轍跡裏或小溝裏，

開了一道小運河；他又在運河裏架起水車來，因此他瞭解

水的壓力；他有時又在小池裏浮起一塊樹皮以當小船。他

喜歡用泥捏成種種樣式的東西。無論什麼物件，他都想支

配，都想利用。在土山上他築構一個洞府，在山頂上他營造一個花園，並且擺着許多可坐的椅子。他常用木板，樹枝，竹頭，木屑等蓋造房子。到冬天他又常用白雪堆成宮殿與砲台；他又常用花崗石築成一坐古堡。」足見每個兒童都有好動的或勞作的本能，發展這種本能是教育最大的責任。福祿培爾相信勞作不但能增進體力，而且有利於理智的和道德的發展。他以為兒童不但應學習工業的勞作，而且應學習家庭內的勞作。他說：『兒童常喜追隨其父母兄弟從事於家庭內的種種勞作或職業上的種種勞作。這些勞作的參預，可發展兒童無窮的能力。』他的高足弟子如

Märeholtz-Bulow, Georgens, Hanschmann 等對於勞作教育的發展都有相當貢獻。同時海爾巴派 (Herbartians) 教育家如 Ziller 和 Barth 也極力提倡勞作教育。

(六) 後期工業革命時代的勞作教育。所謂後期工業革命時代即自十九世紀初年至同世紀末年的一個時期。在這時期中德，法，意，俄等國都努力提倡勞作教育，以奪取世界工商業上之優越地位。同時，英國想獨佔世界商場，政府與各大公司都極力獎勵勞作教育；在一方面創立許多工業學校和工科大學，在他方面介紹勞作學科於中小學課程之中。但在這時期內勞作教育最發達的國家，要算美

國，現略述其沿革如左。

在十九世紀初年，美國中部各省有種種勞作教育運動，其目標在使公立學校顧到農人工人利益，即在課程中設立有關於工業和農作的學科。一八六二年，美國聯邦政府通過地產與學案 (Land Grant Act)，令各省劃出公地若干項，作為興辦工業和農業學校的基金。後來各省都競設工業專門學校，農業專門學校，藝徒學校，工務補習學校等，對於美國工業的發達有極大的貢獻。

美國普通中小學校內設置勞作學科，以麻沙丘塞茲 (Massachusetts) 省為最早。麻省於一八七〇年通過一議案，令全省中小學校加授勞作學科，如圖畫，手工，家政等。後來美國各省都通過類似麻省的議案，勞作教育的空氣瀰漫全國。當時還有種種運動，足以促進勞作教育。第一為幼稚教育運動。亞得拉 (Adlea) 在紐約設立「工人子弟幼稚園」，其課程以遊戲和勞作為中心。後來，其他幼稚園競相仿效，於是最低級的學校也有勞作科了。第二為工業教育會的組織。一八八四年紐約省有工業教育會的組織，其目標有三：(1) 應用遊戲原則於手工教學；(2) 使幼稚教育與勞作教育合一；(3) 改進中小學勞作教育與師資訓練。後來各省都有此種會社的組織，對於勞作教

育的發達，頗有相當貢獻。第三為各地工會的活動。這些工會常要求學校設立勞作學科，凡未曾學習勞作學科者，工會不准其做工。第四為低能兒童教育運動。在十九世紀中年，西格英 (Seguin) 用勞作的歷程去訓導低能兒童，收效極大，頗引起當時教育家的注意，後來他進一步，主張勞作的歷程是訓練普通兒童之最好的方法。因受西格英的影響，許多學校漸注意勞作學科。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有些教育家以為普通中小學的勞作科，對於工業和農業的發達，仍無直接的影響；於是產生職業教育運動。當時各地職業學校風起雲湧，但成績最好而影響最普遍者為赫姆唐學院 (Hampton Institute)。該校創辦人為亞姆司特朗 (Armstrong)。他於一八六八年創設該校，專收容黑人，其目標在注重職業訓練。他說：『本校目標是極明確的：即在訓練黑人領袖，使其能為自身或教其他黑人成家立業；在使其能獨立謀生；使其尊重勞作並有勞作的技能；建設一個工讀機關，使學生不但能獲得謀生技能，而且能發展其性格。』一八七〇年黑人華盛頓 (Booker T. Washington) 又創立達司達李學院 (Insklee-gee)，其目標，組織，課程與赫姆唐學院差不多。這些學校都以勞作為一切活動的中心；學校房屋，傢俱，儀器

等多半為學生所自造。

(七) 二十世紀的勞作教育。在這時期內歐美勞作教育均有長足的進展。英國自一九一八年費休案 (Fisher Act) 通過以來，義務教育年齡延長至十八歲；凡畢業於小學校而未滿十八歲的青年，都要進補習學校，學習有關於勞作的種種學科。法國自歐戰後，各級職業學校頗為發達；但勞作學科在普通中小學校內毫無地位。意大利自法西斯蒂黨專政以來，各級職業學校極發達，對於該國工商業的進步，頗有相當貢獻。德國教育大家克欣斯太尼 (Kerschensteiner) 為「勞作學校」 (Arbeitliche) 的鼻祖。他最初在蒙欣 (Munchen) 辦補習學校，根據學生所營的職業，組織課程以適應其特殊的需要。結果極佳，他於是進一步主張一切學校都應以職業訓練為其主要目標。後來，他創立勞作學校，在全歐頗風行一時。自歐戰後，德國教育家更注意勞作教育，於是「生產學校」 (Produktionsschule) 又極盛行。丹麥的「民衆高等學校」亦是世界著名的職業學校，其課程亦以勞作為中心。

但勞作教育最普及的國家，要算美國。杜威於本世紀初年在芝加哥大學附小實驗其教育理想。他教兒童紡織，縫紉，烹飪，木工等，使其明瞭各種原料的性質與各種工

業進化的歷程。關於勞作的目標，課程，教學法等有極深入的理論。全世界的勞作教育都多少受其影響。同時職業學校亦日見發達。一九一六年米爾阿季職業學校 (Milwaukee Trade School) 成立，次年聖路易機械職業學校 (St. Louis Mechanical Trade School) 成立。其他各地的職業學校相繼成立，並都有省政府的補助金。

美國各省政府提倡勞作教育，不遺餘力。如康尼提卡提 (Connecticut) 省於一九〇三年曾設置一委員會，專調查工業教育的需要與促進工業教育的方法。一九〇七年該省省議會即通過「設立免費學校以教授工藝理論與實施」一案，於是全省工藝學校均受省政府的補助金。後來各省相繼設置委員會，並津貼工藝學校。美國中央政府對於職業教育亦有發給補助金的辦法。一九一四年國會設立「職業教育國家補助金調查委員會」。同年委員會報告調查結果，認為有補助的必要。至一九一七年遂通過著名的塞密司——休司案。依據該案條文，中央政府年出三百萬元，作補助各省職業教育經費。同時各省政府亦須籌足與中央補助該省政府的相等之數目，始得領取補助金。所謂職業教育，包括工業，農業，家事三種。

俄國關於勞作教育在歐戰前本有相當基礎，其手工教

授法，曾風行全世。自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全國教育以農工活動為基礎，其中小學統稱為統一勞動學校。自一九二二年實行新經濟政策以來，各級職業學校在數量上和質地上都有驚人的進步。自一九二九年實行五年計畫以來，整個教育系統都盡力發展勞作教育，以謀計畫之實現。五年計畫中有所謂文化計畫，關於職業人才的需要與訓練，都有極正確的估計與極精密的計畫。蘇俄現在的教育系統，上自研究院，下至第一級勞動學校，都以勞作教育為骨幹。

總起來說，歐美勞作教育約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十六世紀初年即有若干「烏托邦派」作家，討論勞作教育的價值。但彼等祇有勞作教育的理想，而無具體計畫。十七世紀的「唯實主義」教育家，鑒於手的訓練有裨益於心的修養，始擬出勞作教育的具體計畫。但彼等空有計畫，而未嘗見諸實行。至十八世紀前期教育家佛蘭加，森勒，赫克等，始介紹手工一科於其實驗學校之中。但這些學校中的手工，只是學生課餘之消遣品，只算課外活動。至十八世紀後期，平民主義的思潮甚為蓬勃，於是「慈幼院派」教育家始把手工列入課程內，作為一種正式學科。自工業革命後，工業教育，貧民教育，文化教育三大運動極為發達，

手工不但爲一種正式學科，而且變爲特種學校的課程內之中心學科。但手工教學祇限於特種學校，而未普及於公立中小學校內。至十九世紀中年，歐美各國始將手工一科列入普通中小學校的課程之中。至二十世紀初年，中央政府

又開始發給勞作教育的補助金。近來蘇俄教育，則上自研究院，下至幼稚園，都以勞作爲課程之中心。在蘇俄，除掉勞作教育，卽無所謂教育。這是世界教育新趨勢，亦是四百年來勞作教育演進之最後的與必然的結果。（完）

漫 游 散 記 (二十一)

丁文江

金沙江

東川巧家

會理盆地的東邊到坡和塘爲止。從此向東，上魯南山就走到金沙江的西岸。我前面已經說過金沙江在四川雲南交界的地方是一個馬蹄形的大灣子，馬蹄的缺口向北。我從金江驛向會理是在灣子最南的一點過江。現在從魯南山向東，又走到馬蹄灣子的東支。

從魯南山到江邊直線不到四十公里，其中却隔着從東北到西南的四道山：第一道就是魯南山本身，高出海面三千公尺有零；第二道是望鄉台，比魯南山還要高二百多公尺；第三道是大銀廠，高度和望鄉台相等；第四道是大麥地梁子，高度也在三千尺左右。魯南山與望鄉台之間是岔河的谷，在岔河村的上游高度約爲二千至二千四百公尺。

望鄉台與大銀廠之間是炭山溝，溝身與岔河相仿。這兩條河在岔河村的東面會合，同向東流到大橋村，再會從北方來的水向東南流，在象鼻嶺的對面，入金沙江。大銀廠與大麥地之間是鐵廠河的支谷，在鐵廠附近深不過二千一百公尺，但是鐵廠河本身向在南流，穿過大麥地梁子，在沙坪子與金沙江會合。

上面所講的地形，最足以注意的是各山各谷的深度大抵相等：山在三千到三千二百公尺；谷在二千到二千四百公尺。假如我們能用土把谷身填上一千公尺左右，這一帶的地形就變爲一個單簡的高原。不但如此。這幾條山頂上的地層全是平鋪着的；山之所以成功完全是水的作用。這就是說，未成山以前原本是一個高原，以後流水沖開了這幾條一千多公尺的深谷，谷與谷之間的高地統成功了「梁

子」。所以儘管各山好像是平行，實際上不成所謂山脈。尤其是鐵廠河的支谷很短。大麥地梁子和大銀廠在西南方面互相連接，平行的形勢更不顯明。

上面所舉的幾條水都是金沙江的支流。距金沙江不遠的地方牠們的谷身還有二千多公尺，而金沙江本身出海面不過七百多公尺！例如鐵廠河在鐵廠的高度是二千一百公尺，東南十六公里到沙坪子入金沙江高度只有七百三十公尺。平均每一公里低九十公尺。這還是就比較大支谷的平均谷身而言。若是以谷兩旁的山計算，距江水三公里的地方還有兩千公尺，從山到江，每一公里低五百公尺，坡度為百分之五十！

這又是地形上很重要的特點，就是金沙江的谷身是兩重的：第一重出海面二千多公尺，比山地低一千公尺，面積比較的平廣；第二重是在第一重谷裏面所鑿成的一千三百尺的峽江。

這是江的西岸。江的東岸情形也是一樣，但是表示得更為明顯。金沙江與東川（會澤縣）盆地之間有一條很重要的支流叫做小江，發源于尋甸。從南偏東向北偏西流，在東川西二十五公里象鼻嶺村的北面入金沙江。小江的東岸是一道南北行的高山。最高的峯叫做古牛寨，出海面四千

一百四十五公尺，是滇北最高的山。從古牛寨向西到小江不過十公里，而小江比古牛寨要低三千公尺，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三十。這可算是中國最深的峽谷——比美國著名的高老拉到（Colorado）大峽谷還要深一千三百多公尺。

從小江入金沙江的地方向南三十公里又是一片大山，東西長三十多公里，南北也幾十公里。山頂各峯平均在四千公尺左右。山以東是小江，山以西是普渡河，都是金沙江的重要的支流，而因為大山的間隔，兩條江之間，完全沒有交通。譬如從祿勸縣到東川，不是下到金沙江再順着大山北坡向東（這可要算世界上有數的難走的路），就是要繞山的南坡到嵩明尋甸。如此重要的大片山地却沒有一定名稱。東川府志上有所謂大雪山，風魔嶺，羅木山，大概就在這一帶，但這都不是山的總名。雲南軍用地圖上把牠分做兩部：東部寫做大雪山，西部樂英山。我測量的時候，土人都叫牠為老雪山。我現在姑且用大雪山的名詞來代表高山帶的全部，因為這是地理上天然的一個單位，應該要有總名，而大雪山與土人所說的老雪山相近。

大雪山以北，金沙江以東，小江以西，是一塊三角形的地方。三角的底部地形比較的不規則，平均高度在二千五百公尺。三角的上部却異常的平坦——在大山，深谷之中

自成一條兩千公尺高的平原。在平原中心的安樂箐，拖布卡都是古湖地，地下還出泥炭。而向東，向西，向北，不遠都下到小江或是金沙江的深谷，谷底比平原要低一千二百公尺。因為牠南北長而東西狹，北面在小江金沙會合的地方中斷，成功一個向北的尖子。土人叫牠爲象鼻嶺，我現在把這個名詞推廣到這一塊高原的全部上。

我于民國三年六月二十日下魯南山到了岔河。這是屬雲南巧家的村子。從會理向東川的大路是由岔河向東到大橋再向東南到蒙姑過金沙江，經過江東的那姑到東川城。如此不但路近而且比較的好走，因為蒙姑在象鼻嶺的下游，所以只過金沙江，不過小江。二來那姑在東川的西北，已經到了古牛寨大山的北頭，山不甚高。但是我是要到東川巧家所屬的銅鑛上去的。所有的銅鑛都在大路的南面，所以不走向東的大路，改向南經發窩到鐵廠。在岔河找人引路竟沒有人肯去，——從苦竹官村保護我過魯南山的兩個獍猴當然是要回去銷差，不能再送。沒有法子，問明白方向沿途走去，一直走到半路上的窄路箐纔找到鄉導。

西南幾省，各縣的界線往往很不天然。這一縣的村子有時陷在鄰縣的裏面，與本縣的地方完全不相連續。例如岔河已經屬雲南巧家。在他東面的大橋反屬會理。發窩則

附屬于大橋的安土司。這都是因爲各縣的界線原是各土司土地的界線。土司是封建式的地主，所屬的土地又因爲戰爭，承繼，婚姻，種種的關係，不免分裂。結果是甲土司的屬地混在乙土司的境內。這叫做插花，是地方行政的障礙。

雲南東山的銅鑛全在小江與金沙江之間的三角地帶，尤其在大雪山的北坡。惟有鐵廠在金沙江的西岸。但是這是各廠中出產最低的廠。我到那裏的時候，許多老礦已經衰歇，可以看的東西很少。只有在發窩和鐵廠的時候我走上望鄉台，大銀廠兩條梁子頂上測量，地形觀察很有趣。在這兩處不但都望得見魯南山，而且可以看見七八十公里以外在會理西北的龍爪山。向東看的時候江東的大山當然可以看見，尤其是古牛寨大山，高出衆山之上，容易認識。大雪山則因爲許多山尖高度相等，峯的個體不容易區別。金沙江相距不過二十多公里，都看不見——只能沿大橋河谷看去望見江兩邊峭壁下削，造成峽江的形勢。在大銀廠向東望，又可以知道所謂大麥地梁子，已經不是如大銀廠望鄉台的整齊；大橋河，鐵廠河，和南邊的一條短的岩壩河把牠切成功幾段。平均的高度也較大銀廠，望鄉台稍低。

從鐵廠到江東岸銅鑛去，應該順鐵廠河向東南在沙坪

子過江到拖布卡。我因為聽說沙坪子南四公里有個鹽井在江邊上，要去看看。從沙坪子去，陸地沒有路。沿江去是上水，而且在沙坪子未必找得着船。遂決意從鐵廠走大麥地小路直到鹽井。這條路極其難走，馱行李的騾馬恐怕去不得。但是從鐵廠到鹽井雖是不過二十六公里，從鐵廠到大麥地梁子，要上九百公尺；從大麥地到鹽井要下二千公尺。

沿路還要測量，一天是萬萬走不到的。半路上人家極少，沒有地方可住，一定要帶上帳棚。於是把大宗的行李用牲口馱着，一直向沙坪子過江去到拖布卡等着。我自己只帶兩個騾子馱着帳棚及必需的東西走小路向鹽井。第一晚在大麥地梁子頂上打野。上到頂梁的時候天還沒有黑，望的很遠。向東望得見二千二百公尺深的金沙江，並且看見江中心的石頭——著名的將軍石和江心石。向南望得見普通渡河的深谷。靠江邊還有許多綠色的樹木，夾着灰色的石頭。再上岩石變為紅綠色，樹木完全沒有了。到了對岸的二千公尺，岩石又變為黃色。紅黃色的江水在一條狹槽子面流着，兩邊是一千多公尺的峭壁。真是天下的奇觀。

晚間睡在帳棚裏，很是舒服，不料半夜裏下起大雨來，一直到早起纔歇。別的不要緊，帳棚被雨浸透了，異常的沉重，原來的騾子馱不動了。這本是常有的事。尋常都

是臨時雇人抬。在大麥地僱不出人來，而且要下大陡坡，更是困難。幸虧有兩個騾子，都馱得不重。只好把零碎東西解下求，叫馬夫和鄉導幫着措。一個騾子馱帳棚，一個帶馱帳棚的桿子。遇見難下的坡，兩個人伺候一個騾子，一個在前面拉住緝繩，一個在後面捉住尾巴慢慢向下移動。路不很遠，走了大半天，也就到了。

我仍然是一個人，在後面走的。走出大麥地，路完全在山脊上，高度總在二千八百公尺左右，並沒有多大的起伏。走了八公里，路忽然向下。到中梁子，兩公里半下八百公尺。從中梁子向南路又忽平。不久又灣灣曲曲的向南下。走了四公里下了二千公尺，纔到江邊！然後路轉了向東，在離江水四五十公尺的坡上走。路是從陡坡上鑿開來的，寬不過五六尺。許多地方又新被水沖壞了，缺缺凹凹極其難走，而且越向下走，溫度越高。在中梁子，下午一點鐘溫度不過二十四度。下到江邊，下午四點溫度到了三十三度。江在一個極深的峽谷裏面，下午四點已經看不見太陽。四點半走到鹽井，天已黃昏，我揹着許多儀器，穿着秋天的衣服，渾身都被汗濕透了。

到了鹽井一看，是一條狹而長的小街。一共不過幾十家子。大多數沒有房子，住在岩洞裏！在我到那里的時候

，街離江水還有十多丈。用的吃的水都得挑上來。吃當然是不可少的，用則就不能不節省了。但是天氣如此的煩熱，終年終日要出汗的。於是我看見很奇特的洗澡的法子。許多男男女女亦着上身聚在街心裏。一木桶的水，女人先替男人洗。洗完了男人再替女人洗！因為水是太可寶貴的，洗的時候不可不小心保存。岩洞裏太暗，點火費錢，只好在街上。街上太狹，帳棚支不起來。我只好在一個破廟裏。屋頂大部分沒有了，我睡在床上可以看着天上的星。

編者後記

△我們在本刊第一號的「引言」裏會說：「我們都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期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的這種討論是有益的。」——最近三號本刊裏我們自己因「建國與專制」的問題引起了一點辯爭，這雖然不算激烈，也正可表示我們「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的態度。

△丁文江先生的「漫游散記」，因著者遠游外國去了，中斷了幾個月。現在丁先生回來了，他想在這幾期中把

飯米是我們帶來的。此外一點任何菜都買不出來。

這幾十家人都是靠煮鹽生活。鹽水是開井得來的。用石頭砌許多淺的槽子，裏面舖滿沙子。然後把鹽井水倒在槽裏。晒上兩天，連沙子刮起來，裝在木桶裏。桶旁邊有一個小管子。沙子洗在桶底，鹽水慢慢的從小管放到鍋裏。鹽是惟一出產，也是惟一的貨幣。馬夫來告訴我，一斤鹽換九斤柴火。連他們買草鞋都是講多少鹽一雙！

編者

「金沙江」「東川銅鐵」兩題寫完，並預備把已發表的「散記」整理一遍，補作旅行地圖，先印成一部單本。我們知道這個預告一定是獨立評論的讀者很歡迎的。

△丁先生的「漫游散記」的（一）至（十九）登在本刊第五號至第五十三號。

△十二月十九日的大公報登有福州十八日電云：「陳銘樞發表談話駁胡適在獨立評論（七十九號）所載『福建的大變局』一文，謂為以懶惰庸俗的方法來分析革命，在現狀下尋求改良方法，是馬糞上裝金，與國家社會毫無利益。」陳銘樞先生的談話，我們至今未見全文。（適）

商務印書館出版

政法新書

大學叢書

歐美日本的政黨 彭學沛著 一册 二元八角
 國際公法論 李聖五著 上册 二元八角
 中國民法總論 胡長清著 一册 三元六角

政治學淺說.....李聖五著 一册 二角

中國政治思想史.....陳安仁著 一册 一元二角

近代歐洲政治史(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周鯨生著 一册 三元

現代國家自由論(社會科學叢書) 何子恆譯 一册 四角

各國民權運動史(百科叢書) 董之學著 一册 三角

中國內閣制度的沿革(國學叢書) 高一涵著 一册 一角五分

各國待遇華僑苛例概要(王爾摩編) 一册 二角五分

經濟帝國主義(百科叢書) 謝長偉譯 一册 二角

租界問題(百科叢書) 樓桐孫著 一册 二角

蘇俄制度汎繫制度與資本制度(社會科學叢書) Counts 等著 林光徵等譯 一册 七角

蘇俄革命之研究(新時代叢書) Miniko 著 一册 一元二角

蘇俄之歐洲國際關係(新時代叢書) 徐繼知著 一册 二角五分

最近中日問題(英文本).....桂中樞著 一册 二元四角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參與國際聯合會調查委員會 中國代表處說帖(中英文對照本) 二元五角

Memoranda Submitted by the Chinese Assessor to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三元五角

遠東鴉片問題(英文本).....羅運炎著 一册 一元二角

The Opium Problem in the Far East

日本在滿洲特殊地位之研究 Younger 著 葉天倪譯 一册 一元四角

最近歐洲外交史(新時代叢書) 高魯著 一册 三角

古代法(漢譯世) 鍾建閔等譯 一册 二元五角

法律現象變遷史.....朱章寶著 一册 三角

公法的變遷(漢譯世) 徐砥平譯 一册 一元五角

平時國際法(百科叢書) 鄭斌著 一册 四角

戰時國際法(百科叢書) 鄭斌著 一册 四角五分

國際私法(新時代叢書) 于能模著 一册 七角

不平等條約概論(新時代叢書) 吳昆吾著 一册 六角

中國刑法溯源(國學叢書) 徐朝陽著 一册 七角

行政裁判法(政法叢書) 美濃部達吉著 一册 一元二角

鄧定人譯

偵探學要旨(百科叢書) 張澄志著 一册 三角

美國警察行政(市政叢書) Graper 著 一册 四角